

拉丁美洲的 托洛茨基主义

[美] 罗·杰·亚历山大 著

商 务 印 书 馆

拉丁美洲的托洛茨基主义

[美] 罗·杰·亚历山大 著

高 钰 涂光楠 张森根 译

~~~~~  
本书是供内部参考用的，写  
文章引用时务请核对原文，  
并在注明出处时用原著版本。  
~~~~~

商 务 印 书 馆

1984年·北京

60787/4

13

出版说明

拉丁美洲是托洛茨基主义第四国际频繁活动的主要地区之一。从1929年起,拉丁美洲一些国家就相继成立托派组织。1937年至1940年,托洛茨基流亡墨西哥期间,曾亲自向拉丁美洲的托派分子宣扬其理论主张。六十年代以来,国际托派内部不断分裂,从而形成了三支不同派系的第四国际,即统一书记处派(以美国社会主义工人党为核心)、争取重建第四国际组织委员会派(以英国社会主义劳工联盟为核心)和波萨达斯派(以阿根廷革命工人党为核心)。分布在拉丁美洲一些国家的托派组织分别支持或隶属于上述三支不同派系的第四国际。

本书在综述托洛茨基主义和第四国际的发展概况以后,以阿根廷、巴西、智利、玻利维亚、秘鲁、墨西哥和古巴等国为重点,对托洛茨基主义第四国际自二十年代末至七十年代初在拉丁美洲地区的活动情况,作了详尽的论述,为我们了解并深入研究托洛茨基主义第四国际的产生和发展提供了比较系统的资料。

本书作者罗伯特·杰克逊·亚历山大(1918年——)是美国拉特格斯大学教授,曾出版过十几部有关拉丁美洲问题的专著,其中包括《庇隆时代》(1951年)、《拉丁美洲的共产主义》(1957年)、《玻利维亚民族革命》(1958年)、《阿根廷、巴西和智利的劳工关系》(1962年)、《拉丁美洲的政党》(1973年)和《拉丁美洲的土地改革》(1974年)等书。尽管作者自己标榜在书中作“尽可能地客观”的叙述,但是,他作为一个资产阶级学者,站在资产阶级立场上,对于托洛茨基主义的反动实质,对于托洛茨基与斯大林同志在

苏联社会主义建设问题上的分歧，对于托派在拉丁美洲国家的活动等，要做出中肯而客观的分析，事实上是不可能的。因此，读者在阅读本书时，应注意分析和鉴别。

为便于读者理解本书内容，译者加了若干脚注。

1982年6月

目 录

前言	3
第一章 国际托洛茨基主义的兴起和发展	7
第二章 拉丁美洲的第四国际派	50
第三章 托洛茨基主义、庇隆主义和阿根廷的民族革命	62
第四章 巴西的托洛茨基主义、热图利奥·瓦加斯和路易斯·卡洛斯·普列斯特斯	98
第五章 智利的托洛茨基主义	125
第六章 玻利维亚托洛茨基主义的创始	157
第七章 托洛茨基主义和玻利维亚的民族革命	181
第八章 秘鲁的托洛茨基主义	222
第九章 列夫·托洛茨基、迭戈·里维拉和墨西哥的托洛茨基主义	251
第十章 托洛茨基去世后的墨西哥托洛茨基主义	280
第十一章 古巴的托洛茨基主义、第四国际与卡斯特罗革命	302
第十二章 拉丁美洲其他国家的托洛茨基主义	330
后记	346
书目	348

前 言

托洛茨基主义在拉丁美洲左翼政治中力量很小，但是却已经坚持四十多年之久了，而且拉丁美洲人还帮助托洛茨基的第四国际成为国际共产主义运动中存在时间最长的持不同政见的集团。可是，关于世界一些地区的托洛茨基主义史迄今仍很少有认真的著述，更没有一部著作论述托洛茨基主义在拉丁美洲各国的地位。

我曾经有二十五年之久漫游、访问拉丁美洲各地，遇到许多信仰国际托洛茨基主义的人，并与他们交谈；我还长期与美国的一些托洛茨基主义者相识。虽然我时常同他们意见相左，我仍然认为托洛茨基主义是一个严肃的政治运动，值得仔细研究，并感到：他们向我谈的情况以及我若干年来收集到的书面资料，可能使我有条件写一部有关拉丁美洲托洛茨基主义运动的简史。

我在收集这一研究题目的材料中面临的一个问题是：许多有关的书面材料都是短期性的——传单、油印公报、或者只出了几期的报纸——这些材料大多数人不会想到去收集的。另一个阻力是由于第四国际的保密考虑而造成的。就这一点来说，第四国际分子使用“党内姓名”的做法是很普通的。举个例子，在阿根廷托洛茨基主义运动中，利沃里奥·胡斯托被人称为“贝尔纳尔”或“硬木头”，奥梅罗·克里斯塔利在三十年代和四十年代通常只叫作“奥梅罗”，其后他只使用“J. 波萨达斯”的名字。我还发现，要得到托洛茨基主义运动下属组织的确切党员数字和组织规模，实际上是不可能的，甚至想得到一些会议的地点、日期和出席人数的情况也

不可能。幸而，这方面的问题主要由一些非托洛茨基主义者的朋友们帮我解决了，他们把自己保存的一些有关材料提供给我；还有一些国家的许多第四国际成员或以往的成员帮助我，他们让我去采访并提供详尽的文件材料。

有关托洛茨基主义的任何书籍中都有一个重要的用语问题。列夫·托洛茨基的信徒们把自己称为“托洛茨基主义者”，而左翼力量中反对他们的人则称他们为“托派分子”。我作为一名老的社会民主党人自然习惯于使用“托派分子”一词。但是，在本书中，出于对我交往过的人们的礼貌，我设法采取一个妥协办法：两者兼而用之，有时用这一个提法，有时用另一个提法，视具体内容适合而定。

在作品内容涉及争论很大的组织的时候，作者理应说明自己的立场。我从来不是一个托派分子，我成年以后的大部分时间一直加入社会党和社会民主主义联盟，这些左翼组织都是反对第四国际分子的。在本书中，我尽可能采取客观态度，当然，完全不偏不倚也许是不可能的。

自然，我非常感谢许多帮我收集材料和提供编辑意见的人。其中有些人是老朋友：我的同事萨姆·贝利教授，他提供了许多关于阿根廷的材料，并帮我同那里一些老托洛茨基主义者进行联系；我过去的两位学生彼得·洛德和欧文·鲁宾斯坦，现在都是美国的外交官，在我写到有关国家时，他们都提供我他们当时工作的那些国家的极有价值的材料（不属保密范围）；一位阿根廷朋友达尔多·库内奥帮我得到他国内一些有用的资料；墨西哥的罗德里戈·加西亚·特雷维尼奥帮助我获得他国内托洛茨基主义的材料并提供有关托洛茨基在墨西哥居留的一些深入的情况；一度担任过危地马拉共产党领导的卡洛斯·曼努埃尔·佩列塞尔提供了关于古巴托洛茨基主义的有意思的情况以及关于墨西哥托派分子参加危

地马拉游击运动的情况。最后，我必须提到我的好朋友马克斯·沙赫曼，他过去是国际托洛茨基主义领导人和托洛茨基的遗嘱执行人，他给我提供了有关第四国际运动的第一章概况的许多材料，他读了第一章的内容并提出了意见，还提供了关于墨西哥托洛茨基主义的有价值的材料。

还有一些人是我写这本书的时候才认识的。年轻的古巴流亡者纳尔逊·巴尔德斯帮助我得到有关古巴托洛茨基主义的一些重要的资料。一度是阿根廷主要托洛茨基主义者的利沃里奥·胡斯托，寄给我一批极为珍贵的有关阿根廷托洛茨基主义运动的他本人的小册子和书籍；拉特格斯大学的一位玻利维亚学生爱德华多·米歇尔帮我获得了一份利沃里奥·胡斯托对玻利维亚托洛茨基主义的研究报告。一度曾担任第四国际驻墨西哥代表的查尔斯·柯蒂斯也非常合作，他通过通信和一次采访向我提供了有关托洛茨基在墨西哥居留以及墨西哥托派分裂的重要情况，并使我能接触墨西哥托洛茨基主义运动的一些老领导人。墨西哥托派的前总书记费利克斯·伊瓦拉把我介绍给他在那里的一些过去的同事们；另一位过去主要的墨西哥第四国际分子奥克塔维奥·费尔南德斯接受我几次访问，并允许我对他收藏的有关三十年代和四十年代墨西哥托派极有价值的档案进行摘记。

我还必须感谢《洲际新闻》主编、目前还是美国社会主义工人党重要人物的约瑟夫·汉森，他同意我进行一次采访，寄给我有关第四国际各派系之间分歧的材料，并惠然阅读了本书介绍国际托洛茨基主义一章的初稿，提出了意见；他的夫人里巴·汉森使我得到了第四国际统一书记处派下属组织出版的若干欧洲期刊的档案材料。同样，工人同盟的露西·圣约翰允许我使用该同盟有关英、法相应组织出版物的档案。最后，里弗赛德加利福尼亚大学的罗纳德·奇尔科特惠然寄给我有关巴西托洛茨基主义的极有用处的

资料。

不用说，这些人谁也不对本书中的内容承担任何责任。不论出现什么错误，当然还有书中提出的判断和意见，都是属于我本人的(除非另行说明)。

最后，我必须感谢我的夫人琼和我的两个孩子汤尼和梅格，他们忍受了我在写作本书期间一心关注写作，而从他们的观点来看，我应当做一些更有趣的事情，而不是在打字机上敲敲打打地写那些同他们的思想距离很远的事情。我感谢他们可爱的耐心。

罗伯特·J·亚历山大

1972年9月于美国新泽西州新不伦瑞克的拉特格斯大学

第一章 国际托洛茨基主义的兴起和发展

作为一种国际政治运动的托洛茨基主义，发端于本世纪二十年代后期苏联共产党内的权力之争。从那场激烈的斗争中出现了三大派别，它们在苏维埃社会主义共和国联盟境外又有各自相应的派别。

获胜的一派，聚集在斯大林的周围并完全受他的支配。这一派控制了苏联共产党和 1919 年在列宁领导下组成的共产党国际（第三国际或共产国际）。苏联党内的所谓右派——最著名的人物是尼古拉·布哈林、安德烈·李可夫和米哈伊尔·托姆斯基——在国外有它自己相应的派别：国际共产主义反对派，虽然苏联的右派同国外的右翼反对派看来并没有直接的联系。苏联境外最重要的右翼反对派是德国的一支，其领导人是海因里希·布兰德勒和奥古斯特·塔尔海默；和美国的一支，其成员通常被称为洛夫斯通分子（因他们的领袖杰伊·洛夫斯通而得名）。洛夫斯通原来是美国共产党总书记，后被开除出党。到了第二次世界大战初期，右翼反对派作为一个国际性的运动已经消失。布兰德勒—塔尔海默派流亡分子分散在各地，他们的主要领袖、瑞士人朱尔斯·亨伯特—德曼茨加入了瑞士社会民主党；美国的洛夫斯通集团则在 1939 年决定解散。

在反对派的另一端，列夫·托洛茨基在国外的追随者最初组成了国际左翼共产主义反对派，继则在 1938 年之后组成了第四国际，这一派更为重要，更为持久。他们把至少六个西欧国家、若干

亚洲国家和西半球的至少十个国家中的小组织和小党派成功地聚集在一起。其中的两个党——锡兰和玻利维亚的党——一度在短期内成为它们各自国家政治生活中的主要力量。在本世纪六十年代初,苏联和中国公开破裂之前,托洛茨基反对派一直是活跃于世界范围内最重要的共产主义不同政见者。

托洛茨基和俄国革命

列夫·托洛茨基是1917年11月布尔什维克革命的主要领导人之一。然而,他直到推翻沙皇五个月之后的1917年8月才加入了布尔什维克党。在此以前,托洛茨基在俄国马克思主义队伍中的布尔什维克和它的孟什维克反对派之间保持一种或多或少独立的立场;后来,在他同那位老布尔什维克斯大林的斗争中,上述情况对他很不利。

在十一月革命之前几个星期,托洛茨基被选定来领导布尔什维克刚掌握多数的全俄工人、士兵代表苏维埃革命军事委员会。是他组织了实际上发动1917年11月7日布尔什维克政变的赤卫队。在弗拉基米尔·伊里奇·列宁为首的布尔什维克控制的新政府中,他出任外交人民委员。

在1917年11月7日到1924年1月列宁去世以前的大大部分时间里,托洛茨基通常被认为是布尔什维克政权第二号最重要的人物。虽然他在1918年3月辞去外交人民委员的职务而没有在布列斯特-里托夫斯克同德国签订和约,但是几个月之后他重返政府,出任国防人民委员。是他组织了红军,并领导红军在两年半激烈的内战中取得胜利,从而最后确立了布尔什维克对整个俄国的控制。

托洛茨基是一位卓越的雄辩家,在担任国防人民委员期间是第一流的组织者,而且是第一流的马克思主义理论家。可是在布

尔什维克政府担任当然首脑的列宁逝世之后，他在政治上被斯大林所制胜。1924—1927年，当托洛茨基对斯大林开展一场力不胜任的权力之争的时候，两派之间就意识形态问题发生了激烈的争论。托洛茨基认为必须结束革命初期已经形成的小土地所有制，尽快地把农民纳入布尔什维克建立的社会主义制度，因为作为小资产阶级的农民阶级构成建设社会主义的一个潜在的敌对集团。另一方面，斯大林则认为农民是布尔什维克领导的无产阶级的同盟军，因此不应触动他们，至少暂时如此。

托洛茨基还认为必须尽可能快地使苏联实现工业化，因为二十世纪二十年代早期的俄国并不具备建立社会主义制度所必需的经济基础；为此，必须结束列宁在1921年制定的新经济政策所确立的半自由企业制度。反之，斯大林则认为此事并不很紧迫，而必须集中力量使经济至少恢复到1913年的水平（第一次世界大战和內战以前），因此，就这个目的而言，新经济政策证明是有成效的。

最后，托洛茨基根本不同意斯大林关于苏联应当致力于推行“一国建成社会主义”的主张。他认为革命是一个不断的过程；如果革命在已经获得胜利的国家内部不继续深化并在地理上向别国扩展的话，革命就会停顿下来，就会处于守势。因此，托洛茨基认为苏联在进行社会主义改造的同时，必须继续侧重于将革命扩展到别的国家。

在革命理论和实践问题出现这三点根本分歧的基础上，托洛茨基对斯大林的外交政策提出了严重的批评。他强烈反对成立英苏工会委员会*，斯大林设法通过该委员会利用苏联工会作为

* 即英苏统一委员会或英俄统一委员会（大不列颠和苏联工会运动的联合协商委员会），是根据全苏工会中央理事会在1925年4月6日—8日于伦敦召开的英俄工会代表会议上的倡议而成立的。参加委员会的有全苏工会中央理事会和英国工联代表大会总委员会的代表。1927年秋，因英国工联领导人的背叛，这个委员会就不再存在了。详见《斯大林全集》中文版第8卷第175—182页。——译者

工具以便赢得比较保守的英国劳工运动对苏联的支持。托洛茨基还严厉批评斯大林在中国问题上推行的各项政策。斯大林赞成羽毛未丰的中国共产党党员加入中华共和之父孙中山的国民党的协议。1927年5月，当孙中山的继任者蒋介石下令杀害国内几乎所有的重要共产党人时，对共产党人来说，国共联盟证明是灾难性的，这一点似乎证明托洛茨基对于斯大林对华政策的谴责是正确的。

不管双方在立论上是非曲直究竟如何，斯大林证明在政治计谋上更为高明。到了1927年，他已经赢得了足够的权力来把托洛茨基及其主要的追随者清除出苏联共产党，并迫使托洛茨基隔离在西伯利亚。1929年，斯大林采取进一步措施，把托洛茨基从苏联驱逐到土耳其。

斯大林在1928年所采纳的各项政策更多地接近托洛茨基曾经主张的政策，而不是他自己早年所主张的政策。这些政策是：实行农业集体化，通过五年计划强行制定工业化草案，使共产国际采纳一条“第三时期”*的超级革命路线。政策上的这一改变遭到许多原先曾经支持斯大林而反对托洛茨基的人们的反对，但是斯大林在1929—1930年清算了这一“右翼反对派”，将其主要领导人尼古拉·布哈林和他大多数最亲密的伙伴开除出苏联共产党。

托洛茨基被驱逐出境，就在土耳其的普里恩基波定居下来。四年之后，他去法国，但1935年他被迫移居挪威。最后，由于苏联政府不断对挪威施加政治压力，他不得不于1937年离开。此时惟有在立志改革的拉萨罗·卡德纳斯总统**领导下的墨西哥愿意为

* 意即第三国际时期。——译者

** 拉萨罗·卡德纳斯(1895—1970年)，青年时期曾积极参加反对迪亚斯反动独裁的斗争。1934年12月至1940年12月出任墨西哥总统。任职期间推行资产阶级民主改革，沉重打击了本国封建势力和外国垄断企业的利益，为墨西哥资本主义的迅速发展奠定了基础。——译者

他提供避难场所。托洛茨基在墨西哥一直居住到 1940 年 8 月 21 日被斯大林秘密警察的一名特工人员杀害为止。

苏联以外的托洛茨基主义的由来

苏联共产党内争夺控制权的宗派斗争很快为苏联以外各地区共产党人所知道，但是在 1928 年之前，苏联以外各地区大部分共产党人只听到斯大林一方的论点，这主要是由于托洛茨基自己主张将这场冲突保持在党内上层这一个方针所造成的。美国最杰出的托洛茨基派领袖詹姆斯·坎农对这一情况作了如下的叙述：

俄国党内这场重大的斗争中争论的问题，最初只限于极端复杂的俄国问题。许多问题对我们美国人来说是很新鲜的和不熟悉的，美国人对俄国的内部问题所知甚少，因为这些问题具有深奥的理论，我们要理解这些问题是非常困难的——那时我们毕竟还没有受过认真的理论教育——由于我们得不到全面的情况，困难就更大了。我们得不到俄国左翼反对派的文件。对他们的论点，我们一无所知。我们不知道真相。相反，有计划地灌输给我们的都是些不准确的、歪曲的和一面之词的文件。^①

此外，苏联以外各地区的共产党在共产国际的强制下（违者要受到纪律制裁）支持苏联党内胜利者的立场。坎农指出：“世界上所有的共产党奉莫斯科之命发动了反对‘托洛茨基主义’的运动。1927 年秋季（从苏联共产党内）清除托洛茨基和季诺维也夫之后，接着就要所有的党立即表态并暗中威胁称：莫斯科将对那些不持

^① 詹姆斯·坎农：《美洲托洛茨基主义史：一个参与者的报告》（1940 年），第 40 页。

‘正确’立场(即赞同清除)的任何个人和组织采取报复行动。在全党开展了启发和‘开导’运动……党员大会、支部会议、地区会议，中央委员会的代表被派去参加会议，以启发党员认识到把红军的组织者和共产国际的主席开除出党的必要性。”^①

直到共产国际第六次代表大会时(1928年7月—9月)，外国党才最后获悉托洛茨基在苏联这场论战中的观点。虽然托洛茨基这时已流放在西伯利亚，他仍给第六次代表大会送去了一份呼吁书，反对把他开除出一个理论上说来是单一国际性政党的苏联支部。他还向大会送交一份题为《对第三国际纲领草案基本原则的批评》的文件，对斯大林主义的第三国际纲领草案进行评论。

坎农说，尽管在斯大林分子竭力压制托洛茨基观点的情况下，这份文件仍然设法送到了大会设立的翻译室，并在混乱之中被翻译出来分发给出席代表大会的各国代表团团长和大会设立的纲领委员会的成员。^②坎农没有提到他如何把澳大利亚代表威尔金森灌醉以后把他的那份文件偷到手才得以带一份回国。^③坎农一俟离开苏联，就开始散发这一文件。

随着托洛茨基在同斯大林争论的各种问题上所持的观点越来越广泛地为苏联以外所了解，就有小批人出来宣布效忠于托洛茨基，或者对他表示同情。C. L. R. 詹姆斯指出了这种支持的规模：“左翼反对派的一些组织并不能组成一个有效的党……在德国，1933年时只有七百五十人，在希特勒掌权之后的大灾难时期中几乎被消灭殆尽。在西班牙美洲，他们取得了相当大的进展；在加拿大、古巴、中国、法国、西班牙和英国，成立了大大小小的组织，经常受到斯大林分子的迫害，一般在工人阶级运动中不得人心；因

^① 詹姆斯·坎农：《美洲托洛茨基主义史：一个参与者的报告》(1940年)，第43页。

^② 同上书，第49页。

^③ 马克斯·沙赫曼，1970年12月7日致罗伯特·亚历山大的信。

为他们对斯大林的批评听来象是反苏，而且为无休止地责骂托洛茨基主义提供了适宜的背景。”^①

列夫·托洛茨基在1929年流亡到普里恩基波之后，竭力将他的追随者组成一个共产主义派系，其最终目标是改造苏联共产党和共产国际。然而，正如伊萨克·多伊彻所指出的：“托洛茨基把他在西方的追随者组织起来的最初尝试，结果是令人失望的。他把注意力集中在法国，他在那里比别的地方拥有更有影响的追随者……希望在那里建立一个强大的反对派基地。”^②托洛茨基在法国的信徒们的组成成分太不一样，而且喜好争论，他们证明无法达成统一，但是这一事业至少在一个方面确实产生了成效。托派主要的领袖之一阿尔弗雷德·罗斯默“出访德国和比利时，去视察那里的反对派组织并做团结的工作；他还同意大利、荷兰、美国和其他国家的托洛茨基分子建立了联系。他随时向托洛茨基详细地报告他的调查结果。”^③

1930年，在托洛茨基的鼓励和赞同下，最初采取的行动是为国际托洛茨基主义建立一个组织机构。同年4月，在一些国家的代表出席的一次会议上成立了一个国际局。被提名参加国际局的有：法国的阿尔弗雷德·罗斯默（皮埃尔·纳维尔担任他的副手），美国的马克斯·沙赫曼，德国的K. 兰道，西班牙的安德烈斯·宁和来自俄国的列夫·塞多夫（托洛茨基的儿子，化名马金）。但是这个国际局无法行使职能，因为在它成立之后不久沙赫曼就返回美国，安德烈斯·宁在西班牙被捕下狱，塞多夫无法离开普里恩基波。^④因此，成立了一个国际书记处来取代国际局，由皮埃尔·纳

^① C. L. R. 詹姆斯：《1917年—1943年的世界革命：共产国际之兴起和衰落》（1937年），第200—201页。

^② 伊萨克·多伊彻：《被遗弃的先知：托洛茨基（1929—1940）》（1963年），第45页。

^③ 同上书，第53页。

^④ 同上书，第58页。

维尔(人称“苏佐”的一名意大利人)和一位迁居法国的俄国犹太侨民米尔(后来发现此人是苏联秘密警察的特务)组成。^①这个机构也是一个不起作用的协调性组织,托洛茨基在1931年后期把它加以改组。^②

1933年9月30日《战斗者》(纽约出版)公布的十一点纲领,对1933年年中国际托洛茨基主义的目标作了概括:

1. 无产阶级政党在任何条件下始终保持独立性……
2. 承认无产阶级革命的国际性,从而承认它的永久性;反对一国建成社会主义的理论。
3. 承认苏联是一个工人国家,尽管它正在日益蜕化成官僚主义政权……
4. 谴责斯大林主义派在1923—1928年经济机会主义阶段以及在1928—1932年经济冒险主义阶段的经济政策……
5. 承认在无产阶级群众性组织、特别在改良主义工会中开展系统的共产主义工作的必要性……
6. 反对把“无产阶级和农民的民主专政”这一公式作为有别于无产阶级专政的另一种政体……
7. 承认以符合各国具体情况的过渡性口号来动员群众的必要性……
8. 承认对工人阶级的工会群众组织和政治性群众组织采取一项充分的统一战线政策的必要性……
9. 反对社会法西斯主义的理论及其有关的一整套做法,指出它一方面为法西斯效劳,另一方面为社会民主主义效劳

① 马克斯·沙赫曼,1970年12月7日致罗伯特·亚历山大的信。

② 伊萨克·多伊彻:《被遗弃的先知:托洛茨基(1929—1940)》(1963年),第59页。

.....*

10. 在国际共产主义的旗帜下，为重新集合世界工人阶级的革命力量而斗争。承认创立一个能实施上述各项原则的真正共产国际的必要性。

11. 承认党内民主，不仅是在口头上而且要名符其实……

1929年6月，托洛茨基在抵达普里恩基波之后不久，就开始出版了一份名叫《反对派公报》的刊物。几个月之后，这份刊物改在巴黎出版，1931年初，在美国托洛茨基主义组织——美洲共产主义联盟（反对派）的赞助下，一份英文版的《左翼共产主义反对派国际公报》开始在美国问世。

是共产主义反对派，还是新的国际？

在国际托洛茨基主义存在的最初几年中，在其内部就托派运动的真正性质问题展开了相当多的讨论和论战。托洛茨基及其大多数追随者认为，托洛茨基主义运动的存在并不是为了同共产国际相对抗，取而代之，而是为了要改造它。他们认为，从这一作用来看，托洛茨基主义是共产国际的组成部分。伊萨克·多伊彻把托洛茨基早年关于国际托洛茨基主义的立场概括如下：“他宣布，尽管他和他的信徒们已经被开除出共产国际，他们仍然忠于共产国际。他们组成的是一种思想上的学派，力争恢复它在整个共产主义运动中的地位……他们唯一的目的（据托洛茨基的说法）是影响共产主义舆论，使之认识到苏联政府和共产国际的大权已经被篡夺，动员共产党舆论为恢复马克思主义和列宁主义的本来面目

* 在1928—1934年的所谓共产国际“第三时期”中，斯大林主义者相当简单化地把政治分野列为“法西斯分子”（指一切中间偏右的人士）、“社会法西斯分子”（指非共产党的左翼人士、尤其是社会党人）以及共产党人。他们认为共产党的主要敌人是“社会法西斯分子”。

而斗争。”^①

托洛茨基除了向他的追随者强调指出他们断然放弃对共产国际的效忠是错误的这一点以外，还指出他们力量太弱小，还不能向现有的第二国际和第三国际进行挑战。用多伊彻的话说，“托洛茨基告诫拥护第四国际的人说，持不同政见的组织要成为一股真正的政治力量，仅仅举起一面新旗帜是不够的。革命运动不能靠旗帜和口号召唤出来，而是随着它为之说话的社会阶级有机地发展和壮大。每个国际* 代表着工人阶级历史经验和为社会主义的斗争中的一定阶段；任何人都不能泰然无事地忽视第二国际和第三国际同群众的联系，也不能忽视它们政治传统的影响。”^② 托洛茨基及其大部分追随者继续宣布他们是共产党第三国际内部的“反对派”，一直到1933年1月30日魏玛共和国瓦解和希特勒在德国掌权为止。

在希特勒获胜之前的一些年代里（当时纳粹党正在日益得手），托洛茨基多次敦促德国共产党人和社会民主党人之间建立统一战线，以抵制希特勒的威胁。但是不论是社会民主党人还是共产党人都没有心情去留意托洛茨基的强烈要求，因为在那些年代里德国共产党人正在对“社会法西斯主义的”社会民主党人奉行一项特别激烈的斗争政策，这是同共产国际第三时期的路线相一致的。他们奉行这一政策，在许多场合下就同纳粹分子站到一起去反对社会民主党人。

共产党人的不妥协立场受到了被他们攻击的组织（主要是社会民主党）的回敬，而从长远来看在这场斗争中得利的是纳粹党。一俟希特勒上了台，社会民主党和共产党都无法抵抗希特勒建立

^① 伊萨克·多伊彻：《被遗弃的先知：托洛茨基（1929—1940）》（1963年）第43页。

* 指第一国际、第二国际和第三国际。——译者

^② 同上多伊彻书，第44页。

起来的新政权。仅仅几个星期之内,这两个党都被取缔,曾经一度看来几乎不可战胜的这两个党组织彻底瓦解了。

由于德国共产党的迅速瓦解才最后促使托洛茨基产生了应当由他和他的信徒们建立一个新的第四国际的想法。多伊彻叙述了作出这一决定的理由:“托洛茨基在这些日子里放弃了对第三国际的效忠。在一篇题为‘德国无产阶级的悲剧’(副标题是:‘德国工人将再次站立起来,斯大林主义决无出头之日’)的文章中,托洛茨基对局势是这样概括的:德国工人运动遭到的损失并不是一时的败北或者是战术上的挫折,而是战略上的重大失败,这会使工人阶级在一整个时代中力量衰竭,陷于瘫痪……他的结论是:如同第二国际在第一次世界大战爆发时遭到的可耻崩溃一样,斯大林主义也尝到了它的‘8月4日’*。”^①托洛茨基作出的头一个反应是号召成立一个新的德国共产党。不出几个星期,他就进而主张成立一个全新的共产国际的想法。最后,他开始敦促成立一个苏联共产党的对立组织,力争在苏联掀起一场“政治革命”。

第四国际的组成

虽然托洛茨基在1933年同意建立第四国际作为第三国际的对手而不是作为试图改造共产国际的组织,但是实际上又过了五年第四国际才宣告成立。与此同时,宣传成立新的国际是托洛茨基及其追随者的主要活动之一。1934年初,国际左翼反对派首先签署了一项支持这一主张的文件;参加签署的还有德国社会主义

* 指1914年8月4日第二国际领导人的背叛行为。当时,第二国际的最大政党——拥有100万名党员的德国社会民主党领导人,同本国的资产阶级和容克地主阶级的代表一道在国会中投票赞成德国军事预算拨款的提案。在德国对俄宣战的那一天(同年8月1日),德国社会民主党领导人还号召群众“捍卫祖国,抵御俄国蛮族”、“不到胜利,决不收兵”。——译者

^① 伊萨克·多伊彻:《被遗弃的先知:托洛茨基(1929—1940)》(1963年)第200—201页。

工人党(SAP)、荷兰独立社会主义党和荷兰革命社会主义党的代表。这些党中间只有最后一个党才(在某种意义上说)是托派组织。^①

在第四国际宣告成立之前的时期中,托洛茨基的追随者也试验了“法国式迂回”策略(托洛茨基在法国的追随者最早被建议加入第二国际社会党的队伍,因而得名)。托洛茨基作出这一建议,“不是为了接受(社会党的)思想,相反,而是为了在改良主义的堡垒内部反对改良主义,并‘把它们的革命纲领带给群众’”^② 1934—1935年,所有的托派组织对这一策略展开激烈辩论,大部分托派组织接受了它。可是,可能除了美国托洛茨基分子以外,实行“法国式迂回”策略的托派组织(包括阿根廷的组织在内)并没有通过加入社会党而使自身的成员人数大大增加。

但是托洛茨基及其最亲密的伙伴们决定于1938年9月正式成立第四国际。成立大会是在阿尔弗雷德·罗斯默的家里举行的,那是在巴黎附近的小镇佩里克尼(虽然多年来正式的说法认为那次会议是在“瑞士某地”举行的)。二十一名代表出席了会议,据说代表十一个国家的组织。

由于害怕遭到斯大林主义分子的袭击,大会在1938年9月3日一天之内就告结束。(在此之前,斯大林主义分子已经暗杀了若干名会议的筹划者,偷走了第四国际的章程草案和一些别的文件。)这次会议由美国社会主义工人党的马克斯·沙赫曼主持。大会听取了关于托洛茨基主义组织在世界各地进展情况的报告,会议的正式议程“排得满满的,足够使正常召开的大会忙一个星期。”^③ 主要的争论似乎集中在新的国际是否应当事实上宣告成

① 《战斗者》,纽约市,1934年4月21日。

② 伊萨克·多伊彻:《被遗弃的先知:托洛茨基(1929—1940)》(1963年)第273页。

③ 同上书,第420页。

立。来自波兰的两名代表是这种意见的主要反对者；伊萨克·多伊彻声称这两名代表所提出的反对成立第四国际的主张是由他拟定的。^① 表决结果以十九票对三票通过创建第四国际。^② 然后会议选出执行委员会来领导这一新组织，委员会中至少包括一名拉丁美洲人——巴西的马里奥·佩德罗萨。

显然有人会提出这样的问题：托洛茨基为什么特别要在那个时候决定成立第四国际呢？他这样做肯定不会是因为国际托洛茨基主义运动正在取得重大进展。他的追随者在苏联国内已经在政治上被清洗，其中许多人已在肉体上被消灭。在东欧和南欧，工人运动和马克思主义政治组织遭到了统治那些国家的法西斯和半法西斯政权的镇压。在德国和奥地利，任何一个反对党都无法进行有组织的活动；慕尼黑协定签订后的捷克斯洛伐克情况也是如此，该协定在第四国际成立后不到一个月就签订了。

只有在欧洲的法国和英国，托洛茨基主义组织在公开活动；人民阵线在法国的消失使整个左派情绪十分低落。在西班牙，法西斯主义不到六个月就在内战中取得全胜，甚至在残存的西班牙共和国，托洛茨基派也被共产党影响的政府深深地赶入地下。在亚洲，唯一有些重要的托洛茨基主义运动的国家是锡兰。在新大陆，在美国、加拿大和五、六个拉丁美洲国家有一些托洛茨基主义的小组织。^③

托洛茨基为什么最后决定正式建立第四国际，对这个问题的唯一回答也许是：因为到了1938年的时候，他已经完全放弃了可能改组共产国际的任何希望了；因而认为必须有一个他看来是致力于完成国际工人阶级革命的国际运动。

^① 伊萨克·多伊彻：《被遗弃的先知：托洛茨基（1929—1940）》（1963年）第421页。

^② 同上书，第422页。

^③ 同上书，第423页。

1939—1940 年危机

第四国际在它成立后不到一年的时间就经历了第一次严重危机。这次危机起因于托洛茨基继续鼓吹“保卫苏联”，甚至在面对第二次世界大战初期的一些事件的情况下还是这样。这些事件是：斯大林—希特勒条约，苏联和纳粹德国瓜分波兰，苏联吞并其他的东欧地区，苏联入侵芬兰；这些事件的发生使得托洛茨基的一些追随者对其领袖的态度提出了疑问。他们尤其对托洛茨基的这一论点提出异议：苏联尽管是一个“蜕化的工人国家”，但仍然是工人国家，因此，不管它采取什么行动，第四国际都一定要保卫它。

詹姆斯·伯纳姆 1939 年 9 月在一份致美国社会主义工人党的声明中宣布，“从任何意义上说，也决不能把苏联当作一个工人国家。”此后不久，马克斯·沙赫曼向美国社会主义工人党领导提交一项决议案，称苏联占领波兰东部地区是“帝国主义的”，并进而否定了托洛茨基所谓苏联的行动具有任何进步结果的说法。沙赫曼敦促社会主义工人党放弃它保卫苏联的誓言。^①但是，托洛茨基仍然坚不应允。他认为，苏联为了保卫边境，进行入侵是有道理的，任何一个苏联政府都不得不采取象斯大林那样的行动，而且工人国家的“战略利益”高于芬兰的自决权。^②

社会主义工人党的多数领导站在托洛茨基一边，反对沙赫曼和伯纳姆。虽然在美国社会主义工人党的党内斗争中托洛茨基明显地处于多数地位，但他建议詹姆斯·坎农领导的多数派避免进行一场摊牌，以免造成党的分裂。不过 1940 年初还是出现了分裂，当时少数派退出美国社会主义工人党，组成工人党。这个党作

^① 伊萨克·多伊彻：《被遗弃的先知：托洛茨基（1929—1940）》（1963 年）第 471 页。

^② 同上书，第 473 页。

为一个持不同政见的托派组织有十五年之久；到了五十年代中期，它朝着社会民主主义的方向发展；1958年年中，工人党（当时称为独立社会主义联盟）的成员被接受加入美国社会党。

第四国际这一最大的下属组织发生分裂，在整个第四国际，特别在法国，产生了反响，那里有相当多的成员接受伯纳姆或沙赫曼的观点。^① 第四国际执行委员会中站在沙赫曼一边的非美国委员只有巴西的马里奥·佩德罗萨和特立尼达的 C. R. L. 詹姆斯（这两个人那时都在美国党内）。当时住在墨西哥的西班牙人格兰迭索·穆尼斯后来也拥护沙赫曼。^② 与沙赫曼分子的论战，是托洛茨基在 1940 年 8 月 21 日惨遭谋杀之前最后一些政治活动之一。

1946 年第四国际会议

第二次世界大战严重地干扰了第四国际的活动。然而，1940 年 5 月 9 日至 5 月 16 日召开了第四国际的一次紧急会议，以估量大战爆发所引起的局势。会议通过了托洛茨基撰写的《关于帝国主义战争和无产阶级革命的宣言》。宣言指望世界战争之后必将发生革命大动荡，认为“历史上，战争常常是培育革命的根源，这正是因为战争动摇腐朽政权的根基，削弱统治阶级，进一步促进被压迫阶级的革命义愤。”^③

第四国际总部迁往纽约市，但是战争还在进行的时候就企图在欧洲重建第四国际。第四国际的欧洲下属组织于 1943 年 8 月在一个秘密地点召开了一次会议，据报导与会的有法国、比利时、希腊、西班牙和德国党的代表。成立了一个临时欧洲秘书处，开始出版期刊《第四国际》，最初是油印的，后来改为铅印。据报导，秘

^① 伊萨克·多伊彻：《被遗弃的先知：托洛茨基（1929—1940）》（1963 年）第 477 页。

^② 马克斯·沙赫曼，1970 年 12 月 7 日致罗伯特·亚历山大的信。

^③ 《洲际新闻》，纽约，1970 年 4 月 27 日。

书处曾帮助建立一个在法国的德国流亡支部。

1944年2月，召开了第四国际欧洲会议。与会的代表来自法国、比利时、西班牙、德国和希腊等支部，会议开了六天。选出了欧洲执行委员会和欧洲秘书处。其后，欧洲执行委员会扩大，包括英国、法国、比利时、西班牙、德国、瑞士、希腊和荷兰的代表参加，以及印度支那法国侨民中的一个托派组织的代表。^①

第四国际战后第一次会议于1946年4月在比利时一个不明的地点举行。显然，若干托派政党和组织的多数派和少数派代表都出席了会议。这次会议最重要的决议是“确立本届会议以及会议选出的执行机构的权威”。决议称：

由第四国际各个支部委任代表所组成的本次代表会议——自1940年紧急会议以来头一次相聚一堂——听取了欧洲秘书处的组织报告，注意到了现国际执行委员会委员们的意见，充分了解到会议筹备中的种种困难，兹决定：(1)把它作为一次第四国际的世界代表会议来召开，并对议事日程上的所有问题作出有约束力的决定；(2)解散现有的国际执行委员会和国际秘书处，由本次会议选出新的国际执行委员会和国际秘书处，在世界代表大会召开以前行使全权。^②

这次会议为第四国际的支部、特别是欧洲的支部制订了一项双重战术。一方面，由于想象社会党和共产党内出现“危机”，因此托洛茨基分子应力图打进这两个党内。但另一方面，它们还应推动各托洛茨基主义政党的“独立”发展。这项双重性政策概括为：“总的说来，我们的建党道路，特别是在大陆欧洲，现在应通过将我

① 《第四国际》，纽约，1946年6月24日，第184页。

② 同上杂志，第183页。

们的独立工作(这由我们的组织和政治自主权给予保障)同我们在改良主义、中间派和斯大林主义组织中进行耐心、系统和持久的本派工作相结合。”^①

1948年第四国际大会

第四国际第二次代表大会是战后第一次正式的代表大会，于1948年3月至9月的某个时候在巴黎举行。这次代表大会的明显特点也许是它的极端机密性，其目的显然是即要防止警察破坏又要防范斯大林分子袭击。出席大会的代表们证实，尽管采取了严密的防备措施，警察部门和外国大使馆还是详细了解到了大会的情况。^②

出席代表大会的不仅有第四国际正式支部的代表，而且有各国持不同政见的托洛茨基分子的代表。马克斯·沙赫曼写道：“这次代表大会无疑是托洛茨基主义运动历次国际会议中出席人数最多、最有代表性的会议。资产阶级或斯大林分子的压制以及财源不足使许多支部不能派遣代表出席。但是，出席大会的代表不只来自欧洲，而且还有亚洲、南非和西半球若干国家的代表，这是从来没有见过的。他们的出席说明托洛茨基主义运动热诚献身于许多堕落分子、怀疑主义者和厌倦分子所抛弃了的社会主义国际主义。”^③

摆在第二次代表大会面前的有三大问题：法国托洛茨基主义队伍的分裂；所谓的俄国问题；以及再次实行“法国式迂回”策略的主张。第一个问题产生于二次大战期间法国托洛茨基主义运动内部对于参加抵抗运动问题上发生的分裂。一部分人认为，托洛茨

① 《第四国际》，纽约，1946年6月24日，第178页。

② 同马克斯·沙赫曼的谈话，1970年6月21日于纽约。

③ 马克斯·沙赫曼：《第四国际代表大会》，载1948年9月号《新国际》。

基分子不应当参加,因为抵抗运动服务于“帝国主义战争”的目的。另一部分人在某种程度上曾经支持过抵抗运动,还有一部分人则非常积极地参加抵抗运动。由于存在着这种争论,当大战于1945年结束时,法国大概有五个自称为托洛茨基派的不同组织,代表大会试图将这些托派组织合并成一个组织,但没有成功。

第二个问题起源于对第二次世界大战以来在东欧建立的、受共产党控制的政权究竟如何分类的问题。美国社会主义工人党的约瑟夫·汉森在1970年12月24日给本书作者的一封信中,对大会代表中的讨论情况作了如下的概括:

当时在如何确定东欧国家结构的性质问题上,托洛茨基主义运动中发生了分歧。大多数人认为不能把东欧国家称作工人国家,不论对工人国家这个名词规定何种条件。少数人认为它们的性质是工人国家,虽然它们肯定不是无产阶级民主占支配地位的那类工人国家。少数派宁可称它们为蜕化了的工人国家,但是这样提法难免前后矛盾,因为它们是在克里姆林宫政权官僚军人保护下产生的,因而从一开始就是“蜕化的”。少数派因而把它们称作“畸形的”工人国家。应该补充说明,少数派的立场最终为全世界托洛茨基主义运动所有支部的多数派所采纳,成为第四国际的正式立场。

对这个问题的第三种立场是马克斯·沙赫曼提出的。他作为美国工人党的代表以观察员身份出席大会,有发言权,没有表决权。1970年12月7日,沙赫曼在给本书作者的一封信中简明地阐述他当时所持的立场:

我的论点是:如果俄国是“蜕化的工人国家”(我不同意这

种说法),那么根据社会经济和政治的结构和形式来看,这些新的卫星国也就是“蜕化的工人国家”了。这种说法给我们的“理论”带来了两个难题:其一,在没有无产阶级或革命政党的卫星国里发生了无产阶级革命;其二,在没有成为非蜕化的工人国家之前,就可能成为一个“蜕化的工人国家”。我决不是说,它们总的说来是蜕化的工人国家,而是说,它们象俄国一样,是反动的、官僚集体主义的国家。

代表大会上大多数人所持的立场是:东欧各国政权是“资本主义的”,因为“这些‘缓冲’国所维护的仍然基本上是资产阶级性质的所有权,尽管这种所有权形式各异而且复杂。”但是,代表大会通过的决议还指出:“‘缓冲’国的状况同时代表着一种波拿巴主义的极端形式”(着重点是原有的),可是当后来南斯拉夫领导同斯大林和克里姆林宫破裂以及第四国际支持铁托的信徒时,上述声明证明是颇为令人尴尬的。^①

第三个问题是马克斯·沙赫曼提出的,他建议所有的托洛茨基主义组织都加入社会党。这个建议不同于三十年代采用“法国式迂回”策略之处,在于:1948年提出托派加入社会民主党,目的是留在社会民主党内相当长一段时间,而不是搞类似第二次世界大战爆发前不久在法国、美国、阿根廷和其他几个国家中所采用的“突然袭击”的方式。这一见解遭到大会断然拒绝。^②

第四国际中的巴勒罗派分裂

五十年代初,在第四国际内部出现了重大分裂。这一分裂是由于第四国际国际执行委员会第十次全会所同意的新的“打进去”

① 《铁托同志和第四国际》,载1948年9月号《新国际》。

② 同马克斯·沙赫曼的谈话,1970年6月21日于纽约。

政策而引起的。那次全会是在该组织的总书记米歇尔·巴勃罗领导下在 1952 年召开的。这项新的政策建议：在共产党是主要工人阶级政治组织的国家中，第四国际在那里的下属组织应把它们成员派到那些共产党里去，在社会党居优势的地方，就把成员派到社会党里去；与此同时，在每个国家中，应在共产党和社会党之外保持一个独立的小组织来贯彻执行重要的和确切的托洛茨基派的任务。巴勃罗本人看来是拥护这项新的“打进去”政策的主要鼓吹者。他阐述他的立场如下：

在这些国家，问题是要日益对受斯大林分子影响的组织和工人实行某种特殊的“打进去”政策。这就是说，我们越是接近战争（指第三次世界大战，巴勃罗预言它即将爆发），我们越来越重要的一部分力量就必须进入受斯大林分子领导或影响的各种政治组织和工会组织（包括共产党），留在这些组织内展开工作，采取的策略要适应这些组织的性质和服从长期工作的原则。

巴勃罗对那些不赞成通过斯大林主义组织（托派对它们几乎反对了二十五年）来搞革命的人进行辩论的时候，强调他所主张的政策是一项“长期”政策。他声称：“因为斯大林主义继续存在、甚至还取得胜利，而对人类命运感到绝望的人们，是在以他们的尺码来缩短历史。他们希望资本主义社会走向社会主义的整个改造过程在他们短暂的一生中就能完成，这样他们为革命作出的努力可能就得到补偿。就我们而言，我们肯定我们在南斯拉夫问题上第一篇文章中所写的内容。这种改造大概需要长达几个世纪的整个历史时期，其间将不时出现一些同‘纯粹’形式和‘纯粹’标准相距甚远的资本主义与社会主义之间的过渡形式和过渡政权。我们知

道，这种论断使某些同志大为震惊，并已被别人当作攻击我们为‘修正主义’的跳板，但是我们并没有缴械。”^①

正如持不同政见的美国托派刊物《劳工行动》所报道的，巴勃罗的建议要求许多托洛茨基分子留在共产党和社会党之外，其中包括：“(1)从事……辅助工作所‘严格必需’的人员——基干力量；(2)尽管我们竭尽全力仍打不进斯大林主义组织的人员；(3)那些被认为留在共产党队伍之外接受托派训练更为合适的人员。”^②

巴勃罗的“打进去”主张在第四国际遭到激烈的反对。法国支部的成员首先反对，结果他们被第四国际正式开除出去。接着，1953年11月，美国社会主义工人党发表一封所谓《致所有托洛茨基主义组织的公开信》，投入了战斗。

美国社会主义工人党的公开信首先指出法国支部的大多数成员被开除出第四国际一事，并对美国社会主义工人党自身没有“采取更加有力的行动”加以反对表示遗憾。公开信接着告诫称：“严重的危险威胁着第四国际的未来，甚至威胁着第四国际的生存。渊源于胆怯和小资产阶级印象主义的修正主义思想已经在它的领导层内部冒头。第四国际更大的弱点是由于它脱离下属各支部的活动而时刻助长个人统治制度的建立，这种制度及其反民主的方法是以修正和放弃马克思主义的方法为基础的。”^③

随后，美国社会主义工人党、英国社会主义劳工联盟、被开除出去的法国支部和若干其他的组织联合起来“重新组织”第四国际，建立第四国际国际委员会，以反对巴勃罗控制的第四国际执行委员会。当时世界上最大的和最重要的托洛茨基主义政党锡兰平

① 上述引文均摘自《劳工行动》，纽约，1952年6月2日。

② 同上。

③ 杰拉尔德·希利：《第四国际的问题》，新闻通讯，伦敦，1966年，日期不详，第6页。

等社会党* 似乎在这场争执中形式上保持了中立，尽管该党的领导同情国际委员会而不同情巴勃罗。^① 可是，意大利、比利时和拉丁美洲的重要托洛茨基主义组织仍然忠于巴勃罗。

统一和新的分裂

开始于 1952 年至 1953 年的国际托洛茨基主义运动的分裂持续了十年。1961 年初，美国社会主义工人党政治委员会发表了一项声明，这是把第四国际的各种力量重新统一起来的最初尝试之一。该声明指出了“世界托洛茨基主义运动中两大派别看来意见一致的一些问题。”^② 在进行了至少长达两年多时间的积极磋商之后，隶属于国际委员会和国际执行委员会的大多数党派最后准备宣布它们再次重新联合起来。第四国际据说的重新统一是在 1963 年 6 月一次未加透露的地点举行的代表大会上达成的，选出了新的第四国际执行委员会和统一书记处。据报道，“来自二十六个国家和各大洲的代表和观察员出席了会议。”^③

1963 年 7 月 10 日的纽约托派报纸《战斗者》说，“在重新统一的代表大会召开之前，分别举行了两次集会，一次是隶属第四国际国际委员会的多数派支部代表召开的，另一次是隶属第四国际国际执行委员会的支部代表召开的第七次世界代表大会。在重新统一的代表大会上，通过了共同的文件。国际执行委员会的代表立即批准重新统一大会的文件；国际委员会的代表说，他们会建议各

* 平等社会党成立于 1935 年，1942 年正式同第四国际发生关系。1964 年 6 月，该党举行特别会议，决定与执政党自由党合作。在 1970 年 5 月大选中，由自由党、平等社会党和部分共产党成员组成的联合阵线获胜。平等社会党三名成员参加了由自由党主席西丽玛沃·班达拉奈克夫人出任总理的内阁。该党在工人和城市小资产阶级知识分子中有相当的影响。——译者

① 《战斗者》，纽约，1954 年 4 月 14 日。

② 《洲际新闻》，纽约，1970 年 4 月 27 日。

③ 《战斗者》，纽约，1963 年 7 月 10 日。

自的组织及早予以批准。”尽管作出这一方面的努力，真正的统一并没有实现。相反，不是原来的两个国际组织（各自声称自己是托洛茨基主义运动的“真正”代表），而是出现了四个，其中的三个在国际上有些追随力量。结果，不久就有了四个第四国际。

举一个例子，米歇尔·巴勃罗拒绝接受“统一”的决定。在“围绕如何制止核战争的不同估计、世界革命各个部分之间的相互关系、中苏争论的意义和托洛茨基主义者对这一争论问题应采取什么态度、即将离任的领导的工作成败”^①等问题上，巴勃罗在1963年国际执行委员会派的第七次代表大会上处于少数。后来在1965年，他组成了他自己一派的第四国际，但是他团结的各国托派组织为数不多，尽管它还继续出版一个刊物。^②米歇尔·巴勃罗并不是世界托洛茨基主义运动寻求统一的唯一反对力量。第四国际国际委员会（反巴勃罗派）的英国支部或法国支部都没有接受统一。米歇尔·巴勃罗的国际执行委员会所属的第四国际拉丁美洲局也没有接受统一。

因此，由于1962—1963年力求组成一个单一的第四国际，结果就出现了四个以第四国际命名的组织。它们是：

1. 以美国社会主义工人党为中心的所谓统一书记处。美国社会主义工人党名义上不隶属于任何国际组织（这是为了避免遵从1940年的沃里斯法或外国代理人登记法*），但事实上它是统一书记处的主要成员。

2. 上面已提到的米歇尔·巴勃罗的组织。

3. 第四国际国际委员会，其主要下属组织是英国的社会主义劳工联盟和法国的共产国际组织。世界托洛茨基主义的这个派别

① 《战斗者》，纽约，1963年7月10日。

② 《洲际新闻》，纽约，1971年11月22日。

* 美国罗斯福政府制定的这个法令，禁止美国共产党与共产国际或其他国际团体发生联系。——译者

以杰拉尔德·希利为首，其成员通常称为“希利分子”。它在拉丁美洲的唯一成员组织是以吉列尔莫·罗拉为首的玻利维亚托洛茨基主义派。

4. 以总书记 J. 波萨达斯(奥梅罗·克里斯塔利)为首的国际执行委员会，波萨达斯是阿根廷托洛茨基主义分子。国际执行委员会是由 1963 年以前的巴勃罗派拉丁美洲局建立的组织。第四国际较老的拉丁美洲成员组织中，大部分同这个拉丁美洲局有直接联系，虽然到 1961 年时在智利、秘鲁、古巴、阿根廷和墨西哥都有着同反巴勃罗派联系的对立组织；1963 年之后，这些对立组织都成了统一书记处的下属组织。当波萨达斯把拉丁美洲局改为第四个第四国际时，他并没有把所有的拉丁美洲托洛茨基分子都带走。后来，波萨达斯在几个欧洲国家中成功地建立了若干小组。

第四国际统一书记处

统一书记处领导的国际托洛茨基派于 1965 年 12 月在一个未公布的地方召开了它统一后的第一次世界代表大会。据美国社会主义工人党《国际社会主义评论》1966 年春季号的社论说，“出席代表大会的有代表几乎所有西欧国家、许多非洲和亚洲国家以及北美和拉丁美洲革命的马克思主义组织的六十多个代表和兄弟组织的观察员。”社论接着指出：“前任领导报告说，尽管……出现一些次要的叛变事件，自从上届代表大会以来的两年里，许多支部得到了加强，新的支部创建起来了，过去十年的离心倾向已经停止并且有了扭转。力量得到了增强的统一运动的最重要和最可喜的特色是，从许多国家年轻革命家中正在兴起的年轻一代中吸收了新的成员，代表大会本身代表的年龄大大降低就反映了这一情况。”

这次代表大会通过的一系列决议，明显地代表这一派对国际

托洛茨基主义所面临的重大问题所持的立场。大会通过的主要决议的标题是《国际局势和革命的马克思主义者的任务》。其他的决议有：《非洲革命的进展和问题》、《西欧资本主义的演变》和《中苏冲突和国际共产主义的危机》。大会的基本决议重申了正统托洛茨基主义的传统立场，如“我们的任务”之二，是“无条件地保卫一切工人国家，首先是苏联和中华人民共和国；反对帝国主义。这方面特别值得关注的是保卫革命的古巴，因为古巴的地理位置毫无掩蔽，而且美帝国主义采取极端措施来设法摧毁古巴。”^①

《国际社会主义评论》1966年春季号的社论将统一书记处对中苏分裂的立场概括如下：“文件的目的是不是寻找支持这一方或那一方的‘理由’，而是弄清局势的真相。很清楚，第四国际在这一过程中的立场是独立的。虽然如此，就中苏两方而言，托洛茨基主义运动是倾向于中国人一方的”。^②

1965年统一书记处第四国际代表大会的主要文件表明，该组织支持卡斯特罗分子当时在拉丁美洲大力推行的游击战战术。这一决议指出，“古巴革命的胜利，在拉丁美洲的革命先锋队中间展开了一场主要以建立与群众隔绝的游击小组为基础的运动，来取代建立新的革命领导。先锋队通过最富有献身精神、最有生气的分子的无谓牺牲，对这些冒险主义行动（这在菲德尔主义潮流中出现过）付出了沉重的代价。但是，更加成熟的武装斗争的概念逐步取代了这一盲动主义倾向，这一概念将游击斗争、群众武装斗争和组织群众求得经济需要三者溶合在一起。”^③

这一决议显然是试图缩小该决议最后一句所说明的第四国际对“夺权道路”的立场同那时卡斯特罗分子宣扬的主张之间的分

① 《社会党国际评论》，纽约，1966年春季号，第48页。

② 同上杂志，第36页。

③ 同上杂志，第48页。

歧。这个菲德尔主义的理论就是所谓的“游击中心论”，这一理论最初由欧内斯特·切·格瓦拉、其后由雷吉斯·德布雷*所阐述。在第四国际通过这一决议的时候，几个国家的游击组织正在把“游击中心论”付诸实践，此后不久，格瓦拉本人在玻利维亚也运用这一理论，但失败了。根据“游击中心”的理论，一小批城市年轻人有可能进入一个偏僻的农村地区，他们从这一地区首先着手削弱现政府在该地区行使权力的能力。一旦成功地建立这样一个游击中心以后，革命者就接着建立一支游击部队，最终把战争推向城市。

格瓦拉和德布雷放弃了传统的马克思列宁主义立场，他们认为不仅革命的政治和军事领导应当统一于“游击中心”，而且还认为在发动革命战争的地区无需在民众中进行广泛的政治准备工作。更为异端邪说的论点是：在革命之前无需建立一个革命的共产党，也无需由它来领导革命——这一论点认为，这样的党会在革命军队本身之中涌现。^① 统一书记处派的托洛茨基主义分子不能支持“游击中心论”，不管他们对卡斯特罗的热情多么强烈。他们认为自己是完美的马克思列宁主义者，因此他们肯定不能放弃“先锋”党在革命中的首要作用这一列宁的主要思想。

代表大会有关欧洲的决议反映了统一书记处派托洛茨基分子所推行的路线，这条路线显然也被认为适用于至少几个拉丁美洲下属组织。这一决议指出，“打进去的工作在法国和意大利的共产党内，在英国的工党内，在奥地利的社会党内，在丹麦的社会主义工人党内将继续推行。”^② 这表明第二次世界大战结束后多年在第

* 雷吉斯·德布雷（1940年— ），原系法国巴黎大学学生。1961—1967年在古巴居住。后来参加切·格瓦拉在玻利维亚的游击队，1967年4月20日在该国东南部被捕入狱。1970年托雷斯政府执政期间获释。其代表作品：《革命中的革命》（1967年法、英、西班牙文版）和《智利革命：与阿连德的谈话》（1971年）。——译者

① 关于雷吉斯·德布雷理论的简述，见雷吉斯·德布雷：《革命中的革命》，《每月评论》出版社，伦敦和纽约，1967年。

② 《社会党国际评论》，纽约，1966年春季号，第74页。

四国际队伍内引起许多辩论的“打进去”政策并没有被完全放弃。

虽然我们没有找到关于这一问题已发表的讨论材料，但是在六十年代至少有两个加入统一书记处的拉丁美洲组织推行了“打进去”战略。在智利，作为一个独立组织的统一书记处派的党销声匿迹了，该党党员成为亲卡斯特罗的左派革命运动（MIR）的一部分。古巴的情况也类似，在卡斯特罗及其同伙建立了后来在1965年成为古巴共产党的那个组织之后，统一书记处的托洛茨基主义分子看来没有努力保持一个独立的组织，而是加入了古巴共产党。

在这次代表大会期间和大会之后，国际托洛茨基主义的统一书记处派特别强调当时正在东南亚进行的战争中支持越共和北越。因此，1966年7月该组织的国际执行委员会召开一次大会，通过一项决议，宣布：“今天，我们的主要口号是：建立工人和反帝运动的各种力量，反对美国侵略越南的世界统一战线，保卫越南革命，最大限度地支援越南革命。”^①

统一书记处派最近召开的一次全体会议，就是1969年复活节前后在奥地利某地举行的所谓第九次世界代表大会。据报道，来自三十个国家的九十八名代表、兄弟组织的代表和观察员参加了大会。大会通过的主要文件是关于世界革命的新论题和一项关于世界青年激进化的决议。第九次代表大会的名誉主席包括秘鲁的乌戈·布兰科以及墨西哥的丹尼尔·卡梅霍和卡洛斯·塞维利亚，这些人当时都在他们自己的国家里坐牢。

第九次代表大会关于拉丁美洲的决议特别有意思。决议说，“拉丁美洲的基本前景，也即唯一现实的前景是：可能会持续多年的一场武装斗争。因此不能把技术准备非常简单地看作是革命工作的方面之一，而应看作是大陆范围的基本方面，是（武装斗争）最低限度条件尚未具备的國家的基本方面之一。不应忘记，归根到

^① 《世界展望》，墨西哥，1966年10月7日，第23页。

底,只有通过制订正确的革命方针才能取得武装斗争的成功;也不应忽视这一事实:运用这样的革命斗争意味着首先要集中一支最低限度的有组织的和政治上一致的力量。”^①

在那些声称自己是列夫·托洛茨基继承者的组织中,第四国际统一书记派仍然是最强大的。它的队伍中有欧洲(英国除外)最重要的托洛茨基主义分子以及美国、加拿大、印度、锡兰、澳大利亚和新西兰的托洛茨基主义政党。可是,这一派在拉丁美洲并不占优势,在整个六十年代的拉丁美洲,波萨达斯派属下的党要比统一书记派属下的党为数更多。

第四国际希利派的国际委员会

第四国际反巴勃罗派国际委员会中的一些人反对本组织同国际托洛茨基主义的巴勃罗派达成和解,这就于1963年产生了统一书记处。其成员中主要有英国社会主义劳工联盟,它最重要的领导人是杰拉尔德·希利。当国际委员会和巴勃罗派组织达成统一时,英国社会主义劳工联盟的代表和国际委员会中的其他一些人反对统一,宣布国际委员会继续存在。

1966年4月4日—8日,这一国际委员会的残余部分在伦敦召开了第一次世界范围的大会——所谓的第四国际国际委员会第三次会议。据报道,“出席会议的有来自十个国家的代表和观察员。两个非洲国家的代表团因护照纠葛未能出席会议。”^②虽然看来没有发表究竟哪些组织和国家派代表出席,但会议的报道表明,派出代表的国家中据说有英国、法国、希腊、匈牙利和美国。匈牙利的代表是一位流亡者。

这次大会通过了五项主要文件:《重建第四国际》、《关于重建

① 《第四国际》(统一书记处),巴黎,1965年5月,第61—62页。

② 《第四国际》,伦敦,1966年8月,第104页。

第四国际委员会的报告和国际委员会的任务》、《大会美国委员会的报告》、《国际委员会关于罗伯逊和斯巴达克代表团参加本届会议的声明》和《国际大会宣言》。这些文件一定程度上说明了国际委员会和统一书记处之间的分歧。

主要的分歧之一是关于“打进去”的问题，即一些国家的托洛茨基主义组织是否应当在社会党和共产党内部设法开展工作。关于这一点，《重建第四国际》的决议指出：“在先进国家中，僭用第四国际名称的修正主义者既屈从于斯大林主义，又屈从于社会民主主义。这也是放弃了建立独立的工人阶级政党的任务。万事集中于一点：‘深入地打进去’，并在社会民主党内鼓励‘群众性中间派’倾向。这样，这些部门的干部被训练得能够机会主义地适应于专业的中间分子，并在加强社会民主主义官僚体制方面起到作用。”^①

这两个组织所争执的另一点是，国际委员会声称统一书记处的托洛茨基主义分子主张“三分天下的‘理论’，即：‘社会主义国家’、‘先进的资本主义国家’和‘第三世界或风暴中心国家’。”伦敦会议在《重建第四国际》的决议中宣告：“修正主义将先进国家的革命、‘殖民地革命’和工人国家的政治革命分成不同部分，它为资产阶级控制工人运动和阻挠建立革命政党，起了最重要的掩护作用。”^②

伦敦会议还对统一书记处派对待中苏分裂的态度，进行了严厉的批评。会议关于《重建第四国际》的决议评论称：“这一修正主义的破产特别明显地表现在巴勃罗派对苏联共产党和中国共产党分裂问题的估价上。巴勃罗派不对这一分裂的原因和后果进行客观的分析，以便加强第四国际击败官僚体制的斗争，而是详细地讨论哪条路线——中国的或俄国的——能最充分地表达国际社会主

① 《第四国际》，伦敦，1966年8月，第111页。

② 同上杂志，第116页。

义的需要这一虚假问题。事实是，虽然中国人对苏联共产党的修正主义理论提出了形式上正确的批评，但是这些批评只是一种理论上的装潢，其实际目的是为了反对苏联官僚以牺牲中国为代价而企图同美帝国主义者达成协议的后果。中国领导人对殖民地国家民族资产阶级的作用和苏联对待民族资产阶级的态度提出了形式上正确的批评，并不能阻止中国领导人根据中国的外交需要去破坏工人的斗争(例如在印度尼西亚和北非)。”^①

托洛茨基派在对待古巴卡斯特罗的革命究竟应采取什么态度这个问题上，也存在着基本分歧。国际委员会在《重建第四国际》的决议中批判了统一书记处的立场，并表明了它自己对这个问题的态度：“对古巴的卡斯特罗政权不加鉴别地称赞为‘健康的工人国家’，所有独立的工人阶级的斗争(包括建党)都被放弃了。修正主义者甚至对卡斯特罗镇压那里的托洛茨基主义党(1962年从巴勃罗派分裂出来的波萨达斯集团的一部分)，也认为是正当的。在古巴建设一个独立的工人党和建立工人委员会，作为无产阶级国际主义方针的一部分而扩大拉丁美洲的革命，同美国和世界其他地方的工人结成革命的联盟，这一切完全放弃了。对于苏联官僚集团的‘援助’，不是从国际阶级斗争的角度来看，不是看到苏联官僚集团力求利用古巴革命为其自身的目的服务，而把它看成是对古巴的一种‘进步的’援助。”^②

在苏联1968年入侵捷克斯洛伐克之后，第四国际国际委员会发表了一份攻击统一书记处的长篇文件。其中的一段说：“它全部抱成一团，完全结成一伙；第四国际中的叛徒已屈服于帝国主义和苏联官僚集团的压力，他们成了惊慌失措的小资产阶级和胡思乱想的‘理论家’的先驱者。他们今后的政治作用就是篡夺第四国际

① 《第四国际》，伦敦，1966年8月，第111页。

② 同上杂志，第112页。

的名称来阻碍第四国际的重建。”^①

到了1970年，第四国际国际委员会依然是列夫·托洛茨基继承人位置的竞争者之一。可是，它的追随者大都局限于欧洲和北美。国际委员会的成员分布在英国、美国（美国的工人联盟表面上不是国际委员会的成员，以免受沃里斯法的约束，但实际上是参加国际委员会的活动的）、加拿大、匈牙利、爱尔兰、希腊和法国。拉丁美洲只有一个组织——吉列尔莫·罗拉领导的玻利维亚革命工人党的一派——同国际委员会有联系。^②

最后，希利派声称锡兰革命平等社会党内分裂出来的一个组织是他们的下属组织之一；革命平等社会党本身是1964年由党内持不同政见者所成立的，这些人认为平等社会党决定参加当时锡兰总理班达拉奈克夫人内阁的行为是“修正主义”。平等社会党本身不再参加任何一个相互竞争的国际托洛茨基主义派，虽然它仍然认为自己是一个托洛茨基主义组织。^③

在1971年最后几个月，国际委员会发生了一次重大分裂，一方以英国社会主义劳工联盟为首，另一方以法国国际主义共产主义组织为首。这次分裂的直接理由是，对国际委员会玻利维亚下属组织在导致1971年8月胡安·何塞·托雷斯将军的左派政府*被推翻一事中所起的作用上，产生意见分歧。然而，这场争执看来是已经酝酿多年的分歧的高潮。

① 《第四国际》，伦敦，1968—1969年冬季号，第113页。

② 《洲际新闻》，1971年11月22日，第1016页。

③ 同锡兰平等社会党领袖 N. M. 佩雷拉的谈话，1971年9月21日于纽约。

* 1970年10月7日，胡安·何塞·托雷斯在人民群众的支持下，粉碎了陆军司令罗赫略·米兰达发动的军事政变，接替阿尔弗雷多·奥万多·坎迪亚任总统。托雷斯执政后，驱逐了美国“和平队”，征用了在玻利维亚的美国“文化中心”，收回了美资矿业公司的铀矿租让地。1971年8月，民族主义革命运动和社会主义长枪党发动武装叛乱并推翻托雷斯政府，成立以乌戈·班塞尔为总统的政府。——译者

第四国际波萨达斯派

正如在反巴勃罗派中的情况一样，巴勃罗派组织中也有人不同意六十年代初世界托洛茨基主义队伍重新统一的计划。这些人以所谓第四国际国际执行委员会的拉丁美洲局为中心，为首的是人称 J. 波萨达斯的阿根廷托洛茨基主义分子。

J. 波萨达斯的真名是奥梅罗·克里斯塔利，是出席 1948 年第四国际第二次代表大会的一个阿根廷派系的主要人物；他们作为“同情组织”的代表参加大会。在 1951 年召开的第三次代表大会上，波萨达斯领导的阿根廷党被正式接纳加入第四国际。从那时起，波萨达斯派的影响扩大到拉丁美洲其他的托洛茨基主义政党，最终控制了这些党，先是乌拉圭党，然后是其他几个党。在 1953—1954 年第四国际分裂之后，波萨达斯成了巴勃罗派新建的拉丁美洲局的头头。

1959 年年底，波萨达斯和他的朋友们开始表示不同意巴勃罗派第四国际大多数人的意见。1960 年在巴勃罗派第七次世界代表大会之前的讨论中，这些分歧继续存在。波萨达斯反对第四国际“欧洲知识分子头目们”，指责他们过多地集中关注欧洲的问题；他本人坚持“殖民地革命”应放在“首位”。

波萨达斯和他的朋友们对巴勃罗派第四国际的不满，不久就采取了组织行动。1961 年 10 月拉丁美洲局组织召开的一次拉丁美洲会议上，采取了这方面的第一个行动。^① 在拉丁美洲局的赞助下，1962 年 4 月在一个未指名的地点召开了第四国际非常会议。虽然公布的会议正式记录中并没有说明哪些党和组织出席会议，但是这次会议是拉丁美洲局召集的，因此可以合情合理地认为，出席会议的绝大多数代表来自第四国际巴勃罗派下属的拉丁美洲

^① 费尔南多·查多：《关于波萨达斯主义的尸体解剖报告》，未出版的论文。

组织。

1962年4月会议发表的一份“公报”指出了拉丁美洲局和巴勃罗同第四国际其他领导人之间发生争执的原因所在，“公报”说：“在世界原子战争面前，前第四国际欧洲知识分子领导人放弃了第四国际的马克思主义革命立场，屈服于小资产阶级的人道主义和平主义，反对战争不可避免的思想，反对动员群众为世界原子战争作好准备，并在苏联重新进行核试验的时候堕入反苏立场。”^①

L. 科斯塔向第四国际这次非常会议作了组织工作的报告。据说报告谈了“‘打进去’工作的情况，建党工作的经验”和“拉丁美洲局活动情况简介以及提出有关国际执行委员会的工作和筹备即将召开的非常代表大会而设立的临时国际书记处的工作计划。”会议选出了一个新的临时国际执行委员会和一个国际书记处，以“替代过去那些业已瘫痪和解体的组织”。会议“决定为重建第四国际在欧洲的各个支部而努力工作。”^②

波萨达斯派第四国际于1964年3月举行了它第一次世界大会。大会“在欧洲”某地举行，定名为第四国际第七次世界代表大会。代表大会以后，波萨达斯派国际书记处发表的一份公报中指出：“代表非洲、欧洲和拉丁美洲十三个国家的代表出席了会议。古巴支部的代表团没有获得出国签证而不能出席。”波萨达斯在组织工作报告中说，当时第四国际有六个欧洲支部。^③

上述公报评论了已经向代表大会作报告的波萨达斯派的组织活动情况。公报说：“代表大会意识到，在整顿欧洲和非洲支部以及组成新的支部的仅仅一年半时间之后，这些支部得到了加强，定期出版双周刊或月刊，保持富有生气的活动，在欧洲无产阶级的斗

① 《第四国际》(波萨达斯派)，1962年9月，第12页。

② 同上杂志，第13页。

③ 同上杂志，1964年7月，第18页和第1920页。

争中发展壮大，在其中赢得了威望和地位。代表大会特别意识到西班牙支部的活动，该支部尽管遭到弗朗哥的镇压，仍然开展经常的、越来越多的活动。”^①

代表大会产生了一些文件，其中包括作为决议通过的《J. 波萨达斯的开幕词》。其他文件有：《世界不断革命的发展》、《世界不断革命进程中的殖民地革命》、《政治革命的发展》、《中苏危机》和一项《政治决议》。

1967年4月，国际托洛茨基主义的波萨达斯派在欧洲某地举行了它的第三次世界大会，定名为第四国际第八次世界大会。据报道，四十二名代表出席了大会，他们代表十七个波萨达斯派下属组织中的十三个。这十七个下属组织中，九个在拉美，六个在欧洲，两个在非洲。据报道，第四国际在这次大会之前曾经出版了十五期《马克思主义评论》（有拉丁美洲版和意大利文版两种版本）和十八种《论社会主义革命的主要问题》的小册子。

波萨达斯派具有若干不同于国际托洛茨基主义其他派系的特征。其中之一是对其主要领袖、阿根廷人J. 波萨达斯的“个人崇拜”。国际书记处的每一次会议大多是由波萨达斯发表讲话，然后作为书记处的决议加以通过。甚至第四国际第八次代表大会的决议也几乎完全是波萨达斯的讲话。同样，第四国际各国下属组织出版的报纸，在内容上也大多是波萨达斯的讲话。

波萨达斯对“民主集中制”这个布尔什维克老概念的解释，为这种个人崇拜提供了“理论”依据。他的解释几乎完全强调“集中”而不是强调“民主”。波萨达斯在对巴西支部成员的一次讲话中，对这一解释作了发挥；这篇讲话后来被作为1966年2月第四国际国际书记处全体会议的一项决议加以通过。这项决议反映波萨达斯讲话时转弯抹角、有时还令人费解的文风特色。

^① 《第四国际》（波萨达斯派），1964年7月，第20页。

波萨达斯在这项文件中评述道：“党的组织和第四国际组织必须使那些最有能力的、最成熟或可以充分发挥作用的人（因为人类发展是不平衡的而且是互相结合的）来影响党和推动它前进，从认识上把它提高到历史的需要、政治纲领的目标、推翻资本主义和建设社会主义的目标，而不需要所有的人对整个历史、社会和社会主义都达到同样的科学的理解程度。”^①

波萨达斯详细阐述了这一理论在他领导的第四国际中的具体运用。他说：“第四国际的中央集权制除了是历史上组织的需要以外，这种手段可以使党即时利用、不时使用、随时变换和随时运用。比如，党收到一篇文章，读一读，议一议，意见就协调一致。发生任何事件时，它的文章就这样传遍全世界了。越南问题刚出现时，第四国际中有三种看法，其中两种是错误的。必须马上写文章。一位意大利同志写了一篇，一位乌拉圭同志写了另一篇，波萨达斯同志也写了一篇。同志们需要写文章，他们都写了。可是他们读了波萨达斯写的文章以后，都一致表示赞同了，活动就开展起来了。”^②

鉴于第四国际波萨达斯派同波萨达斯本人的这种紧密关系，这个组织所持的立场也就是它的领导人提出的立场。那些立场中有许多同国际托洛茨基主义的其它派别所持的立场有许多是迥然不同的。波萨达斯派第四国际所持的一个立场就是坚持认为原子战争的不可避免性，并认为一场原子战争之后必然是工人和社会主义的胜利。1966年2月第四国际国际书记处扩大会议通过的由波萨达斯所撰写的宣言，是这一立场的典型说明。

这份宣言在讨论中国局势时指出：“这意味着原子战争。中国

^① 《拉丁美洲马克思主义评论》（波萨达斯派），1966年8月号，第34页和第195页。

^② 同上杂志，第171页。

人意识到原子战争是不可避免的。”但是对波萨达斯来说，原子战争并不可怕：“毁灭开始以后，群众会在很短的时间内，在几个钟点里，在所有的国家中起来。资本主义在一场原子战争中不能保护它自己，它只能躲在洞穴里并企图竭力破坏一切。而群众却要挺身而出，而且必须挺身而出，因为这是打败敌人的唯一生存之路。社会上会发生连锁反应，而且在战争到来之前的日子里进行备战也必将意味着群众的准备。必须预见到，资本主义政权会到处纷纷崩溃。资本主义的机器：警察、军队将无法抵御，逃之夭夭，人人力图自救。”这样，原子战争的爆发就成为工人的良机。波萨达斯接着说：“必须立即着手组织工人政权，即使在有限的基础上，而不必等待控制全国甚至全市。委员会、联合阵线、苏维埃、公社必须组织起来并行使权力。决不要把自己作为政府而强加给群众，而要鼓励他们组织起来和联合起来……官僚主义的工会领袖会叛离。必须把工会召集起来，让它们去组织工人的权力。生活在民主的社会主义政权下，天天举行集会，事事共同决定。在那里，通过集会、公社和苏维埃中的政治生活，并有武装支持其一切行动，这样，社会利益就超乎一切个人利益之上。”^①

波萨达斯对托洛茨基主义派主张在苏联进行一场政治革命的传统号召，作出一点新的解释。他认为：“政治革命将是存在官僚政权的工人国家中爆发战争的结果。官僚集团将进行凶猛的抵抗，这主要是在苏联，那里的官僚集团是有组织的，它的政治结构非常脱离群众。”^②波萨达斯派的托洛茨基主义分子也是中国共产党政权的有力支持者，他们特别热情地赞扬文化大革命。因此，第四国际第八次世界代表大会上由波萨达斯撰写的一项题为《工人国家中政治革命的发展》的决议中断言：“中国的政治革命是世界

^① 《拉丁美洲马克思主义评论》(波萨达斯派), 1966年8月号, 第136页。

^② 同上杂志, 第37页。

革命的中心，因为中国在进行政治革命的同时宣布进行其他革命的历史必然性，其中包括殖民地革命；中国人正在改正他们以前的立场。”^①

最后，国际托洛茨基主义波萨达斯一派同其他的第四国际组织之间的一个理论上和策略上的分歧是：波萨达斯派号召结成一条“反帝统一阵线”。波萨达斯派第四国际1970年五一节宣言中有一段话典型地反映了这一立场。它说：“第四国际号召一切共产党人、一切共产党群众、共产党领导人、社会党人、基督教民主党人、工会积极分子、工会领导人、革命的民族主义积极分子和领导人、工人国家的党和工会领导和积极分子，为了争取统一，为了结成世界统一阵线以实现群众性的共产国际的纲领，为了制定一项推翻世界资本主义残余势力的斗争纲领，为了建立反帝统一阵线，为了组织全世界群众采取预防性行动以反对帝国主义正在准备、而且随时准备发动、甚至现在马上发动的世界原子战争而斗争。”^②

或许因为波萨达斯派是由巴勃罗派第四国际的拉丁美洲局所创建的，而拉丁美洲局又包括那个地区大部分原来的托派组织，因此托洛茨基主义的波萨达斯派开始时在拉丁美洲拥有比较多的追随者。此外，波萨达斯派还声称在意大利、英国、比利时、法国、西班牙、希腊和阿尔及利亚都有支部。这些党大部分用革命工人党这一名称，每个党都出版一种比较定期的刊物。这些刊物上忠实地登满了J. 波萨达斯冗长的声明和论文，并介绍波萨达斯式的国际托洛茨基主义思想。

波萨达斯派第四国际象一切带有命运感的政治小组织一样，往往夸大了它们自己的力量和重要性。但是，它在这方面比大多数

① 《拉丁美洲马克思主义评论》(波萨达斯派),1967年7月号,第175页。

② 《工人之声》,秘鲁利马,1970年5月下半月。

组织走得更远。波萨达斯在1968年4月的小册子中的讲话，就是这样的典型。他写道：“自从不到六年前我们分道扬镳并把所有其他人开除出第四国际以来，我们取得的进展程度已经足以估量那些进展的重要性来设想未来的发展速度。在六年中，我们进入了十六个国家，其中六个是工人国家。六年之中，我们是六个工人国家的领导经常关注的对象。而其他那些人却没有能力在西班牙建立小组和支部，没有能力在北美洲保持一个托洛茨基主义运动，没有能力在古巴保持这样一个运动。而我们的支部则显示了它们早已具有出众的重要性，早已被群众认为是负责任的和有能力的领导了，群众一开始就跟随这个领导。”^①

波萨达斯派对自己作用的乐观自信的看法反映在1967年4月“霍拉西奥”在第八次代表大会的开幕词中：“我们的支部是人类进步的工具，今天，人类进步就是争取社会主义的斗争。在欧洲，如同在非洲，在亚洲，在拉丁美洲，在工人国家，在美国一样，群众表明他们准备开展和肯定一个世界性的托洛茨基主义思潮。第四国际在这个最后时期中所取得的一切成就（其中包括我们的出版物和第八次世界代表大会准备期间的所有报告）表明这一世界性的托洛茨基主义潮流得到了加强。世界资本主义报刊对波萨达斯同志的文章和著作以及对第四国际的活动的成功和越来越大的重要性的看法，表明帝国主义和苏联官僚集团以及改良主义和调和主义思潮现在承认了我们的历史作用和地位。”^②

世界托洛茨基主义的影响

托洛茨基主义实际上并不是世界政治中的一支重要力量。七十年代初，没有哪个托派政党在任何国家中严重争夺政权。锡兰

① J. 波萨达斯：《资本主义世界的瓦解》（1968年），第93页。

② 《拉丁美洲马克思主义评论》（波萨达斯派），1967年7月号，第62页。

平等社会党可能被认为是具有重大政治影响的唯一托派政党，但是当该党接受班达拉奈克夫人的邀请而参加她的第一届政府时，第四国际各派在六十年代初都同它断绝了关系。

然而，有些托洛茨基主义党在它们各自国家的极左派中并不是没有影响的。比如，在法国1968年5月的学生动乱期间，同统一书记处和第四国际“希利派”有关系的党派特别在学生中间起了重要的作用。英国社会主义劳工联盟的突出之处是：它是能够保持出版一份日报的唯一托洛茨基主义组织，那份报纸叫《工人新闻报》，于1969年10月开始发行。在美国，统一书记处的下属组织社会主义工人党若干年来在抗议侵越战争运动内部的极左派中间是影响力最大的。它的青年组织青年社会主义联盟在六十年代后期成为美国发展最迅速和最大的左翼学生组织。

长期担任第四国际总书记的米歇尔·巴勃罗在阿尔及利亚独立的早期对该国的事务起过重要的——也是十分有争议的——作用。英国希利派社会主义劳工联盟的机关刊物《工人新闻报》在1970年1月17日一期中指出：巴勃罗“在本·贝拉*一上台就当上了他的经济顾问”。文章还说：“修正主义者在本·贝拉上台时宣布阿尔及利亚是‘工人国家’，而巴勃罗则以本·贝拉的名义在欧洲游说，同资产阶级自由派一起为饥馑的阿尔及利亚群众募集罐头牛奶，阿尔及利亚群众从本·贝拉微不足道的改革中得不到什么好处。”文章指出，当本·贝拉倒台时，巴勃罗就溜到欧洲去了。

至少就其下属组织的地理分布情况来说，国际托洛茨基主义确实是一个世界规模的运动。第四国际的这一派或那一派在西欧大多数国家，在美国和加拿大，在九个拉丁美洲国家，在阿尔及利亚和南非，在澳大利亚和新西兰，在以色列、印度、锡兰和日本都有

* 本·贝拉于1963年9月当选为阿尔及利亚民主人民共和国首任总统，1965年6月19日胡阿里·布迈丁发动政变，本·贝拉政权被推翻。——译者

自己的下属组织,甚至在波兰和捷克斯洛伐克还有同情组织。

国际托洛茨基主义和列夫·托洛茨基的传统

由于托洛茨基主义运动完全渊源于一个人的思想和活动,人们也许必然会问:在托洛茨基逝世之后一个世代,以他的名字命名的运动是否能真正地继续代表他所信奉的思想呢? 马克斯·沙赫曼曾长期参加国际托洛茨基主义运动,后来又是对这个运动的敏锐观察家,他在1970年12月7日致本书作者的一封信中用以下一段话谈了这个问题:

托洛茨基主义运动在最近的四十年至五十年期间保持了明显的连续性,三个(甚至四个)第四国际中的每一个就是这种连续性的体现。但是,若干时候以来,已经没有这种名符其实的托洛茨基主义的连续性了。列夫·托洛茨基在1928年到1932年期间特别对托洛茨基主义作了解释,托洛茨基主义完全以下述三点主张为基础:反对一国建设社会主义的理论;反对英俄工会统一委员会的各项政策;反对斯大林—布哈林对中国革命的政策(“我们的阶级集团”等)。所有这些最终都“归结为”支持不断革命的理论 and 实践:只有无产阶级(“得到农民支持的”)——只有布尔什维克革命党领导下的无产阶级——才能够解决建立无产阶级社会主义专政过程中民主革命的所有问题。这一基本的、真正的托洛茨基主义主张,在任何一个第四国际组织或任何独立的新托洛茨基主义组织中都没有得到体现或反映出来。从这个基本的和十分重要的意义上来看,托洛茨基主义已经随同托洛茨基一起寿终正寝了。留下来的仅仅是他的名声和对故人的怀念(敬慕和崇拜)而已。

美国社会主义工人党约瑟夫·汉森在一篇回答古巴共产党领导人布拉斯·罗加对托洛茨基主义攻击的文章中也许可以找到托洛茨基派就沙赫曼的论据作出最简明的正式答复。汉森在一处写道：“托洛茨基坚持认为，保卫十月革命的社会主义成果要求扩大革命的范围，并使它达到最终在工业先进的资本主义国家中建立社会主义国际革命的顶峰。现实已经证实了托洛茨基立场的正确：革命扩大到了东欧，中国推翻了资本家和地主，最后而且同样重要的是，在离开最大的帝国主义强国仅仅九十海里的地方发生了古巴革命。”^①

可是，人们也许会问，列夫·托洛茨基本人在他去世前不久是否没有为他二十五年之后的“正统”信徒们提供反驳的证据。托洛茨基在1939年10月墨西哥托洛茨基主义杂志《关键》上发表的一篇文章中，有一段话使人们对于托洛茨基本人假如在第二次世界大战之后还活着的话是否还是一个正统的托洛茨基主义者，感到严重怀疑。这段话意义重大，有必要把其中有关部分全文转载如下：

如果这场战争象我们所确信的那样引起了无产阶级革命，那么这场战争必将导致苏联官僚统治的垮台和苏维埃民主的再生，其经济和文化基础要比1918年的高得多。如果这样的话，斯大林官僚主义集团究竟是“阶级”呢还是工人国家多余的肿瘤就会自行解决。在国际革命的发展过程中，苏联官僚统治只不过是一段插曲，这一点大家都很清楚。

但是，如果人们认为目前的战争不会引起革命、反而会引起无产阶级衰落的话，那么还有另一种解决办法：那就是垄断资本主义后来的腐朽，它同国家溶为一体，并以极权主义政权

^① 《第四国际》(统一书记处)，1966年8月，第42页。

替代官僚主义统治。无产阶级不能掌握社会的发展方向，在这样的情况下，就会实际上导致新的剥削阶级的出现，这个阶级是从波拿巴主义和法西斯主义官僚统治中涌现的。显而易见，它是一个衰落中的、标志着文明即将告终的政权。

历史的抉择如下：斯大林政权要么是资本主义社会向社会主义社会转变过程中的一次令人厌恶的偶然事件，要么就是一个新的剥削社会的最初阶段。如果后一种推测证明是正确的话，官僚主义集团必将自然地转变成新的剥削阶级。尽管后一种前景非常严峻，但如果世界无产阶级真的证明没有能力执行时代所赋予它的使命的话，那么我们别无他法，而只能承认建立在资本主义社会内部矛盾之上的社会主义纲领是一个乌托邦。当然，必须制订一项新的“最低”纲领，以保卫极权主义官僚社会中奴隶的利益。

上述引文看来肯定表明：托洛茨基要是活到第二次世界大战以后的话，他就不再会认为苏联是“工人国家”了；他肯定也不会认为战后建立起来的那些新的共产党政权具有这样的性质。他的遗孀娜塔莉娅·赛道娃·托洛茨基 1951 年退出第四国际时所写的一封信为这种解释提供了一些证据。她提出自己退出第四国际的几点理由：“你们被老的和过时的公式缠住了，继续认为斯大林主义的国家是工人国家。我不能、也不愿在这一点上追随你们……你们认为大战期间和大战之后确立了斯大林主义统治权的东欧国家也是工人国家。这等于是说斯大林主义完成了一项革命的和社会主义的使命。我不能、也不愿在这一点上追随你们。”

她反对第四国际支持南斯拉夫的铁托主义政权，她写道：“你们直到现在还支持斯大林主义的军队打仗，在那场战争中，他们使朝鲜人民遭受苦难。我不能、也不愿在这一点上追随你们。”她用

下面的话概括了自己的立场：“我很清楚地知道你们不断重申要批判和反对斯大林主义。但在实际上，你们的批判和斗争失去了价值，因为它们取决于并服从于保卫斯大林主义国家的立场，它们是得不到任何结果的。”^①

结 语

托洛茨基主义是国际共产主义内部最持久的反对派运动。它最初出现在世界政治舞台上，是由于列宁逝世之后苏联权力之争的结果。在许多欧洲国家，以及在美国和加拿大和亚洲和拉丁美洲一些国家中，托洛茨基主义赢得了信徒。

虽然在托洛茨基在世时托洛茨基主义运动还保持着相对的统一，但是自从他去世之后，它就发生了一系列的分裂。托洛茨基的继承者在解释和运用他所发展起来的学说时，有相当大的分歧。在各国托洛茨基主义组织内部和整个第四国际内部，权力之争也并未绝迹。结果，到了六十年代初，世界托洛茨基主义分裂成四个相互竞争的第四国际，各自都声称是托洛茨基主义运动创始人的真正继承者。这种分裂在十年以后还继续存在。

^① 娜塔莉娅·赛道娃·托洛茨基致第四国际执行委员会和社会主义工人党政治委员会的信，1951年5月9日。

第二章 拉丁美洲的第四国际派

托洛茨基派在拉丁美洲各种左派政党中力量较小。这个地区大约只有一半的国家存在着第四国际的组织；而且除了一、两个以外，这些组织即使在这些国家的左翼政治力量中也从来不是主要的政党。可是，在本世纪六十年代以前，它们是拉丁美洲地区共产党人的主要马克思列宁主义对手；尽管它们不断遭到失败，而且缺乏来自外部的任何重大支持，它们还是坚持不懈地认真争夺政权，那是相当突出的。

拉丁美洲马克思列宁主义左派中的托洛茨基主义

除了两、三个国家以外，在拉丁美洲争取实现经济、社会和政治根本变革的那些政治力量中，马克思列宁主义者一直是少数派。在大约六个国家中，所谓的民族革命党（如秘鲁的人民党和委内瑞拉的民主行动党）要比任何类型的马克思列宁主义者所取得的成就大得多；在少数情况下，基督教民主党也有更大成就；阿根廷的庇隆主义者、巴西热图利奥·瓦加斯的追随者、乌拉圭的巴特列红党都比马克思列宁主义党重要得多。只有在卡斯特罗的古巴和在智利，马克思列宁主义者才是政权的主要争夺者。

在马克思列宁主义阵营内，正统的共产党（1953年以前是斯大林主义分子，1957年后是赫鲁晓夫分子和勃列日涅夫分子）组成了为时最久、人数最多和最强大的力量。有些共产党比共产党国际成立还早。它们是二十年代初加入共产国际的社会党。到了四十年代后期，每个拉丁美洲国家都有了共产党。在整个地区，它们对

有组织的劳工始终具有广泛的影响,在四十年代的大部分时间,它们是工会中居统治地位的政治力量。它们在四十年代早期参加了古巴的富尔亨西奥·巴蒂斯塔将军的政府,1944年参加了厄瓜多尔的何塞·玛丽亚·贝拉斯科·伊瓦拉的政府,1946年至1947年参加了智利的加夫列尔·冈萨雷斯·魏地拉的政府。

这些正统的共产党今天依然是整个拉丁美洲最大的和政治上最重要的马克思列宁主义力量。在中苏破裂和苏联领导同菲德尔·卡斯特罗之间的争执中,它们仍然坚定不移地效忠于莫斯科;它们确实是苏联国境以外支持苏联共产党领导的最重要的集团之一。

随着苏联和中国共产党领导之间发生分裂,在拉丁美洲出现了一批同北京站在一起的共产党组织。中国人自称拉丁美洲地区有十个这样的党。这些党一般是由于正统的亲莫斯科的拉美共产党内部发生分裂而产生的,它们对于同这些党有联系的青年组织的成员曾有过一定的吸引力。然而,在任何一个拉丁美洲国家中,这样的党在党员人数和影响上都比不上亲苏的党。

六十年代,在拉丁美洲还出现了第三类马克思列宁主义组织,这类组织主要指望哈瓦那给予领导和支持。这些组织完全是在正统的共产主义队伍之外成长起来的,它们通常从中等阶层和上层阶层青年中吸收大部分成员并取得他们的支持。在有些情况下,它们是由于民族革命党出现分裂而形成的。它们把通过游击战夺取政权的道路加以绝对化,拥护埃内斯托·切·格瓦拉和雷吉斯·德布雷所发明的“游击中心”论。少数这样的组织或由于在农村吃了败仗,或由于实际上不可能在农村组织游击活动而转入城市游击活动。这股力量在任何地方都不能发展成为一个得到人民群众大力支持的党。

托洛茨基派并没有象上述三种马克思列宁主义组织中的任何

一种那样重要。第四国际的一些党在党员人数上仍然极少。除了智利和古巴在三十年代、玻利维亚在五十年代初的一段短暂时间以外，它们在任何拉丁美洲国家都没有能够在有组织的劳工内部产生重大的影响。它们不论在哪里都没有能发动一场游击战，尽管有一个时期托洛茨基主义的一个派别曾经在危地马拉的游击队中发生过一些影响。

托洛茨基主义在拉丁美洲的起源和范围

在下列拉丁美洲国家：阿根廷、乌拉圭、巴西、智利、玻利维亚、秘鲁、厄瓜多尔、哥伦比亚、波多黎各、墨西哥和古巴，存在过或现在还存在着托洛茨基主义政党或组织。上述大部分国家，目前至少有两个对立的组织都声称拥护第四国际。这些政党产生的由来各不相同。在阿根廷、巴西、智利、墨西哥、秘鲁和古巴，它们是从各该国的共产党分裂出来的。在玻利维亚和乌拉圭，它们的建立看来同正统的共产党毫无关系，它们是由从未加入过共产国际下属政党的人们所创建的。隶属于第四国际的拉丁美洲政党不同于那些和共产国际有联系的政党，没有一个是通过世界性托洛茨基主义组织的努力而创建的。第四国际不象共产国际那样有一批供养多年的帮助它们在拉美地区成立一些小共产党的领取薪金的组织人员。

拉丁美洲托洛茨基主义党同第四国际的关系

一般地说，拉丁美洲托洛茨基主义党开展活动时，受到第四国际的干预或帮助较少。第四国际并不具备象共产国际在三十年代那样的条件来积极参与它的拉丁美洲成员组织的内部事务。

1938年9月，第四国际成立大会确认了早几个月设立的泛美和太平洋局的建制，以便协调这些地区下属组织的活动。泛美和

太平洋局的总部看来从一开始就设立在纽约。甚至在第四国际成立大会召开之前，就举行了一次西半球的“预备会议”。会议通过了一些有关拉丁美洲局势的决议，其中包括当时的墨西哥托洛茨基主义的主要人物迭戈·里维拉提交的两项决议案。这两项决议案的标题是：《拉丁美洲的发展：关于拉丁美洲论题的建议》和《阶级斗争和印第安人问题》。^①

四十年代初期，当时设在纽约的第四国际总部派有一名代表在南美洲开展工作，它深深地卷入阿根廷和智利第四国际分子的内部争论之中。二十年代之后，随着以阿根廷人 J. 波萨达斯为首的“波萨达斯”派第四国际的建立，第四国际，特别是波萨达斯本人，非常积极地干预了拉丁美洲下属组织、甚至其他各洲下属组织的内部事务。

第二次世界大战之后不久，有人曾试图组织召开一次国际托洛茨基主义拉丁美洲下属组织的会议。智利革命工人党带头提出这一动议，并得到阿根廷革命工人党的支持。^②但是，看来在这动议之后并未得出任何结果。

在五十年代后期和六十年代初期，隶属第四国际反巴勃罗派国际书记处的南美洲南部的党至少保持了一个区域性的空架子，即：正统托洛茨基主义拉丁美洲书记处。阿根廷、智利、玻利维亚和秘鲁的国际委员会派的下属组织看来加入了这个组织，这个组织主要的组织者和鼓动者是国际委员会派阿根廷下属组织的头头纳韦尔·莫雷诺。这个组织在 1961—1963 年在国际委员会派秘鲁下属组织的各项活动中起了相当重要的作用。^③墨西哥托洛茨

① 《关键》，墨西哥城，1938 年 10 月 1 日和 1938 年 11 月 1 日。

② 奥克塔维奥·费尔南德斯档案(以下简称奥·费档案)，智利革命工人党总书记何塞·圣地亚哥 1946 年 11 月致“第四国际各个支部和组织”的信。

③ 关于正统托洛茨基主义拉丁美洲书记处活动的更详尽情况，见第八章《秘鲁的托洛茨基主义》。

基主义运动则经历了由美国托洛茨基主义组织和第四国际直接进行干预的若干时期。

第四国际一方面不常干预它属下的各国党，它给予这些党的帮助也是不多的。没有迹象表明任何一个拉丁美洲的托洛茨基主义政党接受了第四国际或其他外国方面的大笔款项，虽然第四国际出版了各国下属组织以整个第四国际的名义出版的资料。这又同共产国际形成鲜明对照，因为共产国际对它的拉丁美洲地区许多成员组织是提供大量资助的。

近年来，第四国际各种派系为它们的某些被捕入狱的拉丁美洲成员开展广泛的宣传运动。例如，第四国际统一书记处派广泛地宣传被监禁的秘鲁托派领导人乌戈·布兰科的案件，第四国际其他派别对此案也给予一定注意。在六十年代里，所有的第四国际各派系对1968年墨西哥城学生暴动之后被监禁的墨西哥托洛茨基主义分子和其他左派分子进行了广泛的宣传。第四国际波萨达斯派对于被古巴卡斯特罗政府投入监狱的它的五个同志的命运尽可能广泛地开展了宣传活动。

拉丁美洲一些个人也程度不等地广泛参加了第四国际的各项活动。拉丁美洲的代表出席了1938年在巴黎召开的第四国际成立大会；代表之一、巴西人马里奥·佩德罗萨被选进该组织的国际执行委员会。至少有一些拉丁美洲下属组织派代表出席了第四国际1948年和1951年的代表大会。在五十年代和六十年代第四国际发生分裂之后，看来至少也有少数拉丁美洲的代表出席了第四国际不同派别召开的代表会议和代表大会。

拉丁美洲的托洛茨基主义党以及第四国际的分裂

如同世界其他地区的托洛茨基主义政党一样，拉丁美洲的托洛茨基主义政党不得不在最近二十年间分裂为对立的国际托洛茨

基主义派系之间作出选择。在 1953—1954 年米歇尔·巴勃罗的拥护者和反对者之间出现分裂的时候，几乎所有的拉丁美洲党都站在巴勃罗一边并隶属于巴勃罗派所维护的拉丁美洲局。在玻利维亚，在对待“巴勃罗主义”问题上的分歧是造成 1956 年革命工人党分裂的一个原因。

在五十年代初第四国际出现这一分裂之后的年代里，反巴勃罗派在同它的拉丁美洲对手竞争中取得了相当大的进展。美国社会主义工人党的约瑟夫·汉森（五十年代该党同反巴勃罗分子结成同盟）在 1970 年 12 月 24 日给本书作者的一封信中，简要叙述了这两个组织在国际托洛茨基主义设法统一之前几年的力量对比。他评论道：“首先，当 1953—1954 年发生分裂时，巴勃罗在拉丁美洲并非事事占上风的。我怀疑他甚至并没有掌握到多数，尽管根据拉丁美洲当时总的情况是很难加以确定的。第四国际内部对这个问题还存在着一些争论，这是我 1961 年底在访问拉丁美洲期间设法确定的若干问题之一。我同秘鲁、玻利维亚、智利和阿根廷的波萨达斯派组织的领导人交谈过。我也同独立的左派人物以及我相识多年的朋友们核对了情况。”

汉森谈到了他访问过的几个国家的这一情况。他认为巴勃罗派在秘鲁是少数派，指出“在秘鲁，国际委员会支持者的力量远远超过国际执行委员会派的组织。此外，国际执行委员会派当时正在经受一场十分尖锐的内部斗争。”关于邻国玻利维亚，他写道：“很难弄清楚确切的情况，因为当时正在进行镇压和巷战。然而，我同那里的国际执行委员会派的领导人谈了话，他们也正在同波萨达斯派组织进行斗争；而且，当波萨达斯采取分裂行动时，除了四、五个人以外，国际执行委员会派的领导人把什么都囊括走了。此外，吉列尔莫·洛拉当然还领导了另一享有相当声望的组织，它的成员不仅在拉巴斯而且在矿区都有。”

汉森评论道，在智利，他认为“国际委员会派和国际执行委员会派的力量在规模上差别不大，但是据我看，国际委员会派在劳工运动中和在保卫古巴的活动中具有坚实得多的基础。”他对美国社会主义工人党在阿根廷的相应组织印象显然极其深刻：“在阿根廷，波萨达斯派出版一份定期发行的报纸，参加选举活动，发言时就象那个国家没有别的托洛茨基主义组织一样，但事实上它们的实际力量要比国际委员会派小得多。虽然国际委员会派的队伍局部处于地下，但它们在布宜诺斯艾利斯设有一个工作总部，那是拉丁美洲托洛茨基主义组织中最大的总部。在我访问过的许多城市里也有规模相当大的、积极开展活动的组织。虽然要买波萨达斯派的报纸是不难的，但是要找到他们的人却很困难。”

汉森承认同他有联系的第四国际国际委员会派 1961 年在乌拉圭和巴西是两派中的弱者，在巴西实际上根本没有支持者。最后，汉森谈到了古巴，指出“那里的事态发展是相当不同的。国际委员会的力量极其同情卡斯特罗主义运动，参加它的活动，并最终被它吸收。关塔那摩城附近有个较老的组织继续同国际执行委员会站在一起，当波萨达斯分裂国际执行委员会时，这个组织就跟波萨达斯走了。”

在六十年代初，第四国际作了重新统一的尝试，后来分裂成四派——统一书记处、希利派国际委员会、波萨达斯派和米歇尔·巴勃罗领导的单独一派——之后，大部分老的拉丁美洲托洛茨基主义党都选择跟波萨达斯派走。第四国际的这一派事实上是巴勃罗派第四国际的拉丁美洲局所组织的。

老的拉丁美洲党中不接受波萨达斯派影响的主要是已经加入了巴勃罗派的玻利维亚革命工人党的一派。该党支持巴勃罗派同它们的反对派实现统一，有一段时间它是统一书记处派第四国际最重要的拉丁美洲下属组织。然而，统一书记处积极设法鼓励在

拉丁美洲一些国家中建立波萨达斯派政党的其他对手。结果，统一书记处就能在阿根廷、巴西、智利、秘鲁、墨西哥和古巴吸收下属组织或同情组织。但是，同情统一书记处的智利和古巴的托洛茨基主义分子并没有组成独立的党；它们分别隶属于亲卡斯特罗的左派革命运动和古巴共产党。第四国际的希利派分子未能争取到任何拉丁美洲的托洛茨基主义党，虽然吉列尔莫·洛拉领导的玻利维亚革命工人党的一派积极同情希利派。米歇尔·巴勃罗在同统一书记处分裂之后所建立的规模很小的第四国际，似乎没有赢得任何拉丁美洲托洛茨基主义组织的支持。

因此，至少部分是由于世界托洛茨基主义队伍内部的派系分立，相互竞争的党在几个拉丁美洲国家中发展起来了，它们加入或同情相互对立的几个第四国际。在巴西、阿根廷、智利和墨西哥各有两个托洛茨基主义政党或组织；在玻利维亚和秘鲁各有三个。我们将在后面各章中较为详尽地叙述各国托洛茨基主义运动内部这些派系分立的根源和结果。

托洛茨基主义者和菲德尔·卡斯特罗

古巴卡斯特罗政府的建立，对托洛茨基主义者正如对拉丁美洲所有的左派政治组织一样，具有重大的影响。第四国际的不同派别以及它们在拉丁美洲的党，在对古巴革命的估价上有很大分歧。

统一书记处派的第四国际是最热心于卡斯特罗政权的托洛茨基主义组织。它认为古巴政府是“工人国家”，尽管它对卡斯特罗谴责托洛茨基主义的言论表示不满，但是从未动摇过对卡斯特罗政权总的持支持的态度。在美国，它是参加自由古巴委员会的主要政治组织，该委员会在六十年代前半期争取人们对卡斯特罗政权的支持。在古巴国内，它放弃了自己在那里的独立政治组织，它

的信徒们加入了菲德尔·卡斯特罗的古巴共产党。

希利派第四国际则持迥然不同的立场。它还是认为卡斯特罗政权是“小资产阶级”政府，因此不配享有托洛茨基主义者历来给予“工人国家”（不管它多么蜕化变质）的那种“无条件支持”。希利派虽然在这个岛国并没有下属组织，它却强烈地抗议卡斯特罗政府对隶属于国际托洛茨基主义波萨达斯派的革命工人党（托）所采取的镇压行动。

波萨达斯派采取的则是又一种立场。他们宣称“无条件”支持古巴革命，但同时强烈抗议卡斯特罗政府镇压他们在这个岛国的党和监禁党的一些领导人，他们仍然坚持在古巴保持一个独立的托洛茨基主义党的必要性。

就卡斯特罗来说，他实际上毫不重视拉丁美洲其他地方的托洛茨基分子。不同于这种态度的唯一例外是他在1966年初谴责波萨达斯派托洛茨基分子在危地马拉的活动以及他们同马科·安东尼奥·容·索萨中尉领导的游击队组织的联系。就我们所能够查明的情况而言，托洛茨基分子没有被邀请参加哈瓦那会议，那次会议上成立了卡斯特罗搞的相当于共产国际的机构——拉丁美洲团结组织。卡斯特罗也没有向其他拉丁美洲国家的托洛茨基分子提供任何财政或其他方面的援助。

拉丁美洲托洛茨基主义党的特点

所有的拉丁美洲托洛茨基主义党的党员人数都是很少的。拉丁美洲几个第四国际组织中最重要政党玻利维亚革命工人党，即使在五十年代初影响极盛时，党员是否到过数百人以上，颇值得怀疑。正统的共产党能够在党的影响日益增长时吸收大批党员，尔后又通过清洗的办法对这些党员进行筛选，而拉丁美洲没有一个托洛茨基主义党表现出这种才能。

拉丁美洲托洛茨基主义党因为党员人数少，所以一般不能建立基层单位遍及全国各地的全国性组织。它们的组织通常主要局限于首都以及一、两个其他大城市。只有玻利维亚革命工人党，或许还有三十年代的智利共产党左翼能够在国内大部分重要城市以及在更加重要的矿区和少数农村地区保持党的基层组织。拉丁美洲托洛茨基分子由于其组织弱小和财力不足，一般无法维持可作为党的活动中心的总部。在多数情况下，各国的托洛茨基主义党充其量只能设立一个小型的全国办事处，由党的领导人和一般党员志愿提供服务。

拉丁美洲托洛茨基主义政党也不具有本地区正统共产党人所具备的团结和纪律的突出特点。这种相对缺乏纪律的现象可能是由于几个因素。托洛茨基分子不掌握那些执行莫斯科方针的共产党人所能提供的“胡萝卜”或“大棒”。他们得不到那些共产党享有的大量津贴；也得不到机会前往苏联、东欧、中国和其他地方进行“政治旅游”，而这是第二次世界大战以来正统的共产党活动中一个重要的方面。托洛茨基分子对违反党纪或者变节的党员，无力加以惩处。他们缺乏能使脱党分子名声扫地的大型报刊。他们没有大笔工资发给党和工会的工作人员，共产党由于掌握这一手，因此能够对那些同党的领导公开持异议的人剥夺生计。

拉丁美洲托洛茨基主义政党内部相对缺乏纪律所造成的后果，是经常闹意见和宗派活动。内部争吵在阿根廷、玻利维亚、智利和墨西哥托洛茨基主义党内特别明显。如前所述，第四国际不同派别之间的争执往往加深了各个托洛茨基主义党的领导人之间争执的趋势，而且争执往往是很激烈的。

拉丁美洲托洛茨基主义党的领导极大多数是工人阶级出身。阿根廷最早期的托洛茨基主义者，智利党内大部分较重要的人物，古巴大部分原先的托洛茨基主义者，秘鲁的一些原先的托洛茨基

主义者，玻利维亚领导中相当多的一部分人和墨西哥的许多托洛茨基主义领导人，都当过体力劳动者。然而，托洛茨基主义党也能够从别的阶级和集团中补充领袖人物。因此，艺术家和文学家（其中最著名的有迭戈·里维拉）在墨西哥托洛茨基主义党的领导层中起了重要作用；在阿根廷，三十年代托洛茨基主义领导人中就有共和国总统的儿子*；巴西托洛茨基主义头头中还有新闻记者、商人、教师，甚至有第一流的艺术批评家。

拉丁美洲托洛茨基分子在选举活动方面没有什么经验。只有智利人、玻利维亚人、阿根廷人和乌拉圭人才偶而提出担任低级的公职候选人。其他的托洛茨基主义党还从未这样做过。这些党的政治活动主要致力于试图渗入工会，支持出版定期刊物，偶而发行小册子，举行一些不经常的公众集会，近年来还参加游击队的活动。

拉丁美洲托洛茨基分子总是设法在一些拉丁美洲的有组织劳工运动中赢得影响。托派党在它有成员参加的那些工会里成立党组，设法使工会组织置于它的控制之下，并要求工会采取托洛茨基主义的政治立场。在极少数的情况下，有足够的托派代表出席一些全国性的工会代表大会，因而有可能在那些大会上成立党组。

但是，托洛茨基分子只有在少数情况下得到足够的工会支持而有可能开展这样的组织活动。这些少数情况包括：三十年代中期的智利托派，大约与此同时的古巴托派，长达二十多年的玻利维亚托派（特别是在矿工组织中），墨西哥托派有过几次活动但时间不长，三十年代城市中和六十年代初伯南布哥州农村地区的巴西托派。

编辑和推销党的刊物是拉丁美洲托洛茨基主义派的一项意义

* 指阿根廷托派领导人利沃里奥·胡斯托（党内名字是“硬木头”和“贝尔纳尔”），他是阿根廷总统阿古斯丁·P·胡斯托将军（1932—1938年）的儿子。——译者

特别重大的组织活动。有的时候，尤其是在六十年代的一些波萨达斯派政党中，党的活动主要是致力于这项工作。这些刊物作为团结党员和向党员提供党内会议上进行讨论和辩论的材料，以及至少做到在公众中传播他们思想的一个手段，是很重要的。第四国际各个政党和组织向代表大会和其他会议所作的报告中经常谈到刊物发行的数量以及刊物出版的频繁情况。

结 语

托洛茨基主义者在大约一半的拉丁美洲国家中建立了小规模
的政党。尽管他们党员少而且对各自国家劳工运动或一般政治活
动影响很小，但他们仍一直坚持活动。他们在纪律和组织严密性
上比不上正统的共产党，但是他们仍然很活跃，而且是拉丁美洲政
治极左派中的一支具有潜在重要性的力量。

第三章 托洛茨基主义、庇隆主义 和阿根廷的民族革命

托洛茨基主义在阿根廷劳工运动中从来不是一股真正重要的思潮,在这个国家一般的政治活动中也不占任何重要地位。可是,托洛茨基主义运动以这种或那种形式在阿根廷已经存在四十多年了;与这个运动有联系的一些知识分子毫无疑问地影响了阿根廷左派力量的思想,这股力量同列夫·托洛茨基和他的有组织的政治信徒们并无联系,也并不忠于他们。阿根廷托派分子因残酷的派系斗争和激烈的论战而长期陷于四分五裂的状况,这一点可能比其他拉丁美洲国家更为严重。这些内部矛盾可以把阿根廷托洛茨基主义运动的历史划分为若干个大体明确的阶段。

阿根廷托洛茨基主义的第一阶段

阿根廷第一个托洛茨基主义组织是在1929年由罗伯托·吉内伊、卡米洛·洛佩斯和M. 吉内伊这三个工人建立的。他们曾经是阿根廷共产党党员,于1927年加入了在布宜诺斯艾利斯市议员中唯一的共产党议员何塞·佩内隆领导下的党内持不同政见的组织;这个组织曾经取名为阿根廷共和国共产党。^①罗伯托·吉内伊担任阿根廷共和国共产党机关刊物《前进》的发行人和该党的俄罗斯—乌克兰人支部的书记。卡米洛·洛佩斯是党的工会委员会委员。M. 吉内伊是党的一个基层组织的书记。他们三人都是移

^① 有关阿根廷共和国共产党的论述,见罗伯特·J·亚历山大:《拉丁美洲的共产主义》(1957年),第161页。

民,但在阿根廷都已经生活了几十年。

1928年,这两个吉内伊和洛佩斯开始为苏联的托洛茨基主义左翼反对派的立场进行辩护。翌年,他们全部退出了对托洛茨基主义不表同情的阿根廷共和国共产党,建立了他们自己的组织——共产党反对派委员会。1930年3月,他们出版了第一期名为《真理》的刊物。他们在这份刊物中阐明了成立共产党反对派委员会的理由,并刊登了著名的“列宁遗嘱”。“列宁遗嘱”是托洛茨基发表的,但斯大林主义的共产党人不承认那是真实的,直到后来尼基塔·赫鲁晓夫于1956年苏联共产党第二十次代表大会上发表有关斯大林罪状的著名报告时才予以承认。^①

阿根廷托派后来的一名领导人利沃里奥·胡斯托证实共产党反对派委员会是托洛茨基的支持者们在拉丁美洲建立的第一个有组织的团体。委员会的成员立即与他们在美国等地的相应组织建立了联系。美国托洛茨基主义组织美洲共产主义同盟的机关刊物《战斗》,在1929年12月21日一期上公布了下列通告:

反对派组织在阿根廷成立

南美洲第一个反对派组织的成立意味着在为世界共产主义复兴的斗争中向前迈进了一大步。这是对那些高谈“托洛茨基失败”的人们的又一次回敬。未来将很快表明,我们的阿根廷同志采取的这一步骤将会在南美洲所有国家中得到仿效。美国的反对派组织向我们南部大陆的同志们致敬并祝他们取得胜利。

这三名托洛茨基主义者先驱在短时间内就把他们的人数增加

^① 利沃里奥·胡斯托:《阿根廷第四国际主义运动编年史简述》(1941年),第2页。

到八人。他们还把组织的名称改为阿根廷共产党左翼。他们虽然人数很少，但却遭到共产党机关刊物《国际》的猛烈攻击，称之为“警特”。退出正统共产党的一小批犹太人共产党员也加入了他们的队伍；虽然这些新党员中大多数人只在该党内留了很短时间，但留下的人有一个时期曾经出版了一份意第绪语期刊《共产党论坛》。在1930年9月6日发生推翻伊波利托·伊里戈延总统政权*的军事政变时，有若干名托洛茨基主义派工人被投入监狱。

1932年和1933年，原先的托洛茨基主义组织同当时自称支持列夫·托洛茨基思想的另外两个小组织建立了联系。这两个组织中的第一个是由两名阿根廷学生R·劳里希和安东尼奥·加略所领导的，他们在西班牙学习时曾会见了西班牙托洛茨基主义一派的创建人。西班牙托洛茨基分子通知阿根廷共产党左翼，说这两名年青人马上回国，而且认为他们是阿根廷共产党左翼吸收的很好对象。然而，劳里希和加略并不设法与阿根廷共产党左翼接触，只是在几次邀请之后，主要是通过一位西班牙托洛茨基主义流亡分子J·拉莫斯·洛佩斯的种种努力，才使双方走到一起。大约在1933年年底出版的阿根廷共产党左翼最后一期《内部公报》，描述了该党代表团与加略和劳里希会见的情况：

我们试图联合起来开个大会。在这次大会过程中，我们认为双方对于我们所反对的主要方面是一致的，比如：谴责斯大林主义分子在英俄委员会中推行的政策；对华政策造成的冒险行动和大屠杀；社会主义限于一国之内；工人民主的列宁主义方法被上层官僚的独断专行和可恶的双重工会主义所破

* 伊·伊里戈延曾两次出任阿根廷总统，第一次在1916年至1922年，第二次在1928年至1930年。1930年9月初，何塞·费利克斯·乌里武鲁仗持陆、海军的力量要求总统退位，伊里戈延表示屈服。9月6日晚，叛军进驻首都，乌里武鲁自封为共和国临时总统。——译者

坏。这就足以证明我们是在开一次真正的左派共产党人的会议或大会。

在我们举行的第一次联席会议上，任命了一个由双方组成的委员会来起草一份我们可以据以共事的文件。

这种最初的乐观情绪证明是没有根据的，双方最后分道扬镳了。阿根廷共产党左翼把该国自称的托洛茨基主义者不能联合起来的问题归咎于加略—劳里希集团拒绝同“思想上毫无准备的”工人共事。^①

原先的托洛茨基分子与之保持接触的第二个组织是由佩德罗·米莱西领导的。米莱西也使用 P. 马西埃尔和爱德华多·伊斯拉斯的化名。此人是一名市政公务人员，青年时代曾经是个无政府主义者和共产党的早期党员。1932 年后期他被开除出共产党，在党内“受审”期间他坚决否认曾赞同托洛茨基主义。可是，他一旦离开了共产党的组织，就宣布支持托洛茨基，并且把一小批追随者从共产党中拉出来跟他走。

同加略—劳里希集团不一样，米莱西派同意参加当时的阿根廷共产党左翼。达成协议如下：阿根廷共产党左翼出版一期《真理》，宣布新达成的统一，并公布米莱西集团的一份有关它为何加入阿根廷共产党左翼的声明。此后不久，即将召开大会以选举新的中央委员会和其他干部。

阿根廷托洛茨基分子实行联合的这项第二次行动也遭到失败。1933 年 2 月，阿根廷共产党左翼创建人之一卡米洛·洛佩斯重病缠身，罗伯托·吉内伊则已死去。这无疑地推迟了已达成协议的实施，米莱西集团因此主动要求召开拟议的阿根廷共产党左

^① 利沃里奥·胡斯托：《阿根廷第四国际主义运动编年史简述》（1941 年），第 3 页。

翼大会。该组织其余的创建人尽管对这一行动感到恼火，还是同意参加大会。米莱西集团处于多数，他们选举佩德罗·米莱西为阿根廷共产党左翼的总书记，选举米莱西的妻子为组织书记。同时，他们决定派遣一个以米莱西为首的代表团出席拉丁美洲反战大会，那个大会是在共产党的倡导下召开的，定于同年早些时候在蒙得维的亚举行。不久之后，阿根廷共产党左翼的新领导人在该组织的名称上加上“国际共产主义左派支部”的字样。

阿根廷共产党左翼两部分人之间的关系变得日益紧张。当阿根廷共产党左翼新出版刊物的第一期上没有刊登米莱西集团关于它参加托洛茨基主义运动的动机的声明时，原先的托洛茨基主义者就提出了抗议。该党的创建人还指责米莱西集团在分析苏联局势时没有采取正确的立场。最后，他们反对把阿根廷共产党左翼的名称改为“国际共产主义同盟阿根廷支部”，坚称他们并未得到通知要有这一变动。

由于持续不断的分歧，米莱西集团采取行动将阿根廷托洛茨基主义派的三个创建人之一M. 吉内伊开除出该组织；还开除了吉内伊的妻子胡安娜，把该组织的司库C. C. 奥斯特罗夫斯基停职。原托洛茨基组织的其余成员认为，担任总书记的米莱西对采取这些行动未能作出他们认为充分的解释；因此退出了国际共产主义同盟。他们在1933年年底出版了阿根廷共产党左翼的最后一期《内部公报》，实际上结束了他们的政治活动。^①

阿根廷托洛茨基主义的第二阶段

随着在阿根廷最初发起托洛茨基主义运动的一批工人退出政治舞台，还有其他两类人声称忠于列夫·托洛茨基的思想。这就

^① 摘自阿根廷共产党左翼《内部公报》的资料，前引利沃里奥·胡斯托一书转载，第25页。

是劳里希—加略派和佩德罗·米莱西派。前一派似乎自称为国际共产主义同盟；米莱西派一度取名国际共产主义阿根廷支部。

劳里希和加略都是知识分子。利沃里奥·胡斯托指责劳里希具有的是“仅限于咖啡馆谈话水平的知识分子作品”。可是，胡斯托承认，三十年代的大多数其他托洛茨基分子“认为他们是劳里希的门徒”。劳里希在六十年代去世后，他的两部著作出版了，一部是关于马克思主义美学批判的研究，另一部是论述黑格尔和马克思。^①

安东尼奥·加略(也化名 A. 翁蒂维罗斯)，青年时曾是社会党党员，到了十九岁时他出版了一部内容关于 1930 年 9 月阿根廷军事政变的研究作品，题为《对九月运动的马克思主义解释》。当他在西班牙继续学业时，曾会见了托洛茨基的早期西班牙信徒，包括该派主要人物安德烈斯·宁，此人后来在西班牙内战期间被斯大林分子谋杀了。

当劳里希和加略从西班牙回国时，建立了具有托洛茨基主义倾向的、他们称之为国际共产主义同盟的组织，在他们周围集合了一小批追随者，主要是青年知识分子。他们出版了一份名为《新阶段》的刊物。利沃里奥·胡斯托后来声称在 1933—1934 年期间他们的组织仅有八至十名成员。

佩德罗·米莱西派(胡斯托后来说该组织只有十至十二个成员)出版了它自己的期刊《列宁主义论坛》，其中的三、四期是在 1933 年和 1934 年发行的。他们还通过他们建立的一家出版公司何塞·卡洛斯·马利亚特吉* 出版社发行了一系列小册子。他们与劳工运动的联系要比劳里希—加略集团更多些，但是对劳工运

^① 无名氏：《阿根廷托洛茨基主义回忆录》第 7 页。

* 何塞·卡洛斯·马利亚特吉(1895—1930 年)，秘鲁共产党创始人之一。1924 年曾加入美洲人民革命联盟(APRA)。1928 年退出。同年创建秘鲁共产党，任总书记。1930 年病故。——译者

动的影响并不明显。

这两个组织在 1933 年和 1934 年的大部分时间里相互进行激烈的论战，特别是在对激进党应采取什么态度的问题上，激进党是阿古斯丁·P·胡斯托总统的军人—保守党独裁统治时期反对派中最大的力量。然而 1934 年末，在国际共产主义同盟阿根廷支部将其主要领导人佩德罗·米莱西开除之后（理由还不清楚），这两个组织决定联合起来。它们共同建立了国际共产主义同盟（阿根廷支部），开始另行出版一种期刊《第四国际》，第一期于 1935 年 4 月出版。《第四国际》第一期发表了一篇阐述阿根廷托洛茨基主义运动统一的声明，文中有如下内容：

阿根廷的布尔什维克—列宁主义者联合起来了！……

但是妨碍我们日益发展的，是我们自己队伍里的障碍，即存在两个组织而不是一个单一的组织。再者，这些组织——《新阶段》和《列宁主义论坛》——在重要的国内和国际问题上持分歧的立场。这些分歧是造成同盟发生混乱的一个因素，使许多同情者无所适从，甚至使他们丧失信心。现在不是一一列举双方分歧或列举各自进行的工作的时候。关心这方面的人可以参阅《新阶段》和《列宁主义论坛》。根本的一点是，由于双方了解它们肩负的艰巨而重大的任务，因此讨论了这些分歧，并进行了联合。这一联合是国际共产主义同盟新纪元的开始，因为这一联合的实现是建立在纲领性基础上的，我们不久就要公布。我们希望，这将是一个发展和改善的联合，虽然我们充分意识到我们的任务。

《新阶段》和《列宁主义论坛》为《第四国际》打开了道路，以后即行停刊。布尔什维克—列宁主义者的这个新的机关刊物将会发展壮大。同盟各派的联合将肯定是一个积极的步

骤。这是我国马克思主义的进步，是朝着成立新党和第四国际发展的进展，它将为全世界无产阶级带来胜利。

我们将为联合行动而斗争！为建立一个新的共产党而斗争！为世界革命而斗争！布尔什维克—列宁主义者的联合万岁！^①

新的国际共产主义同盟阿根廷支部只生存了两年多时间。然而它在存在期间成功地在拉普拉塔、科尔多瓦和圣非建立了一些小组织。在科尔多瓦的那个组织出版了一份名叫《自由美洲》的杂志，出过五期，是由一名玻利维亚流亡者特里斯坦·马罗夫和阿基莱斯·加门迪亚所领导的。在布宜诺斯艾利斯，劳里希的一个门徒 C. 利亚乔发行了另一份期刊《过渡》。以 L. 科伊夫曼为首的一批同情者也出版了一份为期短暂的杂志《视界》。

国际共产主义同盟于 1936 年改名为劳动党，但是几个月后又恢复原名。到这一年年底，该组织又陷于困境；于是又作出新的努力来把各种力量重新组合成为一个新的组织——马克思主义宣传组织（APM）。这个新组织是由 L. 科伊夫曼组织的，只开过两三次会。

1937 年年初，面对自己组织发生分崩离析的阿根廷托洛茨基分子，对于他们应否奉行列夫·托洛茨基向他的信徒们普遍提出的打进社会党并设法从中破坏的路线这个问题上，发生了分裂。一批阿根廷托洛茨基分子采取这条路线，他们是由 C. 利亚乔领导的，跟随他们的有以 J. 拉戈斯（后来他的真名豪尔赫·阿维拉多·拉莫斯更为众所周知）为首的拉普拉塔省学生小组^②。他们加入了社会党和刚从社会党分裂出来的一个左派组织——社会主义劳工党，这个组织使相当一部分比较年轻的社会党党员一起分裂

^① 前引利沃里奥·胡斯托书，第 11 页。

出来。安东尼奥·加略领导一批阿根廷托洛茨基分子则反对这一策略。

在“打进去”问题上的这种争论，对于国际共产主义同盟是最终的打击。同盟的最后一期《公报》（第二年第十期）于1937年9月出版。最后几期《公报》不是铅印而是用油印机印制的。^①

阿根廷托洛茨基主义的第三阶段

托洛茨基主义者在社会党或社会主义劳工党内都不能施加多大影响。社会主义劳工党的大部分上层领导最终加入了共产党，许多一般党员和下层领导则重新加入了社会党。在托洛茨基主义者当中，很快就提出重新建立他们自己单独组织的提议。

在社会主义劳工党队伍内，那些加入该党的托洛茨基分子不久就聚集一起，试图使他们的观点在党内赢得影响。从1937年8月至12月，以C. 利亚乔为首的一批人出版了五期名为《无产者阵线》（副题《革命马克思主义公报》）的油印刊物。这个组织在1938年8月还出版了一期另外一种刊物《马克思主义》。1938年年初，社会主义劳工党的托洛茨基主义成员在科尔多瓦举行一次全国会议，来自该城以及布宜诺斯艾利斯和拉普拉塔的代表出席了会议。利亚乔在这次大会上再次成为主要人物。

托洛茨基主义者看来取得控制权的唯一社会主义劳工党地方党组织是布宜诺斯艾利斯省利涅尔斯的一个小组织。这个地方组织出版了一份名叫《左派》的小型刊物，副题是《为下属组织提供的机关刊》。1938年2月至8月，该刊出版了三期。

有些托洛茨基分子没有加入社会主义劳工党，要么是因为他们反对“打进去的策略”，要么是因为社会主义劳工党不吸收他们。这些人包括佩德罗·米莱西、科尔多瓦的A·加门迪亚、罗萨里奥

^① 前引利沃里奥·胡斯托一书，第5—8页。

的 D. 西布鲁以及以 V. 卡瓦哈尔为首的圣菲的一个学生组织。

同时，一名托洛茨基主义派的新成员加入了反对“打进去策略”的一派，他曾经有几年是托洛茨基主义运动中最卓越的人物之一。此人就是利沃里奥·胡斯托（他使用的党内名字是“硬木头”和“贝尔纳尔”），他是当时阿根廷总统阿古斯丁·P·胡斯托将军（1932—1938年）的儿子。胡斯托虽然是1918年后开展大学改革的那一代人，但他只是稍稍参加了一下这个重要的运动。他出于希望“了解自己”并作出自己对社会和世界的分析的需要，游遍了阿根廷各地；在二十年代和三十年代初两次访问欧洲和三次访问美国。

胡斯托于1935年年初在第三次访问美国以后，就成了阿根廷共产党的“同路人”，但是由于斯大林主义者迫害西班牙内战时期站在保皇派一边的其他左翼组织，胡斯托就同斯大林主义者疏远了，并在1936年11月的一封公开信（登载于布宜诺斯艾利斯的《明晰》杂志上）中宣布与他们破裂。他对托洛茨基的思想曾经有过几年感到兴趣，等到他与斯大林主义者分裂之后，就立即被公开宣称的阿根廷托洛茨基信徒所吸引了。^①

1937年，利沃里奥·胡斯托开始出版一份具有托洛茨基主义倾向的油印刊物《新闻公报》。他还出版一期名叫《工人的西班牙》的杂志，论述西班牙内战；另外出版一期他起名为《纠察队》的刊物。

胡斯托正式参与托洛茨基主义派的政治活动采取了下述形式：1937年11月7日他邀请各个派系在布宜诺斯艾利斯会晤，以便起草一封回信，对迭戈·里维拉关于正在计划召开一次拉丁美洲托洛茨基主义者会议的来信作出答复。胡斯托列举出接受他邀

^① 有关利沃里奥·胡斯托的自传和他的思想演变的叙述，见胡斯托：《自传笔记》（1956年）。

请的人：“代表主张‘打进去’一派的 C. 利亚乔和 G.（此人姓名未加其他说明）；代表国际共产主义同盟其他人员的米格尔；P. 米莱西和 J. P.（此人姓名未加其他说明）的几名信徒；O. 里瓦斯·罗内伊和其他人等。”

虽然大部分四分五裂的阿根廷托派队伍派代表出席 11 月 7 日大会，但是没有导致联合。主张“打进去”的一派没有接受胡斯托要他们参与创办一份刊物的建议，但是其他人同意此建议。然而，安东尼奥·加略和佩德罗·米莱西之间的老争执干扰了这项计划的实施。结果是，不久出现了两个信奉托洛茨基主义的刊物。

第一个刊物是《新进程》，是由胡斯托同加略和国际共产主义同盟的其他成员共同出版的，并得到罗萨里奥的 D. A. 西布鲁和科尔多瓦的 A. 加门迪亚的支持。《新进程》只出版了一期，刊登的是已经在国际托洛茨基主义刊物上发表过的文章。^①第二个杂志是《倡导》，由米莱西和 J. P. 发行，在 1938 年出版了五期。1939 年 1 月，在胡斯托作出的种种努力未能导致阿根廷托洛茨基主义运动的统一之后，他就出版了一本小册子，书名为《如何摆脱困境：建立世界社会主义革命党（第四国际）阿根廷支部》。他在这本小册子里相当详细地谈论了当时活跃于托洛茨基主义运动中的主要人物，他对他们的讽刺性评论，足以充分说明他为什么在那些被认为是他的伙伴的人们当中激起了这么大的敌对情绪。大约在这本小册子问世的同时，曾经是社会主义劳工党党员的托洛茨基主义者，要么被清除出党，要么就自愿退党。他们中有些人围绕《倡导》杂志同佩德罗·米莱西集团保持联系，而另外一些人则被吸引到以利沃里奥·胡斯托为首的集团一边。

胡斯托集团不久取名为革命劳工组织，出版另一份刊物《国

^① 利沃里奥·胡斯托：《如何摆脱困境建立世界社会主义革命党（第四国际）阿根廷支部》（1939 年），第 12 页。

际》，1939年4月出版了第一期，印数五千册。刊物得到拉普拉塔和科尔多瓦的托洛茨基主义组织的合作。虽然革命劳工组织继续出版《国际》，但到了1940年2月，该组织的人数减少到十人，其中四人（胡斯托曾骄傲地加以夸耀）是工人。布宜诺斯艾利斯以外的成员都退党了，1940年3月该组织内又发生了一次分裂，使人数减少到“五、六名成员”。可是，胡斯托自夸说，从阿根廷成立第一个托洛茨基主义组织以来，托洛茨基主义组织中大多数由工人组成这还是头一次。

1940年和1941年期间，那些留在革命劳工组织内的人非常活跃，这个组织有所壮大。胡斯托谈到这段时期革命劳工组织的活动情况说：“它继续出版《新国际》（重新起名的一份期刊，六月、七月、八月和九月号——为向托洛茨基表示敬意而出版的特大号，发行一万份，那是阿根廷任何托洛茨基主义出版物从未达到过的发行数——以及十一、十二月号）。在整个1940年，在不断的活动中，在反对反动派和斯大林主义（造成其成员数次被反动警察拘捕）的持久斗争中，革命劳工组织得到了增强，使得它的宣传得到广泛传播，继续进行紧张的工作——在斯大林主义报刊的攻击中得到充分反映——而且又开始发展了，但现在只是在工人区吸收新成员。”^①

1941年5月，革命劳工组织改名为革命劳工同盟；更改名称据说是反映该组织的发展。它还把它的期刊改名为《工人斗争》，以取代直到那时一直在使用的《新国际》这个刊名。利沃里奥·胡斯托此时自夸说革命劳工同盟百分之九十的成员是工人。

与此同时，以佩德罗·米莱西为首的对立的托洛茨基主义组织继续出版《倡导》；1939年出版了两期。它设法实现托洛茨基主义派队伍的统一，但是失败了。有一批人因为1939年8月的斯大

^① 利沃里奥·胡斯托：《阿根廷第四国际主义运动编年史简述》，第11页。

林一希特勒条约而感到失望，他们脱离了共产党队伍，加入了托洛茨基主义派，他们在 1940 年 9 月再次设法使四分五裂的托洛茨基主义派队伍联合起来。然而，革命劳工组织、《倡导》集团和曾经采用老刊物《新阶段》名称的国际共产主义同盟残余分子之间的谈判，在激烈的论战之中又归于失败。

然而，这种争取统一的努力再次使得那些同安东尼奥·加略和佩德罗·米莱西有联系的组织聚集一堂。他们组成了一个新的组织——社会主义劳工同盟，承担了《倡导》的出版任务。在这个期刊的新版上，他们自称是“第四国际在阿根廷的领导人”。他们还吸收了 1939 年脱离革命劳工组织的许多人参加。社会主义劳工同盟致函第四国际在纽约的总部，要求承认它是第四国际在阿根廷的正式代表。^①

统一的失败和革命劳工同盟的结束

革命劳工同盟和其他托洛茨基主义组织之间的激烈论战仍在进行着，这些组织除了社会主义劳工同盟外，还包括科尔多瓦的一个小集团，它原先加入过社会主义劳工同盟，后来又宣布自己独立。这个科尔多瓦集团的主要人物，是个假名叫“奥梅罗”的人，后来用了另一个更为人所周知的假名“J. 波萨达斯”，他的真名叫奥梅罗·克里斯塔利。波萨达斯甚至在四十年代早期就明显地擅长于发表那种滔滔不绝的演说，这是使他后来成为拉丁美洲和世界托洛茨基主义主要人物时的突出风格。利沃里奥·胡斯托写的许许多多小册子中有一本指出，波萨达斯在多次设法联合那些自称拥护第四国际的各派而毫无成效的努力中，曾有一次不断地抨击他的胡斯托，“长达数小时之久”。^②

^① 利沃里奥·胡斯托：《阿根廷第四国际主义运动编年史简述》，第 12—14 页。

^② 利沃里奥·胡斯托：《中间派主义、机会主义和布尔什维克主义：革命劳工组织以及在阿根廷和南美洲为争取马克思主义列宁主义的斗争》（1940 年），第 8 页。

毫无疑问，各种托洛茨基组织中的许多分歧集中在人的问题上，自从阿根廷托洛茨基主义运动诞生以来就是这样的；但是也有意识形态问题上的分歧，这种情况的出现是在四十年代早期，那些问题对阿根廷托洛茨基主义后来的几十年间仍很重要。特别重要的是“民族解放”问题。革命劳工同盟坚持其主要领导人利沃里奥·胡斯托曾经提出的带有民族主义色彩的立场，当胡斯托和他的小组最初提出这种立场时，许多人对此表示反对，但在后来一些年中他们都接受了。

在革命劳工同盟的机关刊《新国际》1940年年初的一期上，对“民族解放”的立场进行了争辩。刊物上的文章中指出，它所谓的相互竞争的帝国主义之间的矛盾在第二次世界大战期间正在发展，并指出英帝国主义的相对衰落，文章接着说：

我们必须利用英帝国主义的明显衰落和可能的最后垮台来完成我们的经济解放，因为英帝国主义束缚了阿根廷并阻碍了它的进步。那些英国公用事业公司、工业公司、农业公司和银行将会易手并作为战争的一笔遗产落到美国人手里，种种迹象表明它们会这样做；面对这一前景，决不能保持消极。同样，那些在法律上属于阿根廷的领土——比如马尔维纳斯群岛（福克兰群岛）——也是属于这种情况。阿根廷人民必须提出要求并采取步骤，以便使一切物归原主……

阿根廷人民和大部分无产者必须了解到我们现在生活的时刻的重大意义和极大的严重性，了解到事态发展正在引起的突如其来和连续不断的变化的巨大重要性；了解到只有无产阶级根据整个国家利益采取有力的和决定性的行动，只有工人阶级通过革命的马克思主义政党的激励并支配着共和国命运的无产阶级统一战线，才能使阿根廷免于卷入屠杀并通

过对帝国主义的银行、公司和财产以及大庄园进行无偿剥夺和收归国有，拒付外债和垄断对外贸易等办法来获得民族解放。^①

社会主义劳工同盟强烈反对利沃里奥·胡斯托和革命劳工同盟采取的这一立场。社会主义劳工同盟在1940年4月一期的《倡导》杂志上作了部分阐述：

第四国际不允许提出“民族解放”的任何口号，它往往使无产阶级屈从于统治阶级，相反，它应当肯定无产阶级民族解放运动的第一步就是开展反对这些统治阶级的斗争……

阿根廷的第四国际知道如何去分析本国的现实并制定战略。除非出现新的事态发展或者出现比过去更加正确的新的原则，没有任何东西能迫使我们偏离这一方向。“民族解放”同我们的运动毫不相关。支持阶级斗争！支持社会主义革命！^②

然而，人的因素在阿根廷托洛茨基主义派内部连续不断的派系斗争中依然是重要的问题，有争议的人物莫过于革命劳工同盟的主要人物利沃里奥·胡斯托或“硬木头”了。胡斯托对他的对手经常进行人身攻击，一贯指责他们是“中间派分子”。他进行人身攻击的典型例子是对于对手组织的一些主要人物的如下描述：“劳里希，廉价的书呆子社会民主党人……加略，小资产阶级野心家……米莱西，黄色工会领导人……利亚乔，平庸、失意的文

① 利沃里奥·胡斯托：《革命的战略：为争取统一和拉丁美洲的民族和社会解放而斗争》（1956年），第76页。

② 同上书，第28—29页。

人……科艾弗曼，按他的立场和偏好，也是一个社会民主党人……”这段话刊载在他的小册子《中间派主义、机会主义和布尔什维克主义》第3页上。

胡斯托的对手们对“硬木头”也以牙还牙，并不仁慈。胡斯托本人在他写的《革命战略》一书中引述了他的敌手对他的指责，说他“专横、不忠诚、无纪律”。美国托洛茨基主义分子谢里·曼根（曾化名特伦斯·费伦）干预过阿根廷托洛茨基主义者的统一问题谈判，到头来只是同胡斯托的对手们合作了。他曾经写道：“‘硬木头’并没有凶险到发疯。这不单是个论战的名称，也不是出于个人气愤，而是一个深思熟虑的判断。此人无疑是神经紊乱的，生活在自身的世界里。”^①

双方除了出版不定期刊物外，还出版了各种小册子，作为相互进行论战的工具。1939年4月，“硬木头”出版了一本题为《我们的政治前景——建立一个强大的世界社会主义革命党（第四国际）阿根廷支部》。他建议召集一次大会，把宣称拥护第四国际的各种阿根廷组织团结在一起，接着召开拉丁美洲地区所有托洛茨基主义组织参加的全地区代表大会。在1939年10月出版的另一本小册子《面对世界的重要关头：第四国际想干什么》中，利沃里奥·胡斯托首次较详细地提出了他关于“民族解放”的思想。在五个月之后出版的《中间派主义、机会主义和布尔什维克主义》一书中，他继续维护这些思想并且同反对这些思想的托洛茨基主义分子展开论战。

同时，由于第二次世界大战爆发而将总部从巴黎迁至纽约的第四国际，很想设法使那些声称隶属于第四国际的阿根廷组织实现联合。第四国际直接向谢里·曼根（特伦斯·费伦）参与的那些

^① 特伦斯·费伦致查尔斯·柯蒂斯的书信，1941年10月28日，阿根廷科尔多瓦山。

党表示了这一关注。

曼根—费伦是一名就雇于时代—生活—幸福联合企业的新闻记者，他奉行的方针是，他在新闻事业活动中同他驻在国的托洛茨基主义组织进行联系。^① 据第四国际的美国下属组织社会主义工人党的主要成员费利克斯·莫罗致利沃里奥·胡斯托的信中说：“事实是，费伦同志是应我们的请求才接受现在这一职务的。我们要求他担任这项工作，以便他能够去南美。我再说一遍，他现在的职业是党指派的一项使命。”^② 曼根—费伦于1941年年初抵达阿根廷并开始努力设法将各种托洛茨基主义组织聚集一起。他不久就同利沃里奥·胡斯托发生了冲突。胡斯托后来指责说，从曼根到达以来，就“同社会主义劳工同盟的中间派分子保持了密切而牢固的关系，并让其异乎寻常的成员豪尔赫·A·拉莫斯充当他的书记员。”^③

曼根—费伦本人对自己的活动多少有点不同的看法。在1941年10月28日写给他的美国托洛茨基主义党成员的一封信中，他写道：

“硬木头”开始下的最后通牒是，除非详尽地讨论政治上的分歧，否则革命劳工同盟就不参加讨论统一问题的谈判，这个最后通牒打消了我原来想完全在统一委员会内部达成政治和解协议的希望。想必你能记得，这个问题经一致投票议决（包括“硬木头”在内），同意各组织应当就这一争论问题提交一份意见书。别的组织十分明智，正确地采取了把它们的政治计划摊到桌面上的方针，并要求“硬木头”也这样做。这些

① 同约瑟夫·汉森的谈话，1970年1月28日于纽约市。

② 利沃里奥·胡斯托：《革命的战略：为争取统一和拉丁美洲的民族和社会解放而斗争》（1956年），第108页。

③ 同上书，第184页。

组织在意见书中将它们的政治立场叙述得很明确，而且不是以论战的方式；它们要求“硬木头”照此办理。而且它们事先说明，并不希望这样暴露分歧会使统一不能实现。“硬木头”反对统一当然不是仅仅出于政治考虑，而是反映他只希望在他从不顶嘴的“温顺”组织内自行其是，他当然设法避免提出任何证据。^①

曼根—费伦认为，革命劳工同盟和其他托洛茨基组织之间的纲领性分歧并不足以证明它们应该分裂。他建议把它们的力量统一起来并在新党的第一次代表大会上就悬而未决的问题进行辩论。胡斯托则坚持认为，在建立一个统一的党之前，必须就所有悬而未决的问题达成协议。要达成任何协议证明是不可能的，因此以革命劳工同盟为一方以及以社会主义劳工同盟和特伦斯·费伦为另一方之间的论战继续进行着。利沃里奥·胡斯托在一篇题为《阿根廷纪事》的文章（载1941年5月号《幸福》杂志，署名谢里·曼根）中得到大量武器。这篇文章与其说是作为一个社会主义工人党党员所写还不如说是以《幸福》杂志的精神写的。文章讨论了轴心国宣传攻势渗入南美洲的情况，并评述美国的应战很不够。

几个月之后，在布宜诺斯艾利斯出版的一份左翼月刊《明晰》上，发表了这篇文章的“校正稿”，并加上编者带有敌意的按语。1941年5月31日社会主义工人党的报纸《战斗者》对这篇文章也进行攻击，但没有提及这篇“帝国主义宣传品”是由第四国际一名正式代表撰写的。胡斯托利用这一事件加紧对曼根—费伦进行人身和政治攻击。^②

① 特伦斯·费伦致查尔斯·柯蒂斯的书信，1941年10月28日。

② 利沃里奥·胡斯托：《革命的战略：为争取统一和拉丁美洲的民族和社会解放而斗争》（1956年），第105—110页。

其他事件也造成了革命劳工同盟和阿根廷的托洛茨基主义组织之间的紧张关系。其中的一个事件发生在智利托洛茨基主义分子举行的“重新统一代表大会”上。利沃里奥·胡斯托代表革命劳工同盟,特伦斯·费伦代表第四国际和阿根廷统一委员会,出席了会议。费伦在会上宣读了统一委员会的贺信并发表第四国际书记之一马克·洛里斯批评“硬木头”的一封信。利沃里奥·胡斯托对洛里斯的书信立即给予强硬的回答。1941年10月,统一委员会发表了一份对革命劳工同盟颇有批评的公报。利沃里奥·胡斯托对此作出答复,宣布革命劳工同盟退出统一委员会,但说它的代表将以“观察员”身份继续出席会议。^①

曼根—费伦最终放弃了把革命劳工同盟并入统一的托洛茨基主义党的希望,至少在它创建时是如此。结果,他所主持的统一委员会继续贯彻它的计划,将布宜诺斯艾利斯和各个内地省份其他大部分托洛茨基主义组织加以合并。费伦采取这种态度的一个理由可能就是给他美国同事的信中所作的评论,他说,“对‘硬木头’的让步有个限度,超过这个限度(代表他所说的二十七个人),就会破坏其他整整七十五人的新的统一,并压制他们新的干劲和乐观主义。”

实现统一的结果出现了一个新党——社会主义革命工人党(PORS)。它创办了一份新的期刊《工人阵线》,第一期出版于1941年12月,宣告“阿根廷无产阶级现在有它的政党了”。参加社会主义革命工人党成立大会的有:该党新的总书记卡瓦哈尔(A. 纳瓦哈),拉普拉塔的R. 弗里赫里奥(J. 拉戈斯),J. 波萨达斯,豪尔赫·阿维拉多·拉莫斯,E·里维拉,埃斯特万·雷伊,E. 埃特金,米格尔(或“奥斯卡”,没有其他身分说明),N. 莫雷诺和一名奥地利流亡者(“海外新闻社”驻布宜诺斯艾利斯的代表)库尔特·

^① 特伦斯·费伦致查尔斯·柯蒂斯的信,1941年10月28日。

斯坦菲尔德。^① 社会主义革命工人党显然是在特伦斯·费伦的推荐下被第四国际承认为它的阿根廷下属组织的。

然而，社会主义革命工人党的建立没有实现阿根廷托洛茨基主义分子的完全统一，而且持续时间并不很长。革命劳工同盟继续存在了大约两年时间，“硬木头”（利沃里奥·胡斯托）对革命劳工同盟这个时期的活动作了如下的描述：

它出版了五千份我们的机关刊物《工人斗争》（一度达到一万份），我们尽最大努力把它们全部分发出去。革命劳工同盟的少数几个积极的成员每天前往布宜诺斯艾利斯和附近地区的工会集会、工厂、车间和建筑工地，在那里，我们的期刊一般都是免费分发的，以便得到广泛的读者。由于左派党一再叛变而引起的劳工群众的怀疑情绪是如此之巨大，以至我们在某期《工人斗争》中提出免费发送我们的小册子时，我们只收到一份函索^②。

革命劳工同盟还力图与其他拉丁美洲国家的托洛茨基主义组织建立联系，为了这一目的，它在1943年2月开始出版《南美洲公报（争取建立革命的第四国际）》。这一刊物出了五期；除了阿根廷以外，它们还论述了巴西、智利、乌拉圭、玻利维亚、墨西哥和古巴的事态发展。^③ 在革命劳工同盟决定同第四国际破裂之后，出版了这一公报。这一决定是在致第四国际的一则声明中宣布的，日期为1942年7月20日，由“硬木头”签署。在这一声明中第四国

① 利沃里奥·胡斯托：《革命的战略：为争取统一和拉丁美洲的民族和社会解放而斗争》（1956年），第90—91页。

② 同上书，第127页。

③ 同上书，第126页。

际被指责具有第三国际长期以来特有的那种同样的官僚主义作风；第四国际的美国领导人实际上被指责为美帝国主义的代理人。声明的结尾说：“同志们，我认为向你们提出要求的时刻已经到来了。先生们，要承认我们的你们是谁？一开始先问问我们是否会承认你们，岂不是更合适吗？根据这一点，我们岂不早就应该拒绝给予你们一切权力来使你们冒称自己有权在你们的官僚主义桌前安排我们的席位而不是在我们的革命法庭面前安排你们的席位吗？”^①

革命劳工同盟尽管开展了活动，但还是衰落了。正如“硬木头”自己所指出的：它“开始经历了分裂的过程，除了反映它不得不在其中活动的不利环境以外，还反映了全世界革命的退却。内地一些活跃的同志不再写稿了。其他人成了马克思主义的叛徒。过去一贯给予我们坚决的道义支持的西班牙工人 P. 巴雷拉……去世了。当时是个法律系学生和革命劳工同盟积极分子之一的 A. 弗朗西斯科同志……宣布他希望放弃活动……马特奥·福萨同志不赞成我们同纽约关系破裂，尽管他过去一贯享有高度评价，我们最后还是不得不在没有他的情况下继续下去。”^②

“硬木头”对革命劳工同盟最终的可悲结局作了这样描述：“最后，在布宜诺斯艾利斯，我们只剩下两人：恩里克·卡蒙纳（圣地亚哥·埃斯科瓦尔）和我本人……我们几乎只为自己而不为任何别人写东西。如在这类环境中通常所发生的那样，当力量无法向外部发展时就向内部发展。恩里克·卡蒙纳同志聪颖、忠诚和深厚的阶级感情（他是食品加工工人）以及他给予的支持，对于我们能够在革命劳工同盟中活动是必不可少的，可是在一些愚蠢的问题

① 利沃里奥·胡斯托：《革命的战略：为争取统一和拉丁美洲的民族和社会解放而斗争》（1956年），第115页。

② 同上书，第128—219页。

上使他引起了某些分歧。革命劳工同盟最后以永远分崩离析而告终。”^①

利沃里奥·胡斯托永远没有回到托洛茨基主义的队伍中来。他对托派运动的批评，开始于他同美国社会主义工人党的领导人的争吵，不久就发展到同托洛茨基本人争论。1959年他出版了《列夫·托洛茨基和华尔街》一书，他在书中得出的结论是：第四国际的创建人居住在墨西哥的最后年代里事实上已经成为美帝国主义的同盟者，支持了背叛真正的马克思—列宁主义革命的各项政策。

阿根廷的托洛茨基主义和庇隆主义

社会主义革命工人党的建立，解决了托洛茨基派的统一，但是这为时不长。到了1942年5月，即在社会主义革命工人党成立后仅六个月时间，在个人不和和意识形态分歧的压力下，该党开始分裂了。一名主要成员纳乌埃尔·莫雷诺退出了社会主义革命工人党，有一段时间加入了革命劳工同盟，但是不到几个月时间他也退出了“硬木头”那一派。1943年6月，社会主义革命工人党决定清理结束，甚至放弃再行努力出版它的刊物《工人斗争》了。然而，1945年9月和10月，又出了两期《工人斗争》；在此以后的一段时间里，这个刊物断断续续地出版。最后，1948年3月，社会主义革命工人党的残存成员（卡瓦哈尔仍然是主要人物）再一次决定停止一切进一步的政治活动。^②

意识形态问题和个人分歧这两者是本世纪四十年代及以后阿根廷托洛茨基派分裂的原因。在最终导致胡安·庇隆掌权的1943

^① 利沃里奥·胡斯托：《革命的战略：为争取统一和拉丁美洲的民族和社会解放而斗争》（1956年），第130页。

^② 尼塞托·安德烈：《拉丁美洲托洛茨基主义的国家政策：中间派主义和革命》（1949年），第15页。

年6月4日军事政变*之后,托洛茨基主义者之间意见分歧最大的意识形态问题是如何解释庇隆主义现象,托洛茨基主义者应采取什么态度。

各种托洛茨基主义组织究竟怎样看待庇隆主义和对庇隆主义的反应,同它们在“民族解放运动”问题上的观点是密切相关的。尽管利沃里奥·胡斯托从托洛茨基主义的政治活动中消失了,但这个问题上的论战还在继续。可以说这个问题的焦点是关于什么集团构成“工人阶级主要敌人”的问题,尽管这样说也许对这个长期争论中的问题过分简单化。一种人认为:在诸如阿根廷(和整个拉丁美洲)这样的“半殖民地”国家,如同在高度工业化的国家里一样,工人阶级及其先锋党的主要斗争必须是反对本国资产阶级。这类人否认民族资产阶级具有任何重大的革命潜力。

持反对观点的人则认为,鉴于象阿根廷这样的国家是“半殖民地”性质的,因此主要敌人就是“帝国主义”。既然民族资产阶级的利益在某些时候同帝国主义的利益有矛盾,那么在一定时期,以工人运动及其先锋党为一方和以民族资产阶级为另一方之间就有建立联盟的基础。主张这种立场的一个人把这一意见概括如下:“工人阶级及其先锋队将同民族资产阶级共同前进,一起打击帝国主义,而绝不会和民族资产阶级混同起来。”^①

各种托洛茨基主义组织对“民族解放运动”问题的态度影响了它们对庇隆主义兴起的反应。那些强调需要致力于在国内搞阶级斗争的人,倾向于反对他们所认为的庇隆及其信徒们的资产阶级

* 1943年6月4日,阿根廷“联合军人集团”发动政变,推翻了拉·卡斯蒂略总统的政权。7月7日由原政府陆军部长拉米雷斯将军任临时总统。1944年初,拉米雷斯在以庇隆为首的“上校集团”的压力下宣布辞职。不久由法雷耳将军继任总统,庇隆任陆军部长。1944年7月,庇隆兼任副总统。1946年2月选举中,庇隆获胜,旋即出任阿根廷总统。——译者

① 《十月》第3期,“V. G.”一文,尼塞托·安德烈,援引该文第13页。

民族主义，只有到接近最后关头他们才加入庇隆主义的队伍。那些主张民族阶级合作来反对帝国主义的人，则很早就支持庇隆了。

亲庇隆的阿根廷托洛茨基主义者的立场，遭到了国外正统的和持不同意见的托洛茨基主义者的攻击。美国持不同政见的托洛茨基主义沙赫曼派的机关刊物《新国际》1948年1月号上，有一篇文章认为：“阿根廷托洛茨基主义者希望比教皇更天主教化，比庇隆更加庇隆主义化，这一点现在应该是显而易见了。”这篇文章在辩论这些问题时，评论道：“阿根廷的十月党人*把现代帝国主义的现象和关系与封建主义混为一谈；把社会主义革命与资产阶级混为一谈；把极权主义的波拿巴制度与资产阶级民主混为一谈；把帝国主义世界危机造成的工业发展与民主的工业革命混为一谈。他们把马克思主义——寻求和发现世界各地同样现象的一种科学的国际学说——变成一种本国‘大杂烩’。他们把庇隆的反动宣称为一场资产阶级民主革命，把他在帝国主义间争夺面包屑的斗争宣称为应该得到无产阶级支持的反帝斗争。”

托洛茨基分子中一个早期反对庇隆立场的人是马特奥·福萨，曾经有十年之久，他是同托洛茨基主义派有联系的主要工会工作者之一。显然出于他自己的主动，他于1946年11月开始出版一份名叫《战斗者》的刊物，并加上副题：“保卫被剥削者和被压迫者！争取建立第四国际！”福萨在该刊物的第一期上发表了一篇致“阿根廷工人”的冗长的分析性文章，说第四国际拥有“当前时刻唯一的革命纲领”，并号召在阿根廷建立一个第四国际的党。他还确定庇隆主义“只不过是一种斯大林主义和社会改良主义形式的资

* 1945年10月9日，以爱德华多·阿瓦洛斯将军为首的反对派军人在阿根廷发动政变，把庇隆关押在拉普拉塔河中的马丁·加西亚岛上。10月17日，庇隆的拥护者在布宜诺斯艾利斯举行总罢工，总统埃德米尔罗·法雷尔慑于群众的愤怒情绪，当即下令把庇隆召回，让他来平息这场风波。10月17日是庇隆登上阿根廷政治舞台的关键性日子，所以有人把庇隆分子称为阿根廷的十月党人。——译者

产阶级或国家。”^①

聚集在《战斗者》周围的托洛茨基主义者成立了坚持强调阿根廷内部阶级斗争的主要组织。它们组成了以纳乌埃尔·莫雷诺为首的革命工人党。该党的领导人之一指出：“在1954年当我们看到帝国主义的和反劳工的浪潮正在迫近以前，我们都是庇隆政府的反对者，都是庇隆政府毫不容情的对手；虽然我们对于自己在工作中可能犯下的许多宗派主义错误开展广泛的自我批评，但我们是反对庇隆政府的。”^②

1954年，革命工人党作为一个单独的政党实际上是解散了，其成员集体加入了新成立的民族革命社会党(PSRN)。这是新近脱离强烈反对庇隆主义的社会党的一个组织所发起成立的一个亲庇隆的党。民族革命社会党最著名的领导人是社会党最早的党员之一恩里克·迪克曼和社会党另一个早期党员马里奥·布拉沃的儿子卡洛斯·玛里亚·布拉沃。革命工人党内以J·波萨达斯为首的一派，显然拒绝加入民族革命社会党，并以工人党的名义继续保持革命工人党余下的成员。

原革命工人党的托洛茨基主义者不久终于控制了新成立的民族革命社会党的布宜诺斯艾利斯省联合委员会。他们在1954—1955年负责出版了联合委员会的期刊《真理》。那份期刊的名称与阿根廷第一个托洛茨基主义组织阿根廷共产主义左派机关刊物的刊名雷同；这大概并非偶然。

1955年9月庇隆被推翻之后不久，民族革命社会党被宣布为非法。结果，中止了《真理》的出版，但是过后不久，曾经与《真理》有联系的托洛茨基分子开始出版另一个期刊——《劳工团结》。

① 《战斗者》，布宜诺斯艾利斯，1946年11月1日。

② 埃塞基耶尔·雷耶斯：《什么是左派——答共产党朋友们》（1961年），第31页。

工人之声派

当庇隆下台之后于1956年后期举行第一次工会选举时,《劳工团结》派开始出版另一份刊物——《倾向》,并与一些庇隆主义者共同建立了“劳工组织运动”(MAO),参加这次工会选举。“劳工组织运动”不久开始出版另一份报纸——《工人之声》,与这一新刊物有联系的人们成为所谓的“六十二工会组织”*内的一个派系,“六十二工会组织”是阿根廷劳工运动中庇隆体制的某种参谋部。^①

《工人之声》派显然向他们的国外同志夸大他们在1956—1957年工会选举中所取得的成就。因此,美国托洛茨基主义报纸《战斗者》在1957年6月17日的一期上作如下报道:“在阿根廷,托洛茨基主义者已成为布宜诺斯艾利斯——阿根廷工人阶级最强大的部分——大工厂工人中间最强大的政治派别之一。在最近(1956年9月)的工会选举中,托洛茨基主义者在二十余家大工厂里赢得了胜利,在其他二十余家工厂中因很少票数的差额而落选。在有二十五万工人参加的1957年1月冶金工人的罢工中,托洛茨基主义者选出若干有斗争性的成员参加全国罢工委员会。阿根廷托洛茨基主义者现在正计划出版一份发行量为一万至一万五千份的周刊,这反映他们的影响正日益增长。”

在1953年国际托洛茨基主义发生分裂,《工人之声》派同“反巴勃罗”派有联系,而美国社会主义工人党是“反巴勃罗”派最重要的组成部分。由于“巴勃罗派”的大部分人和“反巴勃罗”派在1963

* 六十二工会组织是庇隆党正统派的工会组织,其核心力量是冶金、汽车等大行业工会。它是拥有三百万会员的阿根廷全国总工会的重要组成部分,还掌握了许多地方工会的领导权,在庇隆党内居于很重要的地位。——译者

^① 埃塞基耶尔·雷耶斯:《什么是左派——答共产党朋友们》(1961年),第27页。

年重新统一起来组成统一书记处，《工人之声》派就成为统一书记处的阿根廷下属组织。^①

据报道，《工人之声》派在1965年1月与另一个小派别——“印第安美洲人民革命阵线”合并，“组成一个新的革命组织”。据称，“这两个组织过去共同参加过多次阶级斗争的行动”。^②这个新的组织是工人革命党。虽然它原先曾同意《工人之声》和《革命指南》双周刊（印第安美洲人民革命阵线以前的机关刊物）作为新党的机关刊物继续出版，但是到六十年代末，工人革命党只出版一份期刊《真理》。^③

工人革命党在1966年5月举行党的第二次全国代表大会。由于同年6月胡安·卡洛斯·翁加尼亚将军独裁统治*的建立，党的机关报《真理》及其“理论刊物”《战略》（当时刚刚创办）不得不转入地下，但是据报道，两份报刊还是继续出版。^④到了1969年，工人革命党报纸改名为《战斗员》。工人革命党的托洛茨基主义者指责新建立的翁加尼亚政权是“标准的波拿巴主义”，并指出“即使它虚弱无力，却与戴高乐相类似，戴高乐要把法国变成帝国主义大国的企图是注定要失败的，正如翁加尼亚在阿根廷搞的计划一样。”^⑤

工人革命党强烈反对翁加尼亚独裁统治。同时，它也强烈谴责总工会（CGT）的领导，指责总工会与翁加尼亚政权相勾结。1967年发表的“五一”宣言，号召工人们拒绝承认他们的领导，并

① 同约瑟夫·汉森的谈话，1970年1月28日。

② 《战斗者》，纽约，1965年4月12日。

③ 《世界展望》，纽约，1968年2月9日。

* 1966年6月，陆军司令胡安·卡洛斯·翁加尼亚发动政变，推翻了人民激进公民联盟的阿图罗·伊利亚政府（1963年7月—1966年6月），出任新总统。1970年6月，在另一次军事政变中，翁加尼亚被陆、海、空三军司令组成的军事委员会推翻，由莱文斯顿继任总统。——译者

④ 《第四国际》（统一书记处），1967年4月号，第72页。

⑤ 同上，第83页。

在—项四点纲领的基础上联合起来：

1. 完全彻底地挫败为大垄断势力和美帝国主义效劳的军事独裁。
2. 建立一个由总工会和劳工运动所要求的党派和组织所组成的临时政府，并召开立宪会议，决定性地把国家组织起来。
3. 撤销现任工会领导。
4. 通过(甲)工厂和厂际抵抗或保卫委员会，(乙)由工厂直接选举代表出席基层工人代表大会（每一千名工人中或者五百多名工人的机构中选—名代表），来发展和加强基层组织。^①

1969年5月和6月，以工人—方和以警察和军队为另—方之间在罗萨里奥城和科尔多瓦城发生了暴力冲突之后，工人革命党致力于发动起义和组织—支革命军。1969年6月11日的一期《战斗员》宣称：“—次动员工作比—百个纲领更有教育作用，作为最后—着，工人革命党建立的革命军必须是真正的人民军队，必须是从人民斗争中产生的并且受到人民的培育，因为—支革命军必须是在有组织的作战行动中形成的，革命军自己的作用不同于人民自发采取的作用。”^②

同—份工人革命党报纸还发表了向总工会的两个派别以及学生和其他组织提出的一—项建议书，建议内容包括下列各点：

1. 建立—个在地区范围和全国范围协调工人和学生活动

① 《世界展望》，墨西哥，1967年5月号，第28页。

② 巴黎，1969年10月13日《红色》引述。

的联合会,发展和深入开展工人、学生和其他人民群众的积极抵抗行动。

2. 组织抵抗突击队、自卫组织和武装战斗小分队,以保护人民进行示威游行反对现政权的镇压性暴力行动,组织人民的暴力反对政府的暴力,并开始为未来的革命军打下基础。

3. 针对政府镇压机关的士兵和下级军官、警察和军队开展宣传运动,号召他们对人民友好,不要向人民开枪。^①

工人革命党几乎没有收到对这个呼吁的反应,但不久之后它组织了自己的准军事组织——人民革命军。人民革命军进行了使人印象深刻的军事行动计划,最引人注目的是1971年6月初他们绑架了斯威夫特公司罗萨里奥屠宰厂的经理,向他勒索赎金。赎金用来使被解雇的工人复职并给城市贫民分发食品和衣服。斯威夫特公司答应了人民革命军提出的条件。^②

在1971年1月一期的《战斗员》上,有一篇文章阐述工人革命党关于党和人民革命军之间相互关系的思想。文章评论道:“代表着马克思主义最优秀传统的工人革命党,从世界无产阶级革命胜利的经验中得到证实,它赞成党和军队应有区别和党指挥军队,认为这是一个原则问题。党是高级的组织形式,是工人阶级先锋队的核心,是革命思想的发言人。它的任务是通过现有的或将成立的群众组织来指导整个革命进程。军队是必须由党创立并受党指导的一个从事战斗的群众组织。党通过其政治工作保证军队目标的无产阶级性质。这就是我们党对于在党的指导下创建和发展人民革命军的认识。忽视党和军队的相互关系,就会为各种错误倾向打开大门。”^③

① 《第四国际》(统一书记处),巴黎,1969年9月号,第19页。

② 《红色》,巴黎,1971年6月7日。

③ 《红色》,巴黎,1971年3月15日。

“民族左翼”

阿根廷托洛茨基主义中“民族解放运动”这一派最著名的领袖大概是豪尔赫·阿维拉多·拉莫斯。在四十年代初社会主义革命工人党分裂之后，他参预了《工人阵线》的出版工作；1945年他成为一个名叫《十月》的新刊物（1945年和1946年出版了五期）的主编。在这份刊物上，拉莫斯对他赞成“民族革命”和对庇隆主义运动及庇隆政府给予“有批评的支持”的思想立场，首次作了充分的阐述。

随后，拉莫斯派——豪尔赫·斯皮林贝戈是其中最有创见的发言人之一——出版了一些其他刊物，包括《左翼》和《政治》。它还开办一家出版社——“印第安美洲出版社”，该社出版了西班牙文版的托洛茨基著作《俄国革命史》以及《列宁生平》和《什么是俄国革命？》。出版社还出版了一些关于拉丁美洲、特别是关于阿根廷的书籍。其中包括：胡安·拉蒙·佩尼亚洛萨的《托洛茨基论拉丁美洲民族革命》（此书主要谈托洛茨基流亡墨西哥期间所写的关于拉丁美洲的著作）；豪尔赫·阿维拉多·拉莫斯的《拉丁美洲某国》和他写的关于曼努埃尔·乌加特的小册子：《拉丁美洲的民族革命：曼努埃尔·乌加特和反帝斗争》（拉莫斯在此书中描述这位前社会党人转变成为民族主义者和阿根廷托洛茨基主义这一派的先驱者）。

阿根廷托洛茨基主义的拉莫斯亲庇隆主义的态度要比它的对手们直率得多。这反映在下述事实上：庇隆主义派日报《民主报》允许拉莫斯本人在该报上发表一些文章，拉莫斯派还成了民族革命社会党的组成部分。拉莫斯本人谈到了他这一派对庇隆主义的态度如下：“10月17日结束了‘声名狼藉的十年’和‘粉红色的时期’。从1945年到1955年，我们在两种意义上支持历史上具有进

步性的庇隆主义：作为新无产阶级的第一次政治经验和作为面对外国帝国主义的防御性的资产阶级民族主义运动……现在我们足以指出，在1955年，在《工人斗争》上，我们在重新复活的寡头势力面前保卫了1945年无产阶级获得的民族成果。”^①

在民族革命社会党1955年被镇压之后的几年里，拉莫斯派主要通过它发行的几种期刊保持了它的特性。他们虽然在自己的著作中继续大量引用托洛茨基的言论，但是他们往往将他们自己说成是民族左翼而不是托洛茨基主义派。

最后，拉莫斯派在1962年建立了民族左翼社会党(PSIN)，试图对它的观点赋予组织形式。虽然这个新党人数还不多，而且显然未独立地参加任何选举活动，但是它在精神上的影响要比它现有人数起的影响广泛得多。它出版了一份比较定期的刊物《民族左翼》，它未加入国际托洛茨基主义中的任何一个派系。

何塞·路易斯·马达里亚加在他的《什么是民族左翼？》小册子里对民族左翼社会党的纲领作了概括。他指出：民族左翼社会党“综合它的纲领为：除了庇隆主义的三面旗帜——经济独立、政治主权、社会正义——以外再加上第四面旗帜，即工人和群众的政府。这是实施其他三面旗帜的保证。”^②

由于1971年3月亚历杭德罗·拉努塞将军夺取政权并答应举行新的选举，民族左翼社会党在新政府设法组织选举时就决定了参加选举的政策。豪尔赫·阿维拉多在向党的第十九次全会的报告中，提出党“在最近将来的基本任务”是：

1. 加强我们在工人阶级中的渗透工作和影响。

① 豪尔赫·阿维拉多·拉莫斯：《为建立革命党而斗争》（1964年），第138页。

② 何塞·路易斯·马达里亚加：《什么是民族左翼？革命社会主义手册》（1969年）第69页。

2. 扩大我们在大学和中学学生运动中的工作,学生运动是革命小资产阶级的先进部分和工人阶级的天然同盟军。

3. 为争取基本的民主自由而斗争,当前首先是胡安·庇隆将军回国*,并立即举行不附有禁律或受人操纵的选举。

4. 为实现工会的民主化而斗争,因为工会受到多次背叛和投降的官僚集团的扼杀,这一官僚集团虽然带有庇隆主义色彩,但无论对庇隆主义还是对工人们都不能提供任何保证。

5. 把民族左翼社会党的组织和影响扩大到还没有建党的那些省份。

6. 直接参与公众的政治活动,举行大会,张贴标语,向千百万阿根廷人讲话,他们期待了解在工人阶级和人民政府领导下如何把阿根廷引向主权、自由、正义和社会主义,期待着出现一个与社会主义拉丁美洲其他姊妹共和国结成联邦的阿根廷。^①

拉莫斯在同一报告中抨击了暴力革命活动:“有可能要举行普选。在这种情况下,脱离群众动员工作的个人恐怖活动,不可能达到它所宣布的目标,尽管这样做显示了许多小资产阶级的青年人为革命捐躯的自我牺牲精神……以武器来代替政治,或者以行动小组的暴力来代替群众的集体暴力,已经导致和将要导致被动、消极、士气沮丧,宝贵精力的丧失以及有斗争性的人们牺牲于镇压力量之下。”^②

除了参加拉莫斯派和最终成为民族左翼社会党党员的托洛茨

* 1955年9月,阿根廷军人夺取政权,庇隆逃亡巴拉圭,后来在西班牙马德里定居。1972年军人政府才同意庇隆回国。1973年6月,庇隆结束了十七年的流亡生活,回到布宜诺斯艾利斯。同年10月12日庇隆第三次出任阿根廷总统。——译者

① 《民族左翼》,布宜诺斯艾利斯,1971年6月,第10页。

② 同上书,第9页。

基分子以外,还有许多个人对世界托洛茨基主义正式派系的“国际主义”立场持“批判态度”,他们较为同情拉莫斯的“民族革命”方针,尽管他们不同意他的学说的一些方面。他们当中有阿尔维托·贝略尼,A·佩雷尔曼和J·J·埃尔南德斯·阿雷吉,他们至少都从四十年代以来就积极参加了托洛茨基主义活动。他们当中有些人出版了一份名叫《拉丁美洲社会主义合众国纲领》的刊物,第一期出版于1964年7月。

另一个具有托派倾向但不隶属于任何国际托洛茨基主义的组织是工人政治运动(MPO),它出版了一份影印的周刊《工人政治》,于1966年开始出版,从我们所读过的几期来看,主要是论述有组织劳工运动中的活动和问题,相对地说没有什么严格意义上的意识形态方面的讨论。

波萨达斯派托洛茨基主义者

五十年代和六十年代阿根廷托洛茨基主义的第三个主要派系,是同J·波萨达斯(奥梅罗·克里斯塔利)有联系的工人党(托)。该党是在四十年代末阿根廷托洛茨基主义发生一片混乱的情况下产生的,它派代表出席了第四国际第二届世界代表大会,但作为“同情组织”的身份出席。最后,它在1951年第三届代表大会上以第四国际正式成员的身份出席。

这是第一个由波萨达斯居支配地位的全国性托洛茨基主义组织,波萨达斯以这个组织为基地,把影响伸展到拉丁美洲的其他第四国际成员党。工人党(托)仍然是阿根廷最小的托洛茨基主义组织,但它的特点是党员人数不多而具有特别强烈的献身精神,这就使它多年来可以比较定期出版它的月刊《无产者之声》。

在1953年世界托洛茨基主义运动发生分裂时,波萨达斯和工人党(托)成了所谓“巴勃罗派”的阿根廷成员党。然而,在巴勃罗

派和反巴勃罗派重新统一时，阿根廷工人党(托)并没有加入新的统一书记处。相反，波萨达斯领头成立了一个同它唱对台戏的第四国际。工人党(托)成为这个第四国际的下属组织，波萨达斯则当上了这个第四国际的总书记。

工人党(托)定期地举行代表大会和其他会议。这些会议通常以波萨达斯的长篇演说为主要内容。他的演说广泛援引列宁和托洛茨基的语录，以这位领袖自己对历史的独特解释和对未来的预言为特色。波萨达斯在1964年11月15日工人党(托)政治局会议上一篇讲话中的一段话可能是很典型的：“这次会议具有十分伟大的重要意义。既然我们没有机会也没有可能召开一次更广泛的会议，因此全党必须深切体会现在这次会议的意义，因为我们正在为党的发展作准备，以影响即将来临的斗争和准备内战……几年之内世界将作出革命的决定。原子战争将引起革命。在原子战争爆发之前很久，革命即将发展。”^①

经常被称为“波萨达斯派”的工人党(托)在庇隆独裁统治倒台以后对国内政治采取了有所独特的立场。它主张举行普选，在普选中阿根廷的中央劳工组织——总工会——将提出它自己的候选人。它认为这将在工会和总工会的基础上组织一个新政党的第一步。^②

但是，在庇隆下台后的时期中，波萨达斯派的方案在工会或任何其他地方都得不到什么支持，他们就自己单独地参加了五十年代末和六十年代的选举。他们声称在1958年普选中获得了一万一千张选票，在下一年的各省选举中，他们声称在布宜诺斯艾利斯省获得二万八千张选票，在科尔多瓦获得大约九千张选票，在圣

^① J·波萨达斯：《庇隆主义先锋组织在争取建立阿根廷工农政府组织中的任务》(1965年)，第27页。

^② 《拉丁美洲马克思主义评论》(巴勃罗派)，1956年10月，第105页。

非获得大约九千张选票，全国总计获得五万二千张选票。在1960年的国会选举中，工人党(托)在布宜诺斯艾利斯省得到二万八千张选票；在同一个地区1962年的议会和省的选举投票中，它赢得了一万一千张选票。波萨达斯派声称，在同样的选举中，以纳乌埃尔·莫雷诺为首的、与它对立的托洛茨基主义组织(它参加了以美国社会主义工人党为其主要成员组织的国际托洛茨基主义派)在布宜诺斯艾利斯仅获得四百张选票。^①

在庇隆下台之后，工人党(托)在劳工运动中的影响很小。工人党(托)不管拥有什么样的工会工作者，他们都和一般受共产党影响的、通称工会统一和协调运动(MUCS)的总工会中的一派结成联盟。波萨达斯派托洛茨基分子通常投身于工会组织的斗争和政治行动。因此，1959年年中，当图库曼省糖业工人的罢工导致总工会在那个省举行总罢工时，工人党(托)政治局号召把这个省的总罢工变成一次全国性罢工，以“挫败阿图罗·弗朗迪西总统的政府的反动政策。”^②

工人党(托)不时召开由各省托洛茨基主义组织的代表出席的全国会议。例如，1962年8月举行了为时三天的一次扩大的中央委员会会议。除了中央委员会的正式委员外，据说出席会议的还有来自首都和科尔多瓦、罗萨里奥、图库曼、萨尔塔、圣地亚哥—德埃斯特罗、圣胡安和门多萨的代表。据报道，来自内地的代表们“政治上是成熟的”，充满着“乐观主义”。会议通过的决议支持“在工会基础上建立一个群众性的工人政党，并在工会基础上建立一个工人政府。”^③1967年6月，举行了另一次扩大的中央委员会会议。据报道，出席那次会议的代表们代表全国各地十九个地区党

① 《拉丁美洲马克思主义评论》(波萨达斯派)，1967年7月，第259—260页。

② 《无产者之声》，布宜诺斯艾利斯，1959年8月上半月。

③ 《第四国际》(波萨达斯派)，1962年9月，第174—175页。

的组织。没有材料说明这些代表究竟代表多少一般党员。^①

波萨达斯本人 1968 年 10 月致工人党(托)的公开信中,明确地提出了波萨达斯派托洛茨基分子在阿根廷的“路线”。波萨达斯认为:“在阿根廷,必须准备在下一个时期里发展我们的支部,使之成为以工会为基础的工人党的重要基地,把存在于庇隆主义组织、共产党、基督教民主党、分散的社会党人中的无产阶级先锋分子聚集在一起,把他们组织起来,承担当前发展革命领导的任务,为夺取政权,为在阿根廷建立工农政府而斗争。”^②

结 语

托洛茨基派在阿根廷从来没有成为该国有组织劳工运动中
的一支主要力量。它在全国总的政治活动中则更不重要。虽然阿
根廷的托洛茨基主义开始于一批活跃在工会运动中的工人,但是阿
根廷托洛茨基主义运动通常是由中等阶层知识分子领导的。在整
整四十年的历史中,它分裂成激烈争吵的派别,这就不可能使得所
有的托洛茨基主义运动协力合作来和阿根廷左派的其他政治派系
开展竞争。

① 《拉丁美洲马克思主义评论》(波萨达斯派),1967年7月,第307页。

② 《工人阵线》,蒙得维的亚,1969年1月10日。

第四章 巴西的托洛茨基主义、 热图利奥·瓦加斯和路易斯· 卡洛斯·普列斯特斯

托洛茨基主义派在巴西政治生活中始终是一支微不足道的力量。可是在本世纪三十年代初，它有几年的确是巴西左翼力量的一个主要流派。由于巴西劳工和激进政治力量分化为热图利奥·瓦加斯的信徒或共产党的支持者（共产党曾在几乎很神秘的人物路易斯·卡洛斯·普列斯特斯的领导下达一个世代之久），巴西的托洛茨基主义派，如同其他左派组织一样，都蒙受了损害。

巴西托洛茨基主义的起源和早期历史

托洛茨基主义在巴西的最早出现是由于那里的青年共产党人组织的队伍中发生了分裂。持不同政见的那个组织的领袖是一个名叫马里奥·佩德罗萨的学生，他在共产党内已经取得相当重要的地位。1929年他前往德国，在柏林大学经济系学习。他在那里最先了解共产国际在斯大林主义者和托洛茨基主义者之间的分裂情况。他对这个问题进行一段时间的研究之后，决定站在托洛茨基主义者这一边，并决定放弃他原打算前往莫斯科进共产国际的马克思—恩格斯—列宁学院学习的计划。

佩德罗萨没有去莫斯科而前往巴黎，他在那里同法国托洛茨基分子当时正在出版的《光明》杂志发生了联系。他寄了几期杂志给他在巴西青年共产党人中的朋友和伙伴；他还详细地写信给他

们，告诉他们共产国际内部的斗争，并表明他支持托洛茨基主义。他争取到他们当中的几个人支持托洛茨基主义的观点，其中包括利维奥·沙维尔，阿里斯蒂德斯·洛博和伊尔卡尔·莱特。

与此同时，罗多尔福·科蒂尼奥带着同情托洛茨基主义事业的心情回国并退出了共产党。他曾经同巴西代表团出席过1928年在莫斯科召开的共产国际第六次代表大会，在那次会议上，斯大林与托洛茨基之间的斗争普遍引起了苏联境外共产党人的注意。

青年共产党人中持不同政见的一批人同科蒂尼奥一起不久以后建立了巴西第一个托洛茨基主义组织——列宁主义共产党组织。1931年，他们的组织重新定名为共产主义同盟。^①

在巴西第一个托派组织成立之后不久，它的主要成员之一阿里斯蒂德斯·洛博被派往布宜诺斯艾利斯去会见流亡在那里的青年军人路易斯·卡洛斯·普列斯特斯上尉。在此之前几年，在1924年和1926年之间，普列斯特斯上尉曾经是“普列斯特斯纵队”的主要领导人之一，这个纵队是一批起义军人，他们走遍巴西内地设法唤起农村居民起来造反。在这次游击战期间，普列斯特斯获得了作为军事指挥官以及为巴西被压迫群众奋斗的战士的崇高声誉；人们逐渐称他为“希望的骑士”。普列斯特斯纵队的大部分人最终去玻利维亚避难，普列斯特斯和其他一些人从玻利维亚前往布宜诺斯艾利斯，继续进行宣传鼓动，反对巴西政权。洛博前往布宜诺斯艾利斯，试图使普列斯特斯皈依托洛茨基主义事业。

洛博有个时期是有所收获的。他手持普列斯特斯在里约热内卢的一位朋友的介绍信前往阿根廷首都。普列斯特斯似乎接受了这些介绍凭证，洛博同他密切共事过一段时间，好象是他的一名重要的政治顾问。

这位前军人领袖那时领导着他自己的政治组织——革命联

^① 同伊尔卡尔·莱特的谈话，1953年6月11日于里约热内卢。

盟，主要是由他那命运不佳的普列斯特斯纵队的流亡者所组成。在巴西和在流亡者当中，他通常被认为是“尉官派”的主要领导人和发言人；“尉官派”这个名称是指参加1924年圣保罗和南里约格朗德州起义的青年军人，他们后来进行了穿越巴西内地的长征。

洛博同普列斯特斯进行广泛的辩论，认为普列斯特斯应当放弃他单独成立的革命组织而加入共产主义运动。当然，托洛茨基分子当时声称他们是共产主义运动的组成部分，是它的左翼，因此洛博的论点不足为奇的。洛博希望，如果普列斯特斯确实成为共产党人，他会加入托洛茨基派。

普列斯特斯仍然是一位业余政治家，他对于洛博的比较老练和撰写公开文件的能力，显然是欢迎的。普列斯特斯1929年和1930年签署的几个文件事实上都出自阿里斯蒂德斯·洛博之手。这些文件包括1930年初宣布普列斯特斯解散革命联盟的公告。

随着1930年革命的爆发（这一革命导致热图利奥·瓦加斯在巴西上台执政），流亡者认为这次起义至少需要持续六个月才能成功。因此洛博向普列斯特斯建议流亡者应当利用这一局势，在巴西内地发起组织一个新的普列斯特斯纵队。洛博提出的论据是，虽然极左派大概不可能通过这一冒险而上台执政，但是他们大概有可能乘瓦加斯革命的战火所引起的混乱之际在整个巴西内地的要害地点建立马克思—列宁主义革命者的核心。

普列斯特斯至少同意让洛博前往巴西边界并研究成立这样一支新的游击组织的可能性；这样，这位托洛茨基主义领导人就来到了乌拉圭边界上南里约格朗德州的边陲城镇圣安纳多利夫腊门托。他对瓦加斯革命者在南里约格朗德州所赢得的控制程度留下深刻印象；他得出的结论是，他原先建议采取的行动几乎不可能产生他所期望的结果。因此他返回布宜诺斯艾利斯。^①

^① 同阿里斯蒂德斯·洛沃的谈话，1953年6月17日于圣保罗。

此时，斯大林主义的共产党也在忙于劝诱路易斯·卡洛斯·普列斯特斯改变信仰。他们在这方面的努力开始于普列斯特斯在玻利维亚避难之后不久，当时共产党中央委员会的主要人物阿斯特罗吉尔多·佩雷拉前往玻利维亚与普列斯特斯会见，试图争取他信仰共产党的思想和立场。^①

随后，1929年7月，中央委员会委员莱昂西奥·巴斯包姆带着中央委员会的证书和毛里西奥·拉瑟达的亲笔信前往布宜诺斯艾利斯。拉瑟达是一位卓越的、非共产党左翼政治家，普列斯特斯曾同他有过交往。这时，巴斯包姆不仅会晤了普列斯特斯，而且还会晤了另外两名主要的“尉官派”人物西克拉·坎波斯和儒瓦雷斯·塔沃拉。这位共产党代表建议路易斯·卡洛斯·普列斯特斯作为即将举行的1930年选举的候选人，并提出了一项尉官派和共产党人可以联合他们的力量支持普列斯特斯的纲领。但是，普列斯特斯表明他无意参加总统竞选，而且认为提出的纲领无论如何也是太激进了。

巴斯包姆深信普列斯特斯和其他“尉官派”领导人考虑更多的是暴动而不是选举。因此，共产党建立了一个有巴斯包姆参加的革命军事委员会，试图在那一级上同尉官派保持联系。与此同时，将设法对普列斯特斯进行思想灌输并争取他接受共产主义观点的主要任务，交给了设在蒙得维的亚的共产国际南美书记处。^②

到了阿里斯蒂德斯·洛博从圣安纳多利夫腊门托之行回国时，他深信斯大林主义者在拉拢普列斯特斯方面做得简直太成功了。因此他决定返回里约热内卢，确信自己已无法吸收普列斯特斯参加托洛茨基主义事业。^③他对普列斯特斯意识形态立场的估

① 同阿斯特罗吉尔多·佩雷拉的谈话，1965年10月19日于里约热内卢。

② 莱昂西奥·巴斯包姆：《共和国实录》（1968年），第2卷，第274—277页。

③ 同阿里斯蒂德斯·洛博的谈话，1953年6月17日于圣保罗。

计，证明是正确的。1931年3月12日，普列斯特斯发表了一封“公开信”，宣布他支持斯大林主义分子。信中还对托洛茨基主义者进行猛烈攻击，说：

他们被开除出党以后，千方百计地攻击党的领导，所作所为如同阿里斯蒂德斯·洛博一样，他报告警察说我和共产国际南美书记处之间关系密切，虽然党采取了行动，试图从中消除“普列斯特斯主义”的影响。自然，他们甚至更不能了解我现在也反对小资产阶级集团，我通过无产阶级的阶级政党接受无产阶级的领导。

在巴西，“托洛茨基主义”是小资产阶级企图使工人群众误入歧途、偷偷打进革命运动内、试图以“制宪大会”的机会主义和改良主义口号来分散无产阶级注意力的另一形式……它是这些同样的“托洛茨基主义者”对最近发生的帝国主义之间的争吵作出评价的小资产阶级标准的自然结果，而这种争吵实际上是不同地区资产阶级集团之间的相互斗争，它自觉或不自觉地为这一或哪一帝国主义效劳。他们很快变成社会法西斯主义，例如普利尼奥·梅洛所组织的工会中所出现的情况。^①

普利尼奥·梅洛原先是共产党南里约格朗德州委员会的一名委员，是新加入巴西托洛茨基主义派的另一名重要成员。他遭到警察的残酷迫害，逃到了乌拉圭，他在那里参加了巴西共产党领导人在蒙得维的亚共产国际南美书记处总部召开的一次大会。出席这次大会的有阿斯特罗吉尔多·佩雷拉，他是最早建议设法将路

^① 阿布瓜尔·巴斯托斯：《路易斯·卡洛斯·普列斯特斯和社会革命》（1946年），第264页。

易斯·卡洛斯·普列斯特斯吸收入党的共产党领导人，主要是他对争取普列斯特斯起了作用；还有奥塔维奥·布兰当，他是党领导中最强烈反对普列斯特斯的那一派的领导人。

这次大会是在瓦加斯革命爆发之前不久在1930年召开的。在共产国际南美书记处的坚持下，大会决定党停止盲目地反对瓦加斯运动，而应设法利用那次革命以推进党的事业。同时，大会同意接纳路易斯·卡洛斯·普列斯特斯入党，虽然不让他担任领导职务，至少要等到他在国际共产主义的哲学和路线方面有了较好的基础以后。

过后不久，梅洛返回巴西，到达圣多斯港，共产党人在那里有一个小的核心组织。他不久就转往圣保罗，在那里他同若济亚斯·莱昂、路易斯·德巴罗斯和其他几个人建立了一个党的地区委员会。^①

瓦加斯的革命一旦在圣保罗获得胜利，新的共产党地区委员会就同临时总统热图利奥·瓦加斯任命的“监督员”（州长）联系，要求许可它合法地在州内开展活动。共产党人的请求得到了支持，因为共产党人路易斯·德巴罗斯是新监督员（即众所周知的若奥·阿尔贝托，他姓德巴罗斯）的兄弟。若奥·阿尔贝托最后签发了许可证，证件行文如下：“本件授权普利尼奥·梅洛先生、若济亚斯·卡尔内罗·莱昂先生和路易斯·德巴罗斯先生以巴西共产党的名义建立它的总部，实施党组织的任何工作，举行选举，召开宣传教育集会，编辑任何政治性的出版物。此外，上述先生们对该党所通过的任何具有颠覆性的材料，负有全部责任。”^②

然而，等到普利尼奥·梅洛及其朋友们收到了瓦加斯政府在圣保罗的代表同意他们从事合法活动的正式许可时，他们已经不

① 同普利尼奥·梅洛的谈话，1953年6月16日于圣保罗。

② 巴斯托斯：《路易斯·卡洛斯·普列斯特斯和社会革命》（1946年），第248页。

是共产党员了。他们已经被反对他们同若奥·阿尔贝托进行谈判的奥塔维奥·布兰当、阿斯特罗吉尔多·佩雷拉以及党的其他全国领导人开除出了共产党。他们被清除出斯大林主义的共产党，并没有限制圣保罗党组织的活动。他们设法把圣保罗城和圣保罗州所有的工人阶级组织联合起来，以建立类似苏维埃的“双重政权”。但是，在当地工人运动中仍然有相当大的影响的无政府主义者拒不参加这一行动，因此就不了了之。以普利尼奥·梅洛和他的朋友们为首的圣保罗共产党这一派不久就加入了托洛茨基主义者的队伍。^①

参加托洛茨基主义派的圣保罗成员比正统的斯大林主义共产党在圣保罗的影响要大得多。共产国际的刊物《红色国际劳工联盟杂志》1931年8月31日一期上有如下一段评述，可资证明。

在早期，革命的工会没有在里约热内卢甚至没有在圣保罗非正式地设法赢得合法存在的权利，而那里是有着这方面的有利机会的。我们已经突出地谈到总工会（共产党的总工会）实际上完全没有参加圣保罗地方的大罢工运动。托洛茨基主义者和普利尼奥分子成功地利用了这一点，夺取了几个工会的领导权——不仅有小的工会，而且还有下列重要工会组织：诸如新成立的人数达千人的发电站和有轨电车工会，以及老的革命印刷工人工会（这一工会在实行星期日休息制问题上开始同警方勾结）。

起初，普利尼奥分子在圣保罗纺织工人工会也取得一定的影响，这个工会是在某种工联主义的基础上自发地产生的。他们同无政府工团主义者结成集团，试图建立一个新的地区性工会中心，最初采用圣保罗州工会整顿委员会的名义，后来

^① 同普利尼奥·梅洛的谈话，1953年6月16日于圣保罗。

则是在老的无政府主义的圣保罗工会联合会的赞助下活动的。他们打算利用这个工会联合会，针对革命的工会运动和总工会从事周密策划的分裂计谋，准备3月间在圣保罗召集一次全国代表大会，在会上将成立一个新的全国工会中心。^①

在瓦加斯政府执政的最初年代里，托洛茨基分子在巴西左派中仍然是一支重要的力量。他们在一段时间里控制了里约热内卢和圣保罗两地的印刷业工人工会和冶金工人工会，他们在其他一些劳工组织中也有某些影响。^②

巴西托洛茨基分子遭到他们从前的共产党同事们的多次攻击。若干年后，这些早期的托洛茨基分子之一以若奥·马特乌斯的笔名写文章，评论此种迫害说：“这一斗争需要作出个人牺牲，要求思想上的坚定性和肉体上的勇气来面对斯大林主义官僚集团在公开场合和监狱里施加的种种毁谤、挑衅和法西斯暴力手段。”^③

人们从一位巴西共产党领导人写的下述一段话（刊登在一份共产国际的刊物上）中，可以体察到斯大林分子对托洛茨基分子攻击言词的性质：“所有的人还没有充分认识到，托洛茨基主义不再是工人阶级内部的一种政治思潮；托洛茨基分子已经沦为一帮间谍、刺客、恐怖分子，是民主、人民、工人阶级最凶恶的敌人……我们将揭露托派内奸分子，并且毫不留情地将他们驱逐出我们的队伍，要求把他们从所有的工人阶级组织和人民组织中撵出去。”^④

托洛茨基主义者还同三十年代初兴起的一个法西斯组织——巴西整体主义行动党——发生了冲突。1934年10月7日他们参加了整体主义行动党分子和各个左派组织之间在圣保罗发生的一

① 《红色国际劳工联盟》杂志，1931年8月1日，第12页。

② 同伊尔卡尔·莱特的谈话，1953年6月11日于里约热内卢。

③ 《社会主义先锋》，里约热内卢，1945年10月26日。

④ F·拉瑟达：《巴西的法西斯政变》，载《共产国际》，伦敦，1938年1月。

场暴力冲突。那天,整体主义行动党分子计划在该党的“元首”普利尼奥·萨尔加多率领下进行一次通过圣保罗市中心的游行。一些劳工组织组成了联合阵线来反对这次示威游行。领导这次反示威的是无政府主义的解放者组织和圣保罗工人联合会。然而,三个工人阶级的政治组织——社会党、共产党和国际共产主义同盟(托洛茨基分子当时用此名称)予以合作。马里奥·佩德罗萨是筹划这次反对整体主义行动党分子的示威活动的联合阵线委员会成员,也是国际共产主义同盟的代表。整体主义行动党分子和左翼分子之间冲突的结果,有两名警察、三名整体主义行动党分子和一名学生死亡。^①

托洛茨基主义者看来最初是反对成立民族解放联盟的,这个联盟实际上是1935年所有反对瓦加斯政权的左派组织所成立的。共产党人指责说:“托洛茨基分子企图再次阻止成立民族阵线。他们攻击民族解放联盟,把它说成是共产党的组织,以便吓跑在民族改良主义资产阶级影响下的人民群众,使他们脱离民族解放联盟……另外一方面,他们把共产党的领导说成是机会主义的,因为它们‘与工人的敌人结成集团’。他们通过此种指责竭力使那些在关于现阶段巴西革命问题上仍受错误的宗派主义思想影响的分子,从民族解放联盟和共产党领导中分裂出去。”^②可是,后来托洛茨基分子看来改变了主意。一位前托洛茨基分子告诉本书作者说,他们最后获准成为几乎在全国所有城镇都建立的民族解放联盟委员会的组成部分,尽管共产党反对这样做。^③

具有讽刺意义的是,共产党人后来把民族解放联盟的失败,特别是它不幸地诉诸武力,都归咎于托洛茨基分子。费尔南多·拉

① 马里奥·佩德罗萨在《社会主义先锋》撰写的文章,里约热内卢,1945年10月12日。

② 《第四国际报刊通讯》,1937年2月6日。

③ 同伊尔卡尔·莱特的谈话,1953年6月11日于里约热内卢。

瑟达在共产国际的期刊《国际报刊通讯》上这样写道：“托洛茨基分子帮助瓦加斯分裂民族阵线并挑动民族阵线采取象 1935 年 11 月那样的突然行动，瓦加斯在这一行动中得以残酷地挫败和镇压争取我国和我国人民独立的英勇战士。”^①

这种说法的可笑之处在于 1935 年 11 月以民族解放联盟名义发动的灾难性军事暴动，事实上是由斯大林主义的共产党策划和实行的。领导暴动的共产党军人之一阿吉尔多·巴拉塔^②以及民族解放联盟的书记罗贝托·西森（他断言共产党号召暴动是违背民族解放联盟中非共产党人干部的意愿的。^③）证实了这一点。

“新国家”时期的托洛茨基分子

国际共产主义同盟和巴西其他左派都深受热图利奥·瓦加斯总统于 1937 年 11 月建立所谓“新国家”* 的半法西斯独裁统治之苦。这个托洛茨基主义组织被打入地下，它的许多领袖被捕入狱，有些人则被迫流亡国外。^④托洛茨基主义组织在地下活动时经历了某些变化。那些没有被投入监狱的国际共产主义同盟盟员将其组织重新命名为布尔什维克列宁主义组织。后来，他们联合了共产党的一个左翼反对派小组织成立列宁主义劳工党，被接纳为第四国际的巴西支部。^⑤

① 《第四国际报刊通讯》，1937 年 2 月 6 日。

② 有关阿吉尔多·巴拉塔对 1935 年 11 月起义的叙述，见阿吉尔多·巴拉塔：《一个革命者的一生（回忆录）》，无出版日期，第九章。

③ 同罗贝托·西森的谈话，1965 年 9 月 8 日于里约热内卢。

* “新国家”，指 1937 年 11 月至 1945 年 12 月瓦加斯统治时期的巴西。热图利奥·瓦加斯（1883—1954 年）1930 年任巴西临时总统，1934 年正式任总统。1937 年 11 月 10 日，他宣布为避免“毁灭性的内战危险”和“从共产主义下拯救巴西”，决定解散议会、停止政党和选举活动，并签署了一部新的宪法以代替 1934 年宪法。1945 年 10 月 29 日，瓦加斯政府被军队推翻，“新国家”即结束。——译者

④ 同伊尔卡尔·莱特的谈话，1953 年 6 月 11 日于里约热内卢。

⑤ 《新国际》，纽约，1939 年 10 月。

国际共产主义同盟的主要人物马里奥·佩德罗萨出国去了。他出席了1938年9月在巴黎附近召开的第四国际成立大会。他在大会上被选入世界托洛茨基主义组织的国际执行委员会，显然是该机构中唯一的拉丁美洲代表。在第四国际成立大会之后，他前往美国，在那里大约住了一年。1940年第四国际队伍发生第一次分裂的时候，他正在美国，当时美国的社会主义工人在苏联入侵芬兰问题上发生了分裂。社会主义工人的多数人支持列夫·托洛茨基对苏联入侵的认可，而以马克斯·沙赫曼为首的少数派则反对托洛茨基的立场。少数派退出了社会主义工人党并成立一个新的工人党。沙赫曼把问题提交第四国际国际执行委员会；该机构中支持沙赫曼立场的少数几个非美国人委员中有一个就是马里奥·佩德罗萨。^①

1940年，佩德罗萨返回巴西，但是他在那里生活很受折磨，1941年他在警察抓他之前再次逃离巴西。他返回美国并一直呆到1945年。在侨居国外的这段期间，他放弃了对托洛茨基主义的信念，同以诺曼·托马斯为首的美国社会党的几位领导人建立了友好关系。当佩德罗萨在瓦加斯独裁统治行将告终的最后几个月再次返回巴西时，他是一个民主社会主义者，不想再同托洛茨基主义发生任何关系了。^②

佩德罗萨在芬兰问题上所持的立场反映巴西托洛茨基主义派内部看来已经发生了分裂。在苏联究竟是不是“工人国家”这一问题上，列宁主义劳工党在1939年发生了分裂。佩德罗萨对1940年第四国际那次分裂的立场——在此过程中，沙赫曼派不久就提出了苏联已不再是工人国家并受一个新的官僚统治阶级所统辖的新论点——反映了巴西托洛茨基主义者的一个派别所已采取的立

^① 同马克斯·沙赫曼的谈话，于长岛弗洛拉尔公园，1970年1月16日。

^② 同马里奥·佩德罗萨的谈话，1946年8月14日于里约热内卢。

场。大部分赞成佩德罗萨立场的人看来在 1939 年就退党了。^①

与此同时,巴西托洛茨基主义派从共产党中吸收了新的成员。1936 年,在对待当时正在开始的总统选举运动究竟应采取什么态度的问题上,共产党队伍内发生了分裂。一派主张支持正式的“政府”候选人、帕拉伊巴州的文化人和政治家若泽·阿梅里科,这一派为首的是拉乌多·雷吉纳尔多·德罗沙,即众所周知的班古。另一派则建议共产党人提出的路易斯·卡洛斯·普列斯特斯作为象征性候选人。普列斯特斯因参加 1935 年 11 月民族解放联盟的暴动当时正在狱中,在暴动期间他被起义者宣布为“总统”。

在讨论这个问题期间,反对若泽·阿梅里科为候选人的一派居于党的领导中的多数。可是,共产国际的莫斯科总部进行了干预,由于共产国际的一道敕令,多数派就变成了少数派。但是反对若泽·阿梅里科为候选人的人仍然控制了圣保罗州共产党的地区委员会,以及巴拉那州的地区委员会和米纳斯吉拉斯、南里约格朗德和伯南布哥等地的部分党组织。几个月之后,他们退出了共产党或者被开除出共产党,开始转向托洛茨基主义。1937 年,他们以革命社会党的名称进行了整顿,这个党出版了一份名叫《社会主义方针》的半合法报纸。

在共产党出现这次分裂期间,国际共产主义同盟与共产党内持不同政见的人没有什么联系。后来,国际共产主义同盟(当时已改名为列宁主义劳工党)和托洛茨基主义派的新成员要求被承认为第四国际的巴西成员组织。列宁主义劳工党的领导人伊尔卡尔·莱特有一个短时期加入了革命社会党,但是随后又退出了。^②

准备提名若泽·阿梅里科为政府候选人的选举并没有举行,因为 1937 年 11 月 10 日发生热图利奥·瓦加斯的军事政变,建立

① 同费布斯·吉科瓦特的谈话,1953 年 6 月 17 日于圣保罗。

② 同埃米尼奥·萨克谢塔的谈话,1953 年 6 月 16 日于圣保罗。

了半法西斯主义的“新国家”。由于建立了这种独裁统治，托洛茨基分子的许多领导人被政府逮捕并用船送往大西洋中的费尔南多—德诺罗尼亚岛，瓦加斯在那里设立了一座庞大的政治犯监狱。^①

在共产党圣保罗地区委员会与斯大林主义的共产党分裂之后，它所建立的革命社会党发出号召，要求巴西所有同情托洛茨基主义的人团结起来。被邀请的包括第四国际的巴西支部列宁主义劳工党。这次会议称为巴西第四国际第一次全国大会，于1939年8月举行。大会是在“岌岌可危的非法情况下”召开的，出席大会的有老的列宁主义劳工党的代表、革命社会党的代表以及“和劳工运动有联系的人们”。不仅列夫·托洛茨基而且许多监禁在费尔南多—德诺罗尼亚岛的托洛茨基主义者被提名为名誉主席。

代表们就“国际局势”进行了长时间的辩论，最后同意团结“在第四国际纲领的周围”。他们向当时住在墨西哥的托洛茨基致意。最后，他们决定会上建立的党的名称是革命社会党。^②

托派至少有一段时间里能够出版地下刊物。1939年3月一期的墨西哥托洛茨基主义刊物《关键》上列举了《阶级斗争》和《在新的旗帜下》两种地下刊物的名称。后来，虽然在“新国家”独裁统治时期托洛茨基分子同所有的反对派一样遭到了残酷的迫害，但是他们在整个时期还能够不时地出版《阶级斗争》。有时它是铅印出版，但一般是油印的。但是，党对政府控制的劳工运动从来没有发挥过任何真正的影响。据说它的成员从未超过二百人。^③

瓦加斯独裁统治对托洛茨基主义者迫害的影响，在“L·罗德里格斯”写给阿根廷当时的托洛茨基主义领袖利沃里奥·胡斯托

① 《工人斗争》，墨西哥城，1939年11月7日。

② 同上。

③ 同埃米尼奥·萨克谢塔的谈话，1953年6月16日于圣保罗。

的一封信中有反映。罗德里格斯写道：“经过几乎七年残酷的反动统治之后，巴西的‘第四国际运动’……现在完全是软弱无力了；对逃脱的人和能够从阴暗监狱里回来的人，都得不到赦免，也不给他们重新生活的机会。因此我们处于完全分散的状况，我们的斗争更为艰难了，因为俄国人对希特勒进行可怕的抵抗使得人们对斯大林主义重新产生一定的信心。”^①

“新国家”时期以后的托洛茨基主义

1944年，革命社会党是最早主张召开制宪会议以结束瓦加斯的“新国家”和建立新政权的政治组织之一。在瓦加斯独裁统治迅速崩溃的最后几个月中，革命社会党对接着举行的总统选举运动不表态。以马里奥·佩德罗萨为首的前托洛茨基主义者对于反瓦加斯派提名的候选人布里加德罗·爱德华多·戈麦斯给予微弱的支持，但是革命社会党拒绝这样做。埃米尼奥·萨克谢塔阐述革命社会党的立场如下：“就我们而言，我们愿意成为国际主义者并依旧忠于阶级斗争。我们愿意对那些能够听或愿意听的人说：托洛茨基主义者拒绝支持资产阶级提出的共和国总统候选人。资产阶级的阶级本能在选择统治者方面是决不会错的，统治者不管多么‘圣洁’，也不过是支持他们的政治组织的执行者罢了。”^②

革命社会党的托洛茨基分子因他们批评马里奥·佩德罗萨的“社会主义先锋组织”而奖赏到了“几个工会的职务”并据说控制了“一个组织中的重要职位”。然而，也是这些前托洛茨基主义反对派却声称革命社会党的工会工作者未曾利用他们有过的影响去积极进行斗争，使劳工运动摆脱“新国家”立法确立的严厉控制。^③

^① 利沃里奥·胡斯托：《革命的战略：为争取统一和拉丁美洲的民族和社会解放而斗争》，（1956年），第123页。

^② 《社会主义先锋》，里约热内卢，1945年9月28日。

^③ 同上书，1946年1月18日。

托洛茨基分子没有能够扩大他们在有组织劳工运动中的影响，也没有能够在总的巴西政治生活中建立据点。1945年以后的工会几乎完全受共产党和热图利奥·瓦加斯的追随者所控制（瓦加斯在1950年年底再次当选为总统；1954年8月，当高级军事司令部向他发出辞职的最后通牒时，他自杀了）。革命社会党显然在五十年代的任何一次选举中都没有提出候选人，该党拥有的这种影响多半集中在圣保罗。

六十年代期间，巴西托洛茨基分子分裂为两个不同的组织，它们同国际托洛茨基主义运动当时分裂出来的不同派系结盟。革命社会党的后继者革命工人党(托)，在1963年之前是第四国际国际书记处巴勃罗派的一部分。在巴勃罗派同它们的反对派开始走向联合以及大部分拉丁美洲下属组织脱离出去组成以J.波萨达斯为首的一个对立的国际书记处之后，革命工人党(托)加入了国际托洛茨基主义的波萨达斯派。同反巴勃罗派结盟并最后同1963年建立的第四国际统一书记处结盟的是马克思主义革命工人政治组织，1968年它改称共产主义劳工党。

革命工人党(托)

据报道，革命工人党(托)1963年2月于圣保罗召开了第一次代表大会。中央委员会设在圣保罗，在累西腓成立了东北地区委员会。该党决定特别注意城市工会和农民运动中的工作。^①革命工人党(托)在东北部的伯南布哥州的农会中获得一些较小的成就。辛西娅·休伊特对他们在这个地区的活动描述如下：

伯南布哥各种政治派别中的极左翼是托洛茨基派，托派的活动基地在塔姆贝市。托派虽然人数不多，但极善词令。

^① 《宪兵审讯录，第709号：巴西的共产主义》第3卷(1965年)，第442页。

在里约出版的《工人阵线》攻击教会发起创办的联合会“是一个纯属形式的、瘫痪的组织，只要发生农民起义，它就出面调解……”1963年9月7日在塔姆贝举行的第一届农民代表大会，建议伯南布哥的所有工人结成联合阵线，发动总罢工，并设立人民法庭来审判老板。代表大会的宣言以“决不与政府和老板妥协”和“劳动者起来反对资本主义和大庄园制”的话作为结尾。托派同反对俄国共产党一样反对中国共产党。他们不与任何其他组织结盟，在1963年10月他们的工会成为地区劳工代表干涉的目标之前，他们的活动仍然局限于塔姆贝市。^①

休伊特小姐在另一篇文章中指出：“总部设在北部塔姆贝市的一小股托派分子直言不讳地斥责现行社会制度。他们在圣保罗出版的《工人阵线》报谈到需要建立人民法庭以审讯同‘资本主义和大庄园制’有牵连的人。”^②

托派在伯南布哥农民运动中的势力是由保罗·罗贝托·平托（党内的名字叫热雷米亚斯）扶持起来的，他是革命工人党（托）中央委员会委员和政治局委员，二十二岁，是圣保罗州莫吉多斯克鲁泽斯印刷工会的前总书记。平托受革命工人党（托）领导的派遣，在农民中间开展工作。他当上了该州党的地区委员会书记，该委员会开始出版一份名叫《土地和社会主义》的期刊。

当平托正在领导塔姆贝工会的一批工人进行示威游行、要求东方制糖厂支付年终奖金和规定最低工资标准时，遭到了暗杀。革命工人党（托）指控“一帮大庄园主和匪徒”谋害了热雷米亚斯。

① 辛西娅·休伊特：《伯南布哥农业工人运动介绍》（1965年），第18页。

② 辛西娅·休伊特：《巴西1961—1964年伯南布哥农民运动》，载兰兹伯格：《拉丁美洲的农民运动》（1969年），第385页。

革命工人党(托)政治局和波萨达斯派第四国际国际书记处都发表声明,谴责1963年下半年平托被暗杀一事。^①

革命工人党(托)是六十年代初参与建立巴西东北部农民运动的政治组织中最小的一个。参预的其他组织有:社会党议员弗朗西斯科·儒利昂组织的农民协会、亲苏共的巴西的共产党、亲中共的巴西共产党、帕德雷斯·保罗·克雷斯波和安东尼奥·梅洛领导的天主教会组织,以及若奥·古拉特总统和伯南布哥州州长米格尔·阿拉埃斯的个人追随者。

尽管(或者说也许因为)托洛茨基分子在东北部农民运动中的影响较小,他们却是极有战斗性的。1963年8月15日一期的《圣保罗州报》指出,革命工人党(托)认为,“为了完成土地改革,农民必须夺地并留在土地上,用到手的一切武器来自卫……必须用武力夺取土地。农业工人必须进行罢工,以支持对土地的占领和阻止警察扑灭农民运动。工人们一定要同意举行总罢工,占领制糖厂和农村地产,建立人民法庭以处决人民的凶手。这就是巴西土地革命和社会主义革命的道路。”^②

革命工人党(托)的党员由于他们的极端主义行动而同其他政治组织以及同联邦和州政府发生了冲突。我们已经指出,联邦政府的地区劳工代表在1963年10月剥夺了托派所控制的塔姆贝工会的合法地位。与此同时,在该地区的三名托派领袖被伯南布哥州州长米格尔·阿拉埃斯的州政府所逮捕。这三个人是:卡洛斯·蒙塔尔罗伊奥斯、埃比雷·萨和克劳迪奥·卡瓦尔坎蒂。

革命工人党(托)试图使伯南布哥州党员被捕一事成为轰动一时的案件。他们在累西腓组织了一次群众集会,据他们说有一千名农民出席;在塞雷恩阿埃姆的农民罢工者明确要求释放托派农

① 《第四国际》(波萨达斯派),1963年10月号,第90—92页。

② 同上杂志,第93页。

民领袖。不知是由于托派的鼓动工作还是由于其他原因，蒙塔罗伊奥斯、萨和卡瓦尔坎蒂在监禁两个月后就被释放了。革命工人党(托)政治局利用这次事件再一次坚持他们对农民运动的极端主义立场。1963年12月29日的党报《工人阵线》发表了政治局的一项声明，其中有下列一段话：“在我们的同志们获得自由之时，托洛茨基主义者重申他们坚定地维护并实施促使这些同志被捕的纲领和行动：拥护占领土地，在伯南布哥和全国成立中央农民组织，组织农民民兵和种植园农民委员会，召开工农兵代表大会，建立地区的和全国的劳工联合会。拉瑟达滚出去！帝国主义滚出去！建立工农政府！”

革命工人党(托)政治局的这一声明表明托洛茨基分子同样怀有当时左派感觉的政治安乐感——认为革命即将爆发和政权即将落到他们手中。革命工人党(托)的声明指出：“客观的革命条件，政权的深刻危机，以及对群众战斗精神的绝对信心，这是我们准备推进这一斗争的基础。”

革命工人党(托)赞成在若奥·古拉特总统政权的最后几个月中采取暴力行动的托派立场，在《人民阵线》1963年12月29日一期题为《在危机、政变和内战之中，革命道路已打开：工农政府》的另一篇文章中也得到证实。文章说：“但是政变是不可避免的。议会、拉瑟达和阿德马尔·德巴罗斯不断地串通一气继续统治下去是不可能的了。如果他们有更大的力量，古拉特就会立即走开让他们掌权……显而易见，尽管得到帝国主义大肆炫耀的支持，尽管得到古拉特的保护，尽管得到一切……但是他们没有力量或能力干什么事。这一切引起古拉特或者另一个文人或军人改良主义者发动政变，是不可避免的。没有其他办法摆脱这种局面。”

随着若奥·古拉特总统的政府被推翻，革命工人党(托)连同巴西所有其他的极左翼政治组织一起被迫转入地下。然而，J.波

萨达斯号召他的巴西同事们继续开展活动。波萨达斯表示，他认为党应当发动总罢工来反对在古拉特被推翻之后接管政权的卡斯特洛·布兰科陆军元帅的军事政府；但是他强调指出，在一段时间内不可能发动总罢工，提出党在劳工运动中宣传鼓动工作的重点应当是“取消对工会的法律控制，反对罢工法，要求增加工资和民主自由权。”他还敦促党应同古拉特的内弟、左派人士莱昂内尔·布里佐拉合作，“但是应当比他走得远得多。”波萨达斯还告诫说，革命工人党（托）可以料到共产党会对它攻击，共产党“将设法同卡斯特洛·布兰科以及其他试图进行改良或妥协的任何人结成同盟。”^①

不久之后，据报道革命工人党根据在蒙得维的亚与亲苏和亲华的共产党签订的一项协议，加入了解放人民阵线。但是罗纳尔德·希尔科特指出，“这一联盟并不妨碍革命工人党（托）对巴西的共产党* 和巴西共产党** 提出批评。”^②

革命工人党（托）遭到军事独裁统治的警察的迫害。1970年5月，革命工人党（托）的党员和圣保罗金属工人工会的领导人奥拉沃·汉森被警察杀害，一名重要律师向法庭提交证据，说明汉森在被杀害之前遭到了严刑拷打。当时，报道革命工人党（托）还有其他十七名党员在狱中。波萨达斯派第四国际为他们发动一场大规模的运动，并得到了许多国家非托洛茨基派人士的支持。^③ 1970年后期，据报道巴西的波萨达斯派组织发生分裂，革命工人党（托）

① 《资产阶级之间的矛盾和进一步争取巴西工人权力的组织工作》，载《工人斗争》，罗马，1964年8月10日，第5页。

* 巴西的共产党的前身是巴西共产党，成立于1922年3月25日。为了向当局登记，取得合法地位，于1961年8月改用现名。——译者

** 1962年2月18日，巴西的共产党发生了分裂。党内一部分不满普列斯特斯集团的人另组新党，沿用巴西共产党原名。——译者

② 罗纳尔德·希尔科特：《巴西的共产党》（手稿）。

③ 《恐怖主义，对革命工人党（托）的镇压，巴西革命条件的发展》（1970年）。

的大多数人同波萨达斯派的领导破裂了。

马克思主义革命工人政治组织

从六十年代初就同第四国际反巴勃罗派有联系的托洛茨基派组织,是1961年建立的马克思主义革命工人政治组织。根据这个组织自己的说法,它“是为了填补我们中间缺少马克思主义先锋队的空白而成立的”。它自己宣布的目标是“组成一个革命的马克思主义政党……是在国内进行社会主义革命的先决条件。”^①马克思主义革命工人政治组织成立后不久,就开始出版一份刊物《工人政治》,由路易斯·阿尔贝托·迪亚斯·利马主编。

1963年年初马克思主义革命工人政治组织举行第二次代表大会。他们在那次会议上通过了一些涉及国内和国际问题各个方面的决议。这些决议中根本没有提到托洛茨基主义或第四国际,尽管决议中含有对共产党,特别是对亲莫斯科的巴西的共产党的不断批评。

马克思主义革命工人政治组织这次代表大会上提出的最重要的议题之一,是涉及有组织劳工的问题。大会决议指出:工会组织的现有体制起源于热图利奥·瓦加斯1937—1945年独裁统治期间所建立的各阶级合作的“新国家”。然后,决议提出以下“当前要求”:

废除工会基金并根据中央劳工组织确定的比例把所有这些钱转入工会、工会联合会和工会总同盟的财库;

废除劳工部通过巴西银行对工会预算的控制权。工会基金的行政管理是工会组织本身的业务;

废除工会管辖问题委员会。对行业和工业部门的管辖是

^① 欧里科·门德斯:《工人运动的发展和汪达尔人的任务》,《工人政治》第6期。

工会组织的职权；

废除劳工部制订的标准工会章程。工会章程应由工人组织制订；

废除劳工部承认和解散工会组织的权力。这一权力必须全部归于工会联合会、工会总同盟和中央劳工组织；

撤销第 9070 号法令。维护不受限制的罢工权。^①

在此决议通过的时候，还没有成立中央劳工组织，现行有关劳工关系的立法禁止成立这一组织的建议。

马克思主义革命工人政治组织还通过了一项内容广泛的关于农民运动的决议，农民运动当时正在全国各地开始确立起来。这项决议指出：“组织农民的任务分为两个方面：一、群众联系方面，工人政治组织同其他左派力量协力合作，将设法在地方一级重建和扩大协会联盟和农会，并使这些组织结成联合会的形式，最后在上面建立全国联合会；二、党组织方面，要求在农村为建立未来的革命党创造条件，首先是制定组成马克思主义—列宁主义核心和使群众关心政治的系统政策。”^②

马克思主义革命工人政治组织甚至在召开第二次代表大会之前，就积极参加了农民运动。在农民运动发展最为引人注目的东北部各州，看来没有迹象表明它有任何影响，然而 1963 年 1—2 月号《工人政治》上一篇题为《冒险主义者》的社论指出：该组织“积极参与了本国南部地区农民运动的组织工作。”同一社论还强调该组织重视农村雇佣工人（不同于佃农、占耕农和其他无地农业劳动者）的组织工作。

工人政治组织采取的政治立场属于六十年代早期活动的各种

① 关于“工人运动”的决议，载《工人政治》第 6 期，第 14 页。

② 关于“农民运动”的决议，载《工人政治》第 6 期，第 17 页。

政治派系的极左翼。它和亲莫斯科的共产党人、社会党人和工党左翼分子采取的立场不同，反对同古拉特协作或支持古拉特。1963年1—2月号《工人政治》上一篇题为《科恩的新计划》的文章，提出了它对古拉特采取的立场。文章说：“改良主义的左派在加强若奥·古拉特反对右派组织的斗争中，犯有两个根本错误。首先，他们使右派组织的力量完整无损地保存了下来，因为中间派只希望击败它，而不是象无产阶级的利益所要求的那样去消灭它……其次，为了挫败一个组织而去加强另一个组织这种僵硬的想法总是导致自身的削弱。左派在加强中间派的时候，使然戈及其助手们掉转枪头对准左派而削弱了左派自己……此时此刻左派的真正任务是采取独立的立场，从组织上加强自己，锻炼群众，用群众自己的力量攻克右派和狡猾的中间派的据点。”

根据这一意向，工人政治组织拒绝参加恢复总统制政体的运动，总统制在1961年9月为议会制所取代了，作为军人领袖允许古拉特担任总统职务所索取的代价。1963年1月政府就此问题举行了全国公民投票，大多数巴西人热情地支持恢复总统制。可是，1963年1—2月号《工人政治》上刊登的一篇题为《公民投票：左派说“不”》的未署名文章，简述了它对这一问题的态度：“正是需要推动无产阶级觉悟和组织工作的发展，才促使工人政治组织承担起拒不接受公民投票所提供的选择这一任务……在一个有被压迫者和压迫者的社会里，议会制或总统制总是代表强者统治，指出巴西人民的真正困难。工人阶级今天采取的适当政策，从根本上说，是指出巴西存在着社会主义的解决办法。”

工人政治组织设法组成一个包括所有的或大部分极左派组织的左翼阵线，而不是同若奥·古拉特和巴西工党左翼的主要领导人莱昂内尔·布里佐拉这类人结成联盟。它根据这一原因支持了圣保罗州1962年10月选举中巴西社会党提名的希德·佛朗哥为

州长候选人。1962年10月号的《工人政治》争辩说，“希德·佛朗哥候选人的产生，是出于社会党力图促成一次由左翼阵线领导的选举运动，这个阵线围绕着已超越这次选举插曲的社会主义纲领进行宣传、鼓动和组织工作。”^①在整个古拉特统治的其余时间里，工人政治组织设法建立这样的左翼阵线。1963年年中，该组织发表了一项题为《为建立左翼革命阵线而斗争》的文件，文件的对象是“提出在社会主义道路上对巴西实行革命变革的所有阶层。”文件提出实现基本“斗争纲领”的一些建议，其中包括生活费用、工会自治和自由、农民要求、政治自由、反帝斗争和对外政策等部分。^②

工人政治组织的领导人究竟期望哪些党加入这样的革命左翼阵线还不清楚。但是，从1963年《工人政治》上曾偶尔友好地提到亲北京的巴西共产党和《拔牙者* 革命运动》（以农民为基础的极左派组织）来看，它们看来象是把这两个组织同社会党一起视为这一阵线中可能的合作者。

随着1964年4月1日若奥·古拉特总统的政府被推翻，工人政治组织如同所有的巴西左派一样遭到了沉重打击。它定期出版的刊物暂停了。看来《工人政治》在1965年6月以后才开始重新问世；虽然这个杂志本应该是按月出版的，但是下一期过了三个月才出版。^③1965年11月，马克思主义革命工人政治组织开始出版油印周刊《国情通报》。1966年2月5日这个刊物的第十四期指出，它已按期出了三个月。它还提出，这个刊物发行于六个州，巴伊亚州党组织还另行出版了一个刊物。最后，它宣布不久将按月

① 《工人政治》，1962年10月，第3页。

② 《工人政治》，1963年年中，第6期。

* “拔牙者”是巴西民族独立运动领袖席尔瓦·沙维尔（1748—1792年）的浑名。席尔瓦·沙维尔1788年在米纳斯吉拉斯州组织反对葡萄牙殖民统治的武装密谋活动。1792年遭杀害。——译者

③ 《工人政治》，第14、15期，1965年6月和9月。

出版增刊,以便更加深入研究当前问题,以及出版一系列涉及特定问题的专论。^①

工人政治组织对于反对若奥·古拉特被推翻后建立的军事独裁统治所持的立场,多少是有点含糊不清的。当1965年8月社会民主党和工党提名恩里克·特谢拉·洛特将军为瓜纳巴拉州州长候选人时,工人政治组织就表示支持。所以采取这种姿态,他们作如下解释:“革命左派支持洛特为候选人,尽管他保守和非常墨守成规,而且正因为这种墨守成规证明是统治阶级所不能接受的。”工人政治组织还认为,“如果说洛特充当候选人是群众斗争的一面旗帜的话,那正是因为这一候选人是四月政权的明显反对派。”^②

可是,当卡斯特洛·布兰科总统的政府否决洛特将军的候选人资格时,工人政治组织就拒绝支持社会民主党和工党提出其他替代洛特的人选,而采取了投空白票的立场。在该组织散发的一份传单中,对此作了概括:“如何在政治上正视这一问题呢?军事政变只有通过工人群众的暴力行动才能推翻。既然我们维护这一观点,而且我们深信这一观点是正确的,那么我们就一定要懂得如何使我们的选举策略适应这一战略。我们不能接受现有体制安排的战场而去加强它。由于在瓜纳巴拉没有候选人能够在客观的革命旗帜下动员群众和启发群众的觉悟,所以我们就不能重复使用给我们造成四月失败的‘两害相权取其轻’的策略。我们必须谴责选举骗局,把我们的目标告诉群众,并号召投抗议票。”^③

工人政治组织继续鼓吹成立革命左翼阵线。它在1966年年末《国情通报》周刊上,再次发出成立这一阵线的号召:“工人政治组织现在比过去更致力于组成这一阵线,从这一阵线中才能展现

① 《工人政治》《国情通报》,第14期,1966年2月5日。

② 《工人政治》,1965年,第15期。

③ 《工人政治》,《为什么废除瓜那巴拉州的投票》(无出版日期)。

出马克思主义革命统一的前景以及工人独立动员的前景。正在巴西的共产党内开展党内斗争的革命力量,布里佐拉分子,各种持不同政见的革命共产党人的组织,工人、农民、学生运动中的独立的革命分子以及军士和水兵的秘密运动,都是结成革命左翼统一阵线的成分。”^①

1968年4月,马克思主义革命工人政治组织与一个叫做列宁主义反对派的组织(它是从亲莫斯科的巴西的共产党中分裂出来的)进行合并而成立了一个新党——共产主义劳工党(POC),这至少是亲托洛茨基主义组织走向统一的一步。

新党的刊物《国情通报》上登载一篇纪念共产主义劳工党成立一周年的文章,概括地谈了它认为成立该组织的重要意义:

首先,我党的成立再次确认了这一列宁主义原则:无产阶级政党既要反对处在混乱中的修正主义党,也要反对试图在山上建立统一的政治—军事指挥部来替代党的德布雷分子。

其次,共产主义劳工党的成立,表明决心要加强坚定而团结一致的少数派,而不是企图虚构地创建一个缺乏思想统一的广泛的集合体。我们在成立党的号召书中说,质量将产生数量……

第三,共产主义劳工党的党章表明了无产阶级革命思想的胜利。当左派陷入改良主义和游击中心论之间的论战时,我们十分明确地坚持我们的无产阶级革命纲领和这一纲领所带来的实际结果……

第四,共产主义劳工党高举意识形态斗争的旗帜。它高举决不妥协的旗帜,反对在改良主义破坏的年代里所发展起来的调和原则的传统,这一传统造成群众迷失方向。从大学

^① 《世界展望》,墨西哥城,1967年5月,第14页。

到工厂，我们坚持开展反对资本主义的斗争以及争取无产阶级领导权和社会主义革命的宣传鼓动运动。^①

新党声称它在学生运动中正在取得非凡的收获。1969年初，据报道在学生运动中，“人民行动组织的影响下降了，而反对派潮流的影响，共产主义青年和共产主义劳工党的影响却相应地有了增长。”^②

共产主义劳工党虽然同统一书记处的第四国际保持了友好关系，但是并不隶属于它。随着时间的推移，那个第四国际对共产主义劳工党越来越持批评态度。爱德华多·皮涅伊罗和J.马托斯在1971年5月《第四国际》上一篇题为《巴西的革命斗争》文章中指出：“共产主义劳工党的主要弱点和错误使它不能成为它希望成为的注重实践的党，人们也可以怀疑它过去或者将来是不是一个注重理论的党。”

这篇文章还说，工人政治组织的前领导人退出了共产主义劳工党并在1969年年底改组了工人政治组织。文章评述道：“共产主义劳工党的新领导，反对派的前领导，开始对巴西革命左翼的成败作了总结，这也是自我批评的总结，这是一种正确的方法。在不隐瞒对托洛茨基主义同情和受其影响的某些党员的压力下，该党似乎已经作出了采取过渡纲领的策略。但是很清楚，能使共产主义劳工党在劳工运动中扩大影响（该党认为这应优先考虑）的政治和组织方面的问题，还远远没有获得解决。”^③

结 语

托洛茨基主义始终是巴西政治生活中左翼少数派内部的少数

① 《洲际新闻》，纽约，1969年5月26日。

② 摘自《第四国际》（统一书记处），《洲际新闻》（纽约，1969年5月5日）转载。

③ 同上。

派。除了三十年代中为期短短的几年外，托洛茨基主义者在有组织劳工中没有重大影响。如同在拉丁美洲其他地方一样，托洛茨基主义近年来分裂成互相争吵的第四国际各派系的追随者或同情者。然而，托洛茨基主义在巴西作为一个已经存在了四十多年的运动，是该国年代最长的政治思潮之一。托洛茨基主义能坚持存在，是值得注意的，尽管它在巴西的国家事务中从未成为一个主要的思潮。

第五章 智利的托洛茨基主义

在智利卡洛斯·伊巴涅斯·德坎波将军的独裁统治（1927—1931年）以前和独裁统治期间，智利共产党队伍内部发生了派系斗争，智利托洛茨基主义的出现就是这场派系斗争的结果。由于共产国际南美书记处很早就支持其中的一个派系集团，因此智利共产党全国领导的分裂从一开始就具有国际影响。

智利共产党的分裂

智利共产党队伍内部的分裂促使了托洛茨基主义运动的兴起，这场分裂起因于该党创始人和最早的领袖路易斯·埃米略·雷卡瓦伦死后争夺领导权的斗争，雷卡瓦伦是在1924年12月自杀死的，这一分裂由于伊巴涅斯独裁统治对共产党人的迫害而加剧了。^①

争夺雷卡瓦伦过去担任的无可争辩的领导地位的有两个主要人物，一个是曼努埃尔·伊达尔戈，他是一名律师，是智利共产党在首都圣地亚哥地区组织的领导人；另一个是埃利亚斯·拉斐尔特，他接任了雷卡瓦伦过去担任的智利共产党所控制的劳工组织智利劳工联合会的主席。可以理解，伊达尔戈派（它最后成为托派）往往以圣地亚哥地区为中心，这是因为伊达尔戈在该地区具有重要性，而拉斐尔特派（它成为斯大林主义派）则从北部的铜矿和硝石矿区以及靠近康塞普西翁（圣地亚哥以南约三百英里）的煤矿地

^① 关于智利共产党起源和历史的讨论，见罗伯特·J. 亚历山大：《拉丁美洲的共产主义》（1957年）第十章。

区吸收力量。

伊达尔戈和拉斐尔特是两个个性很不相同的人物。伊达尔戈是纯印第安血统,在他的朋友中以“印第安人”著称;他年轻时当过工人,担任过工会组织员,但到了二十世纪二十年代中叶,他当了律师。他的个性坚强,激励他的支持者们对他抱有强烈的忠诚。对比起来,拉斐尔特则是主要通过自我教育而成长的,他的一生中大部分时间担任工会和党的干部,个性腼腆、孤独;他可以更多地作为团结反对伊达尔戈影响的人们的一个有威望人物,而不能凭他本人资格而作为一名富有领导才华的领袖。

从雷卡瓦伦去世到1927年5月伊巴涅斯独裁政权建立之间的几年中,伊达尔戈和拉斐尔特两人多多少少和睦地分享了领导权;伊达尔戈是智利共产党的主要发言人,拉斐尔特领导着当时全国劳工运动的主要部分智利劳工联合会。然而,随着伊巴涅斯独裁政权的建立,智利劳工联合会实际上被破坏了,拉斐尔特以及其他许多共产党人一起被流放到太平洋中部一个岛上的集中营。智共本身很难开展活动。虽然曼努埃尔·伊达尔戈在独裁政权初期也曾被短期放逐过,但是他从未正式被免去参议员的职位,而这个职位使他在某种程度上免受迫害。

曼努埃尔·伊达尔戈同共产国际南美书记处之间,甚至在伊巴涅斯独裁统治建立以前,就已经出现了意见分歧。伊达尔戈要求把书记处的总部移到圣地亚哥,理由是:智利是南美国家中工业化程度最高和最为先进的国家。但是,由于其本身的原因,共产国际的领袖们不想这样做,因此南美书记处的所在地仍留在蒙得维的亚。^①

智利共产党上一次召开的、数年一度的代表大会(正式为党的第八次代表大会)在1926年12月至1927年1月举行。一个月以

^① 同曼努埃尔·伊达尔戈的谈话,1946年12月17日于智利圣地亚哥。

后，在伊巴涅斯正式就任总统以前，对共产党的迫害就开始了。1927年5月，党中央委员会全体委员几乎全遭逮捕，唯一逃脱的几个是洛佩斯·P.、何塞·R·巴斯库尼安、多诺索和伊里亚特。其中的后三人自行组成了一个新的中央委员会来管理党的事务，直到1928年8月。

从那时以后，由于独裁政权暂时放松了一下其严厉统治，有更多的人被释放出狱和从流放返回国内，因此中央委员会又一次进行改组。新中央委员会委员中包括巴斯库尼安、加尔达梅斯、多诺索、伊里亚特、J. S. 萨瓦拉和罗萨斯。这个新的机构承担起在三人地方小组的基础上改组党的组织结构。这种三人地方小组相互之间显然没有联系，而只能通过党的高层统治机构来和党的其他组织取得联系。^①

这种新的组织方法看来是导致智利共产党队伍内部不满的第一个问题。它引起了全国领导同圣地亚哥市地方党委之间发生矛盾。后来，圣地亚哥党组织的成员把三人小组的党组织方式称之为“可能是一种搞阴谋的绝好组织，但是无助于使党具备坚强的组织，而党的坚强组织正是它作为无产阶级革命先锋队作用的基础。”^②

智利共产党圣地亚哥的地方委员会成员有M·孔特雷拉斯、E. 托雷斯、温贝托、门多萨、H. 戈多伊、M. 阿拉亚、A. 冈萨雷斯和O. 莫雷诺（他后来被D. 巴里奥斯所取代）。这个委员会很活跃，出版一个油印的公报，在市内各居民区建立党的地方机构。但是，当它设法把活动从市内扩展到周围的圣地亚哥省时，新近扩大的中央委员会阻止它这样做，理由是该地方委员会反对三人小

① 智利共产党(托)编：《保卫革命：1933年3月19日提交共产党全国代表大会审核的报告、论文和文件》（1933年），第14页。

② 同上书，第15页。

组的组织方式。

1929年1月，智利共产党圣地亚哥地方委员会改组，成员为H. 戈多伊，G. 巴尔德斯，J. 查孔和D. 卡塞雷斯。它成功地在市内各地区建立党小组，直到几个月以后伊巴涅斯政府的第三次迫害浪潮。在这一次，中央委员会的全体委员都被捕了；其中两名委员，罗萨斯和加尔达梅斯，是被另一名中央委员J. S. 萨瓦拉出卖给警察的。被捕的若干中央委员会委员，以巴斯库尼安为首，写了一封信给伊巴涅斯总统，要求释放。后来成为托洛茨基分子的人把这一请求描述为“完全没有共产党人的道德心，没有共产党人这样的先锋队革命者最基本的责任心。”^①

由于全体中委被捕，因此1929年4月20日党在圣地亚哥的领导人组成了一个新的临时中央委员会，成员包括H. 戈多伊、E. 菲格罗亚、曼努埃尔·伊达尔戈、G. 巴尔德斯和温贝托·门多萨。设立在蒙得维的亚的共产国际南美书记处改组了这个新的委员会。新委员会派代表团到智利共和国的北部和南部地区去“开始再次重建党，直到那时为止，党未能实现把党组织建成为细胞结构的形式。”^②

临时中央委员会尽管得到共产国际南美总部的承认，它同蒙得维的亚的关系却开始越来越紧张。智利共产党人要求给予财政援助以便派代表到蒙得维的亚和莫斯科去，但始终未获得同意；南美书记处坚持要同智利各城市的地方党组织保持直接联系，而不是通过在圣地亚哥的中央委员会去和它们联系，这种做法引起智共中央几次抗议。

后来，智共中央派了一名名叫索特洛的年轻同志到蒙得维的亚去向南美书记处去通报智利共产党的活动情况。索特洛虽然是

① 智利共产党(托)编：《保卫革命》(1933年)一书，第15页。

② 同上。

智共中央委派去的,他只受权作为情况通报员,可是南美书记处却授予他充分权力,派他回来召开一次中央委员会扩大会议——中央委员加上省委领导人——来决定党的未来。于是,决裂终于发生了。

与此同时,南美书记处不顾智共临时中央的反对,已经同获释出狱的巴斯库尼安等党的其他领导人进行直接接触。由于这些分歧,索特洛召集中央委员会宣布:由于临时中央已不再得到南美书记处的信任,他在南美书记处的充分授权之下接管智利共产党的全部领导。

临时中央委员会进行了反击,它不等到南美书记处下达计划中的中央委员会扩大会议的时间、地点的指示,即自行宣布召开,临时中央委员会并在中央委员会扩大会议前夕把索特洛开除出党。^①

智利共产党中央委员会扩大会议在1930年1月举行。它选举了又一个中央委员会,中央委员为:H.戈多伊、温贝托·曼多萨、H.菲格罗亚、卡洛斯·孔特雷拉斯·拉瓦尔卡、埃利亚斯·拉斐尔特、麦克洛比奥·加尔达梅斯和R·罗萨斯,候补中央委员为:曼努埃尔·伊达尔戈、路易斯·克鲁斯、M.阿拉亚、布劳略·莱昂·佩纳和路易斯·佩纳。然而,这个新的中央委员会却不能工作,因为罗萨斯、拉斐尔特和加尔达梅斯不在,孔特雷拉斯无法找到。结果,在全国代表大会的一个办公室举行了一次新的集会,由曼努埃尔·伊达尔戈、路易斯·克鲁斯和M.阿拉亚组成一个新的临时中央委员会。由于伊巴涅斯独裁政权的第四次反共迫害,这个新的安排也没有奏效。1930年8月举行了一次新的中央委员会扩大会议,结果,全体参加者都遭逮捕。

当年晚些时候,在瓦尔帕莱索的一次会议上,全国各地的党员

^① 智利共产党(托)编:《保卫革命》(1933年)一书,第16页。

选举了又一个中央委员会,成员为布劳略·莱昂·佩纳、加洛·冈萨雷斯、何塞·维加和卡洛斯·孔特雷拉斯·拉瓦尔卡。据伊达尔戈派称,共产国际南美书记处所承认的这个机构“对一系列问题,特别是有关纪律处分的问题,采取官僚主义的态度。”智共的圣地亚哥地方委员会由新中央委员会所改组,成员都是过去没有担任领导的人。^① 由于领导层的不一致,以及由于伊巴涅斯政权不时对共产党进行的迫害,到1931年7月末,智利共产党的队伍已大为削弱。伊达尔戈分子报导称,在那段时期,有“很大比例”的老党员脱离了党,党在群众中的影响已大部分丧失。^②

当第一次分裂的全国代表大会召开之时,智利共产党伊达尔戈派的总书记豪尔赫·拉文(温贝托·门多萨当时所用的假名)列举了他们同南美书记处之间发生争执的八点理由:

一、南美书记处不顾中央委员会的抗议而保持同地方党组织的经常联系。

二、南美书记处不说明任何理由地拒绝中央委员会建立一个“合法”政党的权利,这样一个党将能公开活动,虽然它是受地下共产党机构的控制的。

三、中央委员会要求书记处派两名成员来参加中央委员会并提供技术性意见,但书记处从不履行。

四、书记处指派索特罗全权处分中央委员会,因为中央委员会不听从蒙得维的亚的官僚主义命令。

五、书记处不能保持充分的联系;例如,它只是在开会前十天才通知智利召开共产国际会议。

六、南美书记处时常实际上以智利党中央委员会行事,“违背了共产国际的纲领安排”。

① 智利共产党(托)编:《保卫革命》(1933年)一书,第17页。

② 同上书,第18页。

七、检验书记处给智利党(以及智利党给书记处)的联络内容真伪的方法很混乱。

八、在伊巴涅斯独裁政权期间和其后,书记处拒绝召开智利党代表大会。^①

在这段时期里,智利党和蒙得维的亚的南美书记处的主要联系人是罗多尔福·吉奥迪,他是阿根廷共产党两名主要领导人之一。他经常往返旅行,无疑对于决定共产国际南美总部对其下属智共的政策起不少作用。^②

出现了两个共产党

随着伊巴涅斯独裁的结束,智利共产党内部的分歧成了公开的分裂,组成了两个对立的党。开始时,双方都称自己为共产党(共产国际智利支部)。

在共产国际南美书记处同意下活动了几个月的中央委员会,在伊巴涅斯倒台后不久开了会,开除了若干名反对派的领导成员。这些人中间包括曼努埃尔·伊达尔戈,以及卡洛斯·阿库尼亚、罗伯托·平托和其他一些人,他们后来成为托洛茨基主义共产党的领导人物。被党开除后监禁在马斯阿夫埃拉岛一个犯人营的某些共产党人要求恢复党籍,没有被接受。^③中央委员会也拒绝召开一次邀请两派代表参加的党代表大会,这也是反对派所要求采取的行动。^④

由于受到这些拒绝,曾经在伊巴涅斯政权时期隶属于党的这个或那个中央委员会的反对派成员们,同圣地亚哥地方委员会的成员们一起,建立了一个新的临时中央委员会,并进而以共产党的

① 智利共产党(托)编:《保卫革命》(1933年)一书,第19—21页。

② 同奥斯卡·韦斯的谈话,1947年3月17日于智利圣地亚哥。

③ 智利共产党(托)编:《保卫革命》(1933年)一书,第133—135页。

④ 同上书,第19页。

名义发表谈话。宣布成立这个新机构的声明中部分内容如下：

我们反对一伙肮脏的奸党和不可容忍的个人至上主义奉行的这种蛮横辱骂的政策。我们希望把一切受责难的同志召来，由他们自行解释；惩罚等措施的运用应符合正义的原则，这也应适用于我们无产阶级。真正的共产党员是不会规避责任的，有罪的人必将受到有力的惩罚。

尊敬的同志，你们应该知道，现在党已经在我们的手里，它能恢复它原来纯真的推动力，把改组队伍的任务掌握在自己手里以后，我们就感到自己胜任所承担的责任，并更加深刻地体验到我们的共产主义意识形态。

正在来临的时刻对于无产阶级斗争的胜利具有不可计量的价值。迫切需要我们紧密地团结起来。在我们很快要宣布的某个时刻。共产党人必须举行一次全国代表会议以明确责任并完成我们队伍的组织工作。我们将在那里汇报我们的一切活动。^①

新的中央委员会开始时有七名委员，后来扩大到十五名。化名豪尔赫·拉文的温贝托·门多萨被提名为总书记。决定圣地亚哥党组织的总书记和党代表大会的成员都经常参加中央委员会会议。中央委员会建立了各个附属机构，包括一个组织委员会、一个宣传鼓动组以及工会和政治委员会等。

新领导开展一场强大的运动来重建党组织。在普恩特阿尔托，在圣贝尔纳多以及在圣地亚哥地区的首都都成立了党的组织；还在比尼亚德尔马、基尔普埃、瓦尔帕莱索、塔尔卡瓦诺、塔尔卡、安托法加斯塔、托科皮利亚、库雷普托、科金博、帕尔乌阿诺、圣罗

^① 智利共产党(托)编：《保卫革命》(1933年)一书，第137页。

森德、圣安东尼奥、略列奥、佩尼亚弗洛尔和塔拉甘特成立了党的组织。还建立了一个共产主义青年组织。

新的党领导立即面临一个问题：对1931年9月智利海军发生的兵变采取什么态度。反对派共产党人组成了一个工人统一战线革命委员会，参加的有无政府主义者、房客联盟、“分散的劳工组织”以及马克思主义社会党；该委员会设法发动一场总罢工来支持那次造反，但是只有很少工人响应委员会的呼吁。该党设法和正统的共产党拉斐尔特派组织联合行动，但是拉斐尔特派不响应他们的倡议。尽管如此，反对派共产党人支持了拉斐尔特派在圣地亚哥中心阿拉梅达组织的一次示威，反对派中央委员会的委员们走在一路队伍的前头去参加这一示威集会。这次示威是拉斐尔特派共产党人不接受反对派的意见而组织的，示威并不成功，主要因为警察驱散了向阿拉梅达集中的各路队伍。

反对党在阿空加瓜和圣地亚哥召开的一次地区性党代表大会上的正式报告中总结反对派共产党人对海军兵变的经验如下：“海军的这一运动得出了下面的一些经验：党在最重要的生产领域（硝酸盐、铜、运输、食品业、农业）中缺乏基础，党有具体的需要来渗透到陆军、海军和警察的队伍中去。”^①

当反对派共产党人正在设法上街去组织对起义的海军战士给以支持的同时，该党领袖、参议员曼努埃尔·伊达尔戈在国会的一次讲演中设法对这一起义表示支持。然而，他未获准发言，直到9月16日，兵变被镇压下去以后才让他发言。于是他就集中抨击把伊巴涅斯独裁政权捧上台的文官和高级军官。他谴责那些要求严惩海军兵变人员的主张；他指出：在1924年9月和1925年1月推翻政府的军官们都得到了赦免，因此要求对参加1931年9月海

^① 智利共产党(托)编：《保卫革命》(1933年)一书，第45页。

军兵变的士兵和下级军官也给予同样待遇。^①

那次海军兵变发生在一次选举运动中，当时是要选举一名接替倒台的独裁者卡洛斯·伊巴涅斯的继任人。拉斐尔特派共产党人提名埃利亚斯·拉斐尔特为总统，作为他们在伊巴涅斯倒台后的早期行动之一。但是，反对派不接受这一点，当他们另行组成了一个临时中央委员会以后就提名曼努埃尔·伊达尔戈。在选举运动中，反对派共产党人发现他们支持伊达尔戈的竞选运动受到两大主要候选人胡安·埃斯特万·蒙特罗和阿图罗·亚历山德里的支持者们散布和发表的谣言的很大破坏，谣言说伊达尔戈已经退出竞选。^② 竞选运动还受到戒严令的阻碍，戒严令是在海军兵变的时候宣布的，在选举运动中继续实行。根据戒严令的规定，在伊利亚佩尔、奥巴列和穆尔钦的三份支持伊达尔戈当候选人的省报被停刊了，大量反对派共产党人被捕入狱。^③

在阿图罗·亚历山德里参加竞选以前，一些外国观察家认为伊达尔戈当选总统的可能性很大。纽约《先驱论坛报》在1931年9月6日发表一则合众社电讯称：“许多观察家认为，除非‘左派’团体队伍内发生严重分裂，伊达尔戈参议员将在选举中有很大的得胜机会。”这一电讯以相当天真的语言谈论伊达尔戈的竞选纲领如下：

他的政纲是一周前在这里的共产党代表大会上通过的，体现的原则同苏俄现在的统治路线惊人地相似。他的政纲里包括这些建议：政府管制房租；在经济萧条时期私人住房暂停收租；没收公共土地，拨给工人的土地应合伙耕作；把政府

① 曼努埃尔·伊达尔戈·普拉萨：《武装起义：1931年9月16日共产党参议员曼努埃尔·普拉萨在参议院的讲话》（1931年）。

② 智利共产党（托）编：《保卫革命》（1933年）一书，第47页。

③ 同上书，第16页。

夺取的土地退回给智利印第安人；男女享有同等的社会和法律权利；男女政府雇员享有同等薪水。

伊达尔戈参议员在一次记者访问中告诉合众社说：如果他当选，他要主张由劳工去耕作没收的土地，75%的农产品归耕作者，25%上交国家。这位共产党领导人说，每月收入低于四十五美元者应免交所得税，高收入的人应交纳更多的税。

这两个共产党之间的反感很深。共产国际支持的那一派主要集中攻击曼努埃尔·伊达尔戈。它正式抨击他说过“国家对所有社会力量的调节行动完美地反映了我们共产党的学说”，还说过他不反对“进步的”资本主义对智利的渗透。他们还硬说他说过愿作为“共和党人”死去，说他把卡洛斯·伊巴涅斯称为“首屈一指的共和党人”，并曾投票赞成智利的国内安全法，不赞成共产党反对这项法令的指示。^①

稍晚，拉斐尔特派提出了“工人阶级的叛徒伊达尔戈滚蛋！”的口号；它把伊达尔戈为首的党称为“工人阶级心脏里的资产阶级代理人”，^②并给伊达尔戈本人扣上“专门同资产阶级勾结的人和职业叛徒。”^③

伊达尔戈派对拉斐尔特派的答复，即便不是谩骂，也是同样强硬的。伊达尔戈派中央委员会在它向反对派共产党第一次代表大会的报告中，把1931年圣诞节前夕拉斐尔特派成员夺取科皮亚波和巴列纳尔兵营的一次损失惨重的尝试抨击为“冒险主义的尝试，典型的小资产阶级左派幼稚病思想”。它称那次袭击的特点是构成了“拉斐尔特派（有计划地破坏革命的一个派系）所犯一长列错误

① 智利共产党（斯大林主义派）编：《建立真正的阶级政党——1933年7月共产党全国代表会议决议》（1933年），第26页。

② 同上书，第27页。

③ 同上书，第24页。

的一部分”，是“用挑衅性行动来帮助资产阶级”，它还谴责拉斐尔特派杀害一名主要的年青反对派共产党人路易斯·洛佩斯·卡塞雷斯(中央建筑工人委员会总书记)“并威胁其他人”。^①

尽管有这样的敌视情绪，在1931年晚些时候在安托法加斯塔省和塔拉帕卡省举行的一次补缺选举中，反对派还是支持埃利亚斯·拉斐尔特竞选参议员。反对派声称他们的这一姿态有助于他们在拉斐尔特派成员中争取到同情者。^②

伊达尔戈和拉斐尔特两个共产党派系之间的斗争反映在劳工运动的各项政策上。随着伊巴涅斯的倒台，拉斐尔特派立即重建了智利劳工联合会，它曾经是伊巴涅斯独裁政权以前由共产党控制的劳工组织，埃利亚斯·拉斐尔特曾经担任它的总书记。拉斐尔特在1931年9—10月号的拉丁美洲共产党期刊《拉丁美洲工人报》上说，出席重建智利劳工联合会会议的，有来自洛塔和科罗内尔煤矿的代表，来自塔拉帕卡和安托法加斯塔的硝石产区的代表，以及来自科金博、瓦尔帕莱索、圣地亚哥、康塞普西翁的运输工人的代表，和来自若干省的农业工人的代表。

但是，反对派共产党人强烈反对重建智利劳工联合会。埃米略·洛沃斯在伊达尔戈党第一次代表大会上的“工会报告”中评论道：“拉斐尔特派毫不犹豫地利用一个所谓的工会组织来招摇撞骗，正如他们后来毫不犹豫地把分裂活动从党内转移到劳工组织方面。这些官僚势力总是更注重它自己的稳定而不是工人的总的利益。在分析恢复智利劳工联合会是否适宜以前，在组织一个完全的基层单位以前，他们认为自己能控制它的执行机构。拉斐尔特从销声匿迹的状况中恢复过来以后，在电车工人工会总部主持了一次不到一百人的会议，建立了一个指导委员会，除其他人以

① 智利共产党(托)编：《保卫革命》(1933年)一书，第51页。

② 同上书，第50页。

外,其中包括拉斐尔特派的总书记孔特雷拉斯·拉瓦尔卡。这样,他们就加强了智利劳工联合会作为党的前沿的地位,从而使它没有重建的任何可能性。”^①

尽管反对派共产党的许多成员反对重建智利劳工联合会,但却帮助重建了联合会的一些基层单位。这些成员中包括失业工人理事会总书记罗伯托·平托、建筑工人理事会总书记巴勃罗·洛佩斯以及油漆工人工会领导人埃米略·萨帕塔。

但是,拉斐尔特派无意在智利劳工联合会内部同反对派共产党人分权。1931年9月他们在瓦尔帕莱索的智利劳工联合会代表大会上表明了这一点,那次大会把曼努埃尔·伊达尔戈“开除”出该组织,尽管他并不认为隶属于该组织。不久以后,智利劳工联合会执行委员会开除了其他一些反对派共产党人,包括巴勃罗·洛佩斯、罗伯托·平托、曼努埃尔·冈萨雷斯、弗朗西斯科·马丁内斯、埃米略·萨帕塔以及伊达尔戈派的其他成员。另一方面,反对派共产党人所持的立场是:必须组成一个新的“革命”中央劳工组织,把正统派共产党、反对派共产党和无政府主义分子控制下的、没有政府的官方承认的所有工会都组合到一起。但是,他们始终没有能建立这样一个组织。

伊达尔戈派在建筑工人工会中是最强大的。1931年9月,在圣地亚哥政府建筑工程的一次罢工中,他们领导建筑工人取得了胜利;参议员曼努埃尔·伊达尔戈是罢工工人的正式代表。不久以后,他们成功地建立了一个统一建筑工人委员会,不久,不但在圣地亚哥,而且在附近的普恩特阿尔以及圣安东尼奥、塔尔卡和圣贝尔纳多有了下属机构。这个委员会出版了一个刊物,共出十四期,其中八期是非法出版的。伊达尔戈派把他们在其中有影响的一些工会带进了这个委员会,可是这些工会都不是建筑工人工

^① 智利共产党(托)编:《保卫革命》(1933年)一书,第111页。

会，它们包括圣地亚哥的市政工人和普恩特阿尔托的农业工人。^①

反对派共产党人和“社会主义共和国”

1932年6月4日，军事政变建立了“智利社会主义共和国”。这次政变是由部分军人发动的，得到伊巴涅斯独裁政权倒台以后出现的若干社会主义小党的支持，并得到前独裁者卡洛斯·伊巴涅斯支持者们的帮助。军队中推动这次政变的主要力量是智利空军的创建者马马杜克·格罗维上校；这场运动的两名最重要的文职领导人是智利共济会和社会主义组织“新政治行动会”头头欧亨尼奥·马特以及伊巴涅斯分子、前官方报纸《民族报》主编、曾经担任驻美大使的卡洛斯·达维拉。

在政变以后向智利人民发布的新政府委员会宣言书的部分内容说：“生产阶级的无产者和全体国民都受到一种容许剥削劳工，容许无节制的投机，容许气人的特权存在的经济和社会制度之苦。富豪统治和寡头统治所造成的经济越来越紊乱以及外国利益集团日益绝对的控制，政府的渎职和缺乏效能，悲惨地加重了人民的苦难和民族的痛苦。”^②

新的政府委员会在一项三十点纲领中宣布它当权以后要做的事。这些纲领包括：对富人增加课税，没收一切黄金和外币储备，让失业者在国有土地和未使用的私有土地上进行垦殖，制止房东赶走房客，由国家开发金矿，建立硝酸盐、石油、磷、烟草、酒精和糖的国营公司，建立政府对外贸的垄断，改善和扩大公共教育，以及建立公共卫生部。^③

两个共产党组织对新的社会主义共和国（其实际领导人是马

① 前引智利共产党(托)编：《保卫革命》(1933年)一书，第114—116页。

② 智利社会主义共和国格罗维政府发布的《政府委员会致全国的声明》(1932年)。

③ 智利社会主义共和国格罗维政府发布的《三十点》声明(1932年)。

马杜克·格罗维上校)的态度是很不相同的。紧接着政变以后,学生联合会接管了智利大学;伊达尔戈派的成员奥斯卡·韦斯和当时的拉斐尔特派共产党人(后来参加社会党)托马斯·查德威克成了大学资产的半正式管理人。共产国际的一名代表(罗马尼亚人),在格罗维造反的第二天到达智利并与韦斯和佩德罗·洛佩斯(又名伊达尔戈派学生领袖)会晤;他建议伊达尔戈派党员重新参加共产党并公开承认错误。伊达尔戈派拒绝了。^①

两派共产党人都参加建立了工农兵和水手革命委员会,在大学的一座建筑物里开会。但是,这两派要求革命委员会对新政权采取不同的立场。正统的拉斐尔特派共产党人要它公开宣布彻底反对格罗维政府;反对派共产党人要委员会对该政权给予有保留的支持,说它到目前为止的情况是好的,但说政府提出的想法只有存在一个强大的共产党的情况下才能贯彻。反对派共产党人也提出了一项七点纲领,其中主要的一点是要求武装无产阶级。^②

由于意见分歧,反对派分子退出了拉斐尔特派所控制的革命委员会。因此,伊达尔戈派共产党人同埃利奥多罗·多明格斯领导的马克思主义社会党一起组织了革命社会主义联盟,在全国各地成立了地方组织。该联盟宣布暂时支持格罗维政权,但继续要求武装本国工人。^③

与此同时,政府急于要把两派共产党人都赶出智利大学,因此向两派都提出可以使用圣地亚哥的其他建筑物。拉斐尔特派正巧被分配使用一个卫理公会的教会建筑,使他们在以后一段时间里得了“牧师”的绰号。^④

第一次政变以后十二天,随着格罗维的下台和卡洛斯·达维

① 同奥斯卡·韦斯的谈话,1947年3月17日于智利圣地亚哥。

② 前引智利共产党(托)编:《保卫革命》(1933年)一书,第54—57页。

③ 同上书,第57—58页。

④ 同奥斯卡·韦斯的谈话,1947年3月17日于智利圣地亚哥。

拉当了该“社会主义共和国”的主要领导人，伊达尔戈派共产党人所控制的革命社会主义联盟发动了一次革命的总罢工。罢工延续了三天，在此期间，铁路几乎完全堵塞了，许多建筑工人、工厂职员、出租汽车司机、电车和公共汽车司机、面包工人和其他工人都参加了罢工。^①

在革命的总罢工失败以后，伊达尔戈派共产党被赶入地下，但是他们继续设法参加该国的公开政治活动。伊达尔戈派在准备选举立宪议会（那是格罗维政权最初提议、达维拉政权继续筹备的立宪议会）的时候，参加了所谓的社会主义卡特尔。这是反对派共产党同两个社会主义小组的联盟，这两个小组是在伊巴涅斯政权末尾时出现的，一个叫统一社会党，一个叫社会主义秩序党。^②这个联盟的目的不但是为了在立宪议会选举中提出一个候选人名单，而且要推动“军官、文官和革命组织之间的协作。”^③

在立宪议会选举举行以前，卡洛斯·达维拉政府就被推翻了。他被推翻以后几周之内就举行了新的总统和国会选举。过去支持格罗维政府的力量都拥护格罗维当总统候选人。这些团体中有反对派共产党。它在一项公开声明中解释说：“共产党并不以任何方式为格罗维个人而斗争，它为无产阶级的统一和无产阶级的统一革命行动而斗争。不管有左倾幼稚病的同志怎么看，当前格罗维是可能的政治团结的坚强中心，它有可能转变为夺取政权的有效革命行动。”^④

与此同时，反对派共产党人提出了自己的议会候选人。但是，它能够选举的只有两个人：曼努埃尔·伊达尔戈选进参议院（同激进社会党结成联盟），埃米略·萨帕塔选进众议院（同统一社会党

① 智利共产党（托）编：《保卫革命》（1933年）一书，第61—62页。

② 同上书，第149页。

③ 同上书，第68页。

④ 同上书，第66页。

结成联盟)。①

到了1933年初,伊达尔戈党实际上已经对实现智利所有共产党人的统一团结放弃了希望。结果,它召集了一次全国代表大会来建立一个永久性的单独的党。但是,它称这次会议是共产党的一次“扩大的全国代表大会(共产党统一代表大会)。”②

反对派共产党人向托洛茨基主义发展

智利共产党队伍内部的争权斗争使两派在国际共产主义运动内寻找盟友。很自然地,得到共产国际南美书记处支持的拉斐尔特派站在多数派一边,多数派是在约瑟夫·斯大林及其在苏联共产党领导内的同事们控制之下的。同样自然地,构成智利共产主义内反对派的伊达尔戈派则同列夫·托洛茨基为首的国际左翼反对派联合起来。但是,反对彻头彻尾斯大林主义的拉斐尔特派的理由,并不是影响伊达尔戈派趋向托洛茨基主义的唯一因素。西班牙托洛茨基主义书刊(特别是西班牙托派创始人之一安德烈斯·宁的著作)的影响,有助于使他们相信托洛茨基对共产国际缺陷的分析是正确的。

到伊达尔戈领导的党召开第一次代表大会的时候,国际范围内的这种联盟关系已经清楚了。豪尔赫·诺尔特向这次代表大会提出的“报告和政治命题”指出了智利发生的情况同共产国际内部分裂之间的联系,它说:“孔德雷拉斯·拉瓦尔卡一伙官僚集团的刺耳空话只不过是错误方向以及造成革命紧张形势减退的错误国际政策的必然反映而已。”③

上述报告接受了托派对国际局势的分析:“建立在行贿舞弊和

① 智利共产党(托)编:《保卫革命》(1933年)一书,第30页。

② 同上书,第9页。

③ 同上书,第94页。

任意开除的制度之上的官僚主义从属的行动，很快从共产国际和俄国共产党的中央机关扩展到共产国际的所有支部中去。反对这些共产党的斗争最后具备了国际的特点和形式；全世界发生的共产主义内部的派系斗争，也是出于同样的原因，也具有同样的方面，这里很快就出现了两个对立的共产党集团，它们虽然在革命目标上是一致的，但在理论上是分离的——那就是共产国际及其正统派，以及国际反对派或共产主义运动左翼，它几乎在各国都有派系，并在加快发展。”^① 报告接着批评斯大林主义者的四大理论“偏差”，那就是：它所主张的“一国建成社会主义”、它把社会民主主义说成是“客观上的温和派法西斯主义”、主张用“工农政府”代替“无产阶级专政”、以及共产国际在“第三时期”中的“冒险主义”。

豪尔赫·诺尔特的分析总结了这一切同智利的关系如下：“智利共产党的分裂只是世界性分裂的一个反映，由于发生分裂的原因是雷同的，因此必然表现出同样的方面……。反对孔德雷拉斯、拉斐尔特、罗萨斯、查穆德斯的官僚势力以及反对知识分子之流的谨慎而顽强的革命斗争，是不分地区和不顾种种阻碍而得到全世界反对派支持的同样的斗争。只是由于热烈地希望团结才使党延迟采取这一立场。”^② 这一文件表示同托派坚决站在一起，最后说：“同国际共产主义反对派正式站在一起，标志着那种使党遭遇最大危险的愚蠢孤立状态的结束，标志着一种受到英勇捍卫的立场得到加强。”^③

因此，到 1933 年初，智利共产主义的伊达尔戈派已经正式决定同国际托派运动合并。结果，国际共产主义反对派得到了至少在当时是拉丁美洲最大和最重要的党。

① 智利共产党(托)编：《保卫革命》(1933年)一书，第99页。

② 同上书，第103页。

③ 同上书，第110页。

共产党左翼

反对派共产党的第一次代表大会作出了若干重要决定。首先,大会投票通过把党的名称由共产党改为共产党左翼。其次,它决定隶属于世界托派组织“国际左翼反对派”。此后若干年,它无疑是国际左翼反对派拉丁美洲组织中最有影响的一个。

智利共产党左翼同智利斯大林主义派共产党人在基本纲领和意识形态上继续存在着分歧。这些分歧最明显和最重要的是在劳工运动方面。在若干年中,托派和斯大林主义派共产党人之间在工会政策上至少有过两次大争吵;这涉及对所谓“合法”工会采取的态度问题,以及一个统一的劳工运动的重要性问题。

在伊巴涅斯将军独裁统治倒台后,“合法”工会是有组织劳工的唯一最重要的组成部分。它们是根据1924年9月份通过的法律而建立起来的,当时是在最终导致阿图罗·亚历山德里总统第一次倒台的危机期间。这些法令中有一项规定是对工会给予法律承认,规定了各个劳工团体可以享有的那种权限,并确定劳工部对工会选举和财务的某些控制权。这项法律也规定雇主不得拒绝同得到正式承认的工会进行谈判,还规定工会根据一定的程序可以举行合法的罢工。^①

1924年9月所通过的劳工法最终在伊巴涅斯独裁统治期间付诸实施。相当数量的工会要求并获得了合法的承认。到伊巴涅斯倒台的时候,共有549个合法的工会,拥有68,132名工会会员。它们构成了智利有组织劳工运动的大多数。^②

在有组织工人中间,拥有支持者的各个不同的政治团体,对

^① 关于智利劳动立法的讨论,见罗伯特·J·亚历山大:《阿根廷、巴西和智利的劳工关系》(1962年)。

^② 阿尔弗雷多·鲍恩·埃雷拉:《论工会运动和农业工会》(1934年),第78页。

“合法”工会采取了不同的态度。无政府主义者和拉斐尔特派共产党人立即抵制得到合法承认的工会组织,其论据认为,当一个工人组织获得合法承认以后,就会屈从于政府管制达到无可忍受的程度。对比来看,在伊巴涅斯独裁统治以后兴起的大多数新的社会主义党派则转向这些新组织下属的工人那里寻求对它们的主要支持。

共产党左翼采取了略微中间的立场。他们在建筑业中占主要地位的“非合法”工会内,以及根据 1924 年法律没有受权获得合法承认的市政工人等工会内,都很活跃。另一方面,他们也在取得政府合法批准的工会内开展工作。1934 年,他们帮助组成了“全国合法工会联合会”,该联合会把大部分合法工会都集合起来了。奥斯卡·韦斯和其他一些托洛茨基分子帮助撰写了全国合法工会联合会总书记路易斯·索利斯 1936 年在圣地亚哥的国际劳工组织第一次泛美会议上发表的著名讲话。^①

若干年来,斯大林主义派共产党人和共产党左翼之间在工会团结问题上也存在严重的意见分歧。我们已经说明拉斐尔特派在伊巴涅斯倒台后最初行动之一是恢复在共产党严密控制下的智利劳工联合会。我们也看到伊达尔戈派立即敦促建立一个统一的“革命”中心劳工组织,把共产党两派、社会党和无政府主义者控制的工会团体都包括进来。

共产党左翼继续支持有组织劳工运动全面团结的想法。这是他们支持全国合法工会联合会的原因所在。在那个团体内,以及在他们的影响之下的建筑工人联合委员会内,他们继续鼓吹智利所有工会的统一。建筑工人联合会是派代表出席 1936 年 12 月智利工人联合会 (CTCH) 成立大会的团体之一,这个联合会实际上集合了除了无政府主义者控制的工会以外的所有智利工会。无政府

^① 同奥斯卡·韦斯的谈话,1947 年 3 月 17 日于智利圣地亚哥。

主义者继续保有他们自己的工人总联合会 (CCT)。^①

共产党左翼在第一次代表大会以后的大约四年时间，在智利左翼力量中是一股“第三种力量”。在这段时期里，当时对十分熟悉拉丁美洲大多数马克思主义组织和党派情况的斯蒂芬·纳夫特，认为共产党左翼可能比斯大林主义派共产党“更有影响”。^②

但是，共产党左翼根本不如 1933 年初组织起来的新的社会党那么重要。智利社会党这个党派，是由伊巴涅斯独裁统治后成立的一些小党派合并建立而成的。其中有马克思主义社会党、社会主义秩序党、统一社会党、共和社会党、社会民主党、新政治行动党、智利社会党、国际社会党、劳工党和社会主义行动党。^③ 这些党派曾经在 1932 年 6 月支持格罗维政权。它们也在 1932 年 11 月拥护格罗维竞选总统，成为革命社会主义联盟的一部分。它们中大多数当社会党在马马杜克·格罗维和欧亨尼奥·马特领导下在 1933 年初成立时都和它合并了，他们两人是 1932 年 6 月“社会主义共和国”第一阶段里两名主要人物。

当社会党成立的时候，反对派共产党人对“格罗维分子”的态度是相当敌视的。虽然他们曾经在 1932 年选举中支持过格罗维当总统候选人，正如我们先前已经指出的，他们这样做，主要是由于绝大多数工人支持格罗维，如果反对派共产党人要影响工人，就必须同工人联合起来。几个月之后，共产党左翼的总书记豪尔赫·拉文在他向党的第一次代表大会（几乎与社会党成立大会同时举行）所作的政治报告中，对格罗维运动作如下估价：“目前，格罗维主义正在显露其真实面目，因此开始不成其为一个群众运动，而成

① 胡安·迪亚斯·马丁内斯：《有利于智利无产阶级行动的三十个月——1939 年 7 月 26 日至 30 日 (CTCH) 全国指导委员会致例行大会备忘录》，第 23 页。

② 斯蒂芬·纳夫特：《拉丁美洲的劳工运动》（无出版日期），第 7 页。

③ 智利共产党（托）编：《保卫革命》（1933 年）一书，第 49 页。

为加强某种政治倾向的一种简单手段。”^①

可是，对社会党人的这种敌视态度后来改变了。1935年，共产党左翼同社会党人、民主党和激进社会党一起组成了左翼集团(Bloc de Izquierda)。这个联盟证明是人民阵线组织的先驱。^②最后，在1937年，共产党左翼的大多数决定解散自己的党而作为一个集体加入智利社会党。作出这个决定无疑是有若干原因的。原因之一是共产党左翼正在失去对国际托洛茨基主义的热情，得出结论认为第四国际虚多于实。另一个原因是他们认为智利左翼容不得站在共产党人和社会党人之间的第三党，认为群众是站在这两大集团一起的。共产党左翼的成员决定：如果他们想要代表政治上的一个趋势，那么设法保持自己的组织不如在社会党内部可以干得更好。

似乎没有什么迹象表明共产党左翼参加社会党行列是所谓“法国式策略”的结果，那是指托洛茨基建议其追随者参加社会党以便在那里争取支持者，如有可能就把那些社会党接管过去。智利托派分子采取“策略”的时候，正是其他托派组织(诸如法国和美国的组织)过去采取而目前正在放弃这种想法的时候。而且，没有什么迹象表明共产党左翼人士在社会党内部继续作为一个有组织、有纪律的派别在活动，例如美国的托派就是这样做的。

社会党内的前托派分子

共产党左翼以前的成员一般都并入了社会党。他们中有些人成为该党工会机构的主要人物，而别的人则担任了该党总的领导中的重要职位。曼努埃尔·伊达尔戈自己作为社会党的提名人，1939年在佩德罗·阿吉雷·塞尔达总统的人民阵线政府期间担

^① 智利共产党(托)编：《保卫革命》(1933年)一书，第68页。

^② 雷内·莱昂·埃查伊斯：《智利各政党之历史演变》(1939年)，第188页。

任了智利驻墨西哥大使。^①

托洛茨基分子进入社会党，会使社会党和共产党之间的关系更加难处。在二十世纪三十年代和四十年代，智利共产党人象其他国家中的共产党人一样，实际上害怕托洛茨基主义，因此他们猛烈攻击他们认为托派在社会党队伍里有影响的方面。共产党主要领导人之一、后来成为该党总书记的加洛·冈萨雷斯·迪亚斯的一次讲话中的攻击是很典型的：“谈到了反对托洛茨基主义的斗争，他说有必要把受托洛茨基主义影响的左翼人士一个一个争取过去并帮助社会党人摆脱这一道德败坏的组织。他认为反对这些分子的斗争在智利太弱小了。‘托洛茨基主义已经不再是一个政治流派，现在是由一帮为国际法西斯主义效劳的特务和暗杀者所组成。’”^②

前托派分子在 1940 年发生的社会党分裂中间起重要作用。在塞萨尔·戈多伊·乌鲁蒂亚代表(他从来不是一个托洛茨基分子)的领导下，一大批人脱离了社会党，建立了工人社会党。共产党左翼前成员埃米略·萨帕塔成为这个新党的副书记。参加工人社会党的其他重要的前托洛茨基分子中，有卡洛斯·阿库尼亚和卡洛斯·魏地拉(在分裂前他们都是社会党在智利工人联合会执行委员会内的委员)和拉蒙·塞普尔维达·莱亚尔(智利工人联合会圣地亚哥分会执委会委员)。所有这三名工会工作者都在工人社会党组成以后被撤去了他们在联合会里的职务，这是由于社会党和智利工人联合会领导中的共产党成员合作的结果。^③

① 利沃里奥·胡斯托：《中间派主义、机会主义和布尔什维克主义：革命劳工组织以及在阿根廷和南美洲为争取马克思列宁主义的斗争》(1940年)，第12页。

② 加洛·冈萨雷斯·迪亚斯：《胜利的大会——智利共产党第十次全国代表大会报告、讨论与决议摘要》(1938年)，第43页。

③ 社会主义工人党：《人民的道路——圣地亚哥 1942 年 5 月 1 日至 3 日社会主义工人党第三次全国代表大会决议》(1942年)，第15页。

虽然共产党人早期攻击过工人社会党,这两个党在1941年的国会选举中同激进社会党和民主党联合提出了一张候选人名单。名单中的共产党左翼前成员包括埃米略·萨帕塔、卡洛斯·阿库尼亚和何塞·圣地亚哥。^①圣地亚哥作为革命工人党的一名领导人,最后又重新加入了托洛茨基运动。虽然不曾加入过托派的那些工人社会党领导人中的大多数人最后参加了共产党,那些前托洛茨基分子却最后都回到了社会党里。回去的那些人中有拉蒙·塞普尔维达、卡洛斯·阿库尼亚和埃米略·萨帕塔。^②到了二十世纪四十年代末期,社会党内的前托洛茨基分子都已经失去一切不同的特性了。

革命工人党

虽然共产主义左派的绝大多数领导人和成员参加了社会党,但有少数人没有参加。随着共产党左翼越来越脱离托洛茨基主义,仍然忠于国际左翼反对派的那些人就分裂出去单独成立组织了。

迟至1935年,共产党左翼圣地亚哥地区委员会与党组织决裂,并建立一个新的团体:布尔什维克列宁主义组织,它宣布忠于国际左翼反对派。两年以后,布尔什维克列宁主义组织改名为革命工人党,成为国际左翼反对派的正式下属组织。^③与此同时,宣布忠于托洛茨基主义的第二个新组织成立了。这个组织发源于社会党的青年组织社会主义青年团中的持不同政见者。^④它先取名

① 社会党(全国宣传处)编:《共产党的黑书》(1941年),第29—30页。

② 社会主义工人党:《人民的道路》(1942年)一书,第73页。

③ 同何塞·圣地亚哥和温贝托·巴伦苏埃拉的谈话,1946年12月15日于智利圣地亚哥。

④ 利沃里奥·胡斯托:《中间派主义、机会主义和布尔什维克主义》(1940年),第12页。

为国际主义工人组织,但在1940年改名为国际主义工人党。^①

这两个新的托派组织在一段时期内采取了完全不同的政策,也许它们之间互相的斗争不亚于对反托派分子的斗争。例如,在使得人民阵线当政的1938年大选中它们的分歧是明显的。革命工人党提名社会党领导人马马杜克·格罗维作为他们的总统候选人,他们支持他,因为他们认为他是一名“工人阶级”代表。另一方面,国际主义工人组织则支持人民阵线的提名人佩德罗·阿吉雷·塞尔达。尽管这两个对立的托派组织相互敌视,它们有时候却能够合作。1939年初,革命工人党和国际主义工人组织在圣地亚哥的一个小小的世界产业工人组织的会议厅里联合举行会议“以纪念那些在法西斯枪弹下捐躯的人们。”据报道有一百多名工人参加了这次集会。^②

这两个组织之间的典型论战是1939年11月一期的革命工人党期刊《工人联盟》对国际主义工人组织的攻击。革命工人党的这份机关刊物攻击“所谓国际主义工人组织的决策人,他们在分裂以前就首先动摇了,他们支持象塞尔达那样的叛徒,他们向社会党的改良主义共济会官僚势力叛卖,他们在法西斯主义的人民社会主义先锋队面前采取背叛马克思主义的投降主义立场,他们昨天还在替人民阵线腐朽的民主制充当‘左翼’奸细。”^③

这两个托派之间尽管相互敌视,但最后在1941年还是联合起来了。虽然革命工人党对纽约市的第四国际总部明显地感到十分不满,指责他同国际主义工人党站在一起,但第四国际对智利托派的统一起了关键作用。^④

① 利沃里奥·胡斯托致迭戈·恩里克的信,利沃里奥·胡斯托:《革命的战略:为争取统一和拉丁美洲的民族和社会解放而斗争》(1956年),第181页。

② 《关键》,墨西哥城,1936年6月。

③ 利沃里奥·胡斯托:《中间派主义、机会主义和布尔什维克主义》(1940年),第13页。

④ 利沃里奥·胡斯托:《革命的战略》(1956年),第182页。

有关联合的谈判是在1940年开始的，联合大会于1941年6月在圣地亚哥召开。作为兄弟代表出席会议的人们中间有代表第四国际的特伦斯·费伦以及当时同费伦发生论争的阿根廷革命工人联盟的利沃里奥·胡斯托。不论第四国际对声称隶属于它的这两个智利组织过去态度如何，费伦似乎并不反对革命工人党代表在联合大会上的优势地位：革命工人党的代表不得不承认过去某些意识形态上的错误；他们也不得不接受革命工人党作为联合组织的名字，并选举老的革命工人党总书记迭戈·恩里克斯为新的革命工人党的总书记。^①

在二十世纪四十年代，革命工人党在工会中以及总的政治舞台上很活跃。例如，在1946年，它声称以下一些工会组织里有自己的党员：市政工人工会执行委员会、若干建筑工人工会、圣贝尔纳多编组车场的铁路工人工会、贝拉比斯塔的纺织工会、以及无政府工团主义的皮革工人联合会和印刷工会。他们在工会里作为党员和党的同情者的“派别”进行活动。^②但是，智利市政工人工会主席爱德华多·伊瓦拉1947年初向本书作者说，虽然托洛茨基分子一度在他的工会内是一批有相当影响的人，但他们不再具有足够的力量来选举全国一级或地区一级的工会干部。^③

革命工人党参加了1942年和1946年的大选，该党在1946年约有三百名党员。在1942年的总统选举中，它提出了自己的候选人温贝托·巴伦苏埃拉，来同主要的候选人胡安·安东尼奥·里奥斯和卡洛斯·伊巴涅斯·德尔坎波竞选，但是他得到的选票数似乎没有被记录下来。在1945年，革命工人党提出了若干名议员候选人，一共得到大约一千张选票。托洛茨基分子都没有当选。^④

① 利沃里奥·胡斯托：《革命的战略》（1956年），第182页。

② 同何塞·圣地亚哥和温贝托·巴伦苏埃拉的谈话，1946年12月28日。

③ 同市政工会头头爱德华·伊瓦拉的谈话，1947年4月12日于圣地亚哥。

④ 同何塞·圣地亚哥和温贝托·巴伦苏埃拉的谈话，1946年12月28日。

与此同时，智利托洛茨基分子发生了进一步的分裂。1942年，革命工人党发生一次分裂，一批不满分子成立了列宁主义革命同盟。发生争论的问题似乎在组织方面多于学说方面的。^①

当这种分裂发生的时候，就成立一个“争取组成革命先锋队第四国际智利支部中央临时委员会”。这个组织出版了期刊《列宁主义公报》，它抨击革命工人党“软弱的”政策并批评把“老的党员和第四国际分子”开除出去。革命工人党的三名领导人，恩里克斯、苏亚雷斯和席尔瓦（头两名显然是革命工人党前总书记迭戈·恩里克斯和该党创始人之一伊萨梅尔·苏亚雷斯），据说在该党执委会内是“少数派”，显然是成立不满分子的组织的主要推动者。^②

另一次各托派力量的联合发生在1946年。在该年初举行的革命工人党第四次代表大会上，列宁主义工人同盟的代表参加了，联合的问题提出来了。大会提议“在革命工人党的列宁主义民主集中制的纲领和内部民主”的基础上达成联合。同盟的中央委员会同意合并，因为两个组织之间并无原则分歧，“民族解放”的问题已经在革命工人党的文件《我们的革命》中得到解决。列宁主义工人同盟表示：如果该党全体党员被吸收入新组织，如果在领导内实行比例代表制，它就同意合并。

革命工人党代表大会作出呼应称：它能接受除佩德罗·伊斯拉以外的列宁主义工人同盟全部成员，说能否接纳伊斯拉将由重新联合的革命工人党新中央委员会作出决定。革命工人党代表大会还同意：如果它的条件能被列宁主义工人同盟所接受而大会还在进行的话，列宁主义工人同盟将在新中央委员会内取得代表名额。在革命工人党代表大会结束以后，列宁主义工人同盟拒绝了这一点；它宣布对革命工人党的新中央委员会没有“政治信心”，

① 同何塞·圣地亚哥和温贝托·巴伦苏埃拉的谈话，1946年12月28日。

② 《列宁主义公报》，圣地亚哥，1943年4—5月。

但是，1946年8月举行了革命工人党第一次特别代表会议，会上提出了一个全新的中央委员会。这个会议也同意接收列宁主义工人同盟的全体成员，因此从1942年开始的分裂得到了愈合。^①

智利托派的最近历史

二十世纪五十年代初，托派又一次分裂了。托派组织之一在市政工人工会中有它主要的据点，它反对革命工人党。在1953年初举行的智利中央工会圣地亚哥地区代表大会上，在市政工人工会内的托派组织同无政府主义者和人民社会党共同提出了一份地区执委会的“第三套”候选人名单。这个集团在执委会里赢得了四个席位。革命工人党内的托派分子提出了“第二套名单”，但在地区劳工领导机构内没有赢得任何席位。^②

1957年，革命工人党号召全面改组劳工运动的结构。美国社会主义工人党机关刊物《战斗者》报1957年5月20日的一篇文章中说：“现在最重要的是改组工人运动。革命工人党号召所有工会不论是否隶属于智利中央工会，都按行业或按产业组成改组委员会和产业间委员会。这一活动应最终发展到全行业代表大会和全产业代表大会以及全体工人的一次总代表大会，由此产生一个强大的工人中心。”该文还提供了有关托洛茨基分子本身在工会内的工作的情况：“智利的托洛茨基分子正在力求在工会内建立一个左翼，它将主张最有阶级觉悟的工人团结起来以反对劳工运动中的改良主义分子和官僚主义分子。”

与此同时，革命工人党号召劳工运动在定于1958年举行的大选中提出自己的候选人，这个候选人应“来自工人运动的队伍，并

^① 奥克塔维奥·费尔南德斯档案，何塞·圣地亚哥致“第四国际拉丁美洲各支部和组织”的信，1946年10月11日。

^② 同智利工会行动总书记曼努埃尔·纳兰霍的谈话，1953年7月1日于圣地亚哥。

由工会和农会全国代表大会选出”。革命工人党的建议被劳工运动忽视了，大多数工会领导人(他们是社会党人和共产党人)支持社会主义者参议员萨尔瓦多·阿连德当候选人。

在六十年代，智利托派仍然分裂为两大组织。一个组织是革命工人党，它隶属于国际托洛茨基运动中的“反巴勃罗”派，美国的社会主义工人党是这派的主要组织；在大多数巴勃罗派分子和大多数反巴勃罗派分子重新联合以后，它成了新的“统一”国际组织的智利代表。另一个组织是革命工人党(托)，它开始时隶属于国际托洛茨基主义的巴勃罗派，后来成了阿根廷领导人J. 波萨达斯为首的第四国际“波萨达斯派”的隶属组织。

革命工人党的主要人物是路易斯·比塔勒。他出生于阿根廷，加入了智利籍，左翼的《号角》报在1969年7月3日一期中描写他的情况称：“比塔勒在智利中央工会内很活跃，他在那里同克洛塔里奥·布莱斯特一起都是全国领导人。他写的书表明他很有学识，并对历史和社会学有认真研究。”^①

革命工人党在1964年同其他三个组织联合建立了一个新的极左翼党，似乎一开始名叫人民社会党，最后成为左派革命运动。参加组成这个组织的成员有：共产主义革命运动，它是由共产党分裂出来的人们所组成的；“论战”组织，据托派方面称，它是由“因某种原因脱离有组织的托派运动的人们以及脱离共产党和社会党的人们所组成”；以及克洛塔里奥·布莱斯特的追随者，布莱斯特在智利中央工会内担任总书记达十年之久，但因共产党人认为他过于走极端而被撤掉了那个职位。^②

开始时，左派革命运动中最重要的是布莱斯特和奥斯卡·维斯。维斯在智利共产党左翼内一度是个二流人物，他同共

① 引自《洲际新闻》，纽约，1969年7月28日。

② 《国际社会主义评论》，纽约，1964年夏季。

产党左翼一起参加了社会党，在四十年代初属于工人社会党。在五十年代，他曾经是人民社会党的一个主要人物。人民社会党在1957年同其他社会主义组织联合组成了智利社会党；维斯由于同智利社会党总书记劳尔·安普埃罗意见不合而被该党开除。^①

但是，这些较老的领导人很快就丧失了对革命左派运动的控制。该党在学生运动中曾经有些影响，赢得了对康塞普西翁大学学生联合会的控制。正是这些年轻的成员控制了 this 党。虽然维斯继续认为自己是一个党员，他在1968年向本书作者承认他对该组织已经没有影响了。^②1971年，他重新加入了社会党。

路易斯·比塔勒在一段时间内继续是革命左派运动的主要领导人之一。然而，因为该党主张“暴力夺取政权的道路”及其恐怖主义活动，它时常同当局发生冲突。1964年，比塔勒被警察遣送去库勒普托，这是智利南部一个两千名居民的镇子。^③1969年，他又被警察搜捕并被正式剥夺智利国籍，这一行动引起全国报刊（包括一些比较保守的刊物）的广泛抗议。^④

革命左派运动对萨尔瓦多·阿连德总统的人民团结政府采取一种暧昧态度，该政府是在1970年9月总统选举后当政的。有一个成员组织支持新政权，它的几名成员是阿连德组织的新的总统卫队的队员；另一个成员组织对新政权持敌对态度。与此同时，托派组织在该组织内似乎没有什么明显的影响。

另一个托派组织革命工人党（托）继续独立存在着。它在有组织的劳工运动内只有次要的影响，至少这是六十年代初的情况。国际托派运动波萨达斯派的机关刊物《国际季刊》在1962年9月号一期中报导称，该党有十名成员是出席智利中央工会第三次代表

① 厄恩斯特·霍尔珀林：《智利的民族主义和共产主义》（1965年），第246页。

② 同奥斯卡·韦斯的谈话，1968年7月3日于圣地亚哥。

③ 《国际社会主义评论》，纽约，1964年夏季号。

④ 《洲际新闻》，纽约，1969年7月28日。

大会的代表。它提名雷内·佩雷斯·巴斯、阿维尔·冈萨雷斯和拉蒙·伊瓦瓦卡作为革命工人党(托)在该次会议上主要发言人;这三人都瓦奇帕托炼钢厂工会的代表。该刊物指出,在智利中央工会代表大会期间,革命工人党(托)政治局“发表并大肆散发了一项致代表的宣言书。”^①

革命工人党(托)支持阿连德政权。1971年4月号一期的党报《工人斗争》报在评论人民团结派在三月市政选举中的收获时指出,“社会党得到大量选票,说明很大一部分群众需要通过阿连德总统同意所属的党派来给予他更多的直接支持。”该文还呼吁“共产党及其中央委员会以及一般党员讨论有关在党内确定革命共产主义立场的必要性,有关在智利全力推动这一进程以朝着工人国家的方向发展,对迎战资本主义的最后挣扎作好准备,这是内战的必然过程……以加深第四国际的托洛茨基主义者同社会党和共产党同志们共同的方法、政策和革命纲领。”

1971年7月号的第一期双周刊《工人斗争》报的头版刊载的社论中,除别的内容外,号召“每个工作场所和居民区的警戒与自卫委员会起来支持革命的国家 and 人民政府,控制全国的经济、社会和政治活动。”它还号召通过社会党、共产党和革命工人党(托)的合并而成立一个“单一的群众性马克思主义党”。

结 语

在拉丁美洲,智利是托派在国家政治中成为具有一定重要性的因素的第一个国家。共产党伊达尔戈派在1933年成了共产党左翼,它在若干年内是智利左翼内的一支重要力量,但在共产党左翼的大多数成员和领导人在1937年参加了智利社会党以后,托洛茨基主义对智利政治的影响急剧下降。加入社会党队伍的托派分

^① 《第四国际》(波萨达斯派),1962年9月,第176页。

子经过几年之后就失去了托派分子的一切特征；那些选择留在社会党之外的托派分子则在劳工运动内只有较小的影响，对全国政治则实际上没有任何影响，而且经历了一系列分裂的折磨，这种分裂无助于提高他们总的威信或影响。六十年代后期，智利的托洛茨基分子还是按托派在国际上的分野而处在尖锐的分裂状态，虽然个别托派分子在极左的革命左派运动中有某些重要性，托洛茨基主义总的来说在智利政治生活中实际上已没有重大作用。

第六章 玻利维亚托洛茨基主义的创始

玻利维亚是托洛茨基派在国家政治中一度成为主要力量（虽然为时很短）的唯一拉丁美洲国家。事实上，玻利维亚和亚洲岛国锡兰是托洛茨基派在世界上取得上述重要地位的仅有的两个国家。玻利维亚的托洛茨基派至少还在其他两个方面很突出：它是独立出现的，而且是在玻利维亚共产党建立之前相当长一段时间就出现了，锡兰的第四国际派也是这样；^①另外一点，在六十年代后期，第四国际三大对立派别都有下属组织的仅有的两个拉丁美洲国家中，玻利维亚就是其中的一个。

特里斯坦·马罗夫和玻利维亚托洛茨基主义的起源

玻利维亚托派头一个举足轻重的重要人物是古斯塔沃·纳瓦罗。他年轻时在玻利维亚外交使团工作，驻在巴黎，他在那里对第一次世界大战结束以后的革命宣传表示同情。大约在那时他写了第一本书《真正的美洲大陆》，主张在拉丁美洲实行革命变革；但是作为玻利维亚外交使团的一员，他的作品不能以真名发表，所以他选择了“特里斯坦·马罗夫”的假名。

1926年，马罗夫放弃了他的外交事业而回到玻利维亚。在玻利维亚，他率先组织了一个社会党，它虽然不属于任何国际组织，却对苏联和共产国际抱有普遍同情。这个社会党受到严重的迫害，马罗夫在1928年被迫流亡。经过了玻利维亚和巴拉圭之间的查

^① 有关对锡兰托洛茨基主义的早期情况研究，见乔治·J·勒斯基：《锡兰托洛茨基主义的起源》（1968年）。

科战争,社会党未能生存下来;这场战争开始于1932年末,继续到1936年初。^①

马罗夫大部分的流亡生活是在阿根廷度过的。他在那里带头组织了一个新的革命团体图帕克·阿马鲁*组织,路易斯·佩尼亚洛萨(后来是民族主义革命运动的创始人)和阿利皮奥·巴伦西亚也都是该组织的领导人物。图帕克·阿马鲁组织并不带有任何明显的政治色彩,同阿根廷社会党和共产党都保持比较友好的关系。正是在这段时期中,马罗夫发表了可能是他最重要的著作《高原的悲剧》。^②

1934年12月,图帕克·阿马鲁组织联合另外两个流亡的玻利维亚组织,即总部在智利的玻利维亚左派以及由流亡在秘鲁的难民组成的流亡者组织,在阿根廷的科尔多瓦举行了一次代表大会。在这次大会上产生了革命工人党。^③在革命工人党初建时的主要人物中,有特里斯坦·马罗夫、何塞·阿吉雷·加因斯博格、阿利皮奥·巴伦西亚、托马斯·瓜尔基、卢西奥·门迪维尔和埃内斯托·阿亚拉·梅尔卡多。^④

在革命工人党的所有创建人中间,特里斯坦·马罗夫肯定是资格最老最为出名的,他成了这个党的主要发言人。在许多年以后,玻利维亚托派的一位后来的领导人吉列尔莫·洛拉就此发表评论说:“年轻的阿吉雷最大的错误是让特里斯坦·马罗夫当新党的领导,抱着利用他作为‘可怕的革命者’的威望的奇怪想法。”^⑤

革命工人党在成立大会上决定同以列夫·托洛茨基为首的国

① 同特里斯坦·马罗夫的谈话,1947年5月26日于拉巴斯。

* 图帕克·阿马鲁(?—1571年),印加人领袖。西班牙殖民者入侵后,他据守库斯科继续抵抗,被捕后遇害。

② 同尼古拉斯·桑托斯的谈话,1947年6月3日于拉巴斯。

③ 利沃里奥·胡斯托:《玻利维亚:受挫的革命》(1967年),第101页。

④ 同卢西奥·门迪维尔的谈话,1947年5月28日于拉巴斯。

⑤ 利沃里奥·胡斯托:《玻利维亚:受挫的革命》(1967年),第102页。

际左翼反对派站在一起。在该党创始人中间拥护托洛茨基路线的主要人物,似乎是何塞·阿吉雷·加因斯博格。据报导,大会讨论了“玻利维亚的所有问题:矿业、农业、东部地区、全国政治形势、党的组织,等等”,并且对每一个问题都提出了论文和其他文件,进行了详尽的讨论,通过了决议。^① 革命工人党内的玻利维亚托洛茨基分子同他们的一些阿根廷同志们在科尔多瓦出版了一个期刊,起名为《自由美洲》。这个刊物的主编是特里斯坦·马罗夫,创刊号在1935年6月问世。^②

随着查科战争在1936年初的结束,政府的控制权落到了戴维·托罗上校之手,他建立了一个他所谓的“社会主义共和国”。一些革命工人党流亡分子,其中包括阿吉雷·加因斯博格和阿尔塞·洛雷罗,回到了玻利维亚,同年轻的社会学家何塞·安东尼奥·阿尔塞和经济学家里卡多·安纳亚一起,组成了一个叫作玻利维亚左翼集团的组织。这个集团加入了国家社会党,那是托罗上校为了支持其政权而建立的一个党。国家社会党的领导人是托罗的副总统恩里克·巴尔迪维索以及后来成为民族主义革命运动成员的何塞·塔马约。托罗派阿尔塞·洛雷罗带了足够的经费到科恰班巴去,在克莱扎地方一块教会所拥有的地产上组织了一个农会。可是,阿吉雷·加因斯博格却被托罗政权所迫害而到智利大使馆避难,后来又流亡到智利。^③

1938年初,托罗上校被查科战争中不多的几名玻利维亚英雄之一的赫尔曼·布什上校所推翻。随着布什执政,几乎所有革命工人党的流亡领导人都回国了,其中包括特里斯坦·马罗夫。马罗夫在到达玻利维亚后不久,就去见布什总统。据报导,布什在这

① 利沃里奥·胡斯托:《玻利维亚:受挫的革命》(1967年),第102页。

② 同上书,第103页。

③ 同尼古拉斯·桑切斯的谈话,1947年6月3日于拉巴斯。

次访问时一开始说：“你知道吗，我并不怕你”，据说马罗夫对此回答说：“总统先生，我也不怕你。”从那以后，布什和马罗夫成了好朋友，马罗夫对政府有着巨大的影响。马罗夫被当时玻利维亚存在的那个小小的劳工运动几乎当作一位先知来欢迎的，在其后两年中，他和他的追随者控制了玻利维亚的主要工会组织玻利维亚工会联合会。^①

与此同时，1938年10月间，革命工人党召开了第二次代表大会，这回是在玻利维亚国土上举行的。在这次会议上，革命工人党内部，在阿吉雷·加因斯博格和特里斯坦·马罗夫领导的两派之间，发生了第一次分裂。加因斯博格的立场多少是托洛茨基主义的正统路线。他主张一个组织紧密、忠于教义的革命党。代表大会上多数人赞成这一立场，其结果是，这个党的托派性质就确定下来了，而特里斯坦·马罗夫就被革命工人党所开除。

马罗夫主张组织一个总的以社会主义为方向的广泛的群众性的党，这个党要争取合法化，并且不要正式信奉托洛茨基主义。根据马罗夫的看法，“多年的流亡生活”已经使他和他的支持者们“懂得必须组织一个强大的社会主义党，不要使自己处于极端主义的立场，而空洞地提出一种不符合落后社会的理论。”^②

玻利维亚社会主义工人党

特里斯坦·马罗夫虽然被革命工人党所开除，仍继续进行他的政治活动。1938年他作为独立人士被选进国会。两年以后，他和他的追随者建立了一个同革命工人党相对立的玻利维亚社会主义工人党。在成立那年，玻利维亚社会主义工人党成功地被选上了四名国会议员，包括马罗夫。^③

① 同埃尔南·桑切斯·费尔南德斯的谈话，1947年5月28日于拉巴斯。

② 引自利沃里奥·胡斯托：《玻利维亚：受挫的革命》（1967年），第103页。

③ 同埃尔南·桑切斯·费尔南德斯的谈话，1947年5月28日于拉巴斯。

玻利维亚社会主义工人党最强大的托派对手之一吉列尔莫·洛拉,承认该党“正处在党员为数众多、并能够取得全国性代表地位的时期。”^①马罗夫和他的追随者的实力中心之一是锡矿矿工。1939年8月,在赫尔曼·布什总统的友好执政期间,他们在奥鲁罗的一次代表大会上成功地建立了国内第一个矿工联合会。玻利维亚社会主义工人党的一位重要成员埃尔南·桑切斯·费尔南德斯,在国内最有战略意义的工人中成立这头一个组织时,是一个主要人物。在这个矿工组织建立以后几个星期,布什总统去世了,于是这个联合会就遭到破坏。^②

在1940年当选总统的恩里克·佩尼亚兰达将军的政府期间,玻利维亚社会主义工人党被指责支持这个基本上是保守的政权。这个罪名后来被特里斯坦·马罗夫一伙所否认了。例如,他们引述1934年8月16日的玻利维亚社会主义工人党的周刊《战斗》报上的一篇文章,它抨击佩尼亚兰达政府在上一年十二月屠杀卡塔比的矿工中所起的作用。该文把那次事件称为“冷酷而野蛮地残暴屠杀成百名罢工工人的一场大规模谋杀事件,它将始终成为佩尼亚兰达政府的突出政绩。”

在这一时期里,玻利维亚社会主义工人党在有组织的劳工运动里继续有一定的影响。因此,当时被亲斯大林主义的革命左派党控制的国内唯一的中心劳工组织玻利维亚工会联合会在1942年的第二次代表大会上发生了分裂。圣克鲁斯、奥鲁罗、苏克雷和拉巴斯的地区联合会退出去组成了一个对立的、由社会主义工人党控制的玻利维亚工会联合会。但是,到1943年中,这两派玻利维亚工会联合会已经在革命左派党领导下重新联合起来了,主要是因为比利亚罗埃尔政府对这两派工会联合会都抱敌视态度的缘

^① 利沃里奥·胡斯托:《玻利维亚:受挫的革命》(1967年)第104页。

^② 同埃尔南·桑切斯·费尔南德斯的谈话,1947年5月28日于拉巴斯。

故。^①

随着佩尼亚兰达被下级军官和民族主义政党民族主义革命运动的一场军事政变所推翻、和瓜尔维托·比利亚罗埃尔少校的政府建立起来,玻利维亚社会主义工人党受到了严重的迫害。《战斗》报被查封,该党党员也未能当选任何国会议员。特里斯坦·马罗夫本人据说在一次对他住所的袭击中幸免于难。^②

比利亚罗埃尔政府在1946年7月20日被一场民众起义和军事政变所推翻,玻利维亚社会主义工人党恢复了公开活动。它又开始出版《战斗》报,在1946年12月的大选中它提出了国会的候选人,《战斗》报主编卡洛斯·萨拉萨尔以及阿利皮奥·巴伦西亚·维加是它在拉巴斯地区提名的候选人。^③该党显然相信他们当选的机会该是大的,但是当革命工人党提出了对立的候选人以后,他们当选的希望就落了空。^④至少在国内一些地区,玻利维亚社会主义工人党的候选人似乎参加“无产阶级阵线”的候选人名单进行竞选,这是民族主义革命运动和革命工人党所支持的一个候选人名单。候选人之一是玻利维亚社会主义工人党波托西省的总书记卢西奥·门迪维尔,他当选该地区的参议员。但是,在大选以后,门迪维尔看来已经脱离了玻利维亚社会主义工人党而参加了革命工人党。^⑤

玻利维亚社会主义工人党的意识形态是含糊不清的。它的有些成员和领导人肯定认为自己是托洛茨基主义者。1947年1月4日一期的《战斗》报上的一篇文章表明了这一点,文章在对比“托洛茨基主义”和“斯大林主义”时完全颂扬前者。它把托洛茨基主义

① 同卡洛斯·萨拉萨尔的谈话,1947年5月29日于拉巴斯。

② 《战斗》,拉巴斯,1946年12月28日。

③ 同上。

④ 同上杂志,1947年1月18日。

⑤ 同卢西奥·门迪维尔的谈话,1947年5月28日于拉巴斯。

称为(除其他提法以外)“马克思和恩格斯的学说,它达到和1917年的俄国十月革命同一政治水平的历史完善程度。”可是,特里斯坦·马罗夫自己却争辩说,事态“已经批驳了第四国际的论点,它并没有在任何地方坚实地存在,也没有任何世界性影响。”^①至少到1947年,马罗夫并没有装作是一个托洛茨基主义者。他表示,马尔索·皮韦尔领导的法国社会党的左翼是最近似于玻利维亚社会主义工人党的外国党派。^②

在比利亚罗埃尔政府被推翻以后的年代里,马罗夫声称在1947年初曾有过两千名党员的玻利维亚社会主义工人党就不存在了,其主要原因无疑是由于特里斯坦·马罗夫接受了担任恩里克·埃尔索格总统(1947年初当选)的私人秘书的职务,而工人们普遍认为埃尔索格是传统统治寡头的出色代表。^③阿尔贝托·科尔内霍报导称:玻利维亚社会主义工人党在1949年“停止活动”。^④正如吉列尔莫·洛拉几年以后正确地报导的:玻利维亚社会主义工人党“毫无踪影地消失了。”^⑤

革命工人党的纲领和章程

与此同时,革命工人党已经成了正统托洛茨基主义在玻利维亚众所公认的代表。仅在国会开除特里斯坦·马罗夫的两个星期以后,革命工人党在科恰班巴召开了一次代表会议,通过了一份纲领、章程和一系列的“全国性命题”,这后来成为该党政治立场的基本声明。^⑥

① 《战斗》,拉巴斯,1947年2月8日。

② 同特里斯坦·马罗夫的谈话,1947年5月26日。

③ 利沃里奥·胡斯托:《玻利维亚:受挫的革命》(1967年)第137页。

④ 阿尔维托·科尔内霍:《玻利维亚政纲》(1949年),第159页。

⑤ 同上利沃里奥·胡斯托书,第104页。

⑥ 同上阿尔维托·科尔内霍书,第359页。

革命工人党纲领的开始部分描述了帝国主义“各种矛盾”的“极端激化”，继列宁之后，它也说帝国主义的性质就是“资本主义的最后阶段。”纲领宣称：“充满了内外矛盾的帝国主义必定拚死地挑起一场世界战争以重新瓜分全球，而结果也会激起世界性的无产阶级革命。”^①在资本帝国主义危机正在来临的背景下，革命工人党的纲领宣布：“玻利维亚在这一全面进程中具有并且必定会具有它的作用。”而且，“作为玻利维亚革命无产阶级党的革命工人党，必须随时准备领导无产阶级沿着最正义的道路前进，就是说沿着对那些向帝国主义叛卖的封建和资产阶级作斗争的最革命道路前进。”^②

纲领接着指出，在这个革命进程中，将会有前进和后退的时期。在前进时期人们要求革命工人党起来领导工人进行其革命的使命，其手段就是帮助组织工人委员会从资产阶级议会那里争夺权力；一旦成功以后，工人委员会就将着手建立一个“社会主义的经济组织”，这种组织的活动情况是：“只要世界革命的进展并未强使我们和协助我们进入完整的社会主义阶段，那么工人就要把国家事务，领导矿山、工厂以及从剥削阶级那里夺得的其他企业掌握在自己手中。”^③

革命工人党的纲领认为，玻利维亚的革命将带有适合于该国半殖民地地位的特殊性质。纲领中强调把这种特殊性质描述为“一种混合型的革命”，那就是说：“这种革命是民主——资产阶级革命（以农民战争和起义为特点）和无产阶级社会主义革命（以工人阶级暴动为特点）相结合的。”^④

革命工人党立场的马克思列宁主义正统性，在它坚持城市无

① 阿尔维托·科尔内霍：《玻利维亚政纲》（1949年）第365页。

② 同上书，第366页。

③ 同上书，第368页。

④ 同上书，第369页。

产阶级居首要地位这一点上可以突出地看到，但是这个国家中百分之八十的人口是印第安农民。纲领把这个思想表述为：“因此，我们认为，主要的作用落在无产阶级身上，它作为全国一般受压迫民族的领导，特别是农民群众的领导（今天农民群众被他们的地主所卑鄙地压迫和悲惨地剥削），将能贯彻民主的基本目标，而与此同时确定它的专政。”下面的话是采取这个立场的依据：“农民不是跟随工人，便是跟随帝国主义的封建资产阶级，如果我们把他们带领到正确的道路上来，他们就不得不迫于形势而跟随我们。”^①

坚持认为玻利维亚的城市无产阶级具有重要作用的想法，在纲领的后面部分又一次进行强调说：“我们推断，工、农联合党是不可能的，因为这两大集团的利益是不同的，因为如果是相同的话，就不需要我们一向谈论和仍在谈论的工农联盟了，两大集团就会干脆为同一目标而斗争。无产阶级的问题是在工业里，农奴（印第安人）的问题是在土地上。前者问题的解决，必然带来后者问题的解决；但是后者问题的解决，却并不关联到前者问题的解决的。因此，解决和帮助解决当代社会问题的唯一力量是无产阶级。”^②

革命工人党甚至也反对同民族资产阶级结成联盟的思想。纲领说：“我们不同意那种主张，说什么因为帝国主义束缚的压迫性和剥削性，所以封建资产阶级是革命的，是希望摆脱那种束缚的。封建资产阶级总是跟金融资本走的……。玻利维亚是一头奶牛，帝国主义是它的主人，本国资产阶级是挤奶员。”^③

革命工人党的托洛茨基正统性表现在它赞同“不断革命”的思想。纲领认为：“玻利维亚社会主义革命的胜利不应而且不能限于我们的国界以内，”还说：“可能在我国（或者说在本国舞台上）开始

① 阿尔维托·科尔内霍：《玻利维亚政纲》（1949年）第371页。

② 同上书，第377页。

③ 同上书，第381页。

的革命,将在世界舞台上完成,而这场革命只有在全世界实现了新的社会主义社会的胜利才能完成,因此,在国际意义上说,这将成
为一场不断的革命。”^①

革命工人党的纲领,在末尾谈到该党本身的组织时确认了列宁主义“民主集中制”的思想。这个思想被描写为意指“党具有讨论、批评、表示不满、罢免、选举的绝对条件;而同时又在行动上有铁的纪律,这是由选举产生而又可以罢免的指导机构全权领导下进行的。”^②

革命工人党的章程是在批准纲领的同一次全国代表会议上通过的,它在开始时就宣称:“革命工人党作为一个组织服从于第四国际民主集中制的基本原则(它还没有成为这个组织的一个国别分部,只有当它在组织发展和政治影响有了增加以后才有这资格)。”^③该章程勾划了“布尔什维克”型的党,那是共产国际在头三次代表大会上提出的,当时列宁还活着,斯大林分子和托洛茨基分子之间尚未发生分裂。它号召建立“支部”,作为党组织的基本单位,建立支部的主要基础不在于所属党员的居住地点,而在于他们的职业。它还号召工会中的党员组成“党组”,使革命工人党党员能在各个劳工组织内有组织地开展工作。他们规定党的全国代表大会(至少每年举行一次)是党的最高权力机关,在不召开代表大会期间由中央委员会负责活动。从中央委员会委员中选举产生一名总书记,作为“负有最大责任的革命工人党党员。”^④

因此,到1938年底,玻利维亚革命工人党已经取得了国际托洛茨基主义运动正统成员的正式资格。但是它在国内政治中仍然是一个很次要的因素。

① 阿尔维托·科尔内霍:《玻利维亚政纲》(1949年)第372—373页。

② 同上书,第382页。

③ 同上书,第383页。

④ 同上书,第383—392页。

革命工人党的早期发展

在 1938 年 12 月革命工人党代表大会以后几个星期，这个党遭受了一次严重的打击。它的主要思想家和政治领袖何塞·阿吉雷·加因斯博格在利沃里奥·胡斯托称之为“一次愚蠢的事故”中被杀。^①他死后，党的领导权落到了胡斯托称之为“总部设在科恰班巴的小资产阶级中间派领导人手中。”^②

在若干年中，革命工人党在国内政治中仍然是一个很次要的力量。玻利维亚社会主义工人党在 1938 年至 1940 年之间的影响要大得多；后来，革命左派党（自称是“独立的马克思主义”派别，但在其队伍内有着忠于斯大林主义的分子）成了全国最大和最重要的左翼党派，这主要是由于该党主要领导人何塞·安东尼奥·阿尔塞在 1940 年大选中作为候选人同政府候选人恩里克·佩尼亚兰达将军相竞争的结果。在总统选举过程中，革命左派党虽然在选举中败北，但在全国主要城市中赢得了多数。与此同时，革命工人党仍然处于非法状态，虽然它不时出版期刊《普卡拉》^③。

在这早年时期，玻利维亚革命工人党同国际托洛茨基主义运动保持某些接触，特别是通过第四国际的其他拉丁美洲党派。它同智利的革命工人党有特别密切的联系；此外，第四国际执委会委员、巴西的流亡分子马里奥·佩德罗萨曾经在玻利维亚侨居了一段时间。^④玻利维亚的托派分子也同国际托洛茨基主义运动内的一些不满分子有接触。例如奥鲁罗的马克思主义工人同盟，它自称是托派，但显然并不属于革命工人党而同利沃里奥·胡斯托有接触，它隐藏了一名阿根廷托派内的不满分子。同样地，隶属于革

① 利沃里奥·胡斯托书：《玻利维亚：受挫的革命》（1967年）第105页。

② 同上。

③ 同埃尔南·桑切斯·费尔南德斯的谈话，1947年5月28日于拉巴斯。

④ 同吉列尔莫·洛拉的谈话，1947年6月2日于拉巴斯。

命工人党的革命劳工中心（COR）写信给胡斯托，征求他关于它在1943年2月以后一些时间举行的革命工人党会议上应采取的立场。胡斯托寄了一封长信给革命工人中心，提出了建议。^①

在四十年代初，一个新人物在革命工人党的领导层显露头角。他就是来自科恰班巴地区的吉列尔莫·洛拉，他在上大学以前就同具有托派观点的人有某些接触。当他上大学的时候，他读了列夫·托洛茨基的作品，并成为托洛茨基的狂热信徒之一。与此同时，他在锡矿工人中为革命工人党进行鼓动工作，这一活动使他在1942年12月被捕，并使他被流放到喀喀湖中的一个岛上。^②

这些矿区是革命工人党能够取得某些工会影响的最早地区。那些矿工是玻利维亚主要的无产阶级，他们在赫尔曼·布什上校的政权（1937—1939年）到来以前实际上没有工会组织，后来在该政府的同意下，特里斯坦·马罗夫和他的信徒们第一次成功地建立起矿工工会。在布什死后的保守派反动时期，1939年8月所建立起来的矿工联合会不能活动了。直到1943年12月的政变（那次政变使瓜尔维托·比利亚罗埃尔少校执政）之后，它才恢复活动。

矿工联合会在比利亚罗埃尔政府时期重新建立了。1945年，民族主义革命运动成员、帕蒂尼奥矿山的一名白领雇员胡安·莱钦当选为矿工工会联合会的执行书记，^③过去，当他被比利亚罗埃尔政府任命为卡塔比的副县长时，他因拒绝接受工资“补贴”而名声大振。

① 利沃里奥·胡斯托：《革命的战略：为争取统一和拉丁美洲的民族和社会解放而斗争》（1956年），第174页。

② 同吉列尔莫·洛拉的谈话，1947年6月2日于拉巴斯。

③ 关于论述民族主义革命运动及其在矿业工会中的任务的更详尽情况，见罗伯特·J·亚历山大：《玻利维亚的民族革命》（1958年）。詹姆斯·马洛伊所著《玻利维亚未完成的革命》（1970年）一书，也论述同一问题，但我们认为该书过分强调革命工人党的作用和影响。

1946年3月，在卡塔比举行的矿工工会联合会第三次代表大会上，托洛茨基分子在吉列尔莫·洛拉领导下，在矿工工会中的作用第一次受到公众的注意。拉巴斯的保守派报纸《理智》报和科恰班巴的《时代》报都写道：“托洛茨基派在矿工代表大会上引起人们情绪激动和新发现。”^①托洛茨基分子用这样的话描写自己在第三次矿工代表大会上的作用说：“正是以吉列尔莫·洛拉为首的托洛茨基主义战士，使得民族主义革命运动在亚亚瓜的第三次矿工代表大会上遭到了最大的政治失败……一向习惯于毫无敌手的民族主义革命运动分子，认为这一次代表大会也会象以前的代表大会一样，能使他们轻易地取得胜利。他们认为通过一些蛊惑人心的讲话，矿工群众会欢迎他们的。可是情况并不如此。第三次矿工代表大会是民族主义革命运动的一次重大的失败。托派工人表达了他们革命的反对态度，争取工人群众跟随他们，通过一个革命斗争的纲领，其内容是：工资按指数提高的条款、工时按指数提高的条款、组织一个工人反资本主义团体（无产阶级联合阵线）等等，这就够了。劳工部长蒙罗伊·布克对年轻的革命工人党党员吉列尔莫·洛拉在一场辩论中失败了，洛拉被大会的工人代表们举在肩上抬起来。”^②尽管托洛茨基派作了这种热烈的描绘，他们在第三次矿工代表大会上的影响并不是那么绝对。阿尔贝托·科尔内霍说大会是在“官方控制”之下的，意思是说在民族主义革命运动控制之下。^③

在比利亚罗埃尔政权的时期内（从1943年12月直到1946年7月），革命工人党总的来说反对民族主义革命运动在矿工工会内的影响，例如，革命工人党在矿区散发的一份传单抨击“洛斯卡的

① 科尔内霍：《玻利维亚政纲》，第362页。

② 布宜诺斯艾利斯的《战斗者》，利沃里奥·胡斯托《玻利维亚：受挫的革命》一书，第122页。

③ 科尔内霍：《玻利维亚政纲》，第361页。

一切奴仆、民族主义革命运动的法西斯奴仆和革命左派党的民主奴仆。”(“洛斯卡”一词，是1952年以前惯常用来指玻利维亚经济和社会统治集团的一个术语。)革命工人党的劳工领袖们在比利亚罗埃尔政权时期遭受了一些迫害(民族主义革命运动有一段时间在该政权内有过一些部长)。例如，1945年在矿工联合会里取得正式职位的第一个革命工人党党员内尔松·卡佩利诺就曾被监禁多次。吉列尔莫·洛拉在比利亚罗埃尔时期也曾被监禁和流放多次。^①

但是，尽管革命工人党分子和民族主义革命运动分子在矿工工会内发生竞争和敌对，革命工人党分子对胡安·莱钦的态度却同它对大多数民族主义革命运动分子的态度大不相同。托洛茨基认为胡安·莱钦比大多数民族主义革命运动的工会工作者要左得多，在比利亚罗埃尔执政时期，革命工人党对民族主义革命运动的抨击只有在偶然情况下才扩大到包括莱钦在内。莱钦曾参加过查科战争，在赫尔曼·布什政府期间，他曾在退伍军人组织“退伍军人团”中很活跃，这个组织是布什政府的主要支持者之一，后来从中产生了民族主义革命运动的许多领导人。他曾一度在帕蒂尼奥矿的一个白领职位上工作，他成了该公司足球队的明星，这使他尽人皆知和受到广泛欢迎。1945年，他继另一名民族主义革命运动成员埃米略·卡瓦哈尔而担任矿工联合会的最高领导人。^②

虽然胡安·莱钦有时被他的政敌攻击说他在担任矿工工人联合会领袖的早期曾经是革命工人党党员，那是不正确的。本书作者1947年在拉巴斯同交谈过的所有托洛茨基分子都肯定认为莱钦是一个民族主义革命运动分子，虽然是比较友好的；莱钦本人告诉本书作者称他是一个民族主义革命运动分子。然而，在早些年

① 同吉列尔莫·洛拉的谈话，1947年6月2日于拉巴斯。

② 同胡安·莱钦的谈话，1947年5月28日于拉巴斯。

代,尽管存在政治分歧,托洛茨基分子——特别是那些在矿工工会内活跃分子——同胡安·莱钦之间,还是建立一种比较特殊的关系;而这种关系对于革命工人党的未来,是有很大的影响的。

革命工人党和普拉卡约声明

1946年7月20日在瓜尔维托·比利亚罗埃尔总统的政府被推翻以后,革命工人党和胡安·莱钦之间比较密切的关系产生了重要的政治影响。在那天以后,玻利维亚的政客和政党产生了尖锐的分歧,一方是民族主义革命运动及其同盟者,另一方是反对民族主义革命运动的人。自由党和社会主义共和联盟党这两个传统政党,同受斯大林主义影响的革命左派党以及它控制之下的那部分劳工运动,集合在反民族主义革命运动的阵营之内。它们在比利亚罗埃尔被推翻以后的临时政府内勾结起来;它们虽然在1947年1月的大选中相互反对,但是在恩里克·埃尔索格总统获胜后成立的政府内,他们又一次联合起来了。

革命工人党并不参加这个反民族主义革命运动集团。相反,在革命工人党和民族主义革命运动的左翼之间(因此某种程度上也就是同整个民族主义革命运动之间),通过它们在矿工联合会内以及在矿区政治活动中的“竞争性合作”,建立了一种有点不稳定的和软弱的联盟。

在比利亚罗埃尔被推翻以后不到四个月,矿工联合会于1946年11月在普拉卡约镇举行了一次特别代表大会。民族主义革命运动和革命工人党这两支重要的政治力量派代表出席了这次大会。虽然莱钦及其一伙在大会上具有足够的影响来取得对矿工联合会执委会的多数控制权,他们还是同意通过后来被称之为“普拉卡拉约声明”的文件,那是由托洛茨基派代表提出来作为矿工联合会政治哲学和政治立场的一项基本声明。

据报导,普拉卡约声明是由吉列尔莫·洛拉执笔的^①,在内容倾向上确实是一份托洛茨基主义的文件。后来,这项文件又转而为害了胡安·莱钦,成了指责他是托派分子的主要根据之一。但是,普拉卡约大会上的情况似乎是这样的:莱钦这个人当时对工会政治乱七八糟的情况知道不少,但是对革命意识形态和政治哲学的情况却知之不多,因此他默许对这方面比他内行得多的革命工人党分子来起草一份简述矿工工会联合会哲学立场的文件。

普拉卡约声明开始时说:“即使在玻利维亚,无产阶级也构成了卓越的革命社会阶级。矿工是国内无产阶级中最先进和最有战斗性的部分,他们确定了矿工工会联合会斗争的性质。”^②声明接下去描述玻利维亚是“一个落后的资本主义国家”,说它“只是世界资本主义项链上的一环。”说玻利维亚的特点是资产阶级无力“消灭大庄园并(开展)其他前资本主义的改革。”^③

普拉卡约声明提出了马克思主义信仰的一些简明解释。有一节说:“归根到底,阶级斗争是分配剩余价值的斗争。出卖自己劳动力的无产者力求以较好条件进行分配,而力求继续侵占无偿劳动的产品的生产资料所有主(资本家)则有着相反的目的,这就导致不可调和的利害关系。我们不能闭目无视这样的事实,即:我们反对老板的斗争是一场生死搏斗,因为那场斗争会危及私人财产的命运。正如我们的敌人那样,我们不能承认阶级斗争的停止。当前的历史阶段是人类耻辱的一个时期,只有当社会阶级消灭、被剥削阶级和剥削阶级都不复存在的时候,这个阶段才会过去。”^④声明以一系列口号作结束:“誓死反对资本主义!誓死反对改良主

① 同伊里内奥·皮门特尔的谈话,1954年3月14日于新泽西,新不伦瑞克。

② 科尔内霍:《玻利维亚政纲》,第314页。

③ 同上书,第314—315页。

④ 同上书,第319页。

义的阶级合作主义：通过阶级斗争的道路消灭资本主义社会！”^①

根据革命工人党纲领的思想，普拉卡约声明主张“落后国家的无产阶级必须把争取资产阶级民主主义目标的斗争同争取社会主义需要的斗争结合起来。”这样做的话，它就面对一个同帝国主义相勾结并把整个国家置于“帝国主义统治”之下的大庄园主统治集团。^②也和革命工人党的纲领那样，普拉卡约声明特别强调城市无产阶级的领导作用以及它有“必要的力量来贯彻其自身的目标和其他集团的目标”。它宣称玻利维亚工人阶级运动是“拉丁美洲工人阶级运动中最先进的运动之一。”^③

这个声明的第二节“必须实现的那种革命”，仍然采用这同样的主题。声明在这里宣称：“我们明确地指出这场革命的目标是资产阶级民主性质的，这对于领导这场革命的社会阶级来说，只是无产阶级革命中的一个插曲。玻利维亚的无产阶级革命并不意味着排除国内其他被剥削群众，而是无产阶级同农民、手工业者以及小资产阶级的其他部分的革命联盟……无产阶级专政就是这种联盟在国家意义上的具体化。无产阶级革命和无产阶级专政的口号说明了这样的事实：这种转变和这个国家的指导核心是工人阶级。”^④

普拉卡的声明排除了同“民族资产阶级”合作的任何思想，这反映出它的托派根源。这些根源也清楚地反映在这些话里：“工人一旦当权以后，就不能无限期地保持在资产阶级民主主义的限度以内，而且会发现自己日益迫切地感到必须更深入地向私有财产制度发动进攻，因此，革命就带有不断的性质。”^⑤

普拉卡约声明指出了一系列所谓的“过渡性要求”。这些包括

① 科尔内霍：《玻利维亚政纲》，第 321 页。

② 同上书，第 315—316 页。

③ 同上书，第 317 页。

④ 同上书，第 318 页。

⑤ 同上书，第 319 页。

要求“保证基本生活的工资和按指数提高工资的条款”，包括取消低价的公司商店；“每周工作四十小时，按指数增加工时的条款”；在矿区进行静坐罢工的政策；以集体合同代替个人合同；以及不受政府控制的工会活动。

声明的最后部分号召工会参加大选并组成一个工人代表的议会集团；还建议建立一个“无产阶级联合阵线”，其中包括“赞同我们基本宣言的革命分子，以及诸如铁路工人、工厂工人、印刷工人、汽车司机等无产阶级的组织。”声明还号召组成一个新的中央劳工组织来取代他们认为手工业者和改良主义分子占主导的玻利维亚工会联合会。最后，声明号召矿工和农民建立革命的联盟。^①

革命工人党和民族主义革命运动在 比利亚罗埃尔时期后的合作

在紧接比利亚罗埃尔以后的时期内，革命工人党和民族主义革命运动之间在选举和工会方面都有广泛的合作。在矿工占多数的地区，这两个党支持联合的候选人名单，其结果，在1947年1月的大选中，矿工集团当选了两名参议员和七名众议员。两名参议员是革命工人党的卢西奥·门迪维尔和民族主义革命运动的胡安·莱钦；七名众议员包括四名民族主义革命运动成员和三名革命工人党成员，其中包括吉列尔莫·洛拉。^②

这两个党的工会工作者也进行合作，企图在1947年建立一个新的中央劳工组织，作为由亲斯大林主义的左派革命党所控制的玻利维亚工会联合会的竞争者。它们建立了全国劳工中心，下属组织有矿工工会联合会和工厂工人联合会，大多数工厂工人工会都隶属于后者。全国劳工中心的成员组织中还有民族主义革命运

^① 科尔内霍：《玻利维亚政纲》，第335—340页。

^② 同胡安·莱钦的谈话，1947年5月28日。

动控制下的一批农会。^①有些原来隶属于玻利维亚工会联合会的工会据报导退出了该联合会而加入了全国劳工中心，这些包括科恰班巴和苏克雷的地方工会联合会以及拉巴斯和奥鲁罗的印刷工会。^②

在其后的年代里，民族主义革命运动和革命工人党都被埃尔索格总统和马梅尔托·乌里奥拉戈伊塔总统（在埃尔索格生病辞职时继任）的政府严重迫害。1949年初在“二十世纪”和卡塔比矿工营的一次实际造反中它们进行了合作。同样地，革命工人党似乎在民族主义革命运动在1949年末发动的一次内战中给予了支持；这场运动有一段时间成功地控制了科恰班巴、波托西、苏克雷和圣克鲁斯，但最后被军队所打败。^③

托洛茨基分子也在1950年5月间主要由民族主义革命运动领导发动的一次总罢工中起了重要的作用。埃德温·莫勒形容这次罢工是1952年4月9日革命的“预演”。革命工人党的工会工作者，包括莫勒，是一个紧急委员会里的重要分子，该委员会是由一批小工会——包括银行职员、商业和工业白领工人以及印刷业工人——成立的。正是这个紧急委员会，最后促成了包括全国大多数工会在内的、大得多的协调委员会，采取罢工行动，公开表示要推翻政府（虽然它没有做到）。^④

在“六年间”对民族主义革命运动 和革命工人党的迫害

在一般称为“六年间”的1946—1952年期间，政府当局对民族主义革命运动进行迫害，吉列尔莫·洛拉本人描绘了这种迫害所

① 同卢西奥·门迪维尔的谈话，1947年5月28日于拉巴斯。

② 利沃里奥·胡斯托：《玻利维亚：受挫的革命》，第141页。

③ 同上书，第140页。

④ 同埃德温·莫勒的谈话，1953年7月10日于拉巴斯。

造成的影响的性质，他指出：“六年间意味着民族主义革命运动的殉难史，从中出现了它的偶像和首领。当局的愚蠢和滥用职权只是有助于产生民族主义革命运动不可战胜的传奇。谁也不能否认民族主义革命运动在这段时期中的历史是极为动人的，因为它充满了难以令人相信的牺牲和许多英雄的人性品德……和预期的相反，这种以无谓的恐怖为标志的无情的迫害，是帮助民族主义革命运动——这个战败的、解体的、几乎解散的党派——成为无可怀疑的反对派领袖的基本原因之一。过分的镇压也有助于使民族主义革命运动看来象一个出色的革命党和最接近于掌权的党。”^①

革命工人党发现革命左派党是它的主要敌人，后者包罗了玻利维亚的斯大林分子，在六年间的大部分时间里它是参加政府的。在1947年10月的代表大会上，革命左派党强调必须“揭露托派和民族主义革命运动的鼓动分子，他们似乎要进行一场有利于矿工的反对雇主的斗争，实际却只是寻求一些好听的口号。”革命左派党指出，在工厂工人中间，特别是在拉巴斯，曾经出现“向托派和民族主义革命运动皈依”的现象，而且还指出“托派和民族主义革命运动分子也成功地利用了印第安人对地主制度的不满，发动起义或参加起义。”革命左派党最后辩称：“至于革命工人党，我党除了采取最不调和的敌对态度以外，不能采取其他立场”，因为革命工人党“对社会革命提供幻想的药方，从社会和历史学观点来看是不可实现的。”它的决议宣布：“革命左派党是反对托派和民族主义革命运动颠覆企图的最坚实保证。”^②

尽管受到迫害，革命工人党还是能在1951年3月召开它的第八次全国代表大会。这次大会决定在定于同年五月举行的大选中提出托派的候选人进行竞选。^③但是，在这次大选中没有总统或副

① 利沃里奥·胡斯托：《玻利维亚：受挫的革命》（1967年），第141页。

② 同上书，第139页。

③ 《战斗者》，纽约，1951年4月30日。

总统的托派候选人；革命工人党明显地支持民族主义革命运动提名的维克托·帕斯·埃斯登索罗和埃尔南·西莱斯，他们虽然没有赢得大多数却赢得了多数，从而在大选以后几天仓促地建立由乌戈·巴利维安将军领导的军政府。

革命工人党的第八次代表大会投票通过继续采取谋求建立“包括所有工人阶级组织的联合阵线”的策略。据报导，它还通过“一项强烈的决议，支持被压迫的朝鲜人民的革命斗争，”并投票支持“南斯拉夫工人反对‘华尔街和克里姆林宫’”，但是“批评了南斯拉夫政府的对外政策。”^①

革命工人党在“六年间”未能 担起左翼领导的原因

革命工人党和民族主义革命运动在六年间的联盟中，革命工人党始终是小伙伴。这个原因使玻利维亚国内外的托洛茨基分子和他们的朋友感到迷惑不解。例如，阿根廷前托洛茨基分子利沃里奥·胡斯托问道：“民族主义革命运动是怎么回来的？为什么要回来？他们取代了革命工人党的指导工作，而后者正要最后向高原工人指出一条革命的出路（这些工人原先是徒劳无益地跟随其他党派的）。”^②

我们已经指出民族主义革命运动在这些年里通过殉难而在工人和下层中等阶层中间恢复其威信的重要性。但是造成民族主义革命运动而不是革命工人党在六年后成为玻利维亚的主要群众性政党，还有若干其他因素。

在这期间成为革命工人党主要领袖而崭露头角的吉列尔莫·洛拉，把革命工人党未能在反对 1946 年以后当权的保守政权的革

① 《战斗者》，纽约，1951 年 4 月 30 日。

② 利沃里奥·胡斯托：《玻利维亚：受挫的革命》，141 页。

命斗争中起到主要作用，归因于该党无法建立一个能应运而生的组织。洛拉指出，比利亚罗埃尔时期以及紧接那段时期以后的事态使该党的发展“非常惊人而罕见”，并“使它成为一个群众性政党”。但是，这个迅速的发展“却不禁加剧并突出了我们的组织弱点。在党内，继续应用在读书会或至多在宣传界学来的一些规范。……党的目标和它的原始工作方法之间的差距扩大了。这是一种典型的发展中的痛苦。格外有利的环境使我们成为群众的领袖。……我们成为一个强有力的党，但尽管如此，我们在组织上具备了一个联谊会特性。最聪明的一些玻利维亚青年加入了革命工人党。我们有一批出色的鼓动者，其中许多人认为自己的使命还包括理论工作。但是我们过去缺少，现在还是缺少组织者。”^①洛拉更确切地指出他所认为的革命工人党这个时期中组织方面的弱点：“深入到群众中去的同时，却没有深入工厂或街道组织党的支部；他们的工作只限于宣传革命的原则。……党的最大弱点反映在它的组织发展不完全。”^②

革命工人党在民族主义革命运动和革命工人党关系上处于从属地位的另一个原因，似乎是托洛茨基分子在这段时期中自行定下担任了从属角色。纽约市不同政见的托派报纸《劳工行动》报驻玻利维亚记者胡安·雷伊是这样评论这个问题的：“在第四国际书记处的内部公报中，我们谈到了玻利维亚革命工人党得意地确认支持民族主义者庇隆主义的消息。革命工人党的老战士之一也以同样的得意态度告诉我们说，民族主义革命运动向革命工人党提供了两个部。内部公报说，革命工人党将宣布由两党（民族主义革命运动和革命工人党）组成工农政府，以上述革命工人党的纲领为基础，并得到工人委员会、农民委员会和各城市小资产阶级的革命

① 利沃里奥·胡斯托：《玻利维亚：受挫的革命》，第137页。

② 同上书，第141页。

分子的支持。”

胡安·雷伊也提出革命工人党同民族主义革命运动的关系中处于从属地位的理想依据。他写道：“这项政策是与其相应‘理论’为根据的：内部公报说，‘革命党的纲领必须通过反帝力量、反资本主义力量以及民主和民族主义的代言人来共同制定，对党纲的这种广泛认识必须实际地表现在毫无宗派主义地加入和参与能表达（即使是间接的表达）群众的愿望和感情的一切群众组织和一切群众运动。’”

玻利维亚托洛茨基分子的路线，其含义被胡安·雷伊说出来了。他指出：他们的支持阿根廷的庇隆主义者建立一个西半球的工会组织来反对拉丁美洲工人联合会（为共产党人所控制）和泛美地区工人组织（劳联和产联隶属于它）。胡安·雷伊指出，革命工人党领导人“支持庇隆主义工会大会；这是由在巴拉圭亚松森的庇隆分子所安排的，旨在争取拉丁美洲工人支持庇隆，不但反对‘美国佬帝国主义’，而且反对他的阿根廷反对派，就是阿根廷的工人反对派。……玻利维亚‘正式的托洛茨基分子’无批判地支持庇隆分子的行动，欢迎这种行动是‘拉丁美洲工人联合起来的过程’；他们断言这是突破了‘庇隆主义官僚分子的狭隘目标’，而且从根本上说是一场‘反资本主义和反斯大林主义的运动’”^①

在六年间的终了时期，决定革命工人党在它同民族主义革命运动的关系上居于次要地位的最重要因素，无疑是由于民族主义革命运动具备一个比革命工人党更适应于当时玻利维亚政治现实的纲领和历史。民族主义革命运动提出一项民族主义和基本经济和社会改革的纲领，对广大人民可以具有号召力。到六年间的末了，它终于强烈赞同剥夺三大锡矿公司，以便把作为该国大部分外汇来源的这一工业置于国家手中；这项政策不但得到矿工和其他

^① 《劳工行动》，纽约，1952年4月7日。

工会会员的支持，而且得到很大部分中等阶层的支持。它还主张实行彻底的土地改革，它至少有可能取得占全国人口大多数的无地农民的支持。

民族主义革命运动不象革命工人党，革命工人党的思想和纲领都扎根于马克思主义——列宁主义——托洛茨基主义，侧重于无产阶级的首要地位和革命工人党在城市工人阶级中的先锋作用，而民族主义革命运动则不搞一个阶级的或排他性的号召。相反，坦率地说它是一个多阶级的党，设法使城市工人、农民和很大部分中产阶层的利益结合起来。革命工人党设法取得农民和中等阶层的帮助来牢固树立起“无产阶级专政”，这首先有利于城市工人，公开目的是，不但要废除“寡头们”的私有财产，而且也要废除小农场主和小商人的私有财产；民族主义革命运动则不同，它保证建立一个能设法协调占人口绝大多数的那些成分的利益的政权。

而且，民族主义革命运动在比利亚罗埃尔总统的政府内取得的经验，已经指明了一个民族主义革命运动政权很可能采取的方向。比利亚罗埃尔政府中的民族主义革命运动成员已经采取了最初的步骤，准备建立一个印第安农民的全国性组织，设法了解和解决这个占人口多数的集团的苦难。

正如一名前革命工人党分子所评论的，由于六年间种种事件的结果，成为无产阶级领导的，“不是革命工人党而是民族主义革命运动，它由为数众多的中等阶层所哺育，并调整它的斗争口号来适应群众的迫切愿望。”^①

^① 阿利皮奥·巴伦西亚·维加：《玻利维亚政治思想的发展》（1953年），第112页。

第七章 托洛茨基主义和玻利维亚的民族革命

在1952年4月9日至11日之间，民族主义革命运动夺取了政权。武装的工人在宪兵的支持下战胜了拉巴斯陆军的抵抗。在奥鲁罗和玻多西这样的矿业城，配备了炸药的矿工以革命的名义夺得了控制权。

这场革命运动由埃尔南·西莱斯(他在1951年5月的大选中曾经是民族主义革命运动的副总统候选人)和胡安·莱钦(矿工联合会领袖)在现场领导。在革命胜利以后，为遵循民族主义革命运动所声称的它已赢得1951年大选的断言，西莱斯和莱钦宣布维克托·帕斯·埃斯登索罗*担任共和国的立宪总统。帕斯·埃斯登索罗在4月底从流亡地阿根廷回国^①。

安东尼奥·塞莱梅将军，他是宪兵的头头和新政府首脑的第一候选人，却在战斗期间到智利大使馆去避难，因为当时他以为起义失败了，因此丧失了他对运动的领导权；由于这一点，由于陆军的全面溃败，1952年4月，革命就把权力完全交到民族主义革命

* 帕斯·埃斯登索罗(1907—)早年曾担任省众议员和玻利维亚矿业银行行长等职务。1941年创立民族主义革命运动(MNR)。1941—44年在比利亚罗埃尔政府中任财政部长。1946年比利亚罗埃尔政府被推翻后，他逃到阿根廷。1952—1956年第一次任总统。1956—1959年出任驻英大使。1960—1964年第二次任总统。1964年5月第三次当选为总统，同年11月被副总统巴里恩托斯发动的政变所推翻，流亡秘鲁。1971年他领导的民族主义革命运动同社会主义长枪党联合支持班塞尔政变，推翻托雷斯政府。——译者

① 有关1952年4月革命事件的情况，见利沃里奥·胡斯托《玻利维亚：受挫的革命》(1967年)，第143—148页；以及何塞·费尔曼·贝拉尔德《维克托·帕斯·埃斯登索罗——人与革命》(1955年)第263—280页。

运动的手里。为了加强自身的地位，民族主义革命运动政府解散了现有的陆军(直到1952年4月事件以后一年多才重建起来)，并把军方的武器发给民族主义革命运动的工人和农民支持者。

在1952年4月9日以后的年代里，民族主义革命运动政府对玻利维亚的经济、社会和政治生活实行了基本的改革。它的其他成就包括对所有文盲(主要指印第安农民)给予投票权;把全国大部分农业土地分配给印第安人;把三大矿业公司收归国有;在国内东部地区发起一项重大的经济发展计划;并使一向消沉的农民群众以前所未有的程度参加政治活动。它的大部分政绩在它1964年11月份再次被迫下野时已是不可逆转的了。^①

革命工人党对1952年4月革命的态度

革命工人党从一开始就支持玻利维亚民族革命。纽约的托派报纸《战斗者》报导称：“第四国际的玻利维亚支部革命工人党发布了一项宣言，呼吁参加革命，为革命制订了一项表达全体人民愿望的纲领：国有化，增加工资等。革命工人党党员带头把街垒变成武装抵抗的中心和宣讲革命的讲坛。诚然，对群众的控制是完全由民族主义革命运动所进行的，群众都同它站在一起，但是革命工人党的政治行动为群众提出了具体的斗争目标，这就起到了进一步使这些群众激进化的作用。”^②

纽约市托派中持不同政见者的出版物《劳工行动》的南美记者胡安·雷伊报导了革命工人党分子参加1952年4月9日至11日事件的更多细节。雷伊写道：“玻利维亚革命工人党(托)支持民族主义革命运动;革命工人党党员在民族主义者领导下进行战斗，在

① 有关玻利维亚民族革命的讨论，见罗伯特·J·亚历山大《玻利维亚的民族革命》(1958年)，詹姆斯·马洛伊《玻利维亚未完成的革命》(1970年)。

② 《战斗者》，纽约，1952年4月28日。

莱钦的小组里在街头战斗，这是本记者亲自看到的。他们参加战斗是希望民族主义革命运动会在玻利维亚开始民主革命，‘然后我们(革命工人党)就来了’。”^①

革命工人党毫无疑问地设法利用这场革命来推进它自己的利益。但是，党内在有关它对民族主义革命运动新政权给予支持的性质以及这种支持应该走多远的问题上，似乎存在一些很大的分歧。吉列尔莫·洛拉曾经写道：“紧接着4月9日以后，在革命工人党内部出现了一系列错误的理论。有些人认为民族主义革命运动已经实际上取代了革命工人党作为无产阶级先锋队的地位；还有一些人暗示说，革命工人党只是民族主义革命运动的一个分支，认为它的作用就是无条件地支持；避免一切批评。……所有这些理论都是绝望和恐惧的产物。”^②

革命工人党以外的人们认识到，托洛茨基分子之间在关于应对民族主义革命运动政党采取什么立场的问题上存在着某种意见分歧。1952年8月14日胡安·莱钦同本书作者的一次谈话中指出，革命工人党在政府里没有影响，但是它在新的玻利维亚劳工中心同民族主义革命运动的工会工作者共事；他还指出，革命工人党分子总的态度似乎是和新政权合作。但是他补充说，他并不认为所有的托洛茨基分子都赞成这种合作。

不管革命工人党队伍内部可能存在什么不满，在玻利维亚民族革命的最初几个月里，革命工人党总的态度似乎同1917年3月至11月之间的俄国布尔什维克党的态度大体一样。他们对民族主义革命运动政府给以“有批评的支持”，保护它反对右翼对手，但认为自己或多或少必然要从“小资产阶级”的民族主义革命运动那里接过对革命的控制权。

① 《劳工行动》，纽约，1952年4月28日。

② 利沃里奥·胡斯托：《玻利维亚：受挫的革命》（1967年）。

吉列尔莫·洛拉在4月9日起义以后,马上表示了这种态度。当时他正在欧洲;在革命前几个月他刚从玻利维亚的监狱里逃出来。他在接受法国托派报纸《真理》的访问时,对这个运动表示支持。然后他补充说:“实际上,民族主义革命运动是一个小资产阶级党;它是建立在群众组织的基础之上的。我们根本不相信它能完成资产阶级民主革命的基本任务(摧毁大地产和实行民族解放),我们的纲领指出:这些任务是无产阶级革命现阶段的任务。现在的日常斗争容许我们同抱有一切政治倾向的所有被压迫者结成统一战线,其中就包括民族主义革命运动。我们的目的就是要把工人从小资产阶级领导下解放出来。我们认为,靠诽谤和歪曲是做不到这一点的。”^①

洛拉继续解释说:“革命工人党的主要使命是要担负一个警惕的带路人的作用,以防止工人的雄心壮志被右翼分子的空洞诺言或阴谋手段所冲淡。”在访问结束时,他说:“今天,我们远没有屈从于反民族主义革命运动的歇斯底里,那些亲帝国主义分子把民族主义革命运动称为‘法西斯分子’我们正在同群众一起前进,使4月9日的运动成为走向工农政府胜利的序幕。”^②

1952年8月,铁路工人社会保险基金会前经理人、当时是革命工人党一名领导人的豪尔赫·萨拉萨尔,在拉巴斯向本书作者谈话中也提出了同样的论点。他认为,革命的“正常和自然的”演化应当是革命工人党迅速发展并和民族主义革命运动的左翼分子联合起来把革命转变成一场“无产阶级”革命。^③

在4月9日起义后不久,革命工人党发表了一份十一点的“被剥削者纲领”,它阐述了当时对革命的立场。该纲领提出下列

① 《战斗者》(纽约,1952年5月12日)转载。

② 同上(纽约,1952年5月19日)转载。

③ 同豪尔赫·萨拉萨尔的谈话,1952年8月13日于拉巴斯。

各点：

1，防止把4月9日革命扼杀在资产阶级和官僚主义的体制范围内。

2，加强工人阶级，巩固玻利维亚劳工中心。

3，在土地收归国有和无偿没收大庄园领地的口号下动员农民，使革命进程取得最终胜利。

4，为被剥削者争得民主保证。在工会民主范围内发展工会。革命政党有宣传的自由。废除“罗斯卡”反革命分子的一切特权。

5，以武装工人民兵取代正规军。

6，改善工人生活和劳动条件。实行按指数提高的基本生活工资。签订集体合同。

7，矿山和铁路无偿地收归国有，并实行工人管制。

8，驱逐帝国主义。废除一切使国家屈服于帝国主义的国际条约。取消同联合国签订的技术援助协定。

9，对于因工会活动而被捕下狱的所有工人和农民，普遍给以大赦。

10，由工人控制玻利维亚国营石油公司和圣何塞矿。

11，加强革命工人党，作为革命胜利的必然条件。^①

在革命工人党报纸的最初几期里，有一期刊登了这个“被剥削者纲领”，还有一篇题为“什么革命？”的社论。社论的最后一段强调革命工人党对于我们所强调过的民族革命的态度：“起了发动群众作用的那些事件表明，他们的民主不能局限在资产阶级民主的范围内——实现这种民主，现在既没有时间，也没有物质的可能性——它将以无产阶级专政的形式出现，得到农民和城市小资

^① 《工人斗争》，拉巴斯，1952年6月12日。

产阶级中最受剥削的那部分人的支持。”^①

托洛茨基分子倾向于把新的中央劳工组织——即在革命胜利后几天就建立的玻利维亚劳工中心——看成是相等于俄国革命中的苏维埃。吉列尔莫·洛拉在几年后的文章中对这一点说得很清楚：“玻利维亚劳工中心的诞生，表明无产阶级通过日常活动正走向国家控制……我们不能把工会的传统概念应用于玻利维亚劳工中心。在革命的第一阶段，由于形势所迫，它突破了纯工会考虑的框框，并匆忙地进入了政治领域……在革命的最初一些月里，玻利维亚劳工中心有武装力量，那就是工、农、民兵。”^②

托洛茨基分子把玻利维亚劳工中心同 1917 年俄国的苏维埃等同起来的看法，在 1952 年 8 月 5 日一期的党报《工人斗争》报上说明了。它谈到打算在玻利维亚劳工中心主持下举行“玻利维亚工人和农民的第一次全国代表大会”。《工人斗争》评论说：“我们向工人说：警惕呀！要把你们的革命从那些答应剥夺剥削者的人们手中夺过来！全国劳工代表大会是引导你们避免破坏你们利益的大道。工人议会，或称劳动者全体代表大会，是会象工农政府一样成为现实的，只要三百万工人、农民、士兵以及被剥削的小资产阶级阶层决心结束那个剥削和痛苦的社会。”^③

革命工人党分子就这样把自己描绘成起着布尔什维克的作用，把维克托·帕斯·埃斯登索罗比作克伦斯基，他们设法以此鼓动在民族主义革命运动内部和政府内部的分裂。吉列尔莫·洛拉在他同《真理报》的谈话中强调了这些分裂。他评论说，革命工人党“支持新内阁的左翼”，还说“帕斯·埃斯登索罗政府被它的反动一翼所统治着，表现出在无产阶级和帝国主义之间活动的‘波拿巴

① 《工人斗争》，拉巴斯，1952 年 6 月 1 日。

② 前引利沃里奥·胡斯托一书，第 151—152 页。

③ 《战斗者》，纽约，1952 年 10 月 20 日。

主义’的全部特征。从新总统的种种宣言中毫无疑问地可看出，他决心把自己装扮成唯一能控制群众的人物，以便向美国佬投降并争取他们的信任。我们不能排除这种可能性，即：面对日益尖锐的反对右翼的群众斗争，右翼势力将会同帝国主义结盟以便摧毁所谓的‘共产主义’危险。”^①

1952年6月12日一期的革命工人党报纸《工人斗争》上的一篇文章，也典型地反映出希望从民族主义革命运动内部的分歧中得利的想法，那篇文章的题目叫《宫廷的奴隶》，它评论说：“政府内部存在着一些（不同的）倾向；而且营垒分明：由莱钦、布特隆和查维斯代表的左派；以帕斯·埃斯登索罗等一些人为特征的中派；以及到现在为止指导政府行动的以格瓦拉、西莱斯、巴雷内切亚等人为首的右派。任何人，至少内阁的全体成员了解这一点，是不足为奇的。”

试图鼓动和利用胜利的民族主义革命运动内部的不满，无疑是革命开始几个月中革命工人党所犯的策略错误之一。托洛茨基主义领导人是他们自己教条思想的奴隶，认为左、中、右一定存在，认为左派一定会在短期内同集合在革命工人党内的“真正”革命者联合起来，他们大大低估了民族主义革命运动左翼领导人（包括莱钦、赫尔曼·布特隆和前托洛茨基分子努夫洛·查维斯）对民族主义革命运动的忠诚。虽然在民族主义革命运动领导内部的确存在着意见分歧（几年之内这些分歧就激烈地公开化了），但在革命的最初几个月，所有派别，其中包括民族主义革命运动左翼领导人，都急于缩小这些分歧；左翼分子肯定不愿意让他们同其他民族主义革命运动分子的分歧被一个敌对党派革命工人党所利用。1952年4月起义的几个月之内，其结果却是在革命工人党而不是在民族主义革命运动内部导致了分裂。

^① 《战斗者》，纽约，1952年5月19日。

革命工人党和劳工运动

革命工人党分子由于自己在革命最初几个月里在劳工运动内所起的作用，似乎认为他们最终将会从民族主义革命运动那里把玻利维亚民族革命“继承”过来，这种想法似乎有一定实在的意义。他们经过4月9日至11日的事件以后，在工会内的影响比过去大得多了。

革命工人党声称已控制了拉巴斯的工厂工人组织“工厂工人工会”。革命以后，一名党员当了这个组织的主席，虽然不久以后他被革命工人党开除了，托洛茨基分子在一段时期里继续控制工厂工人工会的若干下属机构。它也控制白领工人的工会“私人雇员联合会”，并且在若干重要的矿工地方工会里继续具有相当大的影响。最后，4月9日以后很快在科恰班巴组织起来的新的地区性农民联合会里，革命工人党有很大的权力。^①该党还成功地控制了科恰班巴各省劳工联合会，这个联合会曾经隶属于玻利维亚工会联合会(CSTB)，被亲斯大林派的革命左派党所控制，而当时很快地把它隶属关系从玻利维亚工会联合会转换到新的玻利维亚劳工中心。^②

托洛茨基分子在革命胜利后立即建立起来的新的中央劳工组织“玻利维亚劳工中心”(COB)中也起着很重要的作用。私人雇员联合会的一名领导人、当时革命工人党内主要的工会人物埃德温·莫列尔当选为革命工人党第一届执行委员会委员。与此同时，1951年以前一直是革命工人党成员的何塞·塞加达当选为玻利维亚劳工中心负责记录工作的书记兼该工会报《起义》的主编。1952年5月1日的该报创刊号特别向吉列尔莫·洛拉表示敬意，

① 同埃德温·摩勒的谈话，1953年7月10日于拉巴斯。

② 同贝尔纳斯·比利亚雷亚尔的谈话，1952年8月14日于拉巴斯。

赞扬他为“表现我们意志的真正英雄。”^①

但是，玻利维亚劳工中心中托洛茨基派的影响远远超出它在该工会执委会中的少数代表地位。革命工人党在最初几个月之取得影响，主要是由于选举该组织代表的特殊方式。玻利维亚劳工中心每周举行一次会议，甚至更多些。结果，玻利维亚劳工中心下属的省级组织事实上不可能从自己会员中经常派出代表去参加这些会议。因此，玻利维亚劳工中心就采用一种办法，使下属的省级组织可以从居住在拉巴斯的人们中间选出常任代表来参加玻利维亚劳工中心。

在革命以后的最初几个月里，革命工人党成功地使得许多省级团体挑选革命工人党分子充任它们驻玻利维亚劳工中心的常任代表。托洛茨基分子就是这样在中央劳工组织里取得大大超过其会员比例或在本国工会中的实际影响的代表名额。胡安·雷伊在1952年10月27日《工人行动》上报导称，玻利维亚劳工中心内部“最大的派系是革命工人党；其次是莱钦和托雷斯的集团，那就是工会中的民族主义派；第三位是斯大林主义者，他们只有五票。”

玻利维亚劳工中心的主要领导人们都关注其他一些活动而没有什么时间专注于玻利维亚劳工中心，这就使得托洛茨基分子在玻利维亚劳工中心内的地位更加重要了。该组织的主要官员是执行书记胡安·莱钦、总书记赫尔曼·布特隆和公共关系书记马里奥·托雷斯，他们都是民族主义革命运动成员。但是，在4月11日以后，胡安·莱钦当了采矿与石油部长，赫尔曼·布特隆是劳工部长，马里奥·托雷斯是矿工联合会的实际领导人。

由于这种局面，玻利维亚劳工中心的头六个月实际上是掌握在托洛茨基分子手中。这一事实是特别严重的，因为在帕斯·埃斯登索罗第一届政府期间，革命政府是正式的“两党”政权，这个政

^① 《起义》，拉巴斯，1952年5月1日。

权承认有组织劳工运动有权提名三名代表，同民族主义革命运动正式挑选的其他代表一起参加政府。在革命的最初几个月里，这些部长们是：胡安·莱钦、赫尔曼·布特隆和农民事务部长努夫洛·查维斯。至少，在理论上，他们三人虽然都属于民族主义革命运动，但都是对玻利维亚劳工中心负责的，而且只要该工会提出要求，他们就要被迫退出内阁。

在革命开始几个月里，托洛茨基分子有好几次利用他们对玻利维亚劳工中心的控制，使它同政府和民族主义革命运动多少处于公开冲突的状况。他们曾经要玻利维亚劳工中心记录在案：要求内阁中的部长们辞职，结果，“帕斯·埃斯登索罗政府就庄严地许诺把矿山收归国有，而玻利维亚劳工中心也就授权劳工‘部长们’留在内阁内。”

还有一次，玻利维亚劳工中心机关刊《起义》报发表了一个文件，题为“玻利维亚工人阶级的意识形态立场”，那肯定是受到革命工人党的思想影响，而不是受到民族主义革命运动的思想影响。例如：“玻利维亚革命必须具有一种联合革命的性质——在当前目标上是资产阶级民主性质的，在不断发展的结果上是社会主义性质的。要分开革命的这两个阶段是很不可能的；这就意味着掌握权力的工人不能停留在资产阶级民主的限度以内，而是应当更深刻地打击财产私有制，转而采取社会主义的方法，这样就使革命具有不断的性质。”

这个文件的发表激起了一批民族主义革命运动领导人发表一则“反共宣言”，而帕斯·埃斯登索罗宣布：除了民族主义革命运动的政治委员会，不得以民族主义革命运动的名义发表任何政治声明，该政治委员会的成员是帕斯·埃斯登索罗、埃尔南·西莱斯以及胡利奥·阿尔瓦雷斯·普拉塔。与此同时，胡安·莱钦宣布：《起义》报上发表的声明“只是一份私人的草稿，而不是最后的纲

领，那份最后的纲领将在一月间的工人代表大会上通过。”胡安·雷伊报导说，“因此，政府同劳工中心之间的冲突，这一回就平伏下去了。”^①

玻利维亚劳工中心内的这种异常局面，最后在1952年10月间造成了一场政府危机，并使民族主义革命运动和革命工人党之间摊牌。当时，帕斯·埃斯登索罗政府快要发布命令把帕蒂尼奥、阿拉马约和霍赫希尔德三大锡矿公司的财产收归国有，规定（以含糊而肯定的语言）各公司最终将能得到对损失的赔偿。这同托派所要求的无偿没收矿山的主张完全背道而驰。

革命工人党分子利用他们对玻利维亚劳工中心的控制，以玻利维亚劳工中心的名义，就矿业问题发表了一封《致维克托·帕斯·埃斯登索罗总统的公开信》。这封信的结果——胡安·雷伊把这封信形容为“号召无偿地国有化和工人实行控制和管理”——是劳工中心为此组织了一次会议，有大量民族主义分子参加（他们一般不参加这类会议），他们在会上取消并谴责对国有化的立场……然后他们组成了一个新的委员会来草拟一份新的致总统的公开信，民族主义者占多数。雷伊总结这一事件说：“政府在莱钦的帮助下，在玻利维亚劳工中心使革命工人党派遭受挫折。”^②

革命工人党在玻利维亚劳工中心内失败的程度，在几个星期后表现出来了，当时，革命工人党派提出了一项动议，指示劳工部长们再一次向内阁辞职。据胡安·雷伊称：“莱钦、布特隆和查维斯（农民部长）已经巩固了对他们政策的支持，以对付革命工人党的攻击，他们在革命左派党的斯大林主义者和共产党的支持下已经获得了23比4的多数票同意他们参加政府。”^③

① 《劳工行动》，纽约，1952年10月27日。

② 同上刊物，1952年11月3日。

③ 同上刊物，1952年12月22日。

当时的情况是：民族主义革命运动的工会工作者不再把玻利维亚劳工中心视为当然。莱钦、布特隆和查维斯开始参加它所有的会议。他们还说服各地区劳工组织（一般都在民族主义革命运动的控制之下）提名参加玻利维亚劳工中心的新代表。特别敦促它们把政府各部的官员们提名为代表；到1953年年中，这些省级代表中有六名“主要官员”（政府各部的二等官员）。1953年7月，主要的托派工会工作者埃德温·莫列尔声称经常出席玻利维亚劳工中心的代表中有50%是各派的政府官员；^①银行工人工会领导人、民族主义革命运动成员吉列尔莫·林比阿斯·比列加斯在1953年7月11日的一次访问记中较少地估计为25%至28%。

托派工会工作者虽然不再控制玻利维亚劳工中心，但还继续参加它的讨论。本书作者在1953年7月9日参加了这一时期中玻利维亚劳工中心的一次或多或少典型的会议。由胡安·莱钦主持的这次会上讨论的主题是即将公布的土改条令，参加会议的有劳工部长赫尔曼·布特隆和农民事务部长努夫洛·查维斯。

第一个发言的是乌戈·洛佩斯·阿维拉博士；他是玻利维亚劳工中心在土改委员会的代表，成立该委员会是为了草拟一项土地分配法令。阿维拉描述了该法令的基本特点，接着的讨论是完全按党派界线进行的。努夫洛·查维斯提出了民族主义革命运动的立场，它一般地支持拟议中的土地改革。接着是共产党的代表何塞·佩雷拉宣读一份由共产党领导人塞尔希奥·阿尔马拉斯签署的文件；后来努夫洛·查维斯说它听来像是1950年的中国土改法，同玻利维亚农村的实际情况没有什么关联。然后是埃德温·莫列尔提出了革命工人党的草案。它要求无偿地没收土地。（政府打算用公债偿还，但是由于玻利维亚的通货膨胀已经非常严重，这种偿付几乎同无偿并无二致。）莫列尔也要求农民自行占地，并自

^① 同埃德温·摩勒的谈话，1953年7月10日于拉巴斯。

行决定如何分配土地。他强调说,根据法律,土地应收归国有,赋与农民以土地使用权,但不得有地产权。莫列尔强调在土改过程中利用现有印第安居民的重要性,他还主张重新分配的计划不应被视为资本主义长期演化过程中的一个步骤,而是走向“更高形式的经济组织”的一步。

这三种观点都在会上得到某些支持,但是会议的控制权显然掌握在主要席位上的三名民族主义革命运动政府部长的手里。努夫罗·查维斯对共产党和托派提出的立法草案的批评是特别尖锐的,谈到共产党的文件时极尽讽刺挖苦之能事。

托派在失去对玻利维亚劳工中心控制权的一年多以后,他们在各个地方劳工组织和产业劳工组织中的影响下降了。他们在科恰班巴地区的劳工和农民运动中的巨大影响已大部丧失。革命工人党在革命最初一些月里曾经在玻利维亚劳工中心的省级下属组织的代表中占到三分之一到二分之一,可是到1954年它只有十分之一了。农民特别因政府的土改纲领而大量地被争取到民族主义革命运动一边来。^①托派在拉巴斯地区的工会中也失利。工厂工人总联合会领导人赫尔曼·布特隆在1953年7月11日告本书作者称:革命工人党分子在拉巴斯工厂工人的工会中已经一个也控制不了,而一年以前他们的影响曾经是很大的。

然而,革命工人党分子继续在矿区有一定实力。胡安·莱钦在1957年7月30日的一次访问中告诉本书作者称,革命工人党当时在矿工联合会的执委会中只有一名成员;但是埃德温·莫列尔(当时已退出革命工人党而参加了民族主义革命运动,他在该运动内是莱钦的重要左右手)认为矿工联合会执委会的10名成员有5名是托洛茨基分子,主要是革命工人党的冈萨雷斯·莫斯科

^① 同奥斯卡·巴里恩托斯的谈话,1954年7月26日于科恰班巴。

索派。^①对于这两种说法，我们无法核实其准确性，但两者都说明革命工人在矿工中的影响根本没有因托派同民族主义革命运动之间日益发展的敌视或因1957年以来革命工人党队伍内部的分裂而受到完全破坏。

革命工人党对革命政府日益加深的敌视

由于丧失了玻利维亚劳工中心的控制，革命工人党对帕斯·埃斯登索罗政府的批评变得强烈了。1952年11月中，《工人斗争》对劳工部长参加内阁的用处提出了问题：“革命不可能从内阁职位中得到推动力，政府是为了重建政治平衡而宽宏地给我们这些内阁职位的，可是后来就把所有那些谦恭地为他们服务的人们丝毫不加考虑地赶走了。”同一期还攻击政府本身：“政府选择的道路引向资本家阶级的加强，引向全国向美帝国主义投降。我们的道路，无产阶级的道路，我们党的道路，引向我们拉丁美洲殖民地被剥削、被压迫人民的革命和反帝政治觉悟的提高，因而有效地帮助了革命的深入、扩大和普及。”^②

革命工人党继续把玻利维亚劳工中心描写为同政府分担控制权的可能的“双重政权”，就像1917年3月至11月间苏维埃在俄国起的那种作用。1953年1月那期的《工人斗争》指出：“政权的各个成分正象胎儿似地在腹中蠕动，而且由革命工人党的一派有意识地表现出来。这些倾向的发展将深刻地改变玻利维亚劳工中心的结构，并把它变成一个具有行政属性的工人议会。”然而，革命工人党不再认为玻利维亚劳工中心发展成一种双重政权的过程，或多或少地是会自动实现的。首先，这要求“工人组织完全独立于政府机构之外”，其次，《工人斗争》主张“玻利维亚劳工中心的未来，

① 同埃德温·摩勒的谈话，1957年7月20日于拉巴斯。

② 《战斗者》，纽约，1953年1月5日。

决定于它自身的加强,把自己改变为一种无产阶级政权,并遵循革命工人党所指出的道路。”^①

托洛茨基分子强烈地批评帕斯·埃斯登索罗政府愿意同美国谈判美国从收归国有的矿山购买锡的问题。1953年2月份一期的《工人斗争》声称玻利维亚政府“过高估计了帝国主义大国”,说:事实上总的世界形势“对帝国主义造成了一种不利的力量对比。”它认为“锡是一种各国都需要的战略原料,无论如何都要购买。”托洛茨基分子认为如果美国不买玻利维亚的锡,玻利维亚就能把它“推销到自由的世界市场上去卖给出价最高的买主,不论是中国人、英国人、俄国人或日本人。”《工人斗争》认为工人们“应当要求打破帝国主义的包围,这种包围堵塞了东、西欧之间以及同毛泽东的中国、同苏联之间的贸易关系;堵塞了拉丁美洲各国之间的充分交流。”^②

同政府的关系越来越困难了。革命工人党后来在1953年声称政府在设法查禁托派报纸《工人斗争》的出版。但是它还是在出刊;据纽约《新战斗》报称;1953年12月20日一期的《工人斗争》“强烈批评了埃斯登索罗政权背叛玻利维亚革命,向美国国务院屈膝,并使法西斯式的势力有可能在玻利维亚发展力量。”^③

托洛茨基分子还声称他们的党员被民族主义革命运动政府不公正地拘捕。何塞·博内蒂在1954年初这样写道:“革命工人党(托)的一名党员、卫生工作者恩里克斯已经在狱中关了几个月了。波托西的一名农民领袖、革命工人党党员丘拉在两个月以前被捕入狱。塔拉科地区的四十名农民,由于同成千成万其他人一起占领了政府决定让与一个美国使团的土地而军队无法赶走他

① 《战斗者》,纽约,1953年3月2日。

② 同上刊物,1953年2月9日。

③ 同上刊物,1954年1月4日。

们,因而被捕入狱。革命工人党的五名党员、亚亚瓜地方的矿工被拘留并解押到拉巴斯。”^①

托派在玻利维亚劳工中心几乎完全败给民族主义革命运动的事实,在玻利维亚劳工中心第一次全国代表大会上表现了出来,代表大会在1954年10月30日至11月16日在拉巴斯举行,大会由胡安·莱钦主持,出席代表310人;维克托·帕斯·埃斯登索罗在开幕日发了言。^②胡安·雷伊用下列语言形容这个第一次劳工代表大会说:“虽然大会受到共产党和革命工人党的攻击,但莱钦核心小组把代表大会组织和准备得使反对派完全被排除在外,民族主义革命运动控制了讨论和所有的决议。因此代表大会表现了民族主义者控制政权和工人运动的稳定性。”^③

革命工人党之丧失影响,反映在1956年大选中该党成果不佳,这是民族主义革命运动政权下举行的第一次大选。民族主义革命运动的总统和副总统候选人赫尔南·西莱斯和努夫罗·查维斯得到786,729票;玻利维亚社会主义长枪党得到130,494票;共产党和革命左派党支持的候选人伊尼格斯和拉腊得到12,273票。而托派候选人乌戈·冈萨雷斯·莫斯科索和F·布拉沃只得2,239票。^④

然而,第四国际巴勃罗派的领导人不承认革命工人党得到的选票数,是托派的失败。第四国际拉美书记处发表的一个小册子报导称:“这些选票来自全国重要的工农中心,它是一支巨大的力量,并且是通过玻利维亚劳工中心推进革命的任务的一个坚实基础,

① 何塞·博内蒂:《支持玻利维亚革命的号召书》,载《马克思主义评论》,1954年5月。

② 国际劳工局期刊《工业与劳工》(日内瓦,1955年5月15日),刊载关于玻利维亚劳工中心大会的报告。

③ 《劳工行动》,纽约,1955年1月10日。

④ 利沃里奥·胡斯托:《玻利维亚:受挫的革命》(1967年),第233页。

那里有大量的群众。”^①

革命工人党的分裂

革命工人党在劳工运动中影响的下降以及革命工人党同民族主义革命运动及政府之间摩擦的不断增加，对于革命工人党的两次严重的分裂起了重要的作用，这使得托派主要地丧失了它在全国政治中作为一支重要的力量。第四国际内部的派系活动也对革命工人党内部的分裂起了作用。

最初出现于革命工人党内部的两个竞争的集团，一个以吉列尔莫·洛拉和埃德温·莫列尔领导的该党主要的工会工作者为中心，另一个以乌戈·冈萨雷斯·莫斯科索为中心。洛拉—莫列尔集团赞成同胡安·莱钦和民族主义革命运动的其他工会工作者合作。他们觉得革命工人党的长期任务是在全国工人中进行政治教育，而不是在不久的将来取得政权。到1954年，他们觉得革命工人党没有取得政权的任何明显机会，认为在当时的国际环境下，一个革命工人党政府不可能维持政权几天之久。

革命工人党的冈萨雷斯·莫斯科索派对玻利维亚民族革命采取一种强硬得多的路线。他们主张同民族主义革命运动或其派系切断任何政治关系，并设法把1952年4月开始的革命尽快推进到建立无产阶级专政，那就是革命工人党的专政。

第四国际内部的问题，对于玻利维亚革命工人党的内部斗争有影响。当洛拉—莫列尔和冈萨雷斯这两派之间的矛盾变得明显的时候，革命工人党内部已经存在一个同美国社会主义工人党联合起来反对第四国际书记米歇尔·巴勃罗路线、而主张打进共产党的集团。在各派系最初联合时，冈萨雷斯·莫斯科索集团和亲社会主义工人党分子共同反对洛拉—莫列尔领导。但是，这个联

^① 利沃里奥·胡斯托：《玻利维亚：受挫的革命》（1967年），第234页。

盟很快就瓦解了。

洛拉—莫列尔派开始对米歇尔·巴勃罗在第四国际内的领导持批评态度。他们指责巴勃罗设法迫使革命工人党同帕斯·埃斯登索罗政府尖锐对立，他们反对同国际上的斯大林主义进行任何妥协。然而，洛拉—莫列尔派并不完全同社会主义工人党联合，他们感到社会主义工人党对不发达国家的问题注意不够。吉列尔莫·洛拉出席了第四国际的巴黎代表大会，大会认可了国际托派队伍内部的分裂。与此同时，革命工人党内的亲社会主义工人党派同洛拉—莫列尔集团合并了。^①

革命工人党的内部斗争在1954年11月公开化了。当时，仍然使用革命工人党名义的吉列尔莫·洛拉创办了他自己的党报《群众》，同《工人斗争》报作竞争，《工人斗争》报的控制权已经掌握在乌戈·冈萨雷斯·莫斯科索的手里。^②然而，似乎一直到1956年5月以后才正式分裂成两个党(都叫革命工人党)。^③

在1956年8月18日一期的《群众》(吉列尔莫·洛拉主编；副标题是革命工人党机关刊，该党中央委员会出版)上；洛拉派提出了它对冈萨雷斯·莫斯科索派(在革命工人党中央委员会内占多数席位)一些不满意的根据。这个刊物说：“按照我们的民主集中制概念，我们承担起捍卫我们国际与民族运动最纯洁的传统。在这个问题上，‘多数派’是走了修正主义道路……我们得出结论：政治局的篡权分子已经并正在采取行动，公然破坏第四国际和革命工人党的基本组织准则。我们可以对他们违反这些准则提出控诉；但这不是一个孤立的纪律问题，而是一种思想和行动体系，旨在借助斯大林主义的方法来扼杀党。”^④

① 同埃德温·摩勒的谈话，1954年7月30日于拉巴斯。

② 利沃里奥·胡斯托：《玻利维亚：受挫的革命》(1967年)，第227页。

③ 同上书，第229页。

④ 《群众》，拉巴斯，1956年8月18日。

1956年10月号一期的《群众》讨论了革命工人党分裂的根源和发展。它说：“派系斗争开始于分析玻利维亚革命性质的问题上，开始于群众觉悟演变的问题上，开始于应对玻利维亚唯一的群众性政党民族主义革命运动采取何种态度的问题上。在有关这些革命政治中心问题发生分歧的基础上，对党的结构提出了两种标准。在斗争过程中，出现了所谓的‘国际主义无产阶级派’，它采用这个名称，以强调其无条件服从于斯大林主义关于党的概念并使用典型的斯大林主义方法。‘列宁主义工人派’（使用列宁主义的名称，是为了反对当时被认为是多数派中的斯大林主义分支）捍卫列宁主义关于党的概念，它成为革命工人党的托洛茨基传统的捍卫者。”^①

这篇文章接下去指出列宁主义工人派是以革命工人党第十次代表会议（1953年6月在拉巴斯举行）所批准的政治论题为中心而形成起来的，它开始受到党的领导的攻击，这样做是根据第四国际拉美局的指示。这一论题认为革命正在经过“一个暂时低沉的阶段”，那是由于“工会运动的官僚化、它的战斗性的削弱以及党在组织上的腐败。”文件认为：“当前的任务不是夺取政权，而是要争取工人阶级和农民的大多数支持革命工人党的立场。我们一再重申，走向工农政府是没有其他道路的。”

洛拉派的刊物说对立派“看来要设法修改第十次代表会议所赞同的政治立场，他们攻击这种立场是悲观主义的和投降性的。”洛拉派指责其对手说过：“群众已积蓄起全部进攻的力量，正在迅速地走向掌权。其结果，工农政府的口号必须转变为宣传鼓动，因为这个口号将立即得到贯彻。民族主义革命运动……已经不是一个群众性政党，它正在迅速地放弃小资产阶级的领导。”

洛拉派认为这种分析是错误的，认为革命工人党的首要任务

^① 利沃里奥·胡斯托：《玻利维亚：受挫的革命》（1967年），第227—228页。

是“从组织上和思想上加强党。”它说，革命工人党可以转变为一个群众性政党的时期正在展开，如果群众将要掌权，这是很重要的；中心问题是使群众从民族主义革命运动分子的控制下摆脱出来。

相反，冈萨雷斯派却认为革命工人党没有时间成为一个群众性的党，因为群众已经在前进，不论有没有革命工人党的领导，群众都会控制国家。他们认为革命工人党的主要任务是“有效地组织民族主义革命运动中的左翼”以实现夺取政权。

第四国际的米歇尔·巴勃罗派接受冈萨雷斯·莫斯科索派作为它在玻利维亚的下属组织。第四国际书记处在给洛拉派的一封信中说：“你们的态度，是基于一种不利于我们的运动在玻利维亚开展的思想，幸而今天革命工人党已经把它克服了。你们不再代表玻利维亚的托洛茨基派了。”^①这一立场同第四国际巴勃罗派第四次代表大会（1954年6月在意大利举行）的政治决议中的一段话是一致的。决议中这一部分的主要撰写人是M·阿罗和J·波萨达斯，决议中说：“民族主义革命运动政府顺从帝国主义和本国反动派压力而出现的右翼甚至反动倾向，使得革命工人党比以前更有必要明白地谴责这一点，它必须排除对这个政府及其‘劳工代理人’的任何同情。”它敦促革命工人党支持选出一个立宪议会的想法，在这种选举中，玻利维亚劳工中心将提出自己的候选人。^②

长远来看，对革命工人党来说，比这种分裂更为严重的是：革命工人党的一些主要的工会人士，以埃德温·莫列尔为首，放弃了托洛茨基主义。1954年，他们退出了革命工人党，参加了民族主义革命运动，他们成为胡安·莱钦领导下的民族主义革命运动左翼的正式成员。在1956年大选中，莫列尔是民族主义革命运动的众议员候选人，并且获胜，他被任命为玻利维亚劳工中心组织书记兼该

^① 利沃里奥·胡斯托：《玻利维亚：受挫的革命》（1967年），第229页。

^② 同上书，第230页。

工会报纸《起义》报主编。^①《起义》在莫列尔主编之下对1956年6月17日的普选评论说：“今天群众将行使他们的一切权力投民族主义革命运动的票，投红色候选人的票，投我们国旗上第一种颜色的票，这种颜色代表着被压迫者在反帝反封建艰苦道路上的牺牲和流血。”^②作为《起义》报的主编，莫列尔接受大体和他走同样道路的其他国家托洛茨基分子的稿件。因此，豪尔赫·阿维拉多·拉莫斯和恩里克·里维拉（以胡安·拉蒙·佩尼亚洛萨的假名写作）曾在玻利维亚劳工中心报纸上发表过若干篇文章，这两个阿根廷托洛茨基分子都是转而支持庇隆的。^③

在1957年，已经很清楚地看到前托洛茨基分子将在民族主义革命运动内莱钦所领导的一派里起重要作用。帕斯·埃斯登索罗的继任者埃尔南·西莱斯政府实行了一项稳定物价的激进纲领，它在劳工运动中引起了很大的反对，反对力量是由胡安·莱钦领导的，虽然他原先曾赞同过稳定物价的做法。^④当莱钦要玻利维亚劳工中心号召举行一场反对西莱斯纲领的总罢工时，这就导致了莱钦的势力同总统之间的一场摊牌。西莱斯通过各工会领导人向基层工人发出呼吁，从而能够挫败这场罢工。一旦当总罢工的威胁消失以后，西莱斯总统和他在民族主义革命运动和工会内的支持者对莱钦派（特别是其中的前托洛茨基分子）采取了一些报复措施。因此，埃德温·莫列尔暂时被民族主义革命运动所开除并被迫辞去他在工厂工人总联合会中的领导职位。^⑤

政府、民族主义革命运动和劳工运动内部1957年危机的一个

① 同埃德温·摩勒的谈话，1956年8月22日于拉巴斯。

② 利沃里奥·胡斯托：《玻利维亚：受挫的革命》（1967年），第238页。

③ 同上书，第239页。

④ 关于西莱斯政府稳定化工作的详尽讨论，见乔治·埃德：《拉丁美洲的通货膨胀与发展：玻利维亚通货膨胀与稳定化的实例史》（1968年）。

⑤ 同埃德温·摩勒的谈话，1957年7月20日；同赫纳德·利纳雷斯的谈话，1957年7月23日。

有意思的方面是，有组织劳工内部那些在 1952 年 4 月起义以前曾经隶属于亲斯大林主义的革命左派党的民族主义革命运动分子都站在西莱斯总统一边，而那些在 1954 年以前曾经是托洛茨基分子的民族主义革命运动的工会工作者们则坚定地和胡安·莱钦站在一起。因此，亲斯大林主义分子和托洛茨基分子之间旧有的敌意继续着，虽然两派都已放弃了原来各自隶属的组织而成为民族主义革命运动的成员。

虽然有人企图撤除莱钦及其同伴们在玻利维亚劳工中心和矿工联合会中的领导职务，这种努力显然没有得到西莱斯总统的全力支持。其结果，莱钦分子继续是劳工运动中的统治力量，其中，埃德温·莫列尔继续是玻利维亚劳工中心的一名重要人物。在 1960 年时，他是农民事务部合作司的司长。^① 三年以后，当胡安·莱钦由于民族主义革命运动拒绝提名他为它的总统候选人而同该运动决裂以后，莫列尔加入了莱钦的新党——民族主义左派革命党(PRIN)。^{*}

分裂以后的两个革命工人党

1957 年中，革命工人党分裂成两个不同的党，一个党由吉列尔莫·洛拉领导，另一个党由乌戈·冈萨雷斯·莫斯科索领导，这个局面已经很清楚。冈萨雷斯·莫斯科索派在 1957 年初举行了它所谓的革命工人党第四次代表会议，冈萨雷斯·莫斯科索当选为总书记，会议通过了一项政治决议、一封“致玻利维亚劳工中心第二次代表大会的公开信”以及一份“致玻利维亚群众的宣言”

^① 同马里奥·蒙特内格罗的谈话，1960 年 5 月 28 日于首都华盛顿。

^{*} 在 1964 年 1 月举行的民族主义革命运动第九次代表大会上，埃斯登索罗为使自己再次担任总统候选人，操纵党内多数派将胡安·莱钦等十名左派领袖开除出党。1964 年 3 月，民族主义革命运动的左派召开第一次全国代表大会，决定同民族主义革命运动决裂并另组民族主义左派革命党，莱钦被选为党的领袖。——译者

书”。^①至于洛拉派，它建立了一所领导人学校，在1957年1月至7月间集合上课，其目的据说是“培养能争取新成员并有效地加以训练的中级领导人。”^②

革命工人党的这两派在玻利维亚劳工中心第二次代表大会上都采取强烈的反民族主义革命运动的立场，这次大会提出了在1957年7月1日举行反西莱斯总罢工的号召。冈萨雷斯派提出了一个由费尔南多·布拉沃起草的题为《无产阶级保卫玻利维亚革命的任务与纲领》的文件，以及由该党下属的矿工代表赫苏斯·穆里埃尔起草的《关于经济稳定和发展的工人计划》。正如《工人斗争》报导的，“托洛茨基派的主张提出了结束联合政府（民族主义革命运动和玻利维亚劳工中心）的必要性，这不是为了放弃它已经赢得的职位，而是为了推进革命，把玻利维亚劳工中心从依附于资产阶级政府的地位下解放出来，并为玻利维亚劳工中心当权、为建立工农政府而斗争。”^③

洛拉派同样反对西莱斯政府。它宣称民族主义革命运动的“民族解放纲领已经被西莱斯总统扔进废纸篓。”洛拉派托洛茨基分子说，解决这种状况是容易的：“民族主义革命运动必须下野。”他们还说：“民族主义革命运动之所以继续当权，只是因为没有人敢把它推下来。……这个立场认为革命工人党应设法当权。那么工人、农民作为一个阶级将担任政府的领导，而不是那些挂着‘工人’招牌的、占据着各部的冒险家和叛徒们”。^④对莱钦的明显攻击是难以想象的。

玻利维亚的托洛茨基分子们继续分成两个激烈对立的党，在1963年以前，两个党都叫革命工人党，当冈萨雷斯·莫斯科索派

① 《工人斗争》，拉巴斯，1957年7月25日。

② 《群众》，拉巴斯，1957年8月。

③ 《工人斗争》，拉巴斯，1957年7月25日。

④ 《群众》，拉巴斯，1957年8月。

分裂时，它的不满分子采用了革命工人党(托)的名字。玻利维亚托洛茨基主义的这种进一步分裂主要因第四国际政治变动而加速了。

当第四国际的米歇尔·巴勃罗派决定同那些和美国社会主义工人党有联系的托洛茨基组织合并时，曾经同巴勃罗派第四国际站在一起的革命工人党冈萨雷斯·莫斯科索派的一部分拒绝参加合并。相反，它参加了阿根廷托洛茨基分子 J. 波萨达斯所领导的分离主义势力，它成立了自己的第四国际，主要以巴勃罗派国际的拉美局为基础。

革命工人党内的波萨达斯分子在矿业城瓦努尼举行了一次它所谓的第十八次党代表会议。会议着手开除“劳耶·冈萨雷斯先生及其同伙和奴仆古斯曼和桑切斯。”它向波萨达斯派的国际书记处致意，“向古巴群众、古巴的革命工人党、向第四国际的一切支部、特别是向秘鲁同志们”致意。它也向波萨达斯致意，“支持他在第四国际的政治组织中的活动，并在投降派对他进行的攻击面前对他表示声援。”

革命工人党(托)强烈地支持波萨达斯的思想。因此，会议接受“第四国际的政策，其思想根据是认为帝国主义正在准备反革命的原子战争，认为战争是不可避免的，认为其结果不是人类的毁灭而是立即爆发革命和共产主义的胜利。”波萨达斯派的革命工人党(托)在它的第一次代表会议上预见到最近的将来在玻利维亚发生一场马克思—列宁—托洛茨基主义的革命的可能性，它说：“民族主义革命运动的官僚机构限制了双重政权一些机制的活动，但不能摧毁它们或者把群众挡回去。这些机制继续充满活力和革命精神。在矿工和农民、贫苦的小资产阶级开始进行斗争的阶段，那种机制存在着真正活动的条件，也存在着对双重政权实行工人阶级解决的条件。”为此目的，“第四国际在玻利维亚的党分析了插手

当前的群众动员的策略,并准备无限期的总罢工,其发展结果就是争取工人权力的斗争和争取工农政府的斗争。”^①

六十年代末,举行了一次不成功的设法把玻利维亚托洛茨基主义的两大最重要派系(吉列尔莫·洛拉和乌戈·冈萨雷斯·莫斯科索所领导的革命工人党的两派)统一起来的尝试。1966年2月17日,两党之间签署了一项协议,它规定要成立一个“统一、集中的领导机构,包括一个中央委员会和一个政治局;全国书记处将由吉列尔莫·洛拉同志和乌戈·冈萨雷斯·莫斯科索同志组成。”它还规定,冈萨雷斯·莫斯科索派的前机关刊《工人斗争》将继续出版,作为“对宣传教育和理论方向的评述”,吉列尔莫·洛拉的报纸《群众》将作为联合党的“政治性期刊”出版。联合党决心“以一切可能的手段来对军人委员会作斗争,”军人委员会是在1964年11月从民族主义革命运动那里夺的权。* 关于两个革命工人党联合的宣言,由乌戈·冈萨雷斯·莫斯科索代表他的一派、由费莱蒙·埃斯科瓦尔代表吉列尔莫·洛拉为首的革命工人党,进行签署。^②

联合的革命工人党的领袖们对于党在全国政治中可以起的作用,表示了很大的乐观。冈萨雷斯·莫斯科索在大选前不久被采访,那次大选在1967年初选出雷内·巴里恩托斯担任共和国的总统,莫斯科索评述说:“资产阶级和改良主义的党已经陷入历史性和纲领性的危机,而原理已被现实所证实的革命工人党则即将使自己成为玻利维亚群众最后的选择。”

冈萨雷斯对于胡安·莱钦再次当选为矿工联合会头头,提出批评,那是在采访以前不久矿工联合会的一次代表大会上选出来

^① 《第四国际》(波萨达斯派),1963年10月,第87—88页。

* 1964年5月埃斯登索罗第三次出任总统,同年11月副总统巴里恩托斯发动军事政变上台,从而结束了民族主义革命运动连续十二年的执政局面。——译者

^② 《第四国际》(统一书记处),1966年8月,第158—160页。

的。他解释说，矿工联合会的那次代表大会不具有代表性，并说，“官僚统治就这样取代了群众的意愿。”^①不共戴天达十年之久的这两派的联合，持续时间是注定不很长的。格里·费里在1964年12月15日的美国社会主义工人党期刊《洲际新闻》上的文章中，用下面的话解释革命工人党队伍发生的新的分裂：“在1966年12月17日，玻利维亚托洛茨基主义运动的两大派别联合起来了。著名的议会人士吉列尔莫·洛拉虽然不在国内也赞成这一联合。但是，当他回国的时候他拒绝在联合组织里工作。他组织了一个个人的团体，后来起名为它从中分裂的那个组织的同样名称。”我们可以看到，洛拉和冈萨雷斯·莫斯科索这两派在观点和前途方面继续存在基本的分歧。洛拉派开始同国际上托洛茨基主义的希利派站在一起，成为拉丁美洲唯一这样做的一个组织。

吉列尔莫·洛拉的革命工人党

洛拉派在玻利维亚政治中采取独立的立场。虽然，在1962年国会选举的时候成立了一个反对派圆桌会议，以便对民族主义革命运动政府提出一个联合阵线，革命工人党内没有一个派系看来在这方面给予了合作。^②革命工人党的洛拉派继续在矿区具有一些影响，但是它在1965年7月20日受到一次沉重的打击，当时革命工人党领导人洛拉的弟弟、该党在矿区的主要人物塞萨尔·洛拉在波托西省被军方逮捕并当场被杀。^③

洛拉派显然未同游击运动进行合作，这一运动在1966和1967年期间是世界闻名的，当时埃内斯托·格瓦拉正在领导这一运动，但是即使在格瓦拉死后它还是规模不大。早在1963年，据引述，

① 《第四国际》(统一书记处)，1967年4月。

② 同马里奥·蒙特内格罗的谈话，1962年4月7日于拉巴斯。

③ 《洲际新闻》，纽约，1969年12月15日。

洛拉把玻利维亚的任何游击队活动都称为“冒险性的造反”。他还说：“违背人民意志、寻求一些显然不符合大多数人利益的目标的游击队员，是没有可能成功地开展活动、巩固自己和生存下来的。”他认为游击战必须从属于“革命阶级的政治战略”，认为它并非“如某些最时髦的马克思主义者所设想的那样”是群众战争的唯一战略。^①1967年年中，卡斯特罗政权所赞成的游击中心主义理论的鼓吹者雷吉斯·德布雷同格瓦拉游击队生活了一段时间以后在设法离开玻利维亚的时候被捕了；洛拉派革命工人党称他为“冒险分子”。洛拉认为政治核心比军事核心更为重要。^②

1969年，洛拉派革命工人党强烈谴责第四国际统一书记处（美国的社会主义工人党同它有关系）所开展的为被捕游击队员作辩护的募款运动。吉列尔莫·洛拉发表一封致第四国际希利派法国下属组织的机关刊物《工人新闻》的信，其中谴责这个运动是“充满骗局的活动”。然后他继续进行指责，据社会主义工人党的《洲际新闻》的译文称：“今天存在着严重的猜疑：冈萨雷斯·莫斯科索本人是靠玻利维亚政府给钱来进行活动的。”^③

英国希利派社会主义劳工联盟的机关刊物《工人报》在1970年1月17日的一期中声称：洛拉对冈萨雷斯·莫斯科索的指责被美国杂志所误译了，说他真正所说的是冈萨雷斯·莫斯科索“愿意代表玻利维亚政府进行工作，”还说洛拉“已说明他愿意出席任何工人阶级的法庭来证明他的指控。”

洛拉派革命工人党的另一名领袖阿尔贝托·萨恩斯也指责统一书记处的运动是一个“骗局”。在1969年11月8日的一则新闻稿中，他谴责冈萨雷斯·莫斯科索派的一些革命工人党分子曾经

① 《季度报告》，波恩，1969年9月，第321页。

② 同上。

③ 《洲际新闻》，纽约，1969年12月15日。

被游击队组织指控为“内务部的告密者和密友。”

吉列尔莫·洛拉后来在《工人新闻》上发表一项声明说，“我完全支持我党为了揭露那些把革命活动变成满足个人私欲的交易的冒险家们而撰写的公报。”^①因此，洛拉派在国际上就同国际托洛茨基主义的希利派相合作，虽然不清楚它是否曾经正式隶属于希利派。

洛拉被冈萨雷斯·莫斯科索派及其国际同伴所强烈谴责，正如1970年4月13日的《洲际新闻》中所说的：“至于洛拉这个分裂出来的小团体，多年来它一直是一个挑衅闹事的工具，正如过去那样，它专门以丑化游击力量为能事。在7月间开始的镇压中，这个资产阶级的胆小鬼就专门花时间写谴责游击力量的小通讯供报纸发表，还做报告嘲笑民族解放军(ELN)战士们英勇、勇敢的行为。实际上，这个黄色的前革命分子的所作所为是为了讨好反革命势力。他声称是‘评价’游击运动，却总是设法在群众面前丑化它。他当前的立场同过去一样，在政治上是黄色的、怯懦的、只是工团主义和经济主义的行动主义。他继续在制造抽象的‘群众性起义’，在时间上推至含糊的遥远未来。……对这位前马克思主义者、前国际主义者和前托洛茨基主义者来说，条件是永远不具备的。作为一个小资产阶级的胆小鬼，洛拉是被革命吓怕了，而且他更加害怕游击力量发出的枪炮声。”

洛拉的党宣布它并不支持阿尔弗雷多·奥凡多将军的政府（那是在1969年一次军事政变中上台的），但它显然比其他托派对政府更加抱同情态度。阿尔贝托·萨恩斯以革命工人党的名义发表了一项公报，其中他说革命工人党“并没有、也不会去支持当前的军政府。”它也谴责某些身份不明的“左翼民族主义者”对政府的支持是一种“简单的机会主义”。然而，萨恩斯的公报说当时的难

^① 《洲际新闻》1970年3月2日。

题在于“把我们的力量用于完善小资产阶级民主，”并且说有必要“成为政府的左翼，以走向实现无产阶级为首的社会主义革命。”^①在奥凡多自称所谓的左翼民族主义政府夺权以后不久，《群众》报这样来说明革命工人党对于该政权的态度：“谈论当前政府的局限之处，说明它被指责为半途而废和向帝国主义投降，这就等于教育群众不要对它抱有信心，这成为当前最重要的任务之一。”^②

关于吉列尔莫·洛拉的革命工人党对它自己在玻利维亚和拉丁美洲的作用的看法，在1970年1月28日—2月4日一期的《工人新闻》上一篇题为《拉丁美洲：无产阶级占领政治舞台》的文章中有进一步的说明。文章评论说，“革命工人党自命为重新集合寻求新方针的拉美战斗力量的中心，首先一定是由于参与了玻利维亚当前政治危机的过程。”洛拉的革命工人党仍然把它的大部分注意力集中于锡矿矿工。该党在他们中间继续具有一些影响力，这可以从洛拉本人在1970年晚期举行的矿工联合会代表大会上突出地坐在前排这件事情上看出来。^③

在奥凡多政权期间，洛拉派的革命工人党继续举行定期的党组织会议。因此，1970年1月28日一期的《群众》报报导称，1月18日曾经举行过一次拉巴斯地区党的干部全体会议。会议批准了党的政治路线，并且对奥凡多政府对它的攻击进行了反击，称那个政权为“帝国主义和本国老寡头势力的代理人。”^④

洛拉派的革命工人党在胡安·何塞·托雷斯将军的短暂政权期间（1970年11月至1971年8月）仍然很活跃。在“人民议会”中有它的成员，这个议会是由胡安·莱钦、一些劳工团体和各个激

① 《存在》，拉巴斯，1970年2月16日。

② 引自《十月》，拉巴斯，1970年2月16日。

③ 美国人类学家琼·纳什的讲话，1971年3月31日于新泽西，新不伦瑞克，拉特格斯大学。

④ 《工人新闻》，巴黎，1970年3月4日—11日一期的报导。

进政党作为“苏维埃”的雏形组织起来的。在那个议会中，革命工人党分子对托雷斯政权表示了“批判性的支持”，要求它武装工人，以便使工人能保卫自己，反对那些阴谋推翻托雷斯的人。

洛拉本人阐述他的党在托雷斯时期的立场：“极左派和巴勃罗分子忘记了列宁和托洛茨基的教导：他们头脑简单地制订了他们的‘文件’，并把托雷斯和奥凡多一班塞尔同等对待。这些人拒绝了解资产阶级民族主义在不发达国家中可能呈现的各种细微差别。……制定革命策略必须首先考虑这些差别。这不是一个支持托雷斯的问题，而是一个摧毁法西斯主义以便建立工人政府的问题。”^①

在托雷斯政权被一次由乌戈·班塞尔上校所领导的、得到民族主义革命运动和玻利维亚社会主义长枪党所支持的军事政变所推翻以后，洛拉派工人党在该政权期间的态度问题在第四国际（该党是第四国际的成员）国际委员会的队伍内引起了分裂。洛拉的对手们严厉批评他和他的党没有武装工人和充当了托雷斯的受骗者。洛拉本人评述1971年8月的大灾祸说，“人人（包括我们马克思主义者）都认为政府的军事部门会把武器交来，它会认为只有通过依靠群众并给以适当的武器才能使他们至少可以把‘猩猩派’（反动军人）好好地中立起来。”法国国际共产主义组织中支持他的人为洛拉辩称：“在这个过程的每个阶段中，革命工人党发动的政治斗争已经使群众能保持他们对托雷斯的阶级独立性，并且挫败那些旨在再次使他们从属于资产阶级和小资产阶级民族主义的阴谋。”^②

① 《洲际新闻》，纽约，1971年11月22日，第1023页。

② 对吉列尔莫·洛拉的革命工人党的活动有争议，有关这一争议的详尽讨论，可见《洲际新闻》（纽约）1971年10月18日和11月22日；这段话引自《洲际新闻》1971年11月22日，第1023页。

冈萨雷斯·莫斯科索派革命工人党

隶属于第四国际统一书记处的冈萨雷斯·莫斯科索派革命工人党最初支持雷内·巴里恩托斯将军和阿尔弗雷多·奥凡多将军1964年11月的政变，那次政变推翻了维克托·帕斯·埃斯登索罗总统的民族主义革命运动政府。纽约托派报纸《战斗者》的一名记者报导称：“自从帕斯的政府机器被推翻以后，目前有完全的自由。出现了报纸的真正繁荣，而且每个阶级、每个社会阶层、每个政党团体和政治派别都自由地表达自己的见解和提出自己的要求。因此，人们可以读到极右翼的纲领，同时在一方面可以读到明显表现托派影响的玻利维亚劳工中心的纲领。”

最初，冈萨雷斯·莫斯科索的托洛茨基派似乎对新军政府的理所当然的领袖巴里恩托斯将军很热情。因此，《战斗者》的记者写道：“巴里恩托斯不是在起着典型的‘猩猩派’（反动军人）的作用。相反，他对所有的人给以种种允诺，访问矿区，等等。他为恢复工人管理作了准备，他的劳工部长明白地对此表示赞成。”《战斗者》的记者对于托洛茨基分子在这一形势下的立场也有说明：“我要补充说，从最贫苦人民中吸收成员的托洛茨基派的经费已经完全用光了。这大大阻碍了他们在当前有利形势下提出他们的纲领。”^①

大约与此同时，第四国际统一书记处的主要意大利领导人利维奥·迈顿评论说，“巴里恩托斯以及同他一起的那些人不得不在一种背景下进行活动，这种背景的特点是所有的反民族主义革命运动潮流发展起来共同行动，其象征就是建立了人民革命委员会，这个委员会里包括了从极右派一直到莱钦的民族主义左派革命党的所有政治组织，只有托派的革命工人党……和共产党不包括在

^① 《战斗者》，纽约，1964年12月7日。

内。”迈顿谈到冈萨雷斯·莫斯科索的党说：“革命工人党，尽管它在决策部门中的重要联系和影响程度，却还没有机会发展成为全国范围的真正直接领导。”^①

但是冈萨雷斯·莫斯科索派革命工人党并没有长久地支持军政权。在1966年7月雷内·巴里恩托斯当选为“立宪”总统以后不久，乌戈·冈萨雷斯·莫斯科索本人在写文章时说，“在7月3日的欺骗性选举以前，我们断言巴里恩托斯—西莱斯政府*至多是军事独裁的‘合法’延续。政府的行动已经清楚地肯定了这种判断。”冈萨雷斯·莫斯科索继续赞同反政府的造反：“认真负责地准备和组织起义和夺权以取代现在的反民族、反工人、反民主政府，是工人、左翼政党、工会领袖和左翼知识分子的最起码的责任。”他说，在这一背景下，革命工人党应当“实际地表明无产阶级的思想先锋有条件成为国家的政治领袖。”

1967年初，巴里恩托斯政府正在纠集形形色色的左翼分子。这包括民族主义革命运动、胡安·莱钦的民族主义左派革命党、亲中国的共产党以及革命工人党的各个派系的成员。被拘禁的革命工人党分子包括吉列尔莫·洛拉，米格尔·洛拉，维克托·索萨，和奥斯卡·圣希内斯。^②1967年4月11日，冈萨雷斯·莫斯科索派革命工人党同亲莫斯科索的共产党和亲中国的共产党一起，被政府宣布为非法。^③

冈萨雷斯·莫斯科索派革命工人党反对巴里恩托斯政权这一事实，在1967年初冈萨雷斯所写的一篇文章中再次加以强调，他

① 《国际社会主义评论》，纽约，1965年冬季号。

* 路易斯·阿道弗·西莱斯是保守的社会民主党领导人和民族主义革命运动总统埃尔南·西莱斯的异母兄弟，他当选为巴里恩托斯的副总统，并在1969年巴里恩托斯去世后继任总统。

② 《世界前景》，墨西哥城，1967年4月16日，第11页和13页。

③ 《共产党国家政治活动的发展》，波恩—巴特戈德斯贝格，1970年2月，第77页。

在文中说“军政权——先在军人委员会、后在巴里恩托斯总统领导下——继续进行民族主义革命运动的未竟之业，即：摧毁群众取得的一切成果，破坏工会，削减工资，打击国有化产业，并把全国变成一个美国殖民地。”这篇文章是在切·格瓦拉的游击队活动普遍为人所知以前写的，冈萨雷斯·莫斯科索在文章中继续赞同把通过游击活动夺取政权的道路应用于玻利维亚。他写道：“例如，在玻利维亚，已经进行了一场土地改革，它虽然有局限，但却已通过它解决了基本的土地问题。然而，游击战仍然是击败军事独裁的必要道路。就我们来说，矿区、城市周围的贫民窟以及生活条件非常困难的某些农业区，是发展游击队组织的沃土。”^①

甚至在格瓦拉的游击运动遭到灾难性失败（其顶峰是切·格瓦拉之死）以后，冈萨雷斯·莫斯科索派革命工人党重申它对游击战的信心。这在1968年1月《世界前景》的一篇文章中谈到了，它说，“但是，尽管指挥员格瓦拉之死，尽管种种打击，玻利维亚的游击斗争继续是该国摆脱经济和政治危机的唯一出路。按照革命工人党的看法，玻利维亚和拉丁美洲的革命者的责任是要支持当前的游击斗争，去加强它，使它摆脱孤立状态，使它同城市和矿区群众的运动结合起来，并使农民作为一股战斗的力量参加进来。”但并无迹象表明格瓦拉曾经同冈萨雷斯·莫斯科索派或任何其他玻利维亚托派相接触。也无证据说明有任何托派的组织的成员真正参加了他的游击部队。^②

1968年6月10日的纽约托派期刊《洲际新闻》的一名玻利维亚记者的一篇文章，形容冈萨雷斯·莫斯科索党在格瓦拉罹难以后的立场。这篇文章在评论对巴里恩托斯政权的非法反对时说，

^① 乌戈·冈萨雷斯·莫斯科索：《古巴革命及其教训》，载《国际社会主义评论》，纽约，1968年3—4月。

^② 参加格瓦拉游击纵队的人员名单，见杰伊·马林：《“切”·格瓦拉论革命》（1969年）。

反对派的成员是：民族解放军（自从南乔阿苏的武装斗争开始以后受到严重迫害），革命工人党；和亲中国的共产党。这些党都已被取缔，受到迫害，完全被赶入地下。已发出传票捉拿乌戈·冈萨雷斯·莫斯科索和奥斯卡·萨莫拉，前者是革命工人党领袖，后来是亲中国的党的领袖。……这些政治力量被认为是支持武装力量（游击战），它们对群众的影响可以用对游击战普遍表示同情这一事实来衡量。它们的前途也同通过武装斗争夺取政权结合在一起。

在切·格瓦拉于1967年10月去世后许多个月中，游击战在玻利维亚平息下来了。但是在1969年7月，全国各地军警与城市游击队（包括冈萨雷斯·莫斯科索派革命工人党）之间发生了冲突。其结果，革命工人党分子安东尼奥·莫雷诺和维克托·科尔多瓦在一次巷战以后于科恰班巴被捕；在奥鲁罗，革命工人党分子和附近矿区工会的领导人费利佩和埃利奥·巴斯克斯被抓获；在拉巴斯，其他一些革命工人党分子都被捕下狱。发生这些事件以后，据报导，冈萨雷斯·莫斯科索派革命工人党内的托洛茨基分子“已在工人农民和学生中开始重新组织起来，首先是为了发动一个支援被捕人员的运动。”^①

随着1969年9月阿尔弗雷多·奥凡多将军的夺权，冈萨雷斯·莫斯科索派革命工人党对新政权给以暂时的同情。它欢迎新政府没收海湾石油公司的决定是一次“人民的胜利”，对此表示支持。但它也说，“我们托洛茨基分子提醒人民：这种反帝胜利是同南乔阿苏游击队，同切·格瓦拉、因蒂·佩雷多和他们的同志们的斗争结合在一起的。”这个声明要求“无条件释放”政治犯，不但包括托洛茨基分子而且包括雷吉斯·德布雷和格瓦拉的阿根廷助手

① 《洲际新闻》，纽约，1969年9月22日。

C. 布斯托斯。^①

1969年11月，革命工人党的全国委员会又发表了一项声明，题为《无条件地大赦、释放被指控为游击队的革命分子》。它提出了许多人名，要求加以释放和结案，“停止搜捕；对革命工人党总书记乌戈·冈萨雷斯·莫斯科索给以公民权利。”^②

然而，革命工人党并没有对奥凡多政府给以普遍的政治支持。在1969年11月的革命工人党一次特别会议上通过了一项决议，把奥凡多称为“资产阶级的代表”，并说：“向他去呼吁完成革命无产阶级及其先锋队的任务，不是愚蠢的话，也是幼稚。……要求奥凡多让工人参与政府就是背叛，因为这会使他们处于资产阶级的控制和领导之下。”

革命工人党进一步宣布：“我们在群众面前宣告的革命原则立场是采取独立行动，对奥凡多政府、它的资产阶级纲领、军队党以及拯救资本主义制度的活动不寄以政治信任。”它重申对游击战的信念：“游击战仍然是一个有效的方法。受到打击以及人员和装备受到损失是不重要的。这一切损失虽然惨痛，但都能加以弥补。重要的是要明确真正的革命者是没有其他的道路可循的。奥凡多所形成的幻想将很快消失，军队对群众开火的枪声将驱散这种幻想。这个过程正在朝向对峙发展。”^③

到1970年年中，在军队和学生之间发生冲突之后，冈萨雷斯·莫斯科索派革命工人党发表一项声明，号召广泛抗议对学生的处理。声明中说：“我们号召学生和工人组织停止同政府对话，直到政治犯获释，直到虐待和迫害停止，直到在政府庇护下的恐怖主义组织解散。当这种罪行比比皆是，而我们的权利正在遭到破坏的

① 《洲际新闻》，1969年11月24日。

② 同上刊物，1969年12月15日。

③ 同上刊物，1970年4月13日。

时候,同政府谈判就等于对这种局面加以认可和接受。”^①

当玻利维亚军人政治的又一次转折导致了奥凡多将军的下台和胡安·托雷斯就任总统时,革命工人党发表了一份由乌戈·冈萨雷斯·莫斯科索、E. 桑切斯和埃利斯科·阿尔达纳所签署的声明。这项声明辩称:“军方和政权的危机(其顶峰是奥凡多被取代)只是资本主义制度和资产阶级党和军队在日益成熟的革命面前腐朽的表明。这种发展的动力来自特奥蓬特的游击队、工人斗争和城市里的战斗。”

革命工人党的声明继续争论说:“社会革命并未发生。危机是在军方本身的框框以内解决的。……军队,资产阶级的武装队伍,仍然控制着国家。托雷斯将军在总统职位上未曾采取一件社会或政治措施来说明他是革命者。……他关于结构改革的概念以及所谓的‘发展战略’把他置于帝国主义在半殖民地国家推行的‘发展主义’(有限工业化和现代化的政策)范围以内。”

革命工人党还说:“有利于托雷斯将军的工人、学生和人民群众的干预,并不能改变这一总貌。要善于把这种军方倾向同群众中发生的生动的进程区别开来,这是很重要的。”它描绘说,这种进程“正在人民的命脉,在矿山深处,在工厂和大学,在过去的庄园,在村社里逐渐成熟,这种进程最充分的表现就是武装斗争和游击战,在这个进程的压力之下,军方队伍内部就定期地出现矛盾。”

革命工人党的这个声明在结尾时号召“组织一个包括赞成对玻利维亚的当前情况采取社会主义的解决办法并支持以武装斗争夺取政权的一切政治倾向在内的革命指挥部”;“成立一个革命工人、人民军”,“发展一个代表群众的机构,使人们能通过它来表达他们对于改造社会的一切革命权力、倡议、担忧和决心。”^②

① 《洲际新闻》,1970年7月13日。

② 同上,1970年11月23日。

但是，尽管冈萨雷斯·莫斯科索派革命工人党对托雷斯将军的政府采取怀疑的态度，它本身在该政府期间的处境却同前两届政权时大不相同。在第四国际统一书记处法国的隶属组织共产主义联盟机关刊物《赤色》的1971年6月14日一期上刊登的一次采访中，冈萨雷斯·莫斯科索本人指出，在奥凡多政府期间，该党被宣布为非法，当时它的全部力量集中在“武装工作上”，而在托雷斯政府期间，该党再一次成为合法了。他指出该党集中在工会、农会和大学里进行工作。他说他们已经赢得了对若干城市小工会的控制权，并且说在1970年12月的拉巴斯工会代表大会上党纲已得到通过。他还说该党“在大学里有许多群众”。

冈萨雷斯·莫斯科索还说该党的报纸《战斗》每月定期出版，它还出版一个学生月刊，它还打算很快发行一个理论性杂志。他说革命工人党属于人民议会中的左派，并认为它应当是“讨论国家问题、解决国家问题和推动问题的解决、但把权力留交群众组织（工会、民兵或人民军队）的一个机构。”冈萨雷斯·莫斯科索坚持认为党在议会中的代表不但代表党本身而且也代表这个或那个工会。”

波萨达斯派革命工人党(托)

以阿马德奥·巴尔加斯为首的波萨达斯派革命工人党(托)肯定是玻利维亚三个托派组织中最小和最不重要的一个。冈萨雷斯·莫斯科索派革命工人党抨击说它“没有生气，它是由军人机构给予生命和准许活动的，”^①虽然这可能是夸大和诽谤，但波萨达斯派不如洛拉派或者冈萨雷斯·莫斯科索派重要。它继续出版非法的期刊《工人之声》。

革命工人党(托)据说已经发表一份“声援书”，支持玻利维亚

^① 《洲际新闻》，1970年4月13日。

的以切·格瓦拉为首的游击运动。^①然而，它对格瓦拉的活动也是有不少批评的：这位阿根廷—古巴领导人被谴责为不采用“群众的革命经验”和缺乏“革命纲领”。^②他们在对立的冈萨雷斯·莫斯科索派革命工人党内的反对者，谴责阿马德奥·巴尔加斯派革命工人党(托)在奥凡多将军当权时“起来公开支持和美化军人阶层和奥凡多。”巴尔加斯据说曾把这些称为“世界革命派潮流的一部分。”^③

但是巴尔加斯派的出版物说明对奥凡多并没有像他们的革命工人党对手所说的那么热情。革命工人党(托)1969年10月份的油印报纸《工人之声》谈到奥凡多政权的出现时说：“玻利维亚的运动是一个反帝的民族主义运动，结构尚未变动，觉悟尚不充分，矛盾重重。比秘鲁民族主义运动的矛盾更多，但是由于玻利维亚的历史、政治和革命条件，它在很短时期内将会跨开大步和经历内部斗争而使第四国际成为大规模动员的领导者。”同一声明宣布：“今天，存在着这样的条件，使矿山、工业、农民和学生的先锋队在革命土改计划、援助与信贷，物价稳定化和销售一切农产品、技术援助、矿工农民联盟等基础之上开始进行组织工作。”它还说：“这是无产阶级矿工先锋队的任务，这是第四国际玻利维亚分部的任务。那就是这个分部的中心活动——自行改组，与此同时着手解决当前的一些问题，例如组织民主工会、取得政治权利、巩固工人、矿工和农民间的联盟。这将把小资产阶级和知识分子带动起来，并将推动军队中的反帝民族主义成分前进。我们不应忽视争取像玻利维亚军队这样的官办部队的可能性。在这个问题上，奥凡多也必须有所响应。”

① 《共产党国家政治活动的发展》，1970年2月，第79页。

② 《季度报告》，1969年9月，第321页。

③ 《洲际新闻》，1970年4月13日。

玻利维亚托洛茨基派为什么走下坡路？

玻利维亚的托洛茨基分子是第四国际在拉丁美洲的组织中唯一在国家政治中起到重要作用的组织。但是他们只是起为时短暂的作用，到六十年代后期，已经变成一个很不重要的、分崩离析的小组织了，在玻利维亚政治舞台上只能起一些骚扰性作用。怎么来解释这种时运逆转的状况呢？

阿根廷前托洛茨基分子利沃里奥·胡斯托解释玻利维亚托派的失败在于他们学说上的弱点。他认为，玻利维亚托派分子之所以失败，是因为他们没有以布尔什维克的好作风来利用他们在民族革命（开始于1952年4月）初期对玻利维亚劳工中心的控制而把该工会改变成一个苏俄在1917年那样的组织，把它变成一个“双重政权”，能对维克托·帕斯·埃斯登索罗的民族主义革命运动政府提出挑战并夺取政权。胡斯托说，可是革命工人党却不是这样，它去支持民族主义革命运动，特别是支持其左翼，这样就扔掉了在革命工人党控制下确立无产阶级专政的机会。

然而，我们认为革命工人党的失败恰恰是由于相反的错误所造成的。首先，玻利维亚托派在1943—46年的比利亚罗埃尔政府期间曾经在玻利维亚锡矿工人工会中成功地取得少量影响，这是事实，但是，主要由于它同胡安·莱钦和工会中的民族主义革命运动派结盟，它才能在六年间维持这个影响并在劳工运动的其余部分取得某些支持。

在六年间成为玻利维亚国内最最有影响的党的，是民族主义革命运动。正是民族主义革命运动在这个时期发动了反对不得人心的历届政府的若干次起义。是民族主义革命运动的流亡领袖维克托·帕斯·埃斯登索罗在1951年选举中赢得了数量最大的选票。是民族主义革命运动组织了1951年4月9日的起义，从而开

始了玻利维亚民族革命的进程。是民族主义革命运动在那场革命中当了政。

在紧接 1952 年 4 月 9 日的那个时期里,绝大多数玻利维亚工人都是支持民族主义革命运动的。在比利亚罗埃尔总统倒台以前曾经支持过亲斯大林主义的革命左派党的那些人,由于革命左派党六年间支持各届政府而同它疏远了,他们参加了民族主义革命运动的队伍。

同革命左派党不一样,革命工人党在六年间曾经同胡安·莱钦和民族主义革命运动联合起来。它曾经支持民族主义革命运动在那个时期的革命活动,它的成员曾经在 1952 年 4 月 9—11 日的事件中同民族主义革命运动的成员在街头并肩作战。其结果,革命工人党作为一个小伙伴分享了民族主义革命运动的名望。

然而,民族主义革命运动在两者关系中始终占主要地位。在玻利维亚民族革命最初几个月,革命工人党在劳工运动内得到的基层支持仅限于矿工工会联合会的一些地方工会、工厂工人工会的一些地方分会、白领工人联合会以及科恰班巴省的一些城乡工会。在革命初期,革命工人党在新成立的玻利维亚劳工中心中有影响,那几乎完全是由于吉列尔莫·洛拉、埃德温·莫列尔以及其他托派领导人都同胡安·莱钦等民族主义革命运动的工会工作者有着或多或少的友好关系,由于民族主义革命运动的劳工领导人都专心致志于他们在政府内的活动以及在各个全国性劳工联合会中的活动。这些领导人允许托洛茨基分子去经营玻利维亚劳工中心,只要他们不对民族主义革命运动政府造成真正严重的问题。

当时,托洛茨基分子在 1952 年 4 月至 10 月期间并无能力把玻利维亚劳工中心变成相当于 1917 年俄国的苏维埃。他们在玻利维亚劳工中心内的影响是由于民族主义革命运动的劳工领导人容忍的结果,而不是革命工人党在劳工运动中得到基层支持的一

种反映。而且，莱钦等民族主义革命运动劳工领袖都是忠于他们自己的党的，他们不愿看到本党对革命的领导权受到革命工人党或任何其他竞争的政党的挑战。

因此，托洛茨基分子认为自己像布尔什维克，而维克托·帕斯·埃斯登索罗是克伦斯基，那是错误的。当他们对民族主义革命运动政府进行第一次认真的挑战时，这一点就很清楚了，他们是在矿山国有化问题上进行挑战：在玻利维亚劳工中心一次会议的过程中，托派对它的控制结束了，从来就没有再恢复过。以后，托派在劳工运动等处的阵地由于革命工人党队伍内部的分裂而遭到进一步破坏。该党分裂成两个对立的派系，双方都用同样的名字，托派的主要工会工作者中许多人全部退出而参加了民族主义革命运动。革命工人党队伍内部的不满是受到第四国际内部的分裂所致。

总之，革命工人党在玻利维亚的垮台，正是由于它教条主义地遵循布尔什维克革命的模式，而不是他们不遵循那个模式。一旦他们不再成为工会运动和五十年代在玻利维亚发生的总的革命进程中的真正重要因素时，自身队伍内的宗派主义就使他们沦为一个吵吵闹闹的小宗派了。

第八章 秘鲁的托洛茨基主义

从1930年以来,秘鲁的大众化的左翼政治一直受到秘鲁人民党的主要影响。以维克托·劳尔·阿亚·德拉托雷为领袖的秘鲁人民党人主要鼓吹在拉丁美洲建立一个致力于通过政治民主来实现基本的社会变革和经济发展的多阶级的党。人民党自从成立以来得到秘鲁绝大部分政治上积极的工人和地位低下的中等阶层分子的支持。各种共产主义者在秘鲁左翼队伍内始终占少数,而在这个马列主义左翼的部分中,秘鲁托洛茨基分子本身又是少数。

早期的秘鲁托洛茨基主义

秘鲁的托洛茨基主义运动开始于1944年,当时是由于两个组织合并的结果。其中一个组织由知识分子所组成,其中最重要的是弗朗西斯科·阿夫里尔·德比维罗、埃米略·阿道弗·贝斯特法林和拉斐尔·门德斯·多尔奇。另一个组织的成员是一些脱离共产党的纺织工人,他们之脱离共产党,是因为感到共产党为了遵循当时“全国团结”的路线而背叛了一次纺织工人罢工。这些工人中最重要的是费利克斯·塞瓦略斯和莱昂西奥·布埃诺。

这两个原先的托洛茨基组织开始共同出版一份称为《外观与现实》的报纸。在1946年8月,他们组成了马克思主义工人组织,并开始出版另一份报纸《革命》,一直出版到1948年。1947年,马克思主义工人组织改名为革命工人党(托)。^①在这段时间里,托洛茨基分子对共产党的攻击特别厉害。例如,在1947年6月下半月

^① 同伊斯梅尔·弗里亚斯的谈话,1971年7月13日于秘鲁利马。

的一期《革命》中,把共产党总书记豪尔赫·德尔普拉多称为“过去的同志”和“叛徒”。

这个秘鲁托洛茨基组织的出现,得到国外托洛茨基分子充满兴趣的欢迎。例如,纽约市出版的、持不同政见的托派期刊《新国际》在1947年9月的一期中发表社论说:“要是说这个组织对群众没有影响,可是它代表的是南美洲马克思主义理论出色的学派。它在理论问题上站在托洛茨基运动的前列,并把革命任务阐述得很明白。”

这一判断主要根据的是马克思主义工人组织显然在成立以后不久发表的一份宣言。该宣言反对秘鲁或拉丁美洲其他国家革命的领导权可以由任何资产阶级分子来承担。它认为:“我国软骨头的民族资产阶级的命运是同全世界资本主义制度的命运密切相联的。……真正的大资产阶级不是在秘鲁,而是在华尔街,那是民族民主革命的凶恶敌人。”它还说,“二十年代的小资产阶级反帝分子已经变成四十年代的资产阶级亲帝国主义分子”,它指的是人民党。

所以,该宣言认为,“民主革命是无产阶级革命的任务。”它以赞同的态度引述秘鲁共产党先驱何塞·卡洛斯·马利亚特吉所说的,“我国的经济解放只能通过无产阶级群众支持世界反帝斗争的行动来实现。”该宣言对托洛茨基主义怀有善意,其证明就是它引述了托洛茨基的话:“民主革命在发展过程中过渡成社会主义革命,因此它是不断革命,”还说:“社会主义革命是国际性的,否则就根本不是社会主义的。”

1952年,革命工人党吸收了一个年青人,在若干年内他成了秘鲁托派的主要人物之一。那是一位十八岁的学生,名叫伊斯迈尔·弗里亚斯,他曾经是人民党青年团的活跃分子,但是后来对该组织感到失望。他认为自己是马克思主义者,但又敌视共产党,因

此参加了革命工人党。^①

下一年的二月份，由于曼努埃尔·奥德里亚将军的独裁政权控告革命工人党和共产党应主要对发生在南部城市阿雷基帕的一次总罢工负责，从而使革命工人党突然闻名起来。警察在袭击时搜到的、发表在日报上的文件，对当时的托洛茨基运动提供了一些有意思的情况。

那些文件中有一份是革命工人党的纲领。根据警方关于革命工人党的报告，这份纲领是伊斯迈尔·弗里亚斯送交革命工人党中央委员会委员费利克斯·塞瓦略斯·克萨达和卡洛斯·豪斯·比斯的。纲领首先谈到政治组织的问题；它要求废除独裁政权的一切镇压性法律，主张十八岁以上的人都应得到普选权，主张士兵享有政治权利，主张组织工会和出版“劳工报刊”的自由。纲领号召无产阶级“重建工会和全国性劳工组织，包括秘鲁工人联合会，”并要求取消“资产阶级国家”对工会组织的一切控制；然后它进而列举若干“工人的当前要求”。纲领还主张土地国有化，“那就是说，取消一切土地私有制”。大地产应予没收，并把大地产使用权给予贫苦农民。它还号召没收沿海的甘蔗和棉花大庄园并把它们改为国营农场。印第安人公社将改为合作社。最后，纲领要求无偿剥夺“公用事业和大型工业企业——矿山、油田、运输和比较发达的制造业。”

革命工人党主张的革命总的说来将遵循1917年布尔什维克起义的模式。纲领说：“农村广大劳动人民的团结、城市工人的组织以及坚实的工农联盟，这些都是革命胜利所必不可少的，只能通过工人、农民、当地居民和驻军的地方委员会来进行。……摧毁资产阶级国家的官僚—军队—警察机器、剥夺剥夺者、镇压复辟封建资产阶级和帝国主义的企图，就需要把那些委员会变成无产阶级

^① 同伊斯梅尔·弗里亚斯的谈话，1971年7月13日于秘鲁利马。

的国家机构。这样，工人、农民、士兵委员会就成为得到贫苦农民支持的无产阶级专政。”

警方关于革命工人党的报告说：该党的许多成员是“前人民党党员”，说他们“比许多斯大林主义共产党人要活跃得多。”报告中说该党有五个地方组织，三个在利马，一个在卡亚俄，一个在阿雷基帕。另一份文件当时透露革命工人党党员往往对自己的重要性的印象有所夸大。该文件据说是中央委员费利克斯·塞瓦略斯在一次访问玻利维亚期间送交中央委员会的报告。塞瓦略斯谈到“我们决定动员人民党”。他还提到争取共产党内不满分子的支持的可能性。^①

在1953年公布的这些文件说明革命工人党或多或少同第四国际有着直接联系，它向第四国际提交有关党的活动的报告。第四国际给革命工人党领导人的一封法文信件中说：“你们的上一封来信……使我们感到极大兴趣。你们的活动，你们的进取、乐观的精神，你们对群众运动的理解，使我们十分高兴。我们肯定你们的组织真正代表了秘鲁群众真正革命的党的核心，它真正走在‘正确的道路’上。”但是这封信也要秘鲁革命工人党分子警惕“反动派的影响”，并告诫“要谨慎，别对自己的成就过于兴奋。必须巩固组织，保持团结和活动，即使那样会放弃一些引人注目的、眼前的胜利，因为我们在全世界范围内正处在一个长久的革命时期。”

1953年，警方宣称，住在巴黎的一名秘鲁革命工人党党员、前大学生弗朗西斯科·阿夫里尔·德比维罗·莱斯汤纳特是该党在第四国际巴黎总部的主要联络员。^② 那年的晚些时候，伊斯迈尔·弗里亚斯被奥德里亚政权从秘鲁驱逐出境。他到墨西哥去，在那里居住到1955年；据报导，他在那里至少有一段时间担任托洛茨

^① 《商业报》，利马，1953年2月4日。

^② 同上，1953年2月3日。

基遗孀纳塔莉亚·塞多娃·托洛茨基的秘书。他在1956年回到秘鲁。^①

尽管奥德里亚独裁政权对于1953年的这些事件很少宣扬,但肯定没有什么严重的托派阴谋在进行中;他们人数太少,不能进行任何重大的阴谋。显然,奥德里亚政权对于使政府相当严重地为难的事件中把革命工人党挑出来当作替罪羊。利马的圣马科斯大学的一次学生罢工同时发生,工人和学生的抗议暂时成功了。后来,在大学假期期间,当大部分学生不在校时,警察把大部分比较重要的学生领袖都拘捕起来,其中有一小批托洛茨基分子。下列事实可以证明并无阴谋活动:警察只是在逮捕学生以后,才令人可疑地安然发现有关“阴谋”的一切文件的。^②

巴勃罗-彼萨达斯派革命工人党

1956年,革命工人党在两个主要问题上发生了分裂:一是对于第四国际的分歧,一是对于党在秘鲁应遵循的政治战略的不同意见。

在国际上,这两派组织——它们都继续自称革命工人党——中,一个同第四国际的米歇尔·巴勃罗派站在一起;它最重要的人物可能是伊斯迈尔·弗里亚斯。另一个组织以卡洛斯·豪斯和费利克斯·塞瓦略斯为首,它同第四国际的国际委员会——美国的社会主义工人党是其中的主要党派——相合作。至于全国政治问题,亲巴勃罗派的革命工人党赞成巴勃罗当时鼓吹的“打进去”政策,而对立的那个组织则反对这项政策。由于奥德里亚将军的总统任期在1956年行将届满,在秘鲁实现“打进去”的可能性增加了。

① 《新闻报》,利马,1970年4月26日。

② 同伊斯梅尔·弗里亚斯的谈话,1971年7月13日。

当奥德里亚将军的任期临近结束的时候，他的军方同僚不同意他通过选举等方式继任总统。在1956年6月的大选中，前总统曼努埃尔·普拉多由于得到非法的人民党地下组织的支持而得胜。他就职以后立即使人民党合法化。

显然，人民党是秘鲁唯一严肃的群众性政党，但是同样明显的是：人民党组织内有着一个不满该党老领导及其政策的左翼。在这种情况下，亲巴勃罗派的革命工人党感到托洛茨基分子参加人民党的时机已经成熟，这样它就能设法取得这个左翼组织的领导权并把它争取到托洛茨基主义思想方面来。^①

亲巴勃罗派对这个问题的立场，在胡安·D·莱瓦的一篇题为《大选以后秘鲁群众力量的上升》的文章中提出来了，该文发表在1956年10月一期的第四国际巴勃罗派机关刊物《拉丁美洲马克思主义评论》上，文中说：

组织在革命工人党内的秘鲁托洛茨基分子的马克思主义革命先锋队任务，是由群众运动的这种发展和特点所决定的，群众的绝大多数都通过人民党的渠道，他们和该党一起开展了斗争和实现政治化。这一基本任务，就是在人民党的组织范围内同人民党的群众团结起来，促进一个逐步树立革命马克思主义立场的工人阶级左翼的建立和发展，以此使劳工和人民党群众实现政治化而建成一个群众性的劳工党。这项任务的一个最基本的方面，就是力争把秘鲁工人联合会改变成一个群众性劳工中心组织，使它包括所有的工人、农民和贫苦的小资产阶级，它特别在土地斗争中组织和动员大量的农民群众。秘鲁工人联合会也将在实现秘鲁群众的政治化和加速它走向建设一个群众性的劳工党（这是实现对秘鲁广大群众

^① 同伊斯梅尔·弗里亚斯的谈话，1971年7月13日。

进行真正的革命马克思主义领导的第一步)方面,成为最强有力的组织之一。^①

在1956年至1960年之间,巴勃罗派的革命工人党在阿雷基帕市的工会中有过相当大的影响。它在利马地区的劳工运动中也有某些重要作用,在1959—60年期间它帮助组织了一个全市性劳工组织以反对那个隶属于秘鲁工人联合会的组织。^②在利马,巴勃罗派革命工人党在工人中影响的据点似乎是在秘鲁主要化学公司之一“化肥公司”的工人工会内。这个工会的领导人同革命工人党中央委员会的苏克拉蒂斯·加西亚和胡安·帕拉西奥斯在革命工人党召开的一次讨论该党对于1962年大选态度的公众集会上一起被捕。革命工人党指责说,这些领导人的被捕,发生在正当人民党强硬派成员攻击那次革命工人党集会的时候,警察就在这时进去逮捕了托洛茨基主义分子和他们的朋友。革命工人党发表了一项呼吁书,号召全拉丁美洲的劳工和农民组织“谴责这种有计划的镇压。”^③

巴勃罗派的革命工人党还在六十年代初期就声称在中心地区的重要矿工联合会内拥有着很大影响。他们声称,1962年4月间该联合会给菲德尔·卡斯特罗寄送了一封公开信,是由于他们的功劳。信中表示该联合会“对美洲第一个工人国家及其社会主义革命……致以热烈的无产阶级敬礼。”这封信的末尾提出这样的口号:“支持古巴社会主义革命的巩固和胜利|支持拉丁美洲的无产阶级革命|支持拉丁美洲苏维埃社会主义国家联邦”^④

① 胡安·D·莱瓦:《大选以后秘鲁群众的力量上升》,载《拉丁美洲马克思主义评论》(巴勃罗派),1956年10月。

② 同伊斯梅尔·弗里亚斯的谈话,1971年7月13日于利马。

③ 《第四国际》(巴勃罗派),1961年11月,第92页。

④ 《第四国际》(波萨达斯派),1962年9月,第169页。

当第四国际巴勃罗派的大部分拉丁美洲下属组织跟随J. 波萨达斯发起了又一个第四国际的组织以后，秘鲁的革命工人党也这样做了。因此第四国际的波萨达斯国际书记处派对于秘鲁中央地区矿工联合会的宣言表示欣慰，它在1962年6月给第四国际拉美各支部发了一封信。信中说，该宣言表明“我们的小党如何能影响大的群众组织，”还认为“在拉丁美洲其他国家中，以及以某种方式在欧洲、亚洲和非洲，有可能引导、指导和影响那种同样的进程。”^①

在普拉多政权期间，巴勃罗一波萨达斯派革命工人党经常同政府难以相处。伊斯迈尔·弗里亚斯出席了1957年在意大利举行的第四国际巴勃罗派第五次世界代表大会，他在1958年以“危及本国国际关系”罪被起诉，理由是他出席了上述代表大会并在1958年5月当美国副总统理查德·尼克松访问利马时参加敌视的示威。弗里亚斯在1959年又入狱一段时期。^②

与此同时，巴勃罗一波萨达斯派革命工人党发生了一次分裂。以伊斯迈尔·弗里亚斯为首的持不同政见组织主要在波萨达斯企图控制这个秘鲁政党的问题上分裂出去了。波萨达斯在1957年第一次访问秘鲁，当时他设法向秘鲁的该党领导人发号施令。弗里亚斯对波萨达斯的对抗，最后发展到1960年弗里亚斯同他的信从者退出去组织了另一个革命工人党。^③失去弗里亚斯，对于巴勃罗一波萨达斯派革命工人党是一个严重的打击。他曾经是第四国际巴勃罗派执行委员会和书记处的成员。弗里亚斯派在退出后，开始出版它自己的期刊《工农报》。^④

弗里亚斯派革命工人党很快就解散了，到了1966年，弗里亚

① 《第四国际》(波萨达斯派)，1962年9月，第170页。

② 《新闻报》，利马，1970年4月26日。

③ 同伊斯梅尔·弗里亚斯的谈话，1971年7月13日于利马。

④ 《新闻报》，利马，1970年4月26日。

斯不再认为自己是托洛茨基分子了。然而，他在1968年组织了一个名叫革命社会主义联盟的独立左翼组织。随着胡安·贝拉斯科将军的军政府上台，该联盟对新政府的改革措施给以支持。到1971年，该联盟已停止活动了，但是弗里亚斯在军政府里已经取得了一个具有某些影响的地位。他先在《快报》上写专栏（该报是贝拉斯科政府从它的原主手中没收来的），然后在另一份亲政府报纸《纪事报》上写专栏；1971年，他被任命为社会动员书记处的成员，那是为动员群众支持贝拉斯科政权而建立的一个机构。^①

波萨达斯派革命工人党当时已改名为革命工人党（托），并继续忠于波萨达斯。到六十年代初，它已经放弃渗透人民党的任何企图，并已丧失它一度在劳工运动中具有过的大部分影响，虽然它仍然控制着利马的化肥公司工会。1962年7月，当举行大选选举普拉多总统的继任者的时候，人民党候选人维克托·劳尔·阿亚·德拉托雷赢得了多数票，但是未能取得选举胜利所必需的33.3%民选票。于是军方推翻了普拉多政府，而人民党所控制的秘鲁工人联合会的反应是号召举行一次反对军方篡权的总罢工。托派控制的化肥公司工会对这一号召的答复是通过一项决议，其中谈到：“秘鲁工人联合会很早以前就不是一个为工人服务的组织，而已经变成一个为老板们服务的机构了。”它还说：“我们是支持总罢工的，但不是要普拉多重新上台或是要贝朗德·奥德里亚或者阿亚·德拉托雷上台执政。我们参加总罢工是为了使工人掌权和建立一个工农政府——那就是一个城乡工人的政府。”^②

在1962年选举以前不久，革命工人党（托）曾经发表一个新的党纲，名叫社会主义纲领。它特别强调“革命的土改”，它强调土改“必须通过占领寡头们的土地，由农民自己来进行。”这个革命工人

^① 同伊斯梅尔·弗里亚斯的谈话，1971年7月13日于利马。

^② 《第四国际》（波萨达斯派），1962年9月，第172页。

党的纲领中还包括一项工人发展经济的计划,号召“把石油、矿山、运输、大工厂、电力、电话等帝国主义企业收归国有。”号召把银行、投资银行和保险公司收归国有,并建立一个单一的国民银行;号召“国有化公司由本公司工人控制和自行管理”;号召城市改革,包括“降低房租、使租户成为业主、重新分布城市人口、消灭贫民窟以及提出一项全国住房建设计划”;号召“同苏联、中国和人民民主国家进行贸易并接受这些国家的信贷。”这一纲领的其他要求是“由工农民兵取代资产阶级军队,”以及“建立工农政府。”^①

当费尔南多·贝朗德·特里四十年来第一次在1966年11月举行市政选举的时候,革命工人党(托)参加了偏僻的通贝斯农村地区的选举。在那里,它同显然被它所控制的通贝斯农民协会一起组成了它所谓的联合阶级选举阵线,在该市提出候选人进行竞选。该阵线号召选民“通过选举使政治干预具有进步和革命的意义——而不决定于通贝斯的选举阵线是否能解决这个或那个地区或区域问题,因为对秘鲁的问题,以及对于仍然存在世界任何地方的资本主义,并不是要同它进行竞争或加以改造的问题,而是要推翻它。”

托洛茨基派支持的候选人名单在通贝斯得到79票,或占总数的19%,但是第四国际波萨达斯派却把这种表现作为托洛茨基主义的一次重大胜利。它的期刊《拉丁美洲马克思主义评论》在1967年7月的一期中宣告(第306页):“选举的这种表现,在整个秘鲁和全拉丁美洲都有反响,因为,虽然它是一个很不重要的地区的有限经验,但它表明:农民组织和无产阶级的工会一样,能够并应当加以使用。……”同一期的《拉丁美洲马克思主义评论》指出革命工人党(托)已经发表了J.波萨达斯的若干小册子。它评论说:“秘鲁支部的这种大力活动在秘鲁被剥削群众的斗争中产生巨

^① 《新闻报》,利马,1970年4月26日。

大的反响,并成为具有纲领性影响的中心。”^①

通贝斯农民协会的托派领导在1967年5月赢得了一次胜利;该协会宣称已迫使贝朗德政府的土改当局把他们所耕作的大庄园土地分给他们。革命工人党(托)发表一项声明来庆祝这一胜利,声明结尾说“工农联盟万岁。”^②1967年,革命工人党(托)还利用一次它说是失败了的教师总罢工来谴责共产党在那次罢工中的“妥协”。革命工人党(托)的文件认为,工人们不应该搞那种“妥协”,而应把那次罢工扩大成为革命性的活动,因为“资产阶级的危机有利于一场根本性的斗争。”^③

费尔南多·贝朗德·特里总统的政府在1968年10月被一次军事政变所推翻,政变后建立了一个以胡安·贝拉斯科将军所领导的军人独裁政权,它自称是“革命的”,并采取了若干民族主义的改良措施,革命工人党(托)挺身而出坚决支持新政权。然而,革命工人党(托)批评该政府未能设法建立一个有组织的文官基础。1969年10月下半月一期的该党党报《工人之声》的一篇社论中说:“(政府领导人)所赖以支持的组织就是军队。再没有别的了。政府的构成就是军队。国家行政部门并不支持他们。”社论总结说:“这种事态发展的政治基础是激励反帝统一战线,其当前纲领是支持民族主义政府的进步措施,与此同时,努力推进本国争取社会主义的斗争并把它发展成为一个独立的阶级和革命形式。”

革命工人党(托)继续支持贝拉斯科政府。1970年5月下半月一期的《工人之声》的一篇社论谴责那种“反民族主义政府的恐怖活动”并赞扬保卫革命委员会的建立表现了“群众要求参政的巨大愿望,他们要求有决定权、有影响力、同时要组织起来——不是

① 《拉丁美洲马克思主义评论》(波萨达斯派)1967年7月,第307页。

② 《工人之声》,1967年6月下半月。

③ 同上。

像资产阶级的、寡头势力的和帝国主义的报刊设法把它描绘的那样,是反对民族主义运动的,而是要推进、发展和激励反帝民族主义运动的力量。”在1971年6月上半月一期中,《工人之声》指出波萨达斯派支持贝拉斯科政权的“理论”根据。它说,J.波萨达斯认为该政权和埃及的、马里的、玻利维亚的和智利的政府都是“革命政府”。

1971年,秘鲁革命工人党(托)是拥有全国总部的少数几个拉丁美洲托派政党之一——它的总部办事处设在利马市中心附近的一幢大楼里,附设有一家小书店,出售J.波萨达斯的小册子以及各期《工人之声》报。

反巴勃罗派的革命工人党

同第四国际米歇尔·巴勃罗派决裂并反对“打进去”的那部分秘鲁托洛茨基主义分子,在1957年3月底举行了第一次代表大会。在这次会议以后,秘鲁、智利和阿根廷反巴勃罗组织举行了代表大会;它成立了“正统托洛茨基主义拉丁美洲书记处”,简称SLATO。^①

反巴勃罗派的秘鲁革命工人党在初创时很小,只在利马和阿雷基帕有一些有组织的小组。它设法渗入那两个城市的工会运动;它在银行工人工会中取得某些成就,并在首都和阿雷基帕的地区劳工联合会里协力组织反对派。^②它最初的主要活动之一是组织一个反帝阵线来抗议副总统理查德·尼克松在1958年5月访问利马。研究乌戈·布兰科生涯的一名学者写道:“革命工人党的人们日夜工作。他们成功地同共产党、进步社会运动和革命工人党(托)建立了反帝阵线。”^③反尼克松活动的成功导致了若干名革

① 贡萨洛·阿尼·卡斯蒂略:《游击战秘史》(1967年),第14页。

② 同上书,第29页。

③ 同上书,第30页。

命工人党领导人被捕。

1959年1月，革命工人党在卡亚俄市举行了一次利马省的地区全体会议。会议研究了党的未来政治路线，欢呼古巴独裁者富尔亨西奥·巴蒂斯塔的倒台和菲德尔·卡斯特罗的革命运动的胜利。几个月以后，革命工人党党员参加了一次由汽车司机联合会带头的反对政府提高汽油价格的广泛抗议运动。^①

1960年，有两个人成了革命工人党里的主要领导人。一个是乌戈·布兰科，他是库斯科的一名年青人，回到秘鲁南部的家乡去，在农民中从事工会和党的工作。另一个是安东尼奥·阿拉贡，他是利马地区革命工人党组织的领袖。有革命工人党组织的另两个地区普诺和阿雷基帕，有一些不那么重要的当地领导人。在其后两年中，有三名外国人在革命工人党领导内起关键作用。可能最重要的是阿根廷人乌戈·布雷萨诺，一般以他的假名纳胡埃尔·莫雷诺著称，他是1957年成立的地区性托派组织“正统托洛茨基主义拉丁美洲书记处”的领袖。另外两个人是阿根廷人阿尔贝托·佩雷拉和西班牙人何塞·马托雷尔。

1960年11月，革命工人党的一次全国代表大会在阿雷基帕举行。维克托·比利亚努埃瓦指出：“在这次代表大会上，他们研究了起义的可能性，在农民组织内可以动员起来参加行动的群众性支持，成员人数，以及采纳有关路线时必须研究的其他内容，起义的路线得到一致同意。计划通过游击战来进行起义。”^②

五个月以后，在秘鲁革命工人党的要求下，“正统托洛茨基主义拉丁美洲书记处”在布宜诺斯艾利斯举行了一次会议。据报导，会议代表来自智利、秘鲁、阿根廷、玻利维亚、乌拉圭和委内瑞拉，虽然应该指出，在委内瑞拉并不存在有活动的托派组织。这次会

^① 贡萨洛·阿尼·卡斯蒂略：《游击战秘史》（1967年），第33页。

^② 维克托·比利亚努埃瓦：《乌戈·布兰科和农民起义》（1967年），第79页。

议批准了秘鲁关于设法走起义道路的决定，会议还答应提供一大笔钱来帮助这一活动。^①

革命工人党的经费问题

由于正统托洛茨基主义拉丁美洲书记处会议的决定，布雷萨诺、佩雷拉和马托雷尔在 1961 年后期到达秘鲁。但是，外国托洛茨基分子答应的款项并未随同他们来到。正统托洛茨基主义拉丁美洲书记处会议原来曾经提出可提供 800 至 900 万阿根廷比索，当时相当于大约 131,580 美元。纳胡埃尔·莫雷诺一到秘鲁就把那笔款项削减大约 80%，提出 50 万秘鲁索尔。虽然他答应在 1962 年 3 月把款子送来，但莫雷诺未能或不愿意这样做。

革命工人党在库斯科的领导人急切地需要经费来进行即将发动的起义，他们要求立即举行一次党的全国代表大会来解决这笔款项问题，限利马的全国领导在 48 小时以内同意这一点，莫雷诺坚持把乌戈·布兰科以及其他一些人撤除领导职务。此事照办了，其结果，当布兰科——后来他被国际托派的各个支部视为英雄——在拉孔本雄山谷发动他那次著名的起义的时候，他不过是一名基层党员。^②

革命工人党领导人无法从海外得到经费，他们就组织了两次从银行“没收”款项的行动。第一次发生在 1961 年 12 月，当时从人民银行一家代理行偷得 105,000 索尔（秘鲁共和国总统马努埃尔·普拉多是该银行的主要股东之一）；^③第二次发生在 1962 年 4 月 12 日，当时从利马郊区米拉弗罗雷斯的一家信贷银行支行弄

① 维克托·比利亚努埃瓦：《乌戈·布兰科和农民起义》（1967 年），第 81 页。

② 同上书，第 94 页。

③ 同上书，第 92—93 页 和贡萨洛·阿尼·卡斯蒂略：《游击战秘史》第 59—68 页，对革命工人党抢劫人民银行一事作了相当详细讨论。

走了2,950,000索尔。^①

但是,这些偷来的经费对革命工人党,特别是对乌戈·布兰科没有什么好处。这笔款项中几乎有一半,1,115,000索尔,在用卡车运往库斯科的时候被警察截获了。其余款项曾经留在一名工程师埃尔南·博希奥·阿连德手里,后来却不见了。博希奥·阿连德最后在1963年5月被托派开除。^②但是,他是否已携款潜逃抑或为该党未来的好处而把款项投资出去了(那是维克托·比利亚努埃瓦提出的一种可能性),则不得而知。

对“起义路线”性质的辩论

随着纳胡埃尔·莫雷诺到达秘鲁,托派队伍内部在进行武装起义的正确方法问题上发生了矛盾。革命工人党1960年11月代表大会上批准“起义道路”的原决议显然赞成游击战的主张,而莫雷诺却有不同想法。他认为,在托洛茨基分子领导下,组织在农会中的农民应夺取地主的土地,组织自卫力量以武装支持他们的行动,从而在全国农村地区建立“双重政权”,如这一运动迅速发展,这就能对现政府的统治力量提出挑战。

莫雷诺把他的思想在一本书里提出来了。该书名为《拉丁美洲的革命》,他在书中强烈反对游击策略。他写道:“农民正在领导着革命斗争,占领土地,同寡头势力的军事力量相比较量。另一方面,古巴革命则通过游击战取得胜利。这两件事已经使得一部分革命先锋队认为唯一正确的战略就是发动游击战。”他说,但是,“这个看法是十分错误的……因为游击战并不是武装斗争的唯一方法,还有别的方法,那在拉丁美洲的某些地方和环境中有用

^① 维克托·比利亚努埃瓦:《乌戈·布兰科和农民起义》第97—98页和贡萨洛·阿尼·卡斯蒂略:《游击战秘史》第77—104页,讨论了信贷银行被劫事。

^② 贡萨洛·阿尼·卡斯蒂略:《游击战秘史》第142页。

得多。”

莫雷诺在阐述那些想法时说：“**游击战不等于起义**。后者是使群众取得政权的艺术，前者则是一种斗争方式，它可以在起义的最终阶段进行，但绝不是说应当在起义的开始阶段提出来。在**夺取政权以前**，**游击活动会大量消耗革命力量**。……游击战作为一种战略，是同起义对立的，那正是因为它不依靠农民或工人阶级的组织和大规模活动来解放一个地区或夺取政权，而只依靠他们的同情和支持来求得生存。那是一种**防御性战略**。”同游击战略相反，莫雷诺提出应使“落后农民”深信“夺地和建立双重政权的必要性。占领土地意味着双重政权，因为它打破了资产阶级的法律而在占领的土地上以他们的不成文法建立起群众的权力。”最后，莫雷诺还说：“没有党，就没有革命；党就是一切，群众是党掌握的工具。”^①

开始时，乌戈·布兰科似乎支持游击战的思想。但是，正如他在拉孔本雄山谷所表明的那样，最后他被引导到支持纳胡埃尔·莫雷诺提出的战略。

革命左派阵线(FIR)的建立

革命工人党有几年的时间一直在设法使秘鲁托派队伍的力量更广泛地联合起来。革命工人党的党报提出这样的口号：“建立一个单一的秘鲁革命政党”，在库斯科，革命工人党党员成功地把其他一些小组织结合在一个被称为革命阵线的机构内。革命工人党同若干极左团体参加了共产党在其中占统治地位的全局保卫石油阵线。最后开始了旨在团结若干托派或半托派团体的谈判。这些团体中包括列宁主义共产党（从共产党分裂出来的组织）、一批独立人士所组织的“支持革命左派团结组织”、革命工人党以及革命

^① 维克托·比利亚努埃瓦：《乌戈·布兰科和农民起义》，第103—104页。

工人党(托)。

最初,革命工人党、革命工人党(托)和“支持革命左派团结组织”同意联合在一个单一的组织内。列宁主义共产党则踌躇不前,因为他们队伍内部有些反对合并的力量。到最后关头,革命工人党(托)经过再三考虑以后退出了联合谈判。

结果,革命工人党和“支持革命左派团结组织”联合起来在1961年12月最后成立了革命左派阵线。直到1963年初,列宁主义共产党才最后决定同革命左派阵线联合起来。^①革命左派阵线成了第四国际反巴勃罗的国际委员会派的秘鲁下属组织,如同革命工人党过去那样,在1963年国际托洛茨基主义各种力量局部地联合起来以后,它就成了第四国际统一书记处的下属组织。

冈萨雷斯·阿尼·卡斯蒂略评述革命左派阵线在成立时所追求的目标说:“当前的目标是完全结合,但是,事实上在一段时期中,组成革命左派阵线的两个组织(革命工人党和列宁主义共产党)是共存的。这造成了一些困难。如何对待那许许多多先于列宁主义共产党直接加入革命左派阵线的同志……以及后于它加入而并不属于上述两党的基层各组织的同志。”^②组成革命左派阵线的各个组织的成员似乎终于达到了完全的结合。不论在该组织内部有过什么争吵,那是和争论者过去隶属的组织毫不相干的。

巴勃罗-波萨达斯派托洛茨基分子的秘鲁下属组织虽然开始时曾经考虑加入革命左派阵线,却对它毫无友谊可言。第四国际巴勃罗派的拉丁美洲局在1962年5月16日通过的一项决议中认为“莫雷诺集团”(他们对革命左派阵线的称呼)已经“自行表明无力保持活动、政策和革命纪律,没有政治远见,不具有和不可能具有任何力量或理由来承担他们现在看来正在从事的重要活动。”拉

^① 贡萨洛·阿尼·卡斯蒂略:《游击战秘史》第124—126页。

^② 同上书,第126页。

丁美洲局进一步谴责“莫雷诺集团”是“帝国主义和资产阶级的代理人，”谴责他们盗用托洛茨基主义和第四国际的名义。^①

乌戈·布兰科和拉孔本雄山谷的农会

秘鲁托派的突出人物无疑是乌戈·布兰科。他是能得到群众性支持的唯一托派领袖。就是他把革命左派阵线的“起义路线”付诸实践。在这条路线失败而布兰科被捕以后，第四国际统一书记处派代表他组织了一场世界性运动，这不但得到另外两个国际托洛茨基派的支持，而且得到同托洛茨基派过去没有联系的一些著名知识分子的支持，甚至得到一些共产党的支持。

布兰科生于库斯科，维克托·比利亚努埃瓦称他为一个“典型的地方小资产阶级分子”。他就读于国立科学高级中学，青年时期博览群书，特别是诸如豪尔赫·伊卡萨和西罗·阿莱格里亚等作家写的描绘印第安的小说。^②中学毕业后，他去阿根廷，入拉普拉塔大学念农学系，他在那里参加了托洛茨基主义运动。在拉普拉塔大学的教师中有乌戈·布雷萨诺（纳胡埃尔·莫雷诺），他是阿根廷托派《工人的话》支部中的主要人物。乌戈·布兰科在1956年回国以后就参加了革命工人党的一派，那是像莫雷诺的阿根廷组织一样同那些反对“巴勃罗主义”的人们站在一起的。^③

布兰科在利马度过了几年，他在那里的革命工人党内很活跃，然后大约在1958年年中回到了他的故乡库斯科。显然他自己也不很肯定要干些什么，他在库斯科市做过各种工作，并在报童和擦皮鞋者等一些不大有可能发展的人们中组织工会。由于他从事工会和党的活动，1959年年中他在库斯科被捕入狱。他在狱中同另

① 《第四国际》（波萨达斯派），1962年9月，第173页。

② 维克托·比利亚努埃瓦：《乌戈·布兰科和农民起义》，第72页。

③ 同上书，第75页。

一名犯人安德烈斯·冈萨雷斯结成友谊，冈萨雷斯是离开库斯科市 90 英里的库斯科省拉孔本雄山谷的一名佃农。他们二人获释以后，已被布兰科赢得信任的冈萨雷斯让布兰科当了转租佃农，显然双方协议要在该山谷的农民中设法发展农会。

五十年代初，拉孔本雄山谷开始出现农会。在五十年代里，农会运动发展缓慢。1958 年，八个农会联合起来组成了拉孔本雄与拉雷斯地方农民联合会。它同库斯科工人联合会确立了友好关系，后者经常提供律师来帮助农会对地主提出控诉。虽然布兰科曾被任命为一些农会驻库斯科工人联合会的代表，他的证书却遭到控制该联合会的共产党人的反对。布兰科并不认为这个问题值得去争吵，而是决定集中力量在拉孔本雄山谷从事组织工作。^①他很快就成为乔皮马约种植园农会的一名主要人物，并在那里组织了一个革命工人学校，据胡利奥·科特勒和费利佩·波托卡雷罗说，该学校“宣传新思想并推动对庄园发动大规模进攻。”^②

1962 年，乌戈·布兰科自荐为拉孔本雄与拉雷斯地方农民联合会总书记候选人。当他当选后，若干老的农民领袖拒不接受，隶属于该联合会的二十个农会的代表退出去并挑选了自己的干部名单。因此，该联合会分裂成为两个对立组织。

韦斯利·W·克雷格评论布兰科成为联合会的总书记后在农民运动上采取的立场说：“已被公认为托洛茨基分子的布兰科比农会运动早先的领袖们采取强硬得多的措施。他感到农民归根到底必须采取暴力和可能的游击战来达到控制土地的目的。1960 年开始表明该运动是要实现小块土地所有制这个目标，并体现在‘无土地，毋宁死’这个口号中”。^③

① 贡萨洛·阿尼·卡斯蒂略：《游击战秘史》，第 34 页。

② 胡利奥·科特勒和费利佩·波托卡雷罗写了《秘鲁农民运动》一章，载兰兹伯格编的《拉丁美洲的农民运动》，第 315 页。

③ 韦斯利·克雷格：《秘鲁拉孔本雄农民运动》，第 287 页。

乌戈·布兰科把农民的夺地运动系统地写成一项“条令”，那是他作为该联合会的土改部长所发布的。这个文件在拉孔本雄山谷广泛散发，内容如下：

(1) 每个农会的全体代表会议应从会员中任命一个土地改革委员会。

(2) 佃户和转租佃农将自动成为他们耕作土地的业主。

(3) 未开垦土地将分成小块进行分配，首先分给最贫苦的农民。

(4) 已经为地主下种的土地，如地主行为合乎人道，可仍归地主所有。否则，那些土地，如有可能加上已由农会在集体控制的庄园房屋及设施，均作学校、商店、灌溉等用途。

(5) 不容许受雇于地主的机构进来插手，因为充分了解农业实际情况的人是农民自己。

乌戈·布兰科自己描绘过这一条令是怎么由农会贯彻的：“当我担任库斯科省农民联合会的土改书记的时候，我发出了一份条令，它在一百处地产上实施，使农民所得比现在的土改法（1964年）更多。……简单来说，该条令规定把土地给予耕作者而不需以任何方式给地主补偿。无地的人或土地极少的人可分配未开垦土地，条件是分配后即行开垦。在有些地产上，农会决定多少土地可留在地主手里。像乔皮马约的情况，那里的牧场主是真正的杀人犯，农会就无偿没收土地、房屋、建筑物等等，这一切都成为集体财产，用作学校、医疗设施、辩护费（入狱农民的赎金、‘律师’等等）。这场深入土改的所有（或几乎所有）负责人都被拘捕了。其他人在斗争中身亡。”^①

布兰科也进行纳胡埃尔·莫雷诺提出的革命进程的第二个步骤。美国托派的青年社会主义同盟发行的一本小册子描绘这个情

^① 《洲际新闻》，纽约，1969年9月29日。

况说：“布兰科开始为没有武装的农民建立保卫组织，以便使他們能保护收回的土地。如果反动地主或警察恐吓他們，印第安人就在布兰科巡视农会时向他报告。如有可能，他就派一个农民武装委员会去进行调查，并通知警察：农民已受到保卫，使警察放冷静些。该联合会开始取得一些武器，希望在每个地方都建立起保卫组织。”^①

1962年11月13日，布兰科和信从他的一些农民袭击了普西乌拉地方军事当局民警队的警察分局。当时值班的唯一民事警卫队的警察被杀；布兰科和他的朋友夺走了三支步枪、一支手枪、弹药和装备；布兰科成了逃避法律的亡命者。^②他和少数信从者一起在拉孔本雄山谷的农民中寻求避难。等到他在1963年5月被捕的时候，库斯科地区的其他托洛茨基分子也已经被警察逮捕了。^③

随着乌戈·布兰科退出舞台，他曾经在拉孔本雄山谷和库斯科地区所能够施展的托派影响显然消失了。在其后几年中，秘鲁政府先是废除了农民对当地地主负有的半封建“义务”，然后使农民得到小块土地的所有权，那些土地过去是地主允许印第安农民自行耕作的；这些措施大大减弱了该地区农民中的激进影响。当一批游击队员（同托派无关）设法在1965年到拉孔本雄山谷建立基地时，他们得到极少支持或得不到支持。^④

支持乌戈·布兰科的运动

随着乌戈·布兰科在库斯科地区工作的失败，革命工人党至少暂时放弃了它对“起义路线”的强调。何塞·马托雷尔给维克

① 青年社会主义同盟编：《无土地，毋宁死》（1967年），第12页。

② 维克托·比利亚努埃瓦：《乌戈·布兰科和农民起义》第139页和贡萨洛·阿尼·卡斯蒂略：《游击战秘史》第136—138页。

③ 维克托·比利亚努埃瓦：《乌戈·布兰科和农民起义》第150页。

④ 韦斯利·克雷格：《秘鲁拉孔本雄农民运动》，第92页。

托·比利亚努埃瓦的一封信中强调了这一点,信中说:“不管现在说的或者将来说的是是什么,在1961—62年期间曾经坚持认为当时的历史任务是要通过武装斗争为主的起义过程来实现秘鲁革命。……从那时以来,什么话都说过,但事实是当时在1962年初谁也不怀疑尽快开始武装行动的必要性。……后来,阿根廷的乌戈·布雷萨诺以及其后的革命左派阵线和乌戈·布兰科修改了起义路线的立场,把它改变为一种计划进行的群众运动,在某些情况下掺杂一些过去的立场使它适应于新的立场,以便令人有一种连续感。”^①

在布兰科和他最亲密的同伴被捕以后,革命左派阵线和第四国际统一书记处本身的许多活动都是环绕他来进行宣传活动的。例如1967年1月2日一期的第四国际刊物《世界前景》几乎完全谈的是布兰科的案子。

1967年4月份一期的第四国际西班牙文刊物《第四国际》上刊登了一篇长文:《保卫乌戈·布兰科和所有秘鲁政治犯的世界性运动》。该文指出,那些被征集来为了布兰科写信给秘鲁政府的人们不但包括亲卡斯特罗的民族解放军和左派革命运动在内的其他秘鲁革命团体的代表,而且有下面一些组织和个人:美国争取公正对待拉丁美洲政治犯委员会,让-保罗·萨特,法国的三个教育工作者工会,一个法国天主教团体,作家西莫内·德博瓦尔,法国经济学家夏尔·贝特兰,一批著名的法国知识分子,一批英国政治家和记者、包括若干国会议员,大赦国际,一个总部在伦敦的专为政治犯作斗争的团体,各类意大利政治家、包括若干名共产党领袖以及墨西哥共产党。在第四国际统一书记处的托洛茨基分子有影响的地方,举行了会议来抗议对布兰科的审讯和监禁。1967年1月27日,加拿大托洛茨基分子在多伦多举行的一次集会是很典型

^① 维克托·比利亚努埃瓦:《乌戈·布兰科和农民起义》第155页。

的，会上有一些大学教授和一位左翼记者兼教授安德烈·冈德·弗兰克*讲了话。^①

乌戈·布兰科仍然关在狱中，直到1966年8月，当他被送到秘鲁最南部城市塔克纳的一个军事法庭受审为止。虽然检察官要求判以死刑，但最后判布兰科徒刑二十五年。他的一些同伴判刑轻一些。他提出了上诉，检察官又一次要求判以死刑；1968年，向军事法庭最高委员会的上诉被驳回，维持二十五年徒刑的原判。^②布兰科最后在1971年1月一次大赦后获释。^③几个月以后他被流放到墨西哥去了。^④

革命左派阵线的意识形态

隶属于第四国际统一书记处的秘鲁托派，在六十年代中、后期发展起一种具有某些特点的思想立场。这种意识形态主要是基于布兰科及其同伴们于1958至1962年间在拉孔本雄山谷取得的经验。

这一思想立场的主要代表人物是乌戈·布兰科本人，他虽然在1962年被剥夺了领导地位，在被捕以后却被视为该党的主要发言人。托派出版社“秘鲁革命出版社”于1964年7月在利马出版的一本题为《我们的革命道路》的小册子详尽地提出了他的观点。

在这本小册子中，乌戈·布兰科强调农民在秘鲁革命发展中的重要性。他强调农会的重要性，把它作为可以同俄国布尔什维克革命中的苏维埃相比的初生的“双重政权”。十分明显，他关于

* 安德烈·冈德·弗兰克曾在美国和拉丁美洲国家的一些大学任教，现任英国东英吉利大学发展问题研究所教授。

① 安德烈·冈德·弗兰克：《乌戈·布兰科不能死去》（1965年）。

② 《洲际新闻》，纽约，1968年9月16日。

③ 同上，1971年1月11日。

④ 同上，1971年9月27日。

秘鲁马克思列宁主义革命的“模式”就是根据他自己在拉孔本雄地区从事农民组织的活动的经验总结。

因此,布兰科主张首先应重视发展农会,但是农会是一种非常广泛的组织,事实上应当被认为是新社会的核心。所以,他认为农会应承担的任务中包括了基层的法治工作、农村地区兴办学校的工作、各种保健服务的组织工作、成立合作社(消费合作社、信贷合作社等等)的工作以及为某些特定居民组织小型公共工程的工作。农会应承担指导农民采取现代化耕作方法和经营作物的任务;它们还应当为农民成立地方保卫组织,应当组织起来占领大地产。各地方农会组织或地区农会联合会,和一个全国性农会联合会,那应当成为一个权力核心,使它能同国家的传统政府相抗衡。^①

虽然乌戈·布兰科使用的模式是他自己在拉孔本雄地区农民中工作的经验,但他承认这种模式并不完善。他认为自己在六十年代初期工作中的基本弱点是缺乏一个组织相当良好的革命政党。他在1968年的一次访问中说:“我参加过的,以及其后的游击斗争的基本弱点是它没有一个扎根于全国群众的党的支持。我不能抱怨我们1962年的武装行动缺乏民众支持。但是当时缺乏引导这种支持的手段,缺乏一个纽带,缺乏一个党。我们的大错误是没有把党的因素从根本上给以重视。”^②

布兰科的立场似乎更接近于毛主义关于马克思列宁主义革命的模式,但是在1969年他重申了马克思列宁主义者委派无产阶级担任这一传统任务的重要性。他在1969年初发表的一次访问记中回答“农民在革命进程中的作用是什么?”的问题时说:“今天,秘鲁的农民是主要的革命力量,但是从长远来说,一旦他们取得土地以后,就成为资产阶级分子了。长远来说,工人阶级是社会主义革

^① 乌戈·布兰科:《我们革命的道路》(1964年)。

^② 《洲际新闻》,纽约,1968年9月30日。

命的唯一保证。我们的工作集中在农村，但只是因为我们的力量有限，使我们不能全国规模地开展斗争，不能除农村以外还在工厂开展斗争。”^①

布兰科对于菲德尔·卡斯特罗的信徒们所主张的“游击中心”理论表示深刻的异议。在1969年初的一次访问中，当他被问到对雷吉斯·德布雷的《革命中的革命？》一书有何看法时，布兰科评论道：“我的主要批评意见是，他缺乏党的观念，他把‘游击中心论’看成是整个拉丁美洲的万应良方。对各国的情况没有作具体分析。秘鲁的革命政治不能由这种武断的观点来指导。”^②几乎在一年之后，布兰科补充说：“卡斯特罗主义的同志们混淆了革命和游击战，他们用游击队去取代党。这是最显著地削弱他们力量的因素。……他们有一些矛盾的方面。由于缺乏深刻的分析，他们对共产党的机会主义批判却导致他们抛弃了马克思列宁主义的许多根本方面。他们低估了党的重要性。他们低估了群众运动的重要性。他们过高估计并美化了单枪匹马的英勇行为。”^③

革命左派阵线和贝拉斯科政权

隶属于第四国际统一书记处的革命左派阵线的托洛茨基分子，对于胡安·贝拉斯科将军的民族主义军政权的态度，不如革命工人党(托)的托洛茨基分子那么热情。他们支持该政府推行的若干措施，但不象革命工人党(托)领袖们那样给以那种普遍支持，更不象前托洛茨基分子伊斯迈尔·弗里亚斯那样的支持了。

革命左派阵线关于贝拉斯科政府的最权威性的声明，也许是该党在1969年8月20日发表的那一份。该声明指出：“一部分左

① 《洲际新闻》，纽约，1969年3月3日。

② 同上。

③ 同上，1970年2月23日。

派人士……说军政府是革命的和民族主义的，”接着说：“我们革命左派阵线的正统托洛茨基主义者认为军政府是一个资产阶级政权，它希望国家发展，但是它不是民族主义的，更不是革命的。”革命左派阵线的声明继续谈它对贝拉斯科政府的看法如下：“从一开始，我们就说过它是波拿巴主义的，那就是说，它总的代表了剥削阶级的利益。在这种波拿巴主义的范围内，在它保存现制度的总目标的范围内，它倾向了赞成经济发展的那部分力量，那就是，其利益在于秘鲁工业发展的那部分国内外资产阶级。”^①

乌戈·布兰科本人对贝拉斯科政权的土改纲领进行过评论，那个纲领肯定是军政府发布的最根本性的一项改革。在据称于1969年7月间进行的一次访问记中，他评论道：“军政府采取的立场有利于被剥削群众并捍卫了民族主权，必须坚定地予以支持。那是没有疑问的。在土改法的具体事例上，我们可以说：这是一部先进的立法，在许多方面优于先前的法律。……但是这项法律象先前的一样，并未提出农民所希望的无偿没收大地产。”^②布兰科显然希望秘鲁土改的结果能导致合作社耕作而不是个体耕作，但是他表示不相信强制办法作为实现这一点的手段：“如果一开始农民分了地，而另一批农民共同经营土地而得到高产，那么后者能使前者改变主意。情况正是这样，因为先锋分子努力把自己组织在合作社里。”^③

当布兰科从监狱获释以后，他对贝拉斯科政府土地改革以及它的一般改良计划提出又一种估计。他谈到的一部分内容是：

帝国主义急切地需要为它的制成品和机器寻找更广大的

① 《洲际新闻》，1969年10月20日。

② 同上刊物，1968年9月29日。

③ 同上。

市场。这种新资本主义政策的目的是适应这样一种土地改革，这种土改将产生一个能吸收帝国主义国家消费品出口的广大的小农业主阶层。

我们这些国家的工业化也适合于这种政策的目的。因为这样能吸收帝国主义的机器出口。即使我国进行这种发展的工业公司并不是帝国主义企业而是民族企业或者甚至是国营公司，情况也是这样。

军政府实验的改革……适应于帝国主义新资本主义的这种总政策。不但是土改那样的具体经济措施是这样（其目的是产生工业品消费者阶层），别的发展法也是这样（其目的是为老板的利益而推动这种发展）。而且教育改革也是这样（其目的是为了提供技术工人，例如车床操作工，那是工业奴隶而不是地主手下的目不识丁的印第安农奴）。

政府的改良措施，除了这些基本的经济原因外，还有政治原因。不仅是主张发展的人们，而且是剥削阶层中最精明的分子，都知道我国以前的情况是不能继续下去的，知道一场真正的民众革命的危險已临近了。

布兰科在回答“秘鲁进程对于拉美的革命动乱的背景具有什么历史意义？”的问题时，总结了他（看来也是他的党）对贝拉斯科政权的看法。他回答那个问题说：“这是一个受谴责的制度孤注一掷地力图扭转人民起来搞真正革命的最后行动之一。”^①

根据贝拉斯科政府的土地改革，布兰科号召他在革命左派阵线中的支持者到农村去在农民中开展工作。他特别向学生们呼吁。他在1969年晚些时候的一篇文章中写道：“我的立场如下，那是在大学里辩论土改法的通过是不是学生们大规模走向农村去的

^① 《洲际新闻》1971年2月8日。

一个理由……我再次号召学生们大批地涌向农村。我们必须坚持我们对土改的批评，但是不要呆在城市讨论它。到农村去推动土改、真正相信土改的人比起那些留在校园里以‘教条式的’革命立场来抨击土改的人，就是更好的革命者。”^①

革命左派阵线的大学部似乎听从了布兰科的建议。它在1969年年中通过了一项决议，在实施办法的部分提出：“这个学年应献给秘鲁农民。因此，不要去上课了，而应在我们的学生会和学生联合会领导下到农村去团结农民。……我们必须力求实行真正的土改，进行有效的组织和生产，并积极参加活动来达到这些动员的要求。”^②

革命先锋

1960年后半年，秘鲁出现了一个半托派性质的新组织。那就是革命先锋（Vanguardia Revolucionaria），它的主要支持来自大学。它是在卡斯特罗派的左派革命运动和亲中国的共产党人所发起的游击运动失败以后在1965年成立的。正如S.洛佩斯在第四国际统一书记处的法国支部共产主义同盟（Liga Commaniste）的期刊上所写文章中所评论的：由于革命左派阵线的软弱，它往往使激进部分发生两极分化。但是，洛佩斯指出它倾向于“折衷和调和”，说它设法避免讨论“国际共产主义运动内部的意识形态斗争”。它甚至低估托洛茨基在制订原来的共产国际纲领时所起的作用。但是洛佩斯的确承认它具有托派色彩。

革命先锋在全国大学里发展很快，大部分取代了毛主义组织和卡斯特罗派组织对学生联合会的领导。但是，到了1971年，革命先锋成员受到成分复杂之害。它分裂成三个对立组织，都用革

① 乌戈·布兰科：《动员农民》，载《洲际新闻》，纽约，1969年10月13日。

② 《洲际新闻》，纽约，1969年9月22日。

命先锋的名称。这些分裂出来的小组织之一公开宣称自己是托派，其他两个倾向于毛主义的方向。当时革命先锋中公认的托派还没有同左派革命阵线或革命工人党(托)发展起密切的联系。^①

结 论

到1971年，秘鲁的托洛茨基主义运动分裂成三个不同的组织。其中两个有国际归属关系：革命工人党(托)隶属于第四国际的波萨达斯派，左派革命阵线隶属于第四国际的统一书记处派。革命先锋当时还没有任何国际联系。

秘鲁的托洛茨基主义在存在四分之一世纪期间，并不是一个重要的政权争夺者。在五十年代末，它确实开始在劳工运动中起到某些影响，主要的受益者是革命工人党(托)。在六十年代初，革命工人党(后来是革命左派阵线)在库斯科省农会中取得了领导地位，虽然，在主要的托派领导人乌戈·布兰科被监禁和政府有关地区实行土改以后，这种影响似乎已消失。现在，托洛茨基主义仍然是秘鲁极左派的一个比较次要的因素，而极左派本身还只是秘鲁全国政治中的一个次要成分。

^① 同阿道弗·贝内加斯的谈话，1971年7月12日于利马。

第九章 列夫·托洛茨基、迭戈·里维拉和墨西哥的托洛茨基主义

墨西哥的托洛茨基主义有其特色,原因如下:首先,墨西哥是列夫·托洛茨基居住过的唯一拉丁美洲国家,也是他同他的拉丁美洲支持者们曾经在那里保持比较密切的个人联系的唯一拉丁美洲国家。其次,墨西哥的托洛茨基主义运动,至少在一段时期里,在它的成员和领袖中有壁画大师迭戈·里维拉这样的国际知名人士,在它的同情者中有小说家何塞·雷维尔塔斯和音乐家卡洛斯·查维斯这样杰出的知识界人士,这在拉美地区也是绝无仅有的。最后,墨西哥的托洛茨基分子是受美国托洛茨基主义运动直接影响并通过它而受第四国际影响的拉丁美洲组织。美国托洛茨基分子曾经直接地,有时专横地干预墨西哥托派的内部争执。

墨西哥托洛茨基主义的起源

和墨西哥共产党一样,墨西哥共产主义的变种托洛茨基主义的产生,主要是由一个美国人开始的。^①墨西哥第一个改信托洛茨基主义的人看来是拉塞尔·布莱克韦尔,他原来是美国共产党人,二十年代末到墨西哥来组织共产党的儿童组织“先锋队”。

布莱克韦尔在墨西哥曾使用罗萨利奥·内格雷特的名字。他同情美国共产党内在托洛茨基对斯大林斗争时站在托洛茨基一边

^① 有关墨西哥共产党起源的讨论,见罗伯特·J·亚历山大:《拉丁美洲的共产主义》(1957年),第15章。

的那些人。美洲共产主义联盟建立后,他开始收到联盟的报纸《战斗者》以及其他托派刊物。他也开始在墨西哥共产党人中寻找归依托派的人,过去和布莱克韦尔共事的一个人写道,“拉塞尔在墨西哥播下了托洛茨基主义思想的叛逆种籽,他看来是设法(在革命组织中)看到当前和憧憬未来,看到赋予有创造力的自由人以生气的人类社会的启蒙者。他本人是富有创造力的,所以他如同卡尔·马克思所梦想的那样来筹划未来。为了寻求实现这一目标,他像熊熊烈火一般地燃尽了他的一生。”^①

布莱克韦尔的第一位归依者是曼努埃尔·罗德里格斯。罗德里格斯是个没有固定职业的年轻人,二十年代初,他对马克思主义哲学,特别是对恩格斯的著名哲学论著《反杜林论》发生了兴趣。随后,他积极参与左翼政治运动,参加墨西哥共产党为支持奥古斯托·桑地诺*而组织的一些活动。桑地诺是正在对占领他的国家的美国海军陆战队进行游击战的一名尼加拉瓜人。罗德里格斯通过这些活动参加了红色援救队。这是一个共产党的外围组织,成立这一组织的明显目的是筹集款项来保卫世界各地的共产党政治犯。

最初,曼努埃尔·罗德里格斯没有获得共产党领导人的信任。他们后来告诉他说,由于他以极大热忱参加各项工作而不问工作多么低下,这使他们怀疑他可能是一名内奸。但是在他数次被捕之后,他赢得了共产党领导人的信任。他虽然从未正式加入共产党,但终于像党员那样获得信任;中央委员会在他家里举行过几次会议,送交共产党的邮件是通过他转递的。

^① 曼努埃尔·罗德里格斯致罗伯特·J·亚历山大的信,1971年3月。

* 塞萨尔·奥古斯托·桑地诺是尼加拉瓜民族英雄。1926年,美国借口“保护”其利益出兵占领尼加拉瓜,他领导人民发动游击战争,迫使美国于1933年撤出尼加拉瓜。1934年他被尼加拉瓜国民警卫队总司令安纳斯塔西奥·索摩查·塔乔杀害。——译者

同时，罗德里格斯开始参加由拉塞尔·布莱克韦尔所组织的一个亲托洛茨基主义的组织；这个组织的成员有罗德里格斯的妻子何塞·雷维尔塔斯（她后来成为一个著名的小说家）和佩德罗·玛丽亚·安纳亚·伊瓦拉，几十年之后伊瓦拉当上了政府报纸《国民报》的编辑部秘书。布莱克韦尔被开除出共产党（并且被他以前的同志们痛打了一顿），之后不久就作为危险的激进分子被驱逐出墨西哥。但是他建立的那个组织还继续活动。1933年间，这个组织出版了各种油印小报，一份名叫《反对派》，另一份叫《左派》。参加这一组织的还有其他一些成员，其中包括费利克斯·伊瓦拉（后来一些年里他在托派事务中起重要作用）和伊瓦拉的一些亲属。

与此同时，罗德里格斯还被开除出他所参加的几个共产党外围组织，尽管他被开除的理由和他同情托派一事毫不相关。他被开除的原因是因为他寄出了共产党中央委员会将在他家举行会议的通告，通告刊载在他所任职的商业公司的广告栏里。他被开除出共产党外围组织之后，他公开宣称他信仰托洛茨基主义，并且带头在墨西哥建立一个公开的托洛茨基主义的组织。因同情托派而不久前被开除出共产党的其他一些人也参加了罗德里格斯的组织。^①

被共产党及其外围组织开除的人组成了共产党左翼反对派。1933—1934年间，他们积极设法同有组织的劳工运动建立联系。只要有重要罢工，共产党左翼反对派成员就向罢工工人散发宣传品，但是此时他们在吸收罢工工人加入他们的队伍方面没有取得什么成就。

费尔南德斯—加利西亚集团

对墨西哥托洛茨基主义的诞生起过重要作用的第二个组织是

^① 同曼努埃尔·罗德里格斯的谈话，1971年1月22日于墨西哥城。

由卢西亚诺·加利西亚和奥克塔维奥·费尔南德斯领导的。他们两人都是教师。加利西亚来自维拉克鲁斯州的哈拉帕。他在当地师范学院学习时就有志于参加共产党的活动。他同共产党人共事了若干年,从事一般的日常工作,如张贴标语,通知开会等等。即使在那里,他也偶而看到左翼反对派的一项通告,那是在纽约市用西班牙文出版准备在拉丁美洲发行的。他写信给通告的出版者,开始定期地收到托派的材料。

1931年,加利西亚搬到墨西哥城上教育学院。他在那里接触到的人要比他在哈拉帕认识的人受过更多的意识形态训练。他开始在红色援救队、革命作家与艺术家联盟(作家和画家们的一个共产党外围组织),和共产党的青年组织共产主义青年团中进行工作。1933年末,他终于决定加入共产党。在这个时期,他继续同左翼反对派保持联系,并且向墨西哥城的共产党人宣传左翼反对派的思想。他不久当上了联邦区红色援救队的头头。^①

墨西哥托洛茨基主义的第二个先锋组织中另一个主要人物奥克塔维奥·费尔南德斯通过拉塞尔·布莱克韦尔的帮助,设法使托派从墨西哥共产党分裂出去。1932年费尔南德斯在教育学院学习时认识了布莱克韦尔。布莱克韦尔使费尔南德斯同美洲共产主义联盟盟员、墨西哥裔美国人A.冈萨雷斯进行接触。冈萨雷斯的主要任务是为拉丁美洲的托派建立联系。他也结识了加利西亚。他们两人同教育学院的另一名学生本杰明·阿尔瓦雷斯一起决定于1933年末参加墨西哥共产党。

然而到了1934年3月,加利西亚、费尔南德斯和阿尔瓦雷斯认为没有什么理由再留在共产党内(因为共产党本身规模很小),决定干脆建立自己的组织。他们退出共产党,但共产党不承认他们有权退出,而坚持把他们开除出党。由于当时共产党的习惯作

^① 同卢西亚诺·加利西亚的谈话,1971年1月22日于墨西哥城。

法是把被开除出党的人痛打一顿，于是这三名师范学院学生就带了手枪去出席开除他们的“审讯会”，以保证自己不会受到那种通常的待遇。

一旦脱离了共产党，这些未来的教师就同团结在曼努埃尔·罗德里格斯周围的那个组织联合起来，他们通过他们在纽约的共同通讯员同罗德里格斯的组织保持联系。他们参加了共产党左翼反对派，1934年以后，这个组织改名为国际共产主义同盟。同盟的第一项工作是出版一份名叫《新国际》的杂志，发行了五期。

这个新的托洛茨基主义组织第一年的主要工作是出版他们的杂志。他们曾经设法从著名的壁画家迭戈·里维拉那里获得资助。里维拉公开表明他同情列夫·托洛茨基的立场；他们还求助于音乐家卡洛斯·查维斯、小说家何塞·雷维尔特斯和知识界的其他人士，所有这些都出力资助《新国际》的出版。^①

1934年3月15日第一期《新国际》刊载一则加利西亚、费尔南德斯和阿尔雷斯三人退出共产党时发表的政治声明，以及对墨西哥共产党机关报《砍刀》猛然攻击他们三人一事所作的答复（该报指责他们是“诽谤者、内奸、分裂者、反革命”）。^②

随后几期的《新国际》刊登了列夫·托洛茨基本人写的几篇文章，包括《工团主义与共产主义》、《统一战线的历史观》和《不断革命》。同时，还刊载诸如弗里德里希·恩格斯的《一八九〇年“五一”声明》这类作品，不久前在巴黎召开的国际左翼反对派代表大会作的报告，以及一篇题为《墨西哥工业如何布局》的文章^③。

国际共产主义同盟早期的活动

同盟于1934年年中举行一次“地区性”会议，其实是一次全国

① 同奥克塔维奥·费尔南德斯的谈话，1971年1月21日于墨西哥城。

② 《砍刀》，墨西哥城，1934年3月20日。

③ 《新国际》，墨西哥城，1934年3月15日、4月和5月。

性会议；会议选出一个执行委员会，批准了党章和通过关于有组织劳工与若干农业问题的文件。^① 1934年8月，同盟还展开筹集资金的运动。同盟印发了题为《致在业的知识分子、学生、工人和农民》的号召书，要他们保证作出捐献。号召书宣告，“我们号召一切革命者前来援助我们，这也是对无产阶级革命事业的援助。”^②

同盟还着手建立一个外围组织——马克思列宁主义研究与宣传协会。迭戈·里维拉任协会总书记，联盟的四名盟员（其中包括卢西亚诺·加利西亚）是协会的执行委员会委员。奥克塔维奥·费尔南德斯在一次协会会议上所作的报告中说：

上个月23日星期六，协会为诗人古铁雷斯·奥尤斯逝世周年举行了纪念集会。我们得到音乐家查维斯和里维尔特斯的合作，会议的结果要比我们预期的好得多。迭戈·曼努埃尔·罗德里格斯和一位工人讲了话，会上还唱革命歌曲，人们情绪十分高昂；有很大部分工人向托洛茨基、同盟和第四国际欢呼。你们将会知道，这里出现了一个组织，实际上是法西斯组织，名叫“墨西哥革命行动党”，在该党的初期发展阶段，法西斯主义的特点一应俱全，那就是：反犹民族主义，反对马克思主义，在工人要求方面提出蛊惑宣传，等等。好吧，在这里，这些“黄金衫”企图破坏各种革命集会。我们预见到他们想要瓦解我们的会议，我们用棍棒武装起来。当会议即将开始时，一批“黄金衫”出头露面了，开始分发他们的宣传品，但工人们同仇敌忾，他们不得不退出了。会议的政治内容很好。里维拉发言抨击法西斯主义，谈到了我们统一战线的策略。罗德

① 奥克塔维奥·费尔南德斯档案（下文简称奥·费档），奥克塔维奥·费尔南德斯致 A. 冈萨雷斯的信，1934年7月3日。

② 奥·费档，国际共产主义同盟筹资的呼吁书，1934年8月15日。

里格斯谈了战争的危险性，我们成功地售出了我们的许多期刊。^①

美国托洛茨基主义领导人对他们墨西哥同志的这种外围组织并不完全表示满意。他们认为，不应当把外围组织单单看作是同盟的法律工具，而是作为一个同情者的组织。他们认为这个外围组织同盟的名称同托派过于密切。^②托洛茨基主义分子也力求在有组织的劳工运动中获得影响；到了1935年初，他们终于组织了一个小型纺织工人工会，还试图建立一个建筑工人工会。^③

在墨西哥托洛茨基主义运动的早期阶段，其领导人和成员同共产党和墨西哥政府都很难相处。整个1934年，共产党正式刊物《砍刀》以及各个共产党外围组织的机关报都猛烈攻击列夫·托洛茨基在墨西哥的追随者。^④在托洛茨基主义运动正式在墨西哥发动之时，墨西哥政府还在大肆镇压一切左翼不满分子。结果是，1934年9月四名托派领导人被捕并被放逐到玛丽亚斯群岛。这一件事使美国的托洛茨基主义分子A.冈萨雷斯说他有一个时期担心这种事态发展，因为他认为墨西哥同志对警察的迫害没有采取提防措施，而这一措施是诸如国际共产主义同盟这类地下组织所必须采取的。^⑤

国际共产主义同盟的早期分裂

国际共产主义同盟成立不到一年时间就分裂为若干争执不休

① 奥·费档，奥克塔维奥致冈萨雷斯的信，1934年7月3日。

② 奥·费档，A.冈萨雷斯致奥·费的信，1934年7月19日。

③ 奥·费档，路易斯·古铁雷斯（奥·费）致A.冈萨雷斯的信，1935年2月4日。

④ 奥·费档，A.冈萨雷斯致奥·费的信，1934年6月3日；奥·费致A.冈萨雷斯的信，1934年7月3日。

⑤ 奥·费档，A.冈萨雷斯致奥·费的信，1934年9月22日。

的集团。虽然个人的分歧对这次分裂确实起着重要作用，但也涉及到意识形态和政治策略方面的问题。这些问题的一个根源，是曼努埃尔·罗德里格斯和画家迭戈·里维拉之间十分密切的联系。罗德里格斯在经受了长期失业(主要是因为他参加政治运动)和经常在牢房“度假”之后，当上了里维拉的秘书。同盟的其他成员显然感到罗德里格斯在组织里实际上成为“里维拉的人”，虽然罗德里格斯始终不承认这一点。^①

论战中的意识形态问题起因于国际托洛茨基主义运动中著名的“法国式策略”。国际左翼反对派法国支部根据列夫·托洛茨基本人的建议，加入了法国社会党，作为社会党的一个派别进行活动，并为托洛茨基主义赢得新的成员。全国其他托洛茨基主义组织随后也采取了类似的行动，最后美国的托洛茨基主义分子在1936年初加入了美国社会党。

曼努埃尔·罗德里格斯认为国际左翼反对派的墨西哥下属组织应该采取像法国下属组织同样的行动。他认为，国际共产主义同盟盟员应当加入左派社会党。这个党是在1934年的竞选运动中出现的，它要支持维拉克鲁斯左翼州长阿德尔贝尔托·特赫达想当总统的野心。在拉萨罗·卡德纳斯(政府的官方政党国民革命党候选人)当选总统之后，该党还继续存在一个时期。左派社会党是一个很松弛的组织，罗德里格斯深信托洛茨基主义分子可以在这个组织内活动并吸收新的成员。^②

罗德里格斯和国际共产主义同盟其他领导人之间的另一争端，是关于他们是否应当同墨西哥工农总联合会当时的头头、强烈反共的维森特·隆巴多·托莱达诺密切合作。1934年初，托莱达诺出席了国际共产主义同盟的一些会议，而且显然曾经考虑加入

① 同曼努埃尔·罗德里格斯的谈话，1971年1月22日于墨西哥城。

② 同上。

这个同盟。他设法得到托洛茨基主义分子的帮助，并建议同他们实行广泛合作。罗德里格斯主张接受这一建议，但同盟的其他成员，包括卢西亚诺·加利西亚和奥克塔维奥·费尔南德斯，则反对这一主意。^①

这些论战的结局是国际共产主义同盟分裂为三个敌对派系。其中一派最初是以加利西亚和费尔南德斯为首，第二派是以罗德里格斯为首，第三派的头头是S. 德安达，此人在1934年初就扬言要分裂出去，因为他断言费尔南德斯和加利西亚持“斯大林主义态度”，虽然这些分歧随后得到了平息，至少是暂时的平息。^②

这一分裂持续了一年多。1935年8月1日，曼努埃尔·罗德里格斯和费利克斯·伊瓦拉为一方同奥克塔维奥·费尔南德斯为另一方，虽然签署了一项显然是要使两个组织实现联合的文献，^③但是这并没有结束墨西哥拥护第四国际的人们中间长期的不和。

卢西亚诺·加利西亚曾于1935年初停止了同奥克塔维奥·费尔南德斯的联系，他后来是众所周知的列宁主义青年组织委员会这一新组织的主要领袖，而S. 德安达也是这个组织的成员。12月，这些人发表一项宣言，谴责“迭戈·里维拉集团”，显然是指罗德里格斯—费尔南德斯分子，而且不承认它是托洛茨基主义派。他们还表示支持建立人民阵线的想法，支持新近组织的全国保卫无产阶级委员会，这个委员会是在隆巴多·托列达诺的领导下为试图团结全国所有对立的工会组织而建立起来的。几个月之后它赞助建立墨西哥工人联合会。这一宣言号召建立“墨西哥真正独立的革命工人政党”，并且保证拥护建立第四国际的运动。^④

① 同奥·费的谈话，1971年1月21日于墨西哥城。

② 奥·费档，奥·费致A·冈萨雷斯的信，1934年6月3日；A·冈萨雷斯致奥·费的信，1934年7月19日；奥·费致A·冈萨雷斯的信，1934年9月22日。

③ 奥·费档，《国际共产主义同盟墨西哥圣胡利娅支部和工人垦殖组织的代表，就现有支部存在的问题和支部的统一问题作出的决议》，1935年8月1日。

④ 奥·费档，《墨西哥托洛茨基分子对工人的宣言》，1935年12月。

重新组织国际共产主义同盟

1936年年中，墨西哥托洛茨基分子又实现了一定程度的联合。曼努埃尔·罗德里格斯完全退出了这一活动，而S.德安达则保持他自己的一个小组。这个组织同西班牙的马克思主义统一工人党建立了某种关系，有一个时期出版了一份与马克思主义统一工人党的同名刊物《战斗》。但是，以卢西亚诺·加利西亚和奥克塔维奥为首的力量再次在国际共产主义同盟这个老名称下联合起来了。^①

新的同盟是由卢西亚诺·加利西亚、奥克塔维奥·费尔南德斯、费利克斯·伊瓦拉和迭戈·里维拉所组成的政治局领导的。伊瓦拉当了一个时期的总书记，他用全部时间致力于同盟的活动。这是迭戈·里维拉第一次正式出现在墨西哥托洛茨基主义运动的领导层中。^②

重建的同盟开始出版一份报纸《第四国际》。第一期是1936年9月3日，报头的副题是“第四国际墨西哥支部国际共产主义同盟(布尔什维克—列宁主义)机关报”。该刊总共出了十六期，最后一期的日期是1937年12月，当时同盟已经再次分裂为争执不休的若干派系。

《第四国际》是一份办得很活跃的报刊。报纸篇幅大，擅长于经常标出特号大字标题，刊载各种不同内容的材料，包括大量有关西班牙内战的消息，特别是关于西班牙和俄国的斯大林主义者图谋镇压西班牙共和国力量内部反对派的新闻；谴责莫斯科第一批审讯的新闻，以及经常刊载有关墨西哥政治和工会事务的新闻和评论。同时还刊登国际左翼反对派发出的长篇文献以及列夫·托

① 同奥·费的谈话，1971年1月21日于墨西哥城。

② 同费利克斯·伊瓦拉的谈话，1971年1月20日于墨西哥城。

洛茨基亲自撰写的许多文章。

在此时期，托洛茨基分子第一次开始在劳工运动中发挥了一些实际的影响。当时在墨西哥城和其他城镇，建筑行业出现一派繁荣景象，托洛茨基分子带头组织了统一建筑工会，它成为这一迅速发展的行业的工人中最大的工会之一。他们在“人民之家”也拥有影响，“人民之家”是一个面包工人工会，它曾经在其总部殷勤接待过其他一些小的工人组织。迭戈·里维拉同“人民之家”领导人的关系特别密切。^①

列夫·托洛茨基与墨西哥托洛茨基主义

与此同时，列夫·托洛茨基本人去墨西哥定居下来了。托洛茨基在墨西哥寻求避难的想法，看来最初是在曼努埃尔·罗德里格斯同国际左翼反对派秘书处的通讯中提出来的。罗德里格斯当时正在卡德纳斯总统的内阁成员弗朗西斯科·穆希卡将军手下工作。穆希卡向罗德里格斯保证，如果时机到来，卡德纳斯政府会乐意考虑这一想法。^②

稍后，在1936年夏天，国际共产主义同盟政治局收到第四国际国际书记处一封信，询问托洛茨基前来墨西哥的气候如何？同盟开始为此发动一场宣传运动，但是他们承认自己“从来没有考虑到这种可能性：首先，托洛茨基是否迫切要求前来墨西哥；其次，卡德纳斯将军的政府是否会同意他来避难。”

但是，1936年11月21日，迭戈·里维拉收到纽约拍来的电报说，探讨卡德纳斯将军是否许可托洛茨基前来墨西哥的问题现在是生死攸关的当务之急。同盟政治局立即决定派遣里维拉和奥克塔维奥·费尔南德斯前往卡德纳斯将军所管的北方托雷翁城，

^① 同费利克斯·伊瓦拉的谈话，1971年1月20日于墨西哥城。

^② 同曼努埃尔·罗德里格斯的谈话，1971年1月22日于墨西哥城。

去当面向他请示。他们带了两名司机，除了吃饭以外，日夜兼程，赶到托雷翁。

同盟的这两位领导眼光看得较远，他们在离开墨西哥城之前就同穆希卡将军进行了磋商，穆希卡给他们开了一封晋见卡德纳斯总统的介绍信。信中表明穆希卡同意准许托洛茨基入境。所以他们几乎立即受到总统的接见，总统当即通知他们说他将让托洛茨基前来避难，唯一的条件是要求墨西哥托洛茨基分子迎接托洛茨基时不要引起墨西哥的托洛茨基敌人们的反示威行动。卡德纳斯总统要他们返回墨西哥城，总统的决定将通知那里的外交部部长。

他们抵达墨西哥城时获得外交部部长的通知说，他强烈反对让托洛茨基前来避难，而且说只要他在职一天，就不会允许他来避难。几个星期过去了，在这期间，政府内部以外交部部长为一方和以穆希卡将军为另一方展开了斗争。

最后，同盟决定于12月17日派遣另一个代表团去见卡德纳斯将军（他当时还在托雷翁），就这个问题向他施加压力，因为如果托洛茨基不能很快获准在墨西哥避难，情况就会十分危险，挪威很可能把托洛茨基交给苏联政府。这第二个代表团到达蒙特雷时获悉墨西哥政府还允许托洛茨基前来墨西哥居住的好消息。他们继续前往托雷翁，此行的目的是感谢总统采取这一行动。^①

卡德纳斯将军在第一次接见同盟领导人时发表谈话说，他不会托洛茨基提出任何条件作为接受他避难的代价，尽管如此，有一个条件他还是坚持了，即托洛茨基不得干预墨西哥内政。伊萨克·多伊彻对此评论道：

^① 这一情况来源于《列夫·托洛茨基就是这样获准避难的》一文，载《工人斗争》，墨西哥城，1943年8月21日。

卡德纳斯允许托洛茨基避难是根据里维拉的请求和他的随行人员的敦促，是从革命休戚与共这一意义上行事的。卡德纳斯声称他不只是允许托洛茨基来避难，而且还邀请他作为政府座上宾在墨西哥居留。卡德纳斯从一开始，就竭尽全力保护他的客人的脑袋，以防范仇恨的怒火把他干掉；而且坚持不懈地进行到底。但是，卡德纳斯本人的处境很微妙……他要求托洛茨基保证不干预墨西哥的内部事务。托洛茨基立即作出这一保证，然而他吸取了他在挪威的惨痛教训，他保持警惕，明确要求保留对任何指责或诽谤进行当众答复的“道义权利”。卡德纳斯对此感到满意。他从未要求托洛茨基不参加政治活动；而且他本人支持托洛茨基有权在斯大林主义分子的攻击面前进行辩护……托洛茨基经常表示感激，而且严格遵守他的誓言，对墨西哥政治从不冒昧地发表任何意见，即使在私下也不那样做，尽管他对卡德纳斯的政策——这一政策未超越资产阶级革命的阶段——势必持有某种批判的态度。^①

这一局面当然使得托洛茨基和他的墨西哥追随者之间的关系有点紧张。除了在极其特殊的情况下，他并不感到他可以自由地直接干预国际左翼反对派墨西哥支部的事务。

托洛茨基一到达墨西哥就阐明他的立场。托洛茨基在给同盟领导人的一封信(该信公布于1937年2月一期的《第四国际》，这是托洛茨基到达后出版的第一期)中，指出他们隶属于一个同他志同道合的组织，并感谢他们给予友好接待；但他接着说，“我对你们的活动不能负丝毫责任。”信的结尾说，“我们的关系将是个人之

^① 伊萨克·多伊彻：《被遗弃的先知：托洛茨基，1929—1940》，1963年，第357—358页。

间的和友好的关系，而不是政治上的关系”。

然而，托洛茨基至少有两次确实对同盟的行动表示不满。一次是在托洛茨基派在失去了对统一建筑工会的控制之后，该派领导人决定要携带武器闯进一次工会集会并夺回这个工会。托洛茨基获悉这些计划后就告知他的信徒说，这不是赢得工人阶级支持的革命办法。^①第二次是卢西亚诺·加利西亚发出号召（公布于1937年5月一期的《第四国际》）要“袭击三、四个大店铺”，并采取其它一些破坏措施，作为反对生活费用高涨的“直接行动”。发出这一号召时正当托洛茨基受到克里姆林宫攻击他所谓在苏联策划破坏和谋杀行动的时候。托洛茨基立即写信给他的墨西哥信徒们，告诉他们说：加利西亚的态度是错误的，认为在那种情况此举几乎是对运动的背叛。^②

托洛茨基当时正谋划对墨西哥政治进行另一种更为严重的干预，但是没有来得及付诸实现，他就死了。1940年5月由共产党画家戴维·阿尔法罗·西克罗斯领头对托洛茨基的住所进行袭击之后，托洛茨基埋头著书，痛斥那些他认为参与这一袭击的人们或者其中的“笔杆子”。这一材料有些送交给墨西哥警察和司法当局，另外一些则送交墨西哥和美国的报界。总之，这本书是对共产主义运动及其墨西哥同路人的控诉，是对他们同苏联政权和克格勃进行勾结的控诉。这部书在托洛茨基死后几个月问世，题为《斯大林帮》。

托洛茨基另一次干预墨西哥事务，是同卡德纳斯政府决定将政府收归国有的铁路转交给铁路工人工会管理一事有关。此举在墨西哥工人联合会内引起争论，联合会执行委员会中的共产党成

① 同费利克斯·伊瓦拉的谈话，1971年1月20日于墨西哥城。

② 同奥·费的谈话，1971年1月21日于墨西哥城。

员对此尤其强烈反对。墨西哥工人联合会全国委员会技术事务助理书记罗德里戈·加西亚·特雷维里奥是主张工人管理的主要支持者。

加西亚·特雷维里奥决定请示托洛茨基就这一争端发表意见。托洛茨基在第一次接见他们时，很快发表意见说加西亚·特雷维里奥是错误的，共产党人是正确的，认为这种由工会控制一个产业的做法是“无政府工团主义”而不是马克思主义。但是加西亚·特雷维里奥坚持不懈地谈他的主张，托洛茨基倾听着，经过几个小时的讨论以后，他向他的客人说，他改变了主意，对这个问题不作决定，需要做进一步研究。

几天之后，加西亚·特雷维里奥再次被召到托洛茨基在科约阿坎的住宅，交给了加西亚一份文件，这一文件代表托洛茨基对这个问题看法的要点。文件对工人实行管理的正反两面进行了充分探讨之后，得出结论说：

对比来说，可以认为这种劳工管理的新办法既具有极大的好处，又包含极大的危险。危险在于国家资本主义有可能通过工会来压服工人，残酷地剥削他们，使他们无力反抗。革命的好处则在于：工人在特别重要的工业部门得到对他们立场的支持，就可以对资本的一切强大据点，对资产阶级国家发动进攻。这两种可能性哪一种会得胜呢？什么时候呢？当然，这是无法预言的。事事都取决于工人阶级各种倾向的斗争，取决于工人们本身的经验，取决于世界局势。总之，根据工人阶级的利益而不是工人贵族的利益来利用这一新的活动形式，只有在一种条件下才有可能，即存在着一个革命的马克思主义政党，这个党细心研究工人阶级的各种活动形式，批评其各种偏向，教育并组织工人，赢得在工会中的影响，而且确

保在国有化工业中有革命工人的代表。^①

托洛茨基告诉加西亚·特雷维里奥说，不论他在墨西哥工人联合会内可能怀抱什么内心目的，他都可以利用这一文件，但该文件不得发表。加西亚·特雷维里奥的确使用了这一文件，虽然在他所支持的事业上没有获得明显成就，他只是到列夫·托洛茨基死后几乎十多年才发表它。当时是得到托洛茨基的遗孀娜塔莉娅·塞多娃·托洛茨基的同意的。^②

此时，墨西哥托洛茨基分子的一项重要任务是警卫托洛茨基的住所。从托洛茨基到达墨西哥之日起，就担心斯大林政权的特务会企图杀害他，所以建立了经常的日夜守卫制度来保护他和他的家属。组织这一工作的任务交给了墨西哥托洛茨基主义主要领导人之一奥克塔维奥·费尔南德斯。他本人和他的家属以及国际共产主义同盟中经过慎重挑选出来的成员们都经常站岗。

但是，1937年年底同盟出现分裂之后，托洛茨基分子决定不再专门依靠墨西哥同志担任保卫工作。第四国际美国下属组织的成员以及一些流亡的德国托洛茨基分子为此目的而参加进来，但仍有一批精选的墨西哥人继续同这些外来者合作。后来终于对托洛茨基发生了两次袭击，第二次是致命性的，两次都没有墨西哥人站岗，费尔南德斯认为要是墨西哥人在场的话，第一次袭击的结果会使袭击者造成伤亡。第二次袭击（由雅克松—莫纳德干的）*本来根本就不会发生，因为他本该在彻底搜身检查后才能获准去

① 罗德里戈·加西亚·特雷维里奥：《一篇未发表的托洛茨基论墨西哥的文章：工业的工人管理》，载《纲领》，墨西哥城，1971年1月20日。

② 同罗德里戈·加西亚·特雷维里奥的谈话，1971年1月20日于墨西哥城。

* 据报道，第一次发生在1940年5月，第二次在同年8月20日。以弗朗克·雅克松为笔名的加拿大记者、比利时公民拉蒙·梅尔卡德在8月20日下午用凿冰镐猛击托洛茨基的颅骨。托洛茨基于21日死去。梅尔卡德在1943年被判处徒刑，1976年10月死于古巴哈瓦那。——译者

见托洛茨基的。①

托洛茨基同一些墨西哥托派领导人发展了友好关系。费尔南德斯记得在奥克塔维奥·费尔南德斯家举行的一次圣诞节晚会上有托洛茨基参加；使托洛茨基的孙子感到高兴的是，这位“老人”参加了打开装有圣诞节儿童玩具的传统墨西哥容器“比尼亚塔”，他还热烈地参加“钉驴尾巴”的游戏。②

国际共产主义同盟的又一次分裂

在托洛茨基到达墨西哥不到一年时间里，托洛茨基在墨西哥的追随者再次发生了分裂。出现新的分裂，部分是因为卢西亚诺·加利西亚和奥克塔维奥·费尔南德斯之间争夺权势的斗争，但部分也是在策略问题上的分歧。如上所述，加利西亚倾向于采取越来越极端主义的立场，主张搞破坏和其他暴力活动，他也支持将托洛茨基分子控制的工会撤出主要的劳工运动的主张。这两种态度都受到托洛茨基本人的反对，这就激怒了加利西亚。

托洛茨基本人由于不能够设法弥合他的墨西哥追随者之间的分歧，便要求他的美国同志给予协助。1938年初，美国社会主义工人党派遣一个包括詹姆斯·坎农、马克斯·沙赫曼和文森特·R·邓恩的力量雄厚的代表团前往墨西哥。他们同加利西亚和费尔南德斯两个集团都进行了磋商，并在“人民之家”领导人招待他们的一次会议上讲了话。但是，这次匆匆的访问没有获得任何具体结果，于是决定派遣一名社会主义工人党代表在墨西哥呆较长时间，以便设法对墨西哥的托派进行整顿。③

选定担任这一任务的人是洛杉矶的社会主义工人党党员查尔

① 同奥·费的谈话，墨西哥城，1971年1月21日。

② 同费尔南德斯夫人的谈话，墨西哥城，1971年1月21日。

③ 同马克斯·沙赫曼的谈话，1970年1月16日于长岛植物园。

斯·柯蒂斯。1933—1934年间，他曾在墨西哥呆过，认识大部分墨西哥托派领导人。社会主义工人党主要领导人詹姆斯·P·坎农给柯蒂斯下达指令，并且把国际共产主义左翼反对派泛美与太平洋局和社会主义工人党的证书交给了他。坎农告诉柯蒂斯说，“（你不得）站在个人立场说话，因为那样只代表个人意见。你是局的代表，你负有改组墨西哥支部的责任。”

坎农写道，“在我们看来，这一局势的最致命性因素是加利西亚（布兰诺），他给我们的印象越来越象是一个显然长时间受过斯大林主义学派教育的党内搞蛊惑活动的小人。”他说，费尔南德斯集团“也是一批知识分子，他们对同盟的解体负有部分的责任；但有一些细微差别。我们的印象是，费尔南德斯兄弟有较好发展前途的可能性”，坎农敦促他的代表持“坚定”而“非粗暴的、或不必要的对抗性态度。”他说他很了解，“在这种情况下，一如既往，你应显示必要的外交手腕、机智和同志态度。”而且他告诉柯蒂斯说，他“无需过于仓促地去改组那个支部。”^①

柯蒂斯在墨西哥呆了几个月之后，报告了他完成使命的情况。这份报告说明加利西亚集团的主要成员是工人。他说，这个集团同意解散它的领导人在建筑工人当中组织的双重工会，并同意将这一组织并入隶属于墨西哥工人联合会的建筑组织。他报告说，加利西亚对此举很不高兴，但也只得听任这样。他注意到费尔南德斯集团主要包括“学生或教师”。这一集团的成员看来不如加利西亚集团成员那样积极，但是他们不断施加相当大的压力，使之被公认为国际左翼反对派的墨西哥正式支部，他们认为得到这一认可以后，前途就会好得多。

柯蒂斯还报告说，“人民之家”领导人要求把墨西哥托派组织的所有主要人物开除出去，要求对墨西哥支部的重建工作只限于

^① 詹姆斯·P·坎农致查尔斯·柯蒂斯的信，1938年6月21日。

“人民之家”的工会领导人。然而，柯蒂斯报告说，他并不认为这是一个好主意，说他“不认为所有的或至少少数老的同盟成员应受到这种待遇。”他报告说，“人民之家”领导人“最初主要是工联主义者，后来才是共产主义者”。其次，他们反对加利西亚集团提出的取消双重工会的政策。最后，柯蒂斯提出一个为期六个月的改组国际托洛茨基组织墨西哥支部的规划。这一规划强调工人在重建组织中的领导地位，尽可能建立省的支部，对支部成员进行思想教育并建立青年组织。^①

1938年9月在巴黎地区召开的第四国际成立大会处理了墨西哥支部的问题。大会就这一问题通过一项特别决议。这个文件对墨西哥支部(特别是加利西亚派系)进行谴责之后，授权“C同志在第四国际书记处分部的直接监督下，继续努力促进第四国际墨西哥支部的整顿工作。”文件授权柯蒂斯(C同志)接纳卢西亚诺·加利西亚和奥克塔维奥·费尔南德斯两人，但是“条件是他们在为期一年的时间里不得在组织内担任任何领导职务。这个组织新的执行委员会首先应当由严肃认真的、有经验的无产阶级分子所组成”。就迭戈·里维拉而言，会议决定“鉴于过去这位同志在墨西哥支部内部关系方面所引起的种种困难，他不得参加重建的组织，但是他为第四国际进行的工作和活动还将在第四国际书记处分部的直接监督之下。”^②

在这一党内斗争和柯蒂斯进行协商的期间，加利西亚写了一封信给托洛茨基，拒不承认他(加利西亚)对托洛茨基分子实行的双重工会政策负主要责任的指责。他痛斥费尔南德斯派系和柯蒂斯对他进行的攻击，并且抗议第四国际泛美与太平洋局作出关于

① 查尔斯·柯蒂斯致社会主义工人党拉美局的信，1938年9月2日。

② 社会主义工人党编：《第四国际(世界社会主义革命党)创建大会、纲领和决议(1939年)》，第117—118页。

把他排挤出第四国际墨西哥支部的决定。他把他在第四国际内部所遭到的大部分反对归咎于托洛茨基本人。^①

1939年1月终于组成了新的墨西哥支部。经过整顿的国际共产主义同盟写信给第四国际泛美局,把事态的发展告诉了他们,要求正式承认为第四国际墨西哥支部。这封信报告泛美局说,费尔南德斯和加利西亚两个派系曾经分别同查尔斯·柯蒂斯举行了会晤,并且召开了两次联席会议,但是双方均认为重新统一是不可能的。

结果,查尔斯·柯蒂斯发出号召,要求“凡愿意建立隶属第四国际并受其纪律约束的第四国际墨西哥支部的同志们”在1939年1月31日举行会晤。号召书规定出席会议和拥护第四国际的条件:会议参加者必须签署一份题为《致第四国际战士书》的文件,文件指出,凡加入重建的第四国际墨西哥支部的人必须同意第四国际和泛美局作出的决定,包括开除卢西亚诺·加利西亚和P·冈萨雷斯的决定;还指出,只有活动的成员才能参加该支部;一旦该组织得到第四国际所承认,他们就乐意重新加入;在批准三位同志加入该支部之前,他们的情况应由第四国际进行调查。

十二名墨西哥人和柯蒂斯出席了1939年1月31日的会议;其他几个无法出席会议的人表示愿意接受会议的决定。会议的议程包括讨论该组织的工作任务,选举各委员会,确定经常的会议时间,设立一个总部,进行教育工作以及其他事务。费利克斯·伊瓦拉当选为总书记,P·托里斯被选定为组织书记,S·兰加里卡被任命为司库。

柯蒂斯要求召开会议的信指出,加利西亚反对派在规模上大致相当1月31日举行会议的那个组织,而且主要是由工人所组成。信件敦促,应作努力以赢得敌对组织中重要工人阶级成员的

^① 卢西亚诺致列夫·托洛茨基的信,1938年12月20日。

拥护,指出这个敌对组织现在是由一个叫卡瓦哈尔的学生领导的,他本人认为很容易被争取到正统的第四国际组织中来。^①

查尔斯·柯蒂斯除了试图重建第四国际墨西哥支部之外,还担负在墨西哥出版一个新刊物的任务。该刊名叫《关键》,据该刊经理费尔南德斯认为,刊物主要是用来作为托洛茨基本人的工具。《关键》固然也刊登他人的许多文章以及第四国际在世界各地的新闻,但其主要目的是作为托洛茨基通过它可以发表西班牙语文章的机关报。那些文章以后可以翻译成其他语言发行到全世界。在一个表面上供当地发行的墨西哥刊物上发表涉及世界各地的事件和事态发展的文章,被认为是为了替托洛茨基干预这些国家内政的说法作掩饰。

在托洛茨基在世时所出版的十五期《关键》中,几乎每一期至少有一篇托洛茨基的文章。这些文章包括他对法国、印度、西班牙和苏联发生问题的评论,还包括对卡尔·考茨基和列宁的遗孀克鲁普斯卡娅的讣告,对第二次世界大战的评论文章,甚至还有书评。这份杂志还刊载第四国际的宣言,包括成立大会的文献、其他国家托派组织的新闻、论述墨西哥事态的文章以及乔治·诺瓦克评论1940年美国选举的一篇文章。

《关键》编辑部包括律师阿道夫·萨莫拉,他在托洛茨基在墨西哥居住期间担任托洛茨基的律师;一名年轻的记者何塞·费雷尔;迭戈·里维拉在1939年初脱离托派队伍前也担任该刊编辑,奥克塔维奥·费尔南德斯一直担任这个刊物的经理。

迭戈·里维拉和墨西哥托洛茨基主义

在《关键》出版期间,迭戈·里维拉断绝了同托洛茨基运动的关系。他在同托洛茨基主义发生联系的五年多时间里,成为托派

^① 国际共产主义同盟致第四国际泛美局的信,1939年2月10日。

运动领导的难以对付的人。

迭戈·里维拉曾经是墨西哥共产党早期的杰出党员之一。他对墨共的贡献是多方面的。他在二十年代撰写了共产党发表的若干文件；他是参加1927年11月庆祝布尔什维克革命十周年的墨共代表团团长。他还是墨共外围组织反帝联盟的主席、“工农集团”的主席、美洲反帝联盟机关报《解放者》的主任。^①但是里维拉主要是个艺术家而不是政治家。早在1924年，墨西哥共产党中央委员会委员伯特伦·沃尔夫（虽然他是美国公民）就曾经试图劝说里维拉退出共产党，理由是里维拉可以通过艺术而不是通过政治活动来为共产主义事业作出最卓越的贡献。而且，里维拉不是当中央委员（他当时担任此职）的好材料。沃尔夫认为，“他经常忘记星期日和忘记时间，他一心贯注于绘画，因此忘了出席中央委员会会议甚至忘了他演讲的日子。”^②

1927—1928年，里维拉在苏联度过了几个月。他在红军大楼墙上绘制壁画，但是一些苏联艺术家（里维拉同他们进行过广泛的论战）对此很嫉妒，对他的工作设置了重重障碍。他接受邀请，为约瑟夫·斯大林画像，当时斯大林即将担任拥有充分权限的苏联共产党总书记。但是据伯特伦·沃尔夫说，那幅画未受到表扬。1928年年中，里维拉奉墨共和共产国际之命返回墨西哥，在1928年总统选举中，行使他作为“工农集团”主席的职责。^③

迭戈·里维拉于1928年9月被开除出墨西哥共产党。沃尔夫说，开除里维拉是“苏联派系政治产生的世界范围清洗的一部分，在有些国家里，整个党被开除，在有些国家里，主要领导人和创建人被开除或者退党，最后这一作法则以比较缓和和混乱的形式

① 伯特伦·沃尔夫：《迭戈·里维拉传奇般的生活》，1963年，第229页。

② 伯特伦·沃尔夫：《迭戈·里维拉传奇般的生活》，1963年，第226页。

③ 同上，第214—224页。

扩展到落后地区。”沃尔夫指出,对里维拉的指控是“仓促捏造和证据明显不足的,所以党忙于制造一些更像样的指控。”里维拉和共产党领袖后来都说,里维拉是因为同情托派而被开除的,但是沃尔夫却写道,“实际上迭戈直到被开除以后才成为托洛茨基的信徒,在审讯和辩护中根本没有提出这一指控。”^①

里维拉对托洛茨基日益增长的同情,势必使他同三十年代早期墨西哥刚刚兴起的托洛茨基主义运动发生接触,他的声誉使他成为墨西哥托派运动最重要的资金来源。然而,他直到1936年国际共产主义同盟进行第一次整顿以后才正式加入这一运动。的确,墨西哥和国际上的托派领导人都对批准他加入他们的队伍有所保留。比如说,墨西哥托派运动驻纽约市的联络员A·冈萨雷斯于1934年年中写信给奥克塔维奥·费尔南德斯,要求墨西哥人对迭戈·里维拉应慎重掌握。冈萨雷斯评述说,里维拉作为一名同情者的话,可以十分有用,但是同盟不应接纳他作为盟员,也不应让他出头露面来发表同盟的见解。他说共产党从来不知道如何对待里维拉,而首先批准里维拉入党就等于完全失去了他;冈萨雷斯敦促托派不要犯同样的错误。^②过了六个月,拉塞尔·布莱克韦尔(当时已返美国)按同样提法写信给卢西亚诺·加利西亚和奥克塔维奥·费尔南德斯。他建议他们两位不要同里维拉发生破裂,而应使他保持作为一个同情者(不作为盟员),因为他在国内和国际上享有声誉。布莱克韦尔提出他们两人应在政治上“孤立”里维拉。^③

但是,当1936年初国际共产主义同盟进行整顿时,这些告诫就抛到九霄云外了。当时,迭戈·里维拉被接纳为同盟盟员,甚至

^① 伯特伦·沃尔夫:《迭戈·里维拉传奇般的生活》,1963年,第233页。

^② 奥·费档,A.冈萨雷斯致奥·费的信,1934年7月19日。

^③ 奥·费档,罗萨里奥·内格雷特(拉塞尔·布莱克韦尔)致卢西亚诺·加利西亚和奥·费的信,1937年1月5日。

成为政治局四名成员之一。他担任此职大约有一年之久。

我们已经指出，1937—1938年国际共产主义同盟发生了分裂以后，托洛茨基分子对里维拉又持谨慎态度。在第四国际成立的大会上作出决定：迭戈·里维拉不应成为经过重建后的第四国际墨西哥支部的成员；他应当在第四国际泛美与太平洋局的直接监督下继续其政治活动。泛美与太平洋局书记何塞·洛佩斯把这一决定正式通知了里维拉，而且向里维拉说，他“确信”里维拉会支持柯蒂斯同志实现墨西哥托派运动的统一。^①

里维拉在创办刊物《关键》时进行了合作，他成为编辑部的一员，但不到几个月时间，他写信给与他共事的编辑之一何塞·费雷尔，要辞去编辑部的职务；他没有说明理由，只是说，“我仍然完全全积极支持《关键》。”剩下的两名编辑部成员费雷尔和阿道夫·萨莫拉复信说，他们不知道里维拉辞职的原因何在，因为他们“同里维拉在理论和政治上都完全一致”。他们不“同意里维拉辞职，而是建议他离职休假。”^②

但是，在下一期的《关键》（1939年4月）上，“卡洛斯·科尔特斯”（大概是查尔斯·柯蒂斯）写道，他终于得出结论认为，里维拉同《关键》和托洛茨基分子的分歧是“理论和政策上的根本分歧。”他说，里维拉参与组成工农革命党，可以说明这一点，他说该党的“纲领和党员情况远远不是马克思主义的。”他认为里维拉对马克思主义感到失望，正在寻求一种新的理论，结果走到了“一种无政府主义、自由主义和社会民主主义的大杂烩。”

里维拉本人在给柯蒂斯的信中对托洛茨基分子作了答复。他争辩说，那个新党（即工农革命党）不是他本人而是“人民之家”所组织的，“人民之家”认为工人应当有自己的政党来参加即将来临

① J·洛佩斯致迭戈·里维拉的信，1938年10月21日。

② 《关键》，墨西哥城，1939年3月。

的总统选举。他认为政府提名的一些总统候选人是有不同的，所以在这些候选人中间作出选择是很重要的。他还说，由于他已经退出了托派，因此他不对托派负责，托派也丝毫不对他本人的行动负责。^①

8月7日，第四国际墨西哥支部中央委员会终于就迭戈·里维拉问题发表了一项声明。声明指出，里维拉曾发表一份讲话，暂时支持胡安·安德鲁·阿尔马桑（主要的反对派总统候选人，一般认为他是右翼），而且指出，既然里维拉曾经被认为是托派，就必须把问题说清楚。声明指出，里维拉在几个月之前就已经同托派没有任何联系了，“这是因为他的一系列机会主义偏向使他同第四国际发生决裂的直接后果。”^②

迭戈·里维拉同托派疏远的一个方面，无疑是他同列夫·托洛茨基之间的个人裂痕。伯特伦·沃尔夫在他的第一部里维拉传记（1939年出版）中曾经写道，“然而，就我所能够肯定的来说，关于他们之间存在根本政治分歧的谣传全非事实”，“托洛茨基确实改变不了迭戈对政治幻想的强烈爱好；不管他们在次要政治问题上的讨论多么热烈，这位画家在政治方面的根本问题上总是听从托洛茨基这位职业政治家的意见。”但是到了沃尔夫的书出版时，情况已经不是这样了。^③

一些同托洛茨基和里维拉都很熟的人评论说，当他们彼此还是同志的期间托洛茨基对里维拉在政治上的变化莫测是特别宽容的。托洛茨基高度评价里维拉作为第四国际的主要一员，而且觉得像他这样具有艺术天才和气质的人不应受到党的严格纪律的约束。他经常敦促其他政治同事对于那些发生在别人身上所不能宽

① 迭戈·里维拉致查尔斯·柯蒂斯的书信，1939年3月20日。

② 《关键》，墨西哥城，1939年7月。

③ 伯特伦·沃尔夫：《迭戈·里维拉的生平和时代》，1939年，第263页。

容的行为,发生在里维拉的身上就要宽容。^①

这四人都很容易冲动,都十分胜任各自的工作,但对于和自己意见不同的人缺乏宽容精神,因此他们大概迟早总会发生冲突。当托洛茨基定居在迭戈·里维拉夫妇的一所房子里的一年半期间,这种冲突显然就发生过了。查尔斯·柯蒂斯说,当托洛茨基在1938年年中返回墨西哥时,他坚持不再当里维拉的“座上客”了。托洛茨基给了柯蒂斯一百比索,要他交给里维拉作为使用那所房屋的房租,里维拉对此很恼火,坚称他不是房东,拒不接受这笔钱。柯蒂斯在他们两人中间来回往返数次,但这也未能使里维拉接受这笔钱,当然也没有能帮助改善这位艺术家和他的房客之间的关系。

里维拉同托洛茨基和托派的破裂,证明只是他回到共产党去的漫长而曲折道路上的第一步。在逝世前不久他被批准重新加入共产党。然而,有些人认为里维拉从未认真支持过托派,或者甚至也从未十分关切过他一般的政治生涯。伯特伦·沃尔夫就是持这种看法的一个,他认为,“没有人认真对待自己信奉托洛茨基主义问题,迭戈尤其如此”。^②托洛茨基和里维拉都熟悉的墨西哥人罗德里戈·加西亚·特雷维尼奥本人虽然从来不是托洛茨基分子,也说过同样的看法。加西亚·特雷维里奥谈到自己以墨西哥工人联合会领袖的资格在三十年代末一次工人教育会议上演说,当时里维拉也出席了。这位艺术家对加西亚·特雷维里奥向一个工人所提问题的回答提出了异议,起来作了三刻钟的发言;声称他逐字援引马克思《资本论》中的一段话,但事实上那段话是完全临时现凑的。里维拉讲完后,加西亚·特雷维里奥从所谓列夫·托洛茨基

^① 查尔斯·柯蒂斯和马克斯·沙赫曼在会见本书作者时都强调托洛茨基对迭戈·里维拉持宽厚态度。

^② 伯特伦·沃尔夫:《迭戈·里维拉的传奇般生活》,第385页。

的一部著作中援引一段同样冗长而虚构的话作为回答。两个人离开会议时，里维拉用手臂搂着加西亚·特雷里维奥，笑着对他说，“你是个坏蛋！”两人捧腹大笑。加西亚·特雷里维奥坚称这一事件对里维拉作为一位政治家的严肃性是一个恰当的评语，而且认为他基本上是个骗子。^①

国际主义工人党

第四国际墨西哥支部重建于1939年初，仍用它的旧名——国际共产主义同盟。同盟在重建后几个月，发行一种油印刊物《布尔什维克》；它最初是作为同盟的《组织公报》发行的，但从1939年5月14日一期开始，刊物加上了题头“第四国际国际共产主义同盟中央机关刊（世界社会主义革命党墨西哥支部）”。这个刊物列出的“责任编辑”是R. 托克托，经理是萨尔瓦多·兰加里卡。《布尔什维克》经常刊登有关第四国际以及各国支部的消息，还有一个“马克思主义通讯”专栏。以此对同盟盟员和《布尔什维克》的其它读者进行意识形态的教育。它还刊载有关墨西哥政治以及工会运动发展情况的消息。

同盟数次发表声明，显然是作为传单印发的。其中一个声明的标题是“国际共产主义同盟关于同迭戈·里维拉的关系以及里维拉对候选人阿尔马桑态度的声明”，谴责里维拉申明支持在竞选同政府提名的候选人曼努埃尔·阿维拉·卡马乔将军角逐的主要反对派候选人胡安·安德鲁·阿尔马桑将军。另一个声明，题为“面对墨西哥比索的贬值”，号召工人采取一系列措施反对因墨西哥货币贬值所造成的生活费用高涨。最后，1939年8月，同盟印发一份题为《斯大林与希特勒》的传单，谴责刚刚签订的希特勒

^① 同罗德里戈·加西亚·特雷里维奥的谈话，1971年1月20日于墨西哥城。

一斯大林条约,但同时也表明它反对“民主帝国主义”。^①

9月,国际共产主义同盟决定改名为国际主义工人党。1939年9月20日第一期党的新机关报《工人斗争》解释改名的理由说:

第四国际从1938年9月召开大会成立以来,已成为争取世界社会主义战士的领导者。我们的组织是向工人们指出革命出路的唯一组织。因此,它有权把自己组织起来并取名为墨西哥无产阶级革命党。

对群众来说,共产主义同斯大林主义已等同起来,这是1923年开始的世界反动阶段的产物。斯大林主义给人类带来了法西斯主义和第二次帝国主义战争。建立世界共产主义社会是马克思和恩格斯所宣布的目标,为此,在不放弃我们目标的情况下,必须放弃共产主义这个名称。

因此,国际共产主义同盟今日采用第四国际墨西哥支部国际共产主义工人党这个名称。^②

以卢西亚诺·加利西亚为首的持不同政见的派系也使用国际共产主义同盟这个名字。这可能也同改名称有点关系。

只要托洛茨基还在世,国际主义工人党党员就把大部分精力和时间致力于出版《关键》和守卫托洛茨基的住房,但这一组织也不时发表政治声明。1939年12月29日,该党发表一项《论苏维埃国家的性质、对波兰的占领和芬兰战争的决议》,刊登在1940年1月一期的《关键》上。这份文件采取当时列夫·托洛茨基及其信徒们所主张的正式路线。文件指出,“我们对苏联的态度是由于需要保持并发展计划经济这一事实所确定的。同时,这是对官僚寄

① 奥·费档,《斯大林与希特勒》,国际共产主义同盟的传单,1939年8月。

② 《工人斗争》,墨西哥城,1939年9月20日。

生制度进行革命斗争的唯一形式。资产阶级对于同苏联官僚统治作斗争不感兴趣，只是觉得这一斗争可以用来反对十月革命。在芬兰战争中，资产阶级看到这种可能性并向‘受打击的民主国家’提供援助。布尔什维克列宁主义者必须保卫苏联，使自己置身于为芬兰无产阶级革命而斗争的最前列。对于斯大林及其傀儡政府的要求，芬兰工人必须回答说：‘不要人民政府，而要以工农兵民主苏维埃为基础的无产阶级专政。’在芬兰和被占领的波兰，争取社会革命和独立的斗争，是把保卫苏联、反对世界资产阶级和反对热月党官僚统治这一任务进行到底的最好途径。”

第十章 托洛茨基去世后的 墨西哥托洛茨基主义

四十年代初，托洛茨基主义在墨西哥的影响要比以往任何时候都大。托洛茨基的信徒们也更加团结。比如说，已经脱离正式的第四国际组织达两年多的卢西亚诺·加利西亚在1940年加入了国际主义工人党而成为该党的主要领导人之一；在此以后的五年时间里，这个组织没有出现重大分裂。在1945年后期，墨西哥托派队伍发生分裂之后几乎两年，国际主义工人党的报纸《工人斗争》（这份报纸曾经在1939年9月至1947年期间比较定期地出刊），在这个时期相当准确地反映了国际主义工人党的利益和活动。

可以预料，《工人斗争》特别是在托洛茨基去世之前几个月以及后来纪念他被害一周年的几期里，偶而再次刊登托洛茨基的文章。《工人斗争》还不时刊载第四国际的正式声明，在战争取得进展从而使第四国际有可能在欧洲土地上得以重建并再次进行某种程度的正常活动之后，尤其是如此。在整个大战期间，《工人斗争》刊登反对墨西哥参战和谴责战争是帝国主义战争的文章。它还反映第四国际号召“无条件保卫苏联”的正式政策。这些号召通常都同时对斯大林进行强烈攻击，把当时苏联遇到的无论什么困难都归咎于他。

《工人斗争》还反映墨西哥托洛茨基分子同他们的美国同志的密切关系；它经常报道美国社会主义工人党，特别是在战争期间政府根据史密斯法审讯社会主义工人党领导人的消息。有几期刊登

那些曾被审讯和判罪的领导人的详尽传记。它还以专题报道拉丁美洲其他地方托派政党和组织的消息以及德国人被撵走后欧洲各国托洛茨基主义再度复兴的新闻。

国际主义工人党机关报反映党在这些年代里大力参预劳工运动的情况。它不断地攻击最大的全国性劳工组织墨西哥工人联合会的领导，广泛详尽地刊载对立的劳工组织活动的消息；例如，1942年3月10日，它刊载一篇关于建立全国无产阶级联合会的长文，在1944年11月下半月的一期中报道联邦区工农解放联盟第一届代表大会的消息。

最后，托派报纸对政府一贯持批判态度。对1940年选举中的政府候选人曼努埃尔·阿维拉·卡马乔及其对手胡安·安德鲁·阿尔马桑将军，几乎进行了同样的、不加恭维的评述；1946年选举时，对官方候选人米格尔·阿莱曼和反对派的主要候选人埃塞基耶尔·帕迪利亚，也是如此。托派报纸还抨击阿维拉·卡马乔政府宣布要建立社会保险制度的意图，称它是掏工人腰包而使他们毫无好处的一种手段。^①

在这期间，墨西哥托洛茨基派吸收一批地位相当重要的新成员。这些人包括：拉斐尔·加尔万，电工，曾是共产党党员，在经历了托派运动之后成为墨西哥最重要的工会领袖之一；A·亚涅斯，后来成为若干国际组织的官员；弗朗西斯科·阿尔瓦拉多，在参加托派运动时是一家大银行的官员，后来又成为墨西哥主要的银行家之一。^②

1939—1945年托洛茨基主义在有组织劳工中的影响

第二次世界大战时期，是墨西哥托洛茨基分子在有组织劳工

① 《工人斗争》，墨西哥城，1945年2月上半月。

② 同奥·费的谈话，1971年1月23日于墨西哥城。

运动中发挥重大影响的唯一时期。国际主义工人党党员同一些试图建立墨西哥工人联合会对手组织的团体积极合作。墨西哥工人联合会的头头是文森特·隆巴多·托列达诺（当时是共产党的同路人），斯大林主义分子在这个联合会中有广泛影响。国际主义工人党党员支持建立全国无产阶级联合会，这是由从前那个无政府工团主义的工会组织工人总联合会以及由墨西哥工人地区联合会（CROM）中的持不同政见者建立的一个中央劳工组织。^①他们还支持建立工农解放联盟，那是联邦区全国工人联合会的一个下属组织。^②

这些组织的领导机构中都有托派的代表。托洛茨基分子在全国无产阶级联合会的领导机构中代表建筑和镶嵌工人工会，并且在全国工人联合会的理事会中至少占有一个席位。他们还设法利用他们在这些工会中日益增长的影响力来影响它们的成员和领导人的政治思想；因此，解放联盟要求奥克塔维奥组织一个马克思主义研究小组，共计有四十名工人参加小组学习。^③

1944年7月20日，在墨西哥城索卡洛中央广场发生了一起重大事件，这一事件涉及到托派与之合作的工会组织。无产阶级全国阵线主持的一次会议抗议墨西哥工人联合会操纵劳工局势，要求修改阿维拉·卡马乔政府提出的社会保险立法。无产阶级全国阵线是由工人总联合会，解放联盟以及这次会议前不久成立的全国无产阶级联合会所组成的。抗议示威者声称他们遭到警察以及墨西哥工人联合会会员和特务的袭击，在中央广场剧烈搏斗达数小时之久。在这场冲突中，若干人死亡，五十六名示威者被捕。^④

国际主义工人党的一些人员还试图在墨西哥工人联合会内部

① 同恩里克·兰赫尔的谈话，1948年8月23日于墨西哥城。

② 同欧卡里奥·莱昂的谈话，1951年8月20日于墨西哥城。

③ 奥·费档，L. 雷德（奥·费）致迭戈·恩里克斯的信，1946年1月18日。

④ 《工人斗争》，墨西哥城，1944年8月下半月。

开展工作。《工人斗争》不时宣扬墨西哥工人联合会一些领导人力图使该会摆脱隆巴多·托列达诺和共产党人的控制而使它“革新”。托洛茨基主义派究竟应当集中力量来设法改造墨西哥工人联合会呢，还是设法建立与之对抗的力量，这一问题会对1945—1946年墨西哥托派运动的分裂起一定作用。

托洛茨基主义运动在那些设法反对墨西哥工人联合会控制有组织劳工的人们当中确实获得一定重要性，但是不应夸大他们的影响。在这些年里，大多数工人仍然留在墨西哥工人联合会的队伍里，处于少数派地位的一些中央劳工组织主要是由前无政府工团主义者和其他分子所控制的，而托洛茨基分子在这些组织的领导中仍是少数。

1945—1946年墨西哥托洛茨基主义派的分裂

托洛茨基主义在墨西哥的有组织劳工中取得重大影响，以及甚至对全国总的政局发生一定影响的可能性，由于托洛茨基主义队伍出现了新的分裂而遭到破灭。这一分裂固然已经酝酿了一些时候了，1945年最后几个月是最高峰。

卢西亚诺·加利西亚和奥克塔维奥·费尔南德斯又一次成为两个派系对立的领袖。奥克塔维奥·费尔南德斯在给智利托洛茨基派领袖迭戈·恩里克斯的一封长信中，说明他对出现这次分裂原因所在的想法。他认为，加利西亚集团曾经反对国际主义工人党同反对墨西哥工人联合会的工会组织进行合作，而是主张设法“改造”墨西哥工人联合会。他坚持认为加利西亚的追随者实际上未曾积极参加任何托洛茨基主义劳工活动，而是往往从局外人的观点批评国际主义工人党工会积极分子的工作。他认为，加利西亚的追随者也没有分担他们出版《工人斗争》的重任，也没有替国际主义工人党从事其他繁琐杂事。费尔南德斯还指责加利西亚集

团企图削弱墨西哥托洛茨基派的反斯大林主义立场。^①

很难说这封信是否提供造成托洛茨基主义组织发生分裂的因素的全貌，因为没有来自加利西亚方面的材料。1945年10月墨西哥托洛茨基组织发生分裂，这一点是确实无疑的。以奥克塔维奥·费尔南德斯为首的持不同政见者退出国际主义工人党，建立了工人社会主义组织，开始出版新的刊物《社会主义论坛》。

在1946年10月(即工人社会主义组织成立后的一年)在该组织中央委员会举行的扩大的全体会议上，奥克塔维奥·费尔南德斯作报告说，工人社会主义组织得到“人民之家”所属工会组织的“坚决而有力的支持”，并且同全国工人联合会、食品工人联合会、工人总联合会和全国无产阶级联合会重新建立了兄弟关系。^②“人民之家”向工人社会主义组织提供地方来继续《社会主义论坛》的出版活动，工人社会主义组织在铸造机排版工人工会的总部举行会议。^③不到一年时间，据报道《社会主义论坛》的发行量达到四千份，其中相当一部分是由同情工人社会主义组织的工会推销的。^④

三十和四十年代墨西哥托洛茨基主义的结束

在一段时间，国际主义工人党和工人社会主义组织都自行宣告它们是“第四国际墨西哥支部”。第四国际本身终于决定支持以卢西亚诺·加利西亚为首的国际主义工人党。1945年12月，奥克塔维奥·费尔南德斯同国际主义工人党决裂几个月之后，访问了纽约市，同美国社会主义工人党领袖恢复了联系，并且通过他们同第四国际也恢复了联系。他这次出访的部分费用是由社会主义

① 奥·费档，L. 雷德(奥·费)致迭戈·恩里克斯的信，1946年1月18日。

② 奥·费档，“工人社会主义组织扩大的中央委员会会议”，1946年10月9日。

③ 奥·费档，L. 雷德(奥·费)致迭戈·恩里克斯的信，1946年1月18日。

④ 奥·费档，“扩大的中央委员会会议”。

工人党支付的。当时他被认为是第四国际运动的墨西哥合法代表。^①

在分裂的早期阶段，第四国际国际书记处通知奥克塔维奥说，第四国际对这次分裂很恼火，而且除了“深刻的政治原因”外，它不能无故表态支持一方。第四国际还表明愿意提供合作，把《社会主义论坛》推销给它的其它下属机构。^②但第四国际也向费尔南德斯集团表示，认为它是墨西哥托洛茨基内部的“持不同政见者”。第四国际的 A. 费尔从纽约写信给奥克塔维奥·费尔南德斯说“你不要忘记，从正统的观点来看，卢西亚诺集团在法律上仍是墨西哥支部。”^③

然而，随着时间的推移，工人社会主义组织和第四国际之间意识形态方面的分歧有了发展。主要分歧是对苏联社会性质的看法这个重大问题。以奥克塔维奥·费尔南德斯为首的集团在其刊物《社会主义论坛》上开始称苏联是“极权主义的。”^④而且越来越不愿意声称自己赞成“无条件保卫苏联”，这一态度引起第四国际领导人的日益不满。^⑤

工人社会主义组织也无疑引起社会主义工人党和第四国际领导人的敌意，因为它对 1946 年后期被开除出社会主义工人党的不同政见者抱有同情态度。费利克斯·莫罗是被社会主义工人党开除的人之一，他把写给第四国际法国支部的一封信的抄件寄送墨西哥工人社会主义组织，要求支持他对社会主义工人党领导的斗争。结果，奥克塔维奥·费尔南德斯写了一封信给第四国际国际书记处，反对将少数派开除出社会主义工人党，指责说这种做法看

① 同奥·费的谈话，1971 年 1 月 23 日于墨西哥城。

② 奥·费档，“里程碑”致 L. 雷德(奥·费)的信，1946 年 12 月 16 日。

③ 奥·费档，“A. 费尔”致 L. 雷德(奥·费)的信，1946 年 9 月 22 日。

④ 《社会主义论坛》，墨西哥城，1946 年 11 月 17 日。

⑤ 同奥·费的谈话，1971 年 1 月 23 日于墨西哥城。

来像是一个“铁板一块”的党而不是一个实行民主集中制的党所采取的行动。他将这封信的抄件寄给了莫罗。^①

工人社会主义组织在它的《内部公报》上也一起反对托洛茨基派在苏联问题上的正式立场。这份刊物的第一期发表了社会主义工人党少数派成员丹尼尔·洛根的一篇文章，题为《官僚帝国主义的产生——为俄国问题讨论会撰稿》。^②1947年初，工人社会主义组织和第四国际之间日益增长的分歧达到了危机点。查尔斯·柯蒂斯再次来到墨西哥，他的任务之一就是设法解决工人社会主义组织和国际主义工人党之间的分歧。事实上，他给社会主义组织下达指示，要该组织同以卢西亚诺·加利西亚为首的国际主义工人党合并，而且要他们放弃对苏联制度所持的批判立场。柯蒂斯通知工人社会主义组织说，它不能再自认为是第四国际墨西哥支部，而通知它说，工人社会主义组织无意接受第四国际的指令。*

工人社会主义组织和第四国际的这一分裂，在工人社会主义组织的刊物《社会主义论坛》上有反映。该刊物1947年7月16日一期的社论中写道：“第四国际的国际领导机构在一项正式决议中或在一份报告中，没有按照讨论程序对工人社会主义组织或《社会主义论坛》所持的立场提出任何批评……该机构最近一直坚持说

① 奥·费档，费利克斯·莫罗致国际共产主义党的信，1946年11月23日；L.雷德（奥·费）致第四国际国际书记处的信，1946年12月20日；L.雷德致费利克斯·莫罗的信，1946年12月27日。

② 《社会主义工人组织讨论与情报公报》，墨西哥城，1946年8月。

* 1971年1月23日在墨西哥城会见奥克塔维奥·费尔南德斯的谈话。查尔斯·柯蒂斯在1971年2月10日给本书作者的一封信上评述了工人社会主义组织对事态发展的看法，摘录如下：“我不得不说明自己记忆模糊，而且我没有文件材料来回忆那些事态发展。我记不起同费尔南德斯的谈话。他们要求我在1947年前往墨西哥去帮助纳塔莉娅解决一些有关住房和她在墨西哥的地位问题。我们确实会见了费尔南德斯，可能进行了这样的谈话，我相信费尔南德斯的记忆要胜于我的记忆，但是，我十分怀疑他说话时使用的先发制人的语调……我肯定我敦促两个组织实现这种统一，但是我的这种肯定并不是由于回忆起具体的交谈，而是由于总的政策是始终一贯的。”

工人社会主义组织不是‘正式的墨西哥支部’。”该刊物说，“有鉴于此，它不再使用使它与第四国际一致的副题头”。

在同第四国际分裂之后，工人社会主义组织和《社会主义论坛》的存在时间都不很长。到了1947年年底，两个组织都已不复存在。^①对立的托洛茨基主义组织国际主义工人党及其刊物《工人斗争》也于1947年底寿终正寝。^②实际上，墨西哥托洛茨基主义运动已不存在了，至少十年以后它才恢复正规建立起来的组织。

五十年代间隙时期

到了1948年，很少有人认为在墨西哥有隶属于国际托洛茨基组织的“党”、“同盟”或“组织”。在过去十五年期间几乎所有曾积极参加托洛茨基主义运动的人们都退出了任何公开宣称的托洛茨基主义活动，虽然其中有些人作为一般工会会员和工会领导人继续从事活动。

最重要的前托洛茨基主义者工会领导人之一拉斐尔·加尔万，是墨西哥电气工人工会的一名主要人物。他是唯一继续从事公开的托洛茨基主义活动直至五十年代初的一个人；在这一工作中，他使用马丁·阿里亚加这个名字。

作为工会工作者继续广泛从事活动的另一名前托洛茨基主义领导人是费利克斯·伊瓦拉。1952年以前，他是电话工人工会的主要领导人之一，同四、五位原先的托派积极分子一道共事过。1952年他们失去对电话工人工会的控制，当时劳工部官员拒不承认他们的工会。^③

显然带头同美国托洛茨基分子一起创办新的托洛茨基主义刊物《干什么？》的是马丁·阿里亚加。《干什么？》于1953年后期开

① 同奥·费的谈话，1971年1月21日于墨西哥城。

② 同卢西亚诺，加利西亚的谈话，1971年1月22日于墨西哥城。

③ 同费利克斯·伊瓦拉的谈话，1971年1月22日于墨西哥城。

始出版，副刊头是“保卫工人和农民的利益”。这个刊物虽然没有掩饰它的托洛茨基主义倾向，但也没有大肆强调这一点。刊物的分析看来着重于马克思列宁主义观察事物的一般看法，而不是特别强调托洛茨基主义的观点。

出版了一共十多期的月刊《干什么？》特别注意墨西哥劳工运动的发展。它对工会的腐化、工会对政府的屈从以及共产党人在工会中的作用进行猛烈攻击；它强调劳工运动须纯洁化。其他一些文章则涉及当时墨西哥总的政治状况。这些文章强调发展到当时的墨西哥革命的“资产阶级”性质，强调这一革命进入“无产阶级”新阶段的必要性。有一篇文章具体论述墨西哥比索的贬值，标题是《贬值：剥夺人民的资源以利资产阶级》。

1954年5月20日一期的《干什么？》，刊载了“五一”宣言。末尾提出五个口号：“社会主义革命万岁”、“工人阶级的英雄们永远留在人们的记忆之中”、“全世界革命者的榜样万岁”、“永远吸取俄国无产阶级以及列宁和托洛茨基的党的教训”、“从社会主义和民主中得到复兴的墨西哥万岁”。但是，这一宣言并未说明是哪一个具体的政治组织颁布的，显然只是出版刊物的个人颁布的。宣言中有一段评述说：“在墨西哥共和国，也必须为建立真正的列宁主义和托洛茨基主义类型的革命劳工政党而斗争。必须建立用马克思、列宁和托洛茨基的原则充分武装起来的布尔什维克组织，再也没有比这个更具有历史必要性的指示了。这是使我国和所有其他国家人民摆脱充当囚犯这一险恶处境的唯一关键。”

参加出版《干什么？》的阿里亚加·加尔万和其他墨西哥人看来像是得到美国社会主义工人党的援助和鼓励。这份杂志刊载了社会主义工人党主要领导人詹姆斯·P·坎农的几篇文章，以及该党另一名杰出人物约瑟夫·汉森的一篇文章。

在五十年代大部分时间里，虽然看来不曾存在过隶属于第四

国际的墨西哥支部，但是一度是墨西哥支部成员的少数人继续积极从事政治活动。其中一个人就是石油城波萨里卡的福斯托·达维拉·索利斯。1956年他当选为波萨里卡市市长，显然他是包括在“无党派人士”的候选人名单上，但政府从未准许他任职。^①

墨西哥托洛茨基主义的复活

在五十年代后期，出现了一个与第四国际有联系的活跃的新的托洛茨基主义运动。这一运动的成员几乎全是学生，三十年代后期和四十年代曾参加托洛茨基派活动的人参加这一运动的不多。甚至像卢西亚诺·加利西亚和拉菲尔·加尔万这样一些人物，尽管还认为自己“或多或少”还是托洛茨基分子并在电气工人工会中曾有过相当大的影响，但也没有被吸收进墨西哥新的托洛茨基主义运动中去。

第四国际新一代的拥护者特别关切主义的纯洁性，人们意识到他们往往怀疑“任何三十岁以上的人”。例如，著名作家维克托·里科·加兰出席托派的一些会议，甚至在一次 J. 波萨达斯为主要讲演人的会议上讲了话。他表示有志于参加这一运动。年轻的托洛茨基分子坚持要检查加兰所有的著述，看看这些著述是否同第四国际的正统概念相一致，其后，加兰的主动表示遭到了拒绝。^②

恢复了的墨西哥托洛茨基主义运动起源于社会主义青年团（活跃于五十年代后期的独立学生组织）；它支持 1958 年的铁路罢工，当罢工领导人把罢工转变为公开反对阿道弗·鲁伊斯·科蒂内斯总统的政权时，政府驱散了罢工。1959 年社会主义青年团发生了分裂。多数派特别强调工会工作，1961 年在第四国际第六次

① 同费利克斯·伊瓦拉的谈话，1971 年 1 月 22 日于墨西哥城。

② 同阿图罗·马丁内斯的谈话，1971 年 1 月 20 日于墨西哥城。

大会上被接受为第四国际巴勃罗派墨西哥支部。这个多数派成为革命工人党(托)的核心。原社会主义青年团的少数派主要由学生组成,取名马克思主义学生联盟。它声称已成为大学界共产主义青年团的主要对手。马克思主义学生联盟在同革命工人党(托)实现联合的谈判(应后者的要求而中断)达不成结果之后,改名为马克思主义工人联盟,开始对第四国际反巴勃罗派发生了兴趣。

1961年,一批曾参加游击活动的危地马拉流亡分子加入马克思主义工人联盟。然而,1962年初他们同一些墨西哥同伴们一起脱离该联盟而加入了革命工人党(托),从而建立了革命工人党和后来成为相当重要的危地马拉游击运动的联系。大约与此同时,革命工人党(托)加入了第四国际波萨达斯派。

统一书记处的墨西哥下属组织

与此同时,马克思主义工人联盟宣称它支持那些力图重新统一第四国际的人们。他们作为兄弟组织的代表出席了“统一大会”,“统一大会”使巴勃罗派和各个反巴勃罗派结合起来了,于1963年建立了统一书记处。

1964—1965年期间,马克思主义工人联盟经历了一次危机,起因于该联盟学生盟员的观点同那些在电气工人工会中积极活动的盟员在观点上发生分歧。据报道,学生要比“工会组织生气勃勃和激进得多”。此时,大学组织声称拥有五十名成员,而且是共产党反对派的主要部分。由于召开第四国际统一书记处第八次代表大会,马克思主义工人联盟的各对立纷争的派系获得了暂时的重新统一。在那次会议上,马克思主义工人联盟被承认为统一书记处墨西哥支部。对当时的情况有如下描述:

1966年初,马克思主义工人联盟是一个具有一定重要性

的政治组织。它同墨西哥城的学生阶层和工人阶级地区有联系。因此在1966年大学生罢课中,托洛茨基主义派起着重要作用。这就使他们第一次成为报刊上头条新闻。1966年,马克思主义工人联盟第一次在某些阶层中建立了重要联系。

但是马克思主义工人联盟还没有作好迎接新阶段的准备。在它的中心行动上再次面临一种不同的发展规律。学生阶层同工会组织破裂了,因为工会组织事实上并未完全受到革命马克思主义立场的熏陶。1966年的分裂是可悲的,但却是不可避免的。结果,马克思主义工人联盟的成员从八十多人减少到约二十多人。

马克思主义工人联盟在这次分裂之后,几乎集中全部精力在大学生中开展工作。它同各式各样的其他左翼——“毛主义分子、格瓦拉分子、德布雷分子和托洛茨基分子”——联合起来,于1967年7月组成保卫政治犯委员会。这个组织召集了全国革命学生代表大会,从中产生了全国革命学生联盟。但不到几个月时间,这一组织为革命工人党(托)的波萨达斯派分子所赢得,因此被大部分其他组织(其中包括马克思主义工人联盟的托派分子)所抛弃。

于是马克思工人联盟于1968年初同工人农民联盟一起组成革命马克思主义青年团。然而这个新组织的内部几乎立即开始争吵起来,有些成员要求“松弛”的组织形式,主张凡宣布忠于该组织总的原则声明的人均可参加,而另一些人主张“民主集中制”的形式。革命马克思主义青年团的派系斗争还没有结束,就在1968年年中爆发了学生罢课运动。革命马克思主义青年团的学生以及隶属革命工人党(托)的学生在领导这场罢课中起着重要作用,虽然他们主要是作为个人而不是作为严密组织的成员在起作用的。他们充当学生领导的先锋,从而使共产党在运动中不能有效地发挥

作用。

从托洛茨基主义派参加 1968 年学生运动之日起,就出现同第四国际统一书记处有联系的这个最新的组织——国际共产主义组织。^①这个新组织开始发行两种文件,都是油印的。一种是《内部公报》,供该组织成员阅读;另一种是《国际》,显然是供更广泛地发行的。

除了这些供墨西哥国内使用的刊物以外,墨西哥托洛茨基主义派还努力出版了多少作为第四国际统一书记处正式出版物的刊物。其中包括第四国际基本刊物的西班牙文版《第四国际》。这个刊物一般专载统一书记处的正式声明或比较有份量的理论资料;还有《世界展望》,是一份比较活跃的刊物,登载更带有鼓动性的和专题性的材料。

这两份刊物均由一人发行。此人偶而也出版隶属第四国际波萨达斯派的革命工人党(托)的刊物。出版统一书记处刊物的款项通常由海外定期支付;付给波萨达斯派刊物的款项则是比较零星的。据说波萨达斯派一位外国领导人有一次曾带给出版者三万美元的现金,用以购置第四国际出版刊物的印刷机。^②

墨西哥托洛茨基分子除了同学生组织合作以及出版全国性和国际性刊物外,还与第四国际统一书记处合作开展一些有关其他问题的运动。例如,在非德尔·卡斯特罗 1966 年 1 月对托派发动攻击之后,国际共产主义组织发表一封以小册子形式公布的《致菲德尔·卡斯特的公开信》。信中不承认受到卡斯特罗直接攻击的波萨达斯派分子是真正的托洛茨基主义者,而且认为“波萨达斯主义这一社会现象应当被认为是一种极左派的宗派运动而不是帝国主义的代理人。”它还坚持认为“共产党的机会主义思想”是

^① 前文均来源于“走向建立革命党”,《国际共产主义组织内部公报》,日期不详。

^② 这一材料来自一名不愿透露其身份的墨西哥托洛茨基主义人士。

“革命运动内部的主要障碍。”^①

同第四国际统一书记处有联系的那部分墨西哥托洛茨基派的队伍里，实际上没有老一代的托派分子。看来同他们有过联系的人只有 A. 卡梅霍，他主要负责汇编墨西哥托洛茨基派在国际上发行的出版物，还有尼古拉斯·莫利纳教授，他在墨西哥大学任教时有许多年轻学生上他的课。这些学生成为这个托洛茨基主义组织的大部分成员。在这个时期里，他还协力翻译和出版一本列夫·托洛茨基文选。^②

另一个激起对托洛茨基主义、特别对第四国际统一书记处重新发生同情的老托洛茨基分子，是曾经在共产党里呆了多年的著名作家何塞·雷维尔塔斯，虽然看来他没有加入第四国际墨西哥下属组织。在六十年代后期已成为世界闻名小说家的雷维尔塔斯，向重新统一后第四国际第三次代表大会发了一份热情奔放的贺电。^③

由于1968年年中的学生造反，国际共产主义组织的大部分领导人(其中包括莫利纳教授)被关进监狱。于是统一书记处开始发动一场世界范围争取释放他们的运动，而且广泛宣传托洛茨基分子和其他政治犯被关押在墨西哥牢房里的恶劣境况。这一运动终于在1971年2月获得一定成效，当时新上任的墨西哥总统路易斯·埃切维里亚释放了莫利纳教授和国际共产主义组织的其他一些成员。然而，其他一些托洛茨基分子仍被关押，他们被判长期徒刑。^④

一些托洛茨基分子的获释出狱，显然使他们可能恢复或多或

① 国际共产主义组织编：《致菲德尔·卡斯特罗的公开信：墨西哥托洛茨基主义者的答复》，墨西哥城，1966年1月。

② 同阿图罗·马丁内斯的谈话，1971年1月20日于墨西哥城。

③ 《洲际新闻》，1969年7月28日。

④ 同上，1971年6月21日。

少的正常政治活动。法国托洛茨基主义《红色》周刊在1971年7月一期报道说,1971年5月29—30日,第四国际统一书记处以一个“同情组织”国际共产主义组织举行了全国代表大会。有四十名代表出席大会,大会集中讨论利用国际共产主义组织在大学生中日益增长的影响这一问题。大会一结束,国际共产主义组织的一个成员卡洛斯·塞维利亚就被判十六年徒刑,他从1968年9月以来就在“临时性逮捕”的名义下一直被监禁着。

同时,原马克思主义联盟的一个派别却用那个名称使一个组织得以生存下来。美国社会主义工人党的约瑟夫·汉森把这个联盟说成是主要活动是为英国社会主义劳工联盟机关报《工人报》偶尔供稿的一个墨西哥小组织。在1970年召开的一次委员会会议上,马克思主义工人联盟被接受为第四国际希利派的国际委员会委员。^①

革命工人党(托)的活动

革命工人党(托)的许多党员也因为1968年的学生示威和罢课而被关进监狱。这个组织余下的党员随后将主要精力花在争取释放这些犯人身上。第四国际波萨达斯派本身把大部分时间和精力用于这一类鼓动工作。这样,1967年1月一期的《第四国际国际书记处新闻公报》全部用于刊载墨西哥革命工人党(托)政治犯和J.波萨达斯之间的来往通信。1968年学生暴动后,革命工人党其他党员也为警察所逮捕。1969年5月,其中许多人,包括阿根廷新闻记者道弗·吉利,因被控从事“罪恶活动”、“煽动颠覆”和其他罪名而被判处长达八年的重刑。^②

尽管墨西哥当局进行迫害,革命工人党还是能够开展其他活

① 《洲际新闻》,1971年11月22日。

② 《公报》,纽约,1969年5月19日。

动。例如，1967年7月该党召开了代表会议和举办领导人训练学校。据报道，会议持续了九天，出席会议的有各单位党组织的成员（但是没有提有多少单位出席）。这次会议选举了新的中央委员会和政治局，制定了扩大党的活动的计划。

就像所有隶属第四国际波萨达斯派的组织一样，墨西哥革命工人党花费许多时间汲取波萨达斯的思想并加以传播。例如，关于代表会议和领导人训练学校的报告指出，“集体和个人都要汲取波萨达斯在构成和形成第四国际的思想（即它的中心精神）的斗争中的一切教导。”^①

革命工人党也有少数老一代的党员。其中一个有福斯托·达维拉·索利斯，他在四十年代曾经积极参加过托洛茨基主义运动，1956年曾被选为波萨里卡市市长，但没有就职。^②其他人包括加尔万（不要和同名的电气工人工会领导混淆起来）和F·比达尔；加尔万在四十年代曾经是个活跃的托洛茨基分子，比达尔在尼基塔·赫鲁晓夫在苏共二十大的演说和1956年苏联入侵匈牙利以前曾经是墨西哥共产党党员，在这以后他同共产党分裂，开始协力恢复墨西哥的托洛茨基主义活动。^③

墨西哥波萨达斯派干预危地马拉游击活动

墨西哥革命工人党（托）的托洛茨基分子从事的最引人注目而且也许是最重要的活动，无疑是在邻国危地马拉共和国参加了马科·安东尼奥·容·索萨中尉*领导的游击运动。这一活动虽然没有导致在危地马拉建立任何托洛茨基主义组织，但是当菲德

① 《拉丁美洲马克思主义评论》（波萨达斯派），1967年7月，第295页。

② 同费利克斯·伊瓦拉的谈话，1971年1月22日于墨西哥城。

③ 同阿图罗·马丁内斯的谈话，1971年1月20日于墨西哥城。

* 容·索萨中尉（1930—1970年），危地马拉“十一月十三日革命运动”领导人之一。1970年在一次武装行动中被政府军杀害。——译者

尔·卡斯特罗强烈指责容·索萨运动的所谓“托洛茨基主义”性质时，墨西哥革命工人党(托)的这一活动确实引起全世界的注目。

危地马拉共产党前领导人卡洛斯·曼努埃尔·佩列塞尔向本书作者详尽介绍了墨西哥波萨达斯派托洛茨基分子在他本国活动的情况。他说，他们在危地马拉的活动，其序幕可追溯到1962年春天，当时菲德尔·卡斯特罗决定支持分散的游击活动而且把相互竞争的游击组织联合起来。

卡斯特罗选定弗朗西斯科·阿马多作为他同危地马拉游击队进行联系的中间人。阿马多是侨居墨西哥的一个危地马拉商人。他从事商业活动，是他同游击队建立联系和向游击队提供金钱的有效“掩护”。阿马多开始作为卡斯特的信使和出纳员周游危地马拉、委内瑞拉和哥伦比亚。他在本国首先是同当地被称为危地马拉劳动党的正统共产党的某些领袖建立了联系。他成为危地马拉劳动党的秘密党员，使该党参加了一段时间的游击运动。

但是卡斯特罗不久就同阿马多破裂了，阿马多转向由马科·安东尼奥·容·索萨领导的众所周知的“十一月十三日革命运动”游击队组织。十一月十三日革命运动对卡斯特罗和危地马拉共产党都保持了某种程度的独立性。阿马多也企图从他在大学曾认识的一些墨西哥波萨达斯派托洛茨基分子那里得到帮助，他从前有一个时期曾在该大学社会科学学院学习过。在他们的帮助下，阿马多开始在危地马拉出版一份名为《社会主义革命》的刊物。这个刊物持强烈的波萨达斯派托洛茨基主义方针。此外，其中一个名叫加尔万的托洛茨基分子成了容·索萨组织购买军火并将其偷运进危地马拉的主要代理人。

加尔万终于被危地马拉政府的特务所捕获，还缴获加尔万随身携带的数量可观的武器。加尔万在危地马拉被关进监狱，直到1966年3月弗朗西斯科·阿马多死去。阿马多是和其他一些游

击队领袖一起被捕和处决的。那时，加尔万获释并被驱逐到墨西哥。^①与此同时，卡斯特罗支持了由另一名前陆军军官路易斯·图尔西奥领导的一个对立的游击运动。卡斯特罗利用1966年1月在哈瓦那三洲会议召开的机会，谴责容·索萨运动，他的主要论据是容·索萨同波萨达斯派托洛茨基分子有联系。^②

1966年4月，容·索萨游击运动同墨西哥波萨达斯派托洛茨基分子终于决裂了。当时，“十一月十三日革命运动”革命法庭在容·索萨亲自主持下，对三名波萨达斯分子进行了“审讯”。对他们三人提出如下指控：“（一）1965年11月，十一月十三日革命运动向资产阶级强行征税，这一行动提供了好几千格查尔，目的是为建立政权和发展危地马拉社会主义革命所需的必要费用；（二）但是所有这笔钱由第四国际和‘十一月十三日革命运动’对分，事先并未同容·索萨司令磋商和征得他的同意；（三）分这笔钱是由佛朗西斯科·阿马多·格拉纳多斯（前政治局委员）和第四国际成员（假名是图里，埃瓦里斯托，托马斯和罗伯托）作出决定并执行的；（四）这笔钱的分配是第四国际国际书记处差不多一年前所设想并作出决定的一项计划的结果，这一计划由目前正被审讯的那些人迅速地执行了。”

据报道，“埃瓦里斯托，托马斯和罗伯托对提出的证据未加反驳、否定或提出本质上不同的意见，而只限于进行法庭从未提出过的政治评论。他们争辩说，第四国际所有部门都使用这笔钱，他们从未拿任何部分供个人使用”。革命法庭作出明确的决定：“首先将埃瓦里斯托，托马斯和罗伯托开除出十一月十三日革命运动，第二，同第四国际断决一切联系。”^③

① 卡洛斯·曼努埃尔·佩列塞尔致罗伯特·J·亚历山大的信，1969年3月14日。

② 《社会主义古巴》，哈瓦那，1966年2月，第88—97页。

③ 上述内容来自《第四国际》（统一书记处），1966年8月，第138—140页。

这一决定制止了墨西哥波萨达斯派托洛茨基分子对危地马拉游击战的介入。随后，对立的第四国际统一书记处对容·索萨集团的行动表示“无条件的支持”，并利用这一机会否认波萨达斯集团是真正的托洛茨基派。^①

墨西哥托洛茨基派同美国托洛茨基派的关系

在整个这一漫长而动荡的墨西哥托洛茨基主义历史中，第四国际的墨西哥信从者们同他们的美国同志一直有着密切的关系。我们已经提到美国托派领导人干预墨西哥托派事务的具体情节，但这里概述一下这一关系的全面规模将是有益的。

墨西哥最初出现托洛茨基主义，是由于一些墨西哥共产党员和共产党外围组织的一些成员同美国的新托派运动进行了联系的结果。建立这一联系的直接代理人是美国共产党人拉塞尔·布莱克韦尔。当托洛茨基主义开始作为世界性运动出现时，布莱克韦尔就被吸引过去成为托洛茨基主义者。他如果不是美国的美洲共产主义同盟的创始成员的话，也是一名早期成员。对此感兴趣的墨西哥共产党人和同路人通过布莱克韦尔同同盟中被委派同拉丁美洲的同情者发展关系的人士进行直接的通讯联系。这方面最重要的人物是长期居住美国的墨西哥人 A. 冈萨雷斯，他在美国托洛茨基主义运动中担任负责同拉丁美洲建立关系的主要成员达十五年之久。

在这些早年时期，冈萨雷斯以及布莱克韦尔（他在同墨西哥人交往时使用罗萨利奥·内格雷特这个名字）和阿恩·斯瓦贝克就组织工作问题经常给墨西哥托洛茨基分子出主意。他们也试图对墨西哥托洛茨基分子进行更透彻的托洛茨基主义思想教育，特别是国际左翼反对派对斯大林和斯大林主义的批评。

^① 《第四国际》（统一书记处），1966年8月，第141—142页。

在墨西哥托洛茨基主义派存在的头十年，查尔斯·柯蒂斯无疑是参与墨西哥事务的最重要的美国托洛茨基分子。当时他还是参加托洛茨基主义运动洛杉矶支部的一名年轻人，会说会写西班牙语，这就使他优于他的大部分美国同事。1933—1934年他在墨西哥住了几个月，他在那里不仅用国际左翼反对派的思想帮助教育他的墨西哥同志，而且还做了大量“杰米·希金斯式的工作”——即诸如出版书刊、组织会议以及通过个人说服来争取支持者这类日常工作。

因此，当1938年墨西哥托洛茨基主义队伍内部再次出现分裂时，对美国托洛茨基分子来说，柯蒂斯就成为派往墨西哥的理所当然的人员了。国际书记处和美国社会主义工人党都授予他委任状，并赋予他广泛权力去整顿士气低落的墨西哥托洛茨基主义队伍。这一权力可以扩大到：决定争执的派系中哪一方最接近“正确”，决定开除谁或重新接纳谁加入已整顿好的组织。

就国际托洛茨基主义体制而言，柯蒂斯除握有大量“政治实力”外，还具有某种外交手腕。所以他能够把第四国际墨西哥下属组织联合起来，它继续存在五年多而没有发生重大分裂。当然，柯蒂斯在墨西哥活动时，并不能完全自行其事。他经常向纽约的社会主义工人党总部作定期汇报。然而没有迹象说明第四国际对他的判断提出过严重疑问，或者否决他的重大建议。

第二次世界大战后在墨西哥托派问题上再次爆发严重意见分歧时，纽约市和墨西哥托洛茨基分子相互竞争的派系之间进行了广泛的通信。最后，纽约再次派遣查尔斯·柯蒂斯去决定对争吵的墨西哥同志应该怎么办。虽然柯蒂斯认为比较正统的卢西亚诺集团比多少有点异端的奥克塔维奥·费尔南德斯更为可取，但他作出的一切努力还不足以平息争执，结果还是使墨西哥托洛茨基主义暂时消亡。五十年代，墨西哥唯一重要的托派活动看来受到

了纽约市的鼓励,特别是出版了《干什么?》大约一年。

六十年代,墨西哥托洛茨基分子,特别是同第四国际统一书记处密切合作的托洛茨基分子和他们的美国同伙之间再次建立了密切联系。墨西哥人由于得到纽约市的财政资助和文件资料,就代表第四国际出版西班牙文刊物,不仅打算在墨西哥而且在拉丁美洲其他地区销售。但是,我们没有发现任何迹象表明对现代墨西哥托洛茨基主义的派系争执进行过像早期那样的直接干预。

的确没有任何其他事例像拉丁美洲托洛茨基主义运动那样受到美国托洛茨基主义运动如此密切的监督的。通过通讯对古巴党进行过一些干预,在四十年代早期有一个短暂时间,特伦斯·费伦对阿根廷和智利的党和组织进行了直接干预。尽管如此,这一干预并不像对墨西哥那样经常或持续不断。

结 语

在1968年年中学生暴乱期间和暴乱以后,由于古斯塔沃·迪亚斯·奥尔达斯总统的政府对左翼政治反对派进行了围捕,而使墨西哥的所有托洛茨基主义派别受到严重损害。这些派别的大部分领导人被监禁,两年半之后还呆在牢房里。停止了国际共产主义组织刊物的发行工作,油印者除外。革命工人党(托)至少直到1969年3月上半月仍在出版《工人之声》,和通常一样,那一期全是波萨达斯本人的著述。然而,那些在牢房之外的革命工人党和国际共产主义组织的成员的活动受到严重的限制。

总之,六十年代墨西哥托洛茨基主义运动只不过是早期墨西哥托派活动的暗淡反映。革命工人党(托)和国际共产主义组织对有组织劳工运动都未产生过任何影响,那些继续或多或少同情托洛茨基主义的工会领导人,像拉斐尔·加尔万和卢西亚诺·加利西亚则对两个党都没有参加。虽然两个党的托洛茨基分子对六十

年代后期十分活跃的学生运动确实有过一些影响，但是它们在国际托洛茨基主义两派间的内部争吵和派系斗争中也很活跃，看来至少同它们争取非本党分子一样积极。

第十一章 古巴的托洛茨基主义、 第四国际与卡斯特罗革命

正如拉丁美洲几乎每一个左翼政治组织和总的世界革命运动一样，古巴的托洛茨基派和整个第四国际运动也同样感受到了菲德尔·卡斯特罗领导的革命的影响。同时，卡斯特罗的革命在某种程度上也受到了托洛茨基主义的影响。

在古巴岛国境内，卡斯特罗的革命使得一直在该国进行活动的唯一有组织的托派遭到镇压，这个托派同第四国际波萨达斯派站在一起。但是，对于如何对待托洛茨基分子问题上出现的分歧，至少是革命领导者中间某些争论的原因所在。最后，卡斯特罗政权成为第四国际各种派系领导之间发生争执的一个主要根源。

古巴托洛茨基派的起源

在古巴托洛茨基派创建者当中，名声特别大的是桑达利奥·洪科。洪科是二十年代后期共产党的主要工会人物之一，也是当时该党最重要的黑人领袖。他是一位有力的演说家，个性很具有吸引力，当上了共产党控制的古巴全国工人联合会的国际书记。^①

1928年，由于赫拉多·马查多总统独裁统治对各个阶层的反对派日益加剧迫害，桑达利奥·洪科逃往国外。他先去墨西哥，同当地的共产党人合作，他还同胡利奥·安东尼奥·梅利亚、奥雷利亚诺·桑切斯·阿朗戈以及其他一些人一起，帮助建立了古巴新

^① 同查尔斯·西米恩的谈话，1970年4月12日于新泽西尤尼恩城。

革命流亡者协会。^①

下一年，洪科以古巴全国工人联合会干部的身份出席了在蒙得维的亚举行的拉丁美洲共产党工会组织领导人大会。这次大会建立了拉丁美洲工会联合会。在工会大会举行之后的那个月，洪科可能还出席了在布宜诺斯艾利斯召开的拉丁美洲共产党代表会议。然后他前往欧洲和苏联。这个时候，他已经开始对斯大林领导下的国际共产主义路线表示怀疑。传说（确否不详）他会见斯大林时因对托洛茨基的立场表示同情而使这位苏联领导人勃然大怒。^②

洪科最后在 1932 年返回古巴，并立即采取步骤建立一个共产主义反对派。他写了一份备忘录给共产国际，反对共产国际对古巴局势所作的分析。他争辩说，在这个岛屿共和国，在传统的地主寡头和帝国主义之间并没有象共产国际所提出的那种联盟，因为那里不存在这种老式的寡头，这种寡头早在 1868—1878 年第一次古巴独立战争时就已经被消灭了。洪科还提醒共产国际注意古巴中等阶层的规模和重要性，指出它不是传统的欧洲式中等阶层，而是个由官员们组成的中等阶层。洪科强调这个中等阶层参与古巴革命的重要意义，并着重指出中等阶层愿意采取暴力，乃至恐怖手段。

这份备忘录对共产国际没有产生什么影响，但由于这份备忘录，在马查多政府倒台之前的 1932 年后期，洪科退出或被开除出共产党。他带头成立了共产主义反对派，不久就取名列宁主义布尔什维克党。共产党关于开除桑达利奥·洪科及其他同伴们的正式解释是谩骂性的而不是分析性的。共产国际正式刊物《国际报

① 马里奥·列拉·埃尔南德斯：《古巴工人史（1574—1965 年）》，1965 年，第 281 页。

② 安东尼奥·阿隆索·阿维拉致罗伯特·J·亚历山大的信，1970 年 3 月 21 日。

刊通讯》于1934年6月15日报道说，洪科集团“坚持没有美国的无产阶级革命古巴就不可能爆发革命的反革命理论。这一理论的实际结果就是托洛茨基分子同马查多的继任政府不断进行勾结，起破坏罢工的作用。”后来，在该刊1935年10月10日的一期上，据报道，“这个反对派在它发展的最初阶段，开始阻止改变党对群众的态度，随后它采取了明确的反革命托派立场。”

桑达利奥·洪科的影响主要是在古巴的工会会员中，但是也有学生参加共产主义反对派的创建工作。这批人来自反对马查多独裁统治的名为“左翼”的学生运动组织。“左翼”中有共产党人和其他左翼分子参加，那是大学中占统治地位的学生指导委员会的主要反对派。学生指导委员会是个思想意识比较模糊的组织，而且在反对马查多独裁统治的斗争中倾向于采用恐怖主义手段。“左翼”中反对共产党影响的分子同洪科及其工会伙伴合作组织了共产主义反对派。学生中主要的人物是查尔斯·西米恩。

共产主义反对派同列夫·托洛茨基领导的国际左翼反对派站在一起。但是这个组织的成员绝不都是正统的托洛茨基分子，有些大概不会比社会民主党激进多少；其他一些人，包括欧塞维奥·穆哈尔，或多或少同华金·莫林密切合作。华金·莫林是一位西班牙马克思主义者，他保持一种大约介于共产党和托派之间的政治立场。

桑达利奥·洪科本人在欧洲停留期间曾经同红色国际劳工联盟西班牙领导人安德烈斯·宁有过许多接触，宁成为西班牙托洛茨基派的创建人。后来，洪科等人收到并大量阅读西班牙托洛茨基分子、特别是安德烈斯·宁和胡安·安德拉德写的作品。古巴人发现他们同西班牙托洛茨基分子采取的立场通常是一致的，因此决定加入国际左翼反对派。^①

^① 同查尔斯·西米恩的谈话，1970年4月12日于新泽西尤尼恩城。

马里奥·列拉·埃尔南德斯在他撰写的古巴有组织劳工史的附录中,提供了1934年列宁主义布尔什维克党党员的名单。他列举了乌尔瓦诺·阿梅斯托、路易斯·M·布斯克特斯、罗伯托·方塔尼利亚斯、马科斯·加西亚·比利亚雷亚尔、华金·加索、卡洛斯·冈萨雷斯·帕拉西奥斯、桑达利奥·洪科、阿曼多·马查多、卡洛斯·帕德隆、费尔明·桑切斯和查尔斯·西米恩。这一名单肯定是不完全的。欧塞维奥·穆哈尔若干年后接任桑达利奥·洪科,作为真正党主要的工会领导人,他肯定参加了列宁主义布尔什维克党。看来巴勃罗·巴尔武埃纳和塞缪尔·鲍威尔也是这样,他们后来也成为真正党主要的工会工作者。也许列拉·埃尔南德斯列举的是列宁主义布尔什维克党的执行委员会的人员。这个党当时声称拥有数百名党员。到了1933年8月,马查多独裁统治被推翻时,共产主义反对派已牢固建立。它在工会中的影响相当大,控制了哈瓦那工人联合会。这个联合会是首都地区主要的工人联合会。

胡利奥·安东尼奥·梅利亚是托洛茨基分子吗?

关于古巴托洛茨基派形成时期最有意思的问题之一,是关于胡利奥·安东尼奥·梅利亚对托洛茨基的态度以及对他同正统共产主义的争执问题。梅利亚是1925年古巴共产党的创建者之一。^①他在死后逐渐被人们认为是古巴共产主义的最早领导人之一;但是有理由提出梅利亚在被害时是否至少在思想上已经成为一个托洛茨基分子这样的问题。

梅利亚曾经是哈瓦那大学的一名学生领袖,而且在第一次世界大战一结束就领导大学改革运动。1923年1月,他建立何塞·马蒂人民大学,1924—1925年,他帮助建立了泛美反帝联盟古巴支部。他多次被捕,最后被马查多政府驱逐出境。他在危地马拉

^① 埃尔南德斯:《古巴工人史(1574—1965年)》,第280页。

同当地共产党一起工作，在那里度过一个时期后，最后去墨西哥了。他积极参加墨西哥共产党的活动，是墨西哥中央委员，主编泛美反帝联盟机关报《解放者》。^①

梅利亚在临终前几个月同墨西哥共产党和斯大林主义派系的分歧日益增长，这看来是毫无疑问的。他同那些倾向于托洛茨基反对派的墨西哥共产党和同路人保持联系。^②在墨西哥共产党政治局的一次会议上，他同共产国际意大利代理人维托里奥·维达利有过严重争执。维达利使用卡洛斯·孔特雷拉斯这个名字是当时墨西哥党的领导人之一。胡利安·戈尔金在他的《斯大林是怎样谋害托洛茨基的？》一书中，报导说孔特雷拉斯攻击梅利亚说：“象这样的反对派只配被处死。”^③1929年1月，维克托·阿尔瓦指出，“看来已经作出了开除他出党的明确决定。”^④

1929年1月，梅利亚在墨西哥城大街上被谋刺身死。共产党人立即指责说，梅利亚是马查多政府的特务杀害的，但戈尔金总结出相反的证据说：“后来一系列揭发材料使人们得出如下结论：真正谋害梅利亚的是苏联国家政治保卫局的阴险特务（孔特雷拉斯）”。^⑤胡利奥·安东尼奥·梅利亚是加入托洛茨基事业中最杰出的古巴人，这大概是毋庸置疑的。但是有一定理由认为，他在去世之前对于被排斥的苏联领导人的地位已经抱有某种同情，也许这同他的被刺大有关系。

托洛茨基派与哈瓦那工人联合会

桑达利奥·洪科返回美洲后，不但投身于共产主义反对派的

① 《国际新闻通讯》，1929年2月1日。

② 《工人斗争》，墨西哥城，1941年1月20日。

③ 豪尔赫·加西亚·蒙特斯和安东尼奥·阿隆索·阿维拉：《古巴共产党史》（1970年），第94页。

④ 维克托·阿尔瓦：《伊比利亚美洲共产主义史纲》，1960年，第96页。

⑤ 引文见蒙特斯和阿维拉：《古巴共产党史》（1970年），第95页。

政治活动,而且还致力于劳工运动。洪科是面包工人,他迅速地成为哈瓦那工人联合会主要人物之一。这个联合会建立于1920年,是古巴最老的劳工组织之一。^①拥护这一劳工组织的主要政治组织是共产主义反对派、新的古巴阿普拉党和社会党人。在圣地亚哥这个东部城市,也有一个强大的工人联合会,它也是在上述政治组织的影响之下。这两个地区性工人联合会是共产党控制的古巴全国工人联合会在有组织劳工运动中的主要对手。

由于大学生与教授和以富尔亨西奥·巴蒂斯塔陆军中士为首的陆军军士之间的共同阴谋,拉蒙·格劳·圣马丁总统于1933年9月4日夺取政权。在格劳·圣马丁总统激进的民族主义政府执政期间,哈瓦那工人联合会支持政府。^②这同古巴全国工人联合会和共产党(曾试图“取消”那次推翻马查多的总罢工)的立场形成鲜明对照;他们指责格劳·圣马丁政权是“社会法西斯主义”,号召在古巴全岛建立“苏维埃”。^③

由于共产党人进行骚扰和盲目反对美国政府,1934年1月格劳·圣马丁政权被同一个富尔亨西奥·巴蒂斯塔(当时任陆军上校)所推翻。在这以后的几个月,在洪科领导下,古巴工人联合会在建筑工人中,在哈瓦那商业区百货商店(包括伍尔沃思百货公司)职工以及其他行业工人中,组织了多次罢工。同时,工人联合会还同古巴全国工人联合会所属各工会进行了剧烈的斗争。1934年8月27日,托派领导的工人联合会和共产党控制的古巴全国工人联合会之间的斗争达到了高峰。在当天晚上,一伙带武器的共

① 埃尔南德斯:《古巴工人史(1574—1965年)》,第98页。

② 上述内容引自同查尔斯·西米恩会见记,1970年4月12日于新泽西尤尼恩城。

③ 关于共产党对格劳·圣马丁政府态度的讨论,见前引蒙特斯和阿维拉:《古巴共产党史》(1970年),第139页;K. S. 卡罗尔:《游击队掌权:古巴革命的道路》,1970年,第74—77页。

产党人聚集在古巴全国工人联合会总部，从那里向工人联合会发动进攻。在战斗中，一人死亡，若干人受伤。^①

到了1934年，列宁主义布尔什维克党（即当时共产主义反对派所使用的名字）在拉丁美洲托派组织中拥有相当多的党员。负责在美国托派和拉丁美洲托派之间进行联系的墨西哥裔美国人A. 冈萨雷斯，向一位墨西哥记者说，1934年中，古巴党拥有六百多名党员。^②

古巴托洛茨基分子在这个时期对他们的前景十分乐观。因此，列宁主义布尔什维克党主要领导人之一M. 加西亚·比利亚雷亚尔，在1934年4月28日纽约托洛茨基主义报纸《战斗者》上写道，“由于列宁主义布尔什维克党近几个月所显示的克制、魄力和坚韧不拔以及全心全意对无产阶级的献身精神，可以预言，我们在特别是北美和南美无产阶级的援助下，必将能够正确而肯定地引导古巴广大群众走向夺取政权的道路。”

托洛茨基派和1935年总罢工

在1934年和1935年头几个月，曾经支持格劳·圣马丁政权的分子忙于策划一场推翻卡洛斯·门迭塔上校政府的运动。巴蒂斯塔上校曾经让门迭塔政府掌权以代替格劳·圣马丁的革命政府。最积极搞这些阴谋活动的是列宁主义布尔什维克党，托洛茨基分子特别同古巴青年组织进行阴谋策划。古巴青年组织是格劳·圣马丁政府极左成员安东尼奥·吉特拉斯组织的。这个组织得到学生的大力支持，在劳工界也有一定影响。它同古巴革命党（真正党）是对手，但却保持友好关系。古巴革命党是由格劳·圣马丁亲自在1934年2月建立的。^③

① 蒙特斯和阿维拉：《古巴共产党史》（1970年），第164页。

② 奥·费档，A. 冈萨雷斯致奥·费的信，1934年6月3日。

③ 列拉·埃尔南德斯：《古巴工人史（1574—1965年）》，第104页。

1934年10月和11月，列宁主义布尔什维克党发表了两个宣言以阐述其立场。一个宣言的标题是《关于目前政局和我们的任务的决议》，另一个宣言叫《行动纲领》。第一个宣言号召进行“一场工农民主反帝革命”。第二个宣言提出一项列宁主义布尔什维克党和古巴青年组织所同意的施政纲领，准备一旦夺得政权就立即付诸实施。

这些宣言激起了当时参加工人党的美国托洛茨基分子的愤慨抗议。工人党全国书记 A. J. 马斯特写信给列宁主义布尔什维克党领导人，反对该党提出的“工农民主反帝革命”的口号，害怕这一革命如果成功，结果就会建立起类似中国国民党政府那样的政权，马斯特提议列宁主义布尔什维克党应当支持一场“民主反帝的起义，建立任何一个能维持一段短时间的联合政权，完全作为单一革命即工人革命的土地反帝阶段。”

A. J. 马斯特还表示，美国托洛茨基分子感到同古巴青年组织讨论密谋活动太多了，在拟定施政纲领上花费时间也太多。马斯特认为，古巴托洛茨基分子应该“深入进行”他们的鼓动工作，“发扬更广泛阶层的革命热情”，而且“列宁主义布尔什维克党应使自己转变为真正的古巴工人阶级的党”。该党应该提出一项“当前斗争纲领”而不是提出一项施政纲领。最后，马斯特敦促列宁主义布尔什维克党和古巴青年组织成立的统一委员会应当扩大，以包括其他组织，“甚至包括斯大林分子。”^①

反对门迭塔政府的阴谋活动以1935年2月的总罢工而达到了高潮。马里奥·列拉·埃尔南德斯，号召进行这次总罢工是为了“建立共和国的新秩序。”^②加西亚·蒙特斯和阿隆索·阿维拉

① 奥·费档，A. J. 马斯特致列宁主义布尔什维克党中央委员会的信，1935年1月6日。

② 列拉·埃尔南德斯：《古巴工人史（1574—1965年）》，第102页。

在其所著《古巴共产党历史》一书中对这次罢工评论道，“确定在三月九日举行革命罢工，这对任何人都不是秘密。罢工委员坚持不懈地工作。咖啡馆变成了密谋策划的中心。炸弹和炸药箱在什么时间、什么地点爆炸是无法预言的。起爆声象雷鸣，宣告暴风雨的来临。随着时间的推移，局势变得日益模糊。”^①

罢工得到哈瓦那工人联合会、托洛茨基分子、古巴青年组织、真正党和阿普拉党乃至 ABC（反对它的人往往称它为“法西斯主义分子”）的支持。^②但是，共产党人拒绝加入无产阶级保卫委员会，因为该委员会原先曾经发动了罢工。而且古巴青年组织和列宁主义布尔什维克党在委员会里拥有强大影响。共产党“号召不同该委员会合作而单独发动一次罢工，以保持它本身的领导。”^③

巴蒂斯塔控制的政府以恐怖手段对付这次总罢工。哈瓦那司令官佩德拉萨上校事实上宣布了戒严法。加西亚·蒙特斯和阿隆索·阿维拉描绘当时的情景说，“在哈瓦那，佩德拉萨上校负责这一局势。他一下子就解决了。他下令破坏罢工，任何人夜晚九点后不准外出。蔑视这一命令者予以拘留，违者处死。他们取缔一切政治组织和工会组织。镇压是凶猛的，一片惊慌，其恐怖情景难以形容。”^④

托洛茨基分子将 1935 年 3 月革命总罢工的挫败，不单单归咎于政府的镇压。R. S. 德拉托雷在 1935 年 10 月一期的美国托洛茨基杂志《新国际》上评述道，“由于缺乏列宁主义布尔什维克党对罢工的中心领导，这场罢工无法抵制反动派可怕的进攻，结果以失败告终。”

① 蒙特斯和阿维拉：《古巴共产党史》（1970 年），第 171 页。

② 列拉·埃尔南德斯：《古巴工人史（1574—1965 年）》，第 102 页。

③ R. S. 德拉托雷：《古巴形势》，载《新国际》，1935 年 10 月。

④ 蒙特斯和阿维拉：《古巴共产党史》（1970 年），第 171 页。

列宁主义布尔什维克党境况恶化

古巴托洛茨基分子的活动在 1935 年 3 月起义之后急剧减少。大部分筹建列宁布尔什维克党的人离开了这个党的队伍，仍留在党内的人在古巴岛的有组织劳工中或总的政治活动中，相对说来影响很小。但是从托洛茨基主义观点来看，总罢工失败后几个月的局势看来并非不利。首先，在罢工受挫后不到两个月时间里，安东尼奥·吉特拉斯为门迭塔—巴蒂斯塔政权的警察所杀，看来托洛茨基分子把吉特拉斯的追随者争取过来支持他们事业的道路已经打开。其次，对罢工的血腥镇压激起了对当权政府的普遍愤恨，似乎创造了有利于列宁主义布尔什维克党发展的环境。在反对该政权的人们当中，列宁主义布尔什维克党人是最富有献身精神和最坚决的。

紧接着 1935 年 3 月总罢工受挫之后，托洛茨基分子持谨慎的乐观态度，这反映在上述 1935 年 10 月一期的《新国际》上发表的文章中。德拉托雷指出，“吉特拉斯之死在古巴政治舞台上产生了一种不同的局面。我们之参加进古巴青年组织的队伍，该组织成员对我党的同情态度，都为我们的组织开辟了良好的前景。小资产阶级不想放弃它搞暴动的意愿。这是生死攸关的问题。这里为无产阶级政党显示其领导才能提供了光辉的机会。一方面，古巴无产阶级在它所处的糟糕局势中，在不论发生任何暴动运动时必将把小资产阶级拉到它的列车上去。如果我们的党懂得如何动员自己的力量并且把它组织成群众能听到它呼声的一个先锋队的形式，那么我可以说革命就得救了。”

德拉托雷接着说，“工作是困难的。我党缺乏财政资金，不能合法地出版自己的刊物，不能开展合法的运动来筹集资金，必须求助于他国的无产阶级，要求立即前来援助。这一呼吁特别是向北

美无产阶级发出的，我们和他们是由于遭受共同的剥削方式而团结一致。”

古巴托洛茨基分子在一个短时期内同广泛的其他组织联合起来（甚至包括共产党和古巴全国工人联合会）为1933年罢工期间被捕人员获释而争取国内外的支持。美国托洛茨基分子费利克斯·莫罗在1935年10月19日一期《社会主义召唤》（美国社会党左翼机关报）的一封信上，在谈到“争取大赦社会犯和政治犯全国委员会”时写道，“该委员会包括三十一个政治组织和工人阶级组织，从共产党到前总统格劳·圣马丁的国民革命党，包括古巴列宁主义布尔什维克党、古巴工人援助队、哈瓦那工人联合会、……商业雇员联盟、古巴青年组织等。”

然而，古巴托洛茨基派的主要问题并非起因于门迭塔—巴蒂斯塔政府的迫害，而是出于其内部的事态发展。事实是，列宁主义布尔什维克党人不但没有接管古巴青年组织并把它变为该国托派的工具；而是大部托派领导人加入了古巴青年组织，并且他们本人对托洛茨基主义发生动摇。

查尔斯·西米恩已经在1934年退出了列宁主义布尔什维克党，加入到前总统格劳·圣马丁的真正党，并且带头组织了真正党的青年组织——真正党青年组织。安东尼奥·吉特拉斯死后不久，一些列宁主义布尔什维克党的领导人，包括桑达利奥·洪科和欧塞维奥·穆哈尔，参加古巴青年组织；他们实际上接管了它，洪科当上了该组织的劳工书记。^①

后来，古巴青年组织的前托洛茨基主义分子成为前总统格劳·圣马丁所领导的真正党的一部分。1937年8月15日，真正党、古巴青年组织、革命左翼、激进党以及各种无党派人士的代表在哈瓦

① 同查尔斯·西米恩的谈话，1970年4月12日于新泽西格登伯格。

那举行会议,成立了一个经过改组的古巴革命党(真正党)。^①前托洛茨基主义分子在改组真正党方面起了重要作用。桑达利奥·洪科和欧塞维奥·穆哈尔建立了前总统格劳·圣马丁的党的劳工委员会,该党成为古巴有组织劳工运动内部对共产党的主要反对力量。

其他的原托洛茨基分子在政治上向别的方向演变。比如,他们当中的埃米略·特罗带头组织一个恐怖主义学生组织——革命造反联盟。该联盟继续存在了十多年,在学生当中有些影响。正是在这个组织里,年轻学生菲德尔·卡斯特罗于四十年代后期在哈瓦那大学上学时经历了 he 最初的政治活动。^②

桑达利奥·洪科和他的原托洛茨基主义同伙成立了反对共产党在古巴有组织劳工中优势影响的一个重要组织。真正党劳工委员会的工作基础同共产党大体相同。在整个古巴岛上,在尽可能多的工会中建立了支部。这项工作终于得到报偿,使得真正党于1937年控制了古巴工人联合会,三年之后该党赢得了对政府的控制。

同时,桑达利奥·洪科于1942年被共产党人所谋杀。真正党党员、桑克蒂斯皮里图斯市市长在该市举行了一次纪念安东尼奥·吉特拉斯逝世周年大会。该党劳工委员会大力支持这次会议。桑达利奥·洪科被宣布为主要发言人。共产党《今日报》谴责即将举行的纪念吉特拉斯的大会;称洪科是“第五纵队”,号召“工人们”反对这次会议。结果,在唱完国歌和市长致了简短欢迎词之后,查尔斯·西米恩开始讲话。此时,一群共产党人闯进大厅,向讲台上的人开枪,打死了桑达利奥·洪科。大厅里总共有三人被杀,若干人

① 《波希米亚》,哈瓦那,1937年8月15日,第34页。

② 安东尼奥·阿隆索·阿维拉给罗伯特·J·亚历山大的信,1970年3月21日;卡罗尔:《游击队掌权:古巴革命的道路》,1970年,第116—121页。

受伤。

洪科的被害在整个古巴岛上激起了抗议的浪潮。共产党则指责真正党人杀害了他们自己的领袖。但是，在政治局内部，显然总的负责袭击那次真正党集会的华金·奥尔多基，据报道却指责桑克蒂斯皮里图斯共产党领导人超越他的指示范围而实际杀死了洪科。^①

洪科死后的列宁主义布尔什维克党

随着桑达利奥·洪科和古巴托洛茨基派其他大部分创建人的去世，列宁主义布尔什维克党在有组织劳工运动中成为一个很次要的因素，而在国家总的政治中则完全是无足轻重的成分了。然而，该党还存在着，而且偶而也能够出版某种刊物；比如说，1919年3月，墨西哥托洛茨基主义刊物《关键》报道说，古巴托洛茨基分子正出版一个名叫《光线和标记》的机关刊物。剩下的一个主要托派领导人是胡安·拉蒙·布雷亚，他在古巴托洛茨基分子中起领导作用，同时也积极参加其他国家（包括西班牙在内）的托洛茨基主义运动。他在三十年代后期的西班牙内战期间在那里度过了一段时期，他于1941年5月逝世。^②

第四国际于1938年9月正式成立时，列宁主义布尔什维克党加入了第四国际。但是该党同第四国际领导人、特别是同美国托洛茨基主义领导人有些意见分歧。因此，当托洛茨基主义的国际共产主义同盟内发生危机而美国社会主义工人党派出查尔斯·柯蒂斯力图对该同盟进行整顿时，古巴的列宁主义布尔什维克党支持卢西亚诺·加利西亚派。柯蒂斯对墨西哥托洛茨基派进行整顿时把加利西亚派排除于该组织之外。虽然柯蒂斯和第四国际领导认为国际共产主义同盟已于1938年解散，但是古巴列宁主义布

^① 蒙特斯和阿维拉：《古巴共产党史》（1970年），第288—289页。

^② 《无产阶级革命》，哈瓦那，1946年5月。

尔什维克党却宣称“对我们来说，同盟仍然是第四国际的一个支部。”^①

在洪科及其同伴脱离了托洛茨基主义队伍之后的年代里，托洛茨基分子继续活跃于有组织劳工的队伍之中。在四十年代初，据报道他们的主要力量在古巴东部关塔那摩地区，特别是在关塔那摩铁路工人当中，这些工人组织在铁路工人兄弟会第十分会里。^②

托洛茨基分子设法在古巴工人联合会（1938年后期在共产党影响下建立起来的）取得他们有可能取得的任何影响。他们反对该组织内的斯大林主义影响。根据美国托洛茨基主义刊物《第四国际》的一项报告，革命工人党（列宁主义布尔什维克党几年前的名称）在1943年古巴工人联合会大会上“极为活跃”。^③

当共产党和真正党之间争夺对古巴工人联合会控制权的斗争在1944年格劳·圣马丁总统当选之后开始达到危机程度时，托洛茨基分子采取赞成工人联合会保持统一的立场。他们号召继续从事斗争，不仅反对共产党控制古巴工人联合会，而且反对政府控制劳工运动这个总的想法，它认为，这种状况是1936年以来的特点，而真正党政府正在试图继续这样做（或者说托洛茨基分子是这样声称的）。^④

但是，当1947年真正党和共产党在古巴工人联合会内真的出现分裂时，托洛茨基分子在这一分裂中不起任何重要作用。这场斗争的一方是格劳·圣马丁的追随者共产党人，另一方是海员、电话和电气工人各工会中的“无党派”工会工作者，这几种力量的领

① 见利沃里奥·胡斯托：《革命战略：为争取统一和拉丁美洲的民族和社会解放而斗争》，1954年，第193页。

② 同劳尔·巴尔迪维亚的谈话，1971年1月20日于墨西哥城。

③ J. B. 斯图尔德：《古巴选举的背景和分析》，载《第四国际》，1944年7月。

④ 《无产阶级革命》，哈瓦那，1946年5月。

领导人没有一个是托洛茨基分子。

1941年5月，革命工人党开始出版《无产阶级革命报》。五年后，这份报纸仍然在出版，虽然并不象原先计划的那样每月出刊一次。该报的主编是巴勃罗·迪亚斯·冈萨雷斯。

托洛茨基分子不时参加选举。1944年，当格劳·圣马丁作为真正党候选人参加竞选，作为离任总统富尔亨西奥·巴蒂斯塔一手挑选的候选人的对手时，革命工人党支持格劳·圣马丁，而且敦促其支持者投票赞成在格劳·圣马丁的古巴革命党(真正党)候选人名单上竞选立法机构职务的工会工作者。

但是两年之后，当再度举行国会和市议会选举时，革命工人党持另一种立场。他们在关塔那摩地区组织了一个“外围党派”——革命先锋组织——来提名地方官职的候选人。但是，当选举法庭拒不给予革命先锋组织以正式承认时，革命工人党号召其支持者不参加投票。它认为，真正党的“古巴主义”已经名声扫地，而且认为，就工人阶级利益而言，情况表明：那些在真正党候选人名单上当选的工人们，并不比非工人的真正党候选人更好。^①

当1953—1954年第四国际巴勃罗势力和反巴勃罗势力之间发生分裂时，古巴革命工人党仍站在巴勃罗派一边，而且隶属于以J. 波萨达斯为首的巴勃罗派拉美局。六十年代初巴勃罗的队伍进一步分裂后，革命工人党就站在第四国际波萨达斯派一边。

反巴勃罗派以及随后的统一书记处看来并未曾在古巴建立任何组织，虽然它们在那里可能有个别的成员。1961年1月14日约瑟夫·汉森为美国社会主义工人党政治委员会作的一项报告中说明了这一点。汉森在讨论古巴出现革命政权时说，“但是，我们对于如何解释古巴在没有一个象美国社会主义工人党这样的党的情况下赢得胜利这个问题仍然不得其解。我要说明一点，在古巴

^① 《无产阶级革命》，哈瓦那，1946年5月。

并没有社会主义工人党。”^①稍后，汉森却反问道：“古巴托洛茨基分子究竟在古巴什么地方呢？”他答道：“他们会在共产党内，对吗？”这进一步表明：事实上，社会主义工人党所隶属的托洛茨基派国际组织在古巴岛上并没有建立它相应的组织。

革命工人党(托)和卡斯特罗革命

革命工人党(托)、即古巴的波萨达斯派对卡斯特罗革命给予充分支持。据报道，该党党员在马埃斯特腊山与菲德尔的游击队并肩作战。1959年以后，他们强烈支持革命运动向马克思列宁主义方向发展。革命工人党(托)党员积极参加了民兵，那是古巴政权招募来防范外来袭击危险和1960—1961年国内日益增长的分歧的。^②

在1961年以前，革命工人党(托)被允许活动而没有受到政权的干预。但是即使在革命的头两年，正统的古巴共产党(当时仍被称为人民社会党)强烈谴责托洛茨基派，竭力败坏他们的声誉，使他们受到镇压。

1960年在哈瓦那召开的第一届拉丁美洲青年大会上，保守的共产党人玩弄了上述这样一个花招。危地马拉共产党原领导人卡洛斯·曼努埃尔·佩列塞尔在一篇题为《从韦特海姆博士到波尔卡诺博士》的文章中叙述当时开会的情况说：“应当记住，当时菲德尔·卡斯特罗看来还没有献身于共产主义，而且认为自己的革命是范围最广阔的。那次大会对古巴共产党人来说是一场决定的战斗。古巴人同其他国家的代表联合起来，开始大肆指责参加会议的非共产党人士，特别是托洛茨基分子，因为他们象共产党人那

① 社会主义工人党编：《古巴革命性质》，1968年，第19页。

② 《政治局向甘蔗合作社大会发表的宣言，1962年8月》，载《第四国际》（波萨达斯派），1962年9月，第165页。

样，作为一个有组织的派别在活动。乌拉圭和墨西哥代表团由于坦率地发表了意见，因此他们或多或少地被监禁在他们各自的旅馆里，直到他们离开古巴。共产党人似乎战胜了图谋接管古巴革命并清洗卡斯特罗的‘托派阴谋’。七月二十六日，卡斯特罗在圣地亚哥发表讲话，其中猛烈攻击了古巴革命和人民的敌人托派阴谋分子。”

1961年5月，古巴政府正式采取行动反对革命工人党(托)。查禁了该党党报《无产者之声》，毁掉了该党即将出版的托洛茨基所著《不断革命》一书的印版。与此同时，劳工部接管了出版托洛茨基主义报刊的印刷厂。^①后来政府不许可革命工人党获得出版报刊所需要的新闻纸或其它印刷品。尽管托洛茨基分子举出《无产者之声》是“在1960年第一个公开提出对古巴革命实行社会主义改造”这一事实，政府还是采取了上述措施。^②

1962年8月，革命工人党(托)同卡斯特罗政府再次闹纠纷。8月18日，党的两位领袖伊达尔贝尔托和胡安·莱昂·拉米雷斯因散发的传单中包括有党的政治局致甘蔗合作社大会的祝词的内容而被逮捕。两天之后，革命工人党(托)关塔那摩地区组织号召举行列夫·托洛茨基被害周年纪念大会，但会议被警察取缔，“因为他们没有在十四天前获得开会的许可。”

由于采取了这些行动，革命工人党(托)政治局于8月22日写了一封信给古巴革命政府。这封信是由伊达尔贝尔托·费雷拉·阿科斯塔签署的。这封信“抗议对这个党的镇压，此举违背我国革命法律和无产阶级民主的一切原则，要求释放被拘留的同志，停止一切有碍我们活动的行政限制。”8月30日，警察来到革命工人党(托)总部，“他们手里拿着许多份我们的刊物，上面有这个总部

① 《新美洲》，纽约，1961年9月22日。

② 《政治局的宣言》。

……和被拘留同志伊达尔贝尔托·费雷拉·阿科斯塔和何塞·伦加尔索的地址。”但是这一次，托洛茨基主义领导人被拘留时间不长，1962年9月1日所有被监禁的人获释。

同时，8月24日、25日和26日，革命工人党(托)在哈瓦那召开第二次全国大会。大会开始时向托洛茨基和他最近去世的遗孀表示敬意。接着讨论五个重要课题，对每个课题都作了报告。J. 洛萨达作了关于国际形势的报告；E. 莫利纳作了关于第四国际特别大会(该大会建立了第四国际波萨达斯派)的报告；R. 卡瓦哈尔作了关于苏联和其他工人国家的报告；还作了论革命局势和古巴工人国家局势与前景以及托洛茨基主义者的任务的报告；I. 费雷拉作关于党的活动和党组织的报告；这次革命工人党(托)大会“对1962年4月召开的第四国际特别大会作出了自己的结论和决议，”那次会议正式建立了国际托洛茨基主义的波萨达斯派。这次大会还决定在1963年3月第四国际波萨达斯派第七次世界代表大会召开之前某个时候举行革命工人党(托)代表大会。^①

在《古巴革命工人党(托)致甘蔗合作社代表大会宣言》中，表明了卡斯特罗政权分子对革命工人党(托)感到恼火的原因所在。这一文件虽然赞成大会要求将糖业合作社转变为国营农场的主意，但也包括有对糖业公司在卡斯特罗政权下的经营方式提出了若干含蓄的(如果不是直率的)批评。比如说，该文件建议，“新成立的工会以及现有工会必须以更加民主的方式进行活动。”它敦促“工会领导应由工人民主选举产生，不得强行规定划一的名单，如果工人认为必要，他们有权提出不止一个名单。”

在谈到组织古巴“工人国家”这些比较一般的问题时，宣言指出，“为确保我们工人国家具有民主的无产阶级的和革命的职能，

^① 革命工人党(托)：《通报》，发表于《第四国际》(波萨达斯派)，1962年9月，第164页。

必须组织工农委员会,由他们所在工作单位的群众选举产生,委员会系指导机构,任命工人国家的一切工作人员,群众通过委员会发表他们的意见,讨论、批准、否决并决定国家的一切问题。革命工人党(托)提出,应像列宁在《国家与革命》一书中所建议的那样成立苏维埃立宪会议,在此基础上组成工人国家。”^①

1963 年后期,卡斯特罗政府断然采取行动镇压一小撮古巴波萨达斯派托洛茨基分子并且宣布他们为非法。我们所看到的最详尽的报导,开头是这样写的:“1963 年 11 月开始逮捕,当时省际公共汽车修理厂机械师安德烈斯·阿方索在他的工人同事中散发了《无产者之声》之后被工厂管理员曼努埃尔·耶罗专横地下令逮捕(自从 1961 年 5 月托派印刷社被没收和托洛茨基《不断革命》一书的西班牙文版铅版被捣毁以来,这些有若干页篇幅的油印托派报纸都是许可出版的)”。

安德烈斯·阿方索以前曾被解雇多次,并坐了短期的牢房。他最后一次被捕后,被押往可怕的哈瓦那拉卡瓦尼亚堡,古巴的许多政治犯就被监禁在那里。阿方索是民兵,1962 年导弹危机时被动员参加的,而且是卡斯特罗政权建立的街区情报网保卫革命委员会的成员。尽管如此,对他还是采取了这一行动。

阿方索被捕后几天,他的妻子也被捕了。12 月 2 日,当里卡多·费拉拉前往当地保卫革命委员会打听阿方索夫人的命运时,也遭致了同样的命运。费拉拉参加过反巴蒂斯塔的游击战,也是民兵和保卫革命委员会的成员,在他的工作单位被公认为“先锋工人”。费拉拉在弗罗拉飓风的风灾后志愿去采摘咖啡,回来后不久就被捕。革命工人党(托)另一个党员罗伯托·特赫拉因为询问他的同志们的情况,后来也被关进牢房。随后,革命工人党(托)总书记和《无产者之声》主编伊达尔贝尔托·费拉拉,也遭到类似命运,

^① 《第四国际》(波萨达斯派),1962 年 9 月,第 164 页。

党的小小办事处受到警察的搜索。

在秘密审讯中,所有这些托洛茨基主义领导人都被判处徒刑,从二至九年不等。对他们的指控是:“(一)散发非法报纸;(二)鼓吹推翻古巴政府;(三)对菲德尔·卡斯特罗表示不满。”

对革命工人党(托)的这一次迫害,不单单是一个局部现象,而是打算同第四国际波萨达斯派(如果不是同整个国际托洛茨基主义体系)决裂。卡斯特罗政权大约在这同一时期所采取的其他行动说明了这一点。第四国际波萨达斯派代表们的居住许可证突然被撤销,任何古巴人都不得离开这个岛国去参加预计在1964年年初召开的第四国际波萨达斯派世界会议。^①

古巴政府领导人与托洛茨基主义

革命工人党(托)的最终被取缔并不是很突然的事,因为古巴除了执政党外,所有其他政治组织均被宣布为非法。执政党成立于1962年,是通过卡斯特罗七·二六运动、老的共产党(人民社会党)和革命指导委员会(曾经参加反巴蒂斯塔斗争的另一个组织)*三个组织合并而成的。比取缔革命工人党(托)更加令人惊奇的,也许是还允许它活动了那么长的一段时间。这就使人对卡斯特罗革命的领导人对托洛茨基主义的态度,提出一些疑问。

我们已经指出,菲德尔·卡斯特罗最早是在革命造反联盟(是由一度加入过托洛茨基派的人们建立的)受到政治锻炼的。这不应使卡斯特罗对托洛茨基派产生偏见。他本人承认,当他1959年1月作为革命胜利的领导人开进哈瓦那时,他只不过是个

^① 上述内容均引自《斯巴达派》,纽约,1965年1—2月。

* 即三·一三革命指导委员会,是1957年3月13日以哈瓦那大学学生联合会主席安东尼奥·埃切维里亚为首的四十多名青年攻打总统府失败之后建立的。成员多是大学生,其纲领是推翻巴蒂斯塔独裁政权。该组织后来转入拉斯维利亚斯省山区打游击,最后与七·二六运动的一支起义部队汇合。——译者

最模糊的马克思主义者。而且也没有理由认为当时他已有的任何经历会使他特别对托洛茨基主义产生偏见。

直到1966年1月,菲德尔·卡斯特罗才宣称他是托洛茨基主义的公开敌人。时值召开三洲大会之际,过去一直同危地马拉的容·索萨游击队合作的墨西哥托洛茨基主义波萨达斯派,是菲德尔盛怒之下的直接牺牲品。但是,卡斯特罗对托洛茨基派的指控大大超过这一有限的目标。在一次激烈的长篇演说中,他对托洛茨基主义作了若干概括。一次,他谈到“这个名声败坏的东西,这个反历史的东西,这个来自显然为美帝国主义效劳的分子的欺骗性玩意儿,那就是第四国际的纲领。”稍后,他说,“如果说托派一度代表的是一种错误的立场,但只是一种政治思想领域的立场,而托派在后来就成为帝国主义和反动派的庸俗工具了。”

然而应该指出,卡斯特罗指控的细节指的是第四国际波萨达斯派。他援引波萨达斯派意大利下属组织出版物上的一篇文章,以及一名墨西哥波萨达斯分子和波萨达斯派阿根廷成员阿道夫·吉利(卡斯特罗称他为阿道尔福·吉尔)的谈话。菲德尔显然对托洛茨基主义波萨达斯派在三个方面特别感到恼火。这就是当时波萨达斯派坚持的三点:认为埃内斯托·格瓦拉要不是被卡斯特罗政权所杀害了,就是被关进监牢了;认为卡斯特罗政府在1965年多米尼加共和国内战期间未曾给予该国“立宪主义者”应当得到的支持;认为同危地马拉容·索萨游击队合作的墨西哥托洛茨基分子已经说服游击运动采纳托洛茨基主义纲领。

不过,还应当注意到,卡斯特罗对波萨达斯分子和其他托洛茨基分子未加任何区别。其所以如此,是因为他不了解二者的区别呢,还是只不过想要公开表明他是一概反对托派呢,这一点很不清楚。事实仍然是,卡斯特罗只有一次感到需要较多地论述托洛茨基主义,他的做法是对马克思列宁主义的这一分支进行笼统的

指控。^①

古巴革命另外两位重要领导人对托洛茨基主义持比较赞同的观点,尽管他们两人都不能被称为第四国际的彻底支持者,而且他们两人在1965年初就离开了古巴政治舞台。他们是卡米洛·西恩富戈斯和埃内斯托·格瓦拉。

西恩富戈斯是古巴革命的主要军事领导人之一。在革命胜利后的最初几个月,他担任起义军的司令员。他不怎么掩饰他对人民社会党(正统的斯大林主义共产党)的反对,据说有一次他禁止这个党的党员在哥伦比亚营(哈瓦那附近的重要军事基地,他的总部所在地)散发他们的《今日报》。西恩富戈斯在他的青年时代如果不是革命工人党党员的话,也是托洛茨基分子的同情者,这是有一定理由的。固然对此还无法加以证实,但却可以说明他对古巴斯大林主义分子表示反感的原因所在。无论如何,1959年10月下旬,卡米洛·西恩富戈斯在多少有点神秘的情况下失踪了。^②

也许更为重要的是关于埃内斯托·切·格瓦拉的态度问题所开展的讨论。格瓦拉在古巴事务方面发挥重大作用的六年期间,对托洛茨基分子发表了一些矛盾的看法。美国社会主义工人党领导人之一约瑟夫·汉森,举了一个事例来说明这些矛盾的态度:“有一次,格瓦拉在电视台上攻击古巴托洛茨基主义报纸。攻击的消息很快传播开了,因为有许多势力,其中包括具有斯大林主义思想的势力,对制造古巴革命和托洛茨基主义之间的分裂很感兴趣。仅在几个月之后,我们才意外地获悉,正好在这一事件的下一天夜晚,格瓦拉在电视台上为歪曲了托洛茨基分子的观点而向‘托洛

① 见菲德尔·卡斯特罗在三大洲会议上的闭幕词,发表于《社会主义古巴》,哈瓦那,1966年2月,特别是第88—97页。

② 有关卡米洛·西恩富戈斯过去的政治隶属关系和信仰的材料,得自访问一位目前仍可能在古巴的工会领导人,因此必须匿名。

茨基主义同志们’表示歉意,而且说他们对他们的话所作的解释是错误的。”汉森还指出,在切·格瓦拉出席埃斯特角会议(这次会议成立了争取进步联盟)的时候,他会见了“波萨达斯集团的主要代表。”^①

切·格瓦拉总的国际路线,看来也更符合托洛茨基主义思想体系,而不符合大部分其他革命组织的思想体系。格瓦拉坚持革命不能犹豫不决,不能加以“稳定化”,而应不断前进,否则革命就会倒退。因此,他谴责用“物质”刺激来鼓励工人提高产量,而且认为“精神”鼓励是与“社会主义”时期相适应的。根据马克思列宁主义理论,社会主义是“共产主义”的前身,因为只有采用这样的精神鼓励才能锻炼与下一个历史时期相适应的“共产主义新人”。虽然列夫·托洛茨基确实未按照这样的思路进行论述,但是这种看法看来肯定同他的“不断革命”的论点有某些一致之处。

然而,有迹象表明,格瓦拉在最后几个月同卡斯特罗政权的交往使他对托洛茨基主义和托洛茨基分子的态度变得强硬起来了。当美国学生组织的一个成员 1964 年夏天访问古巴时,向格瓦拉提问说,“在无条件和保卫革命这个范围内,政治批评是否应以政治方式来对待而不应该压制不同观点,”据报道,格瓦拉作了如下的答复:“我同意你的谈话,但是古巴托洛茨基分子并不在革命营垒内部,他们不过是‘分裂主义者’,我没有在任何山上都看到过他们。我不曾看到他们在城市斗争中战死。他们是在革命已经结束对关塔那摩发出指示之后出现的。我不说他们是美国中央情报局特务,这我们不知道。他们过去没有支持过革命。他们说,有一支由斯大林主义分子组成的右翼而我们(格瓦拉)是左翼。”^②

① 社会主义工人党编:《古巴革命性质》,第 28 页。

② 引文见《斯巴达派》,纽约,1965 年 1—2 月。

第四国际与卡斯特罗革命

关于卡斯特罗政权性质的不同看法，长期以来成为第四国际派系斗争的组成部分。美国社会主义工人党与之有联系的统一书记处所领导的一派，比较迅速地得出结论说卡斯特罗政权是个“工人国家”。社会主义工人党主要人物之一约瑟夫·汉森大力阐述了这一立场。他早在1962年11月20日就写道：“如果客观地把古巴视为工人国家和西半球社会主义革命的开创阶段……那么就可以十分清楚地看到为什么古巴起着这样引人注目的作用。1917年十月革命扩展到西半球来了，这是比古巴经济对南、北美洲的重要性更为重大得多的革命行动。”汉森还说，“情况还远不只是如此。由于涌现出非斯大林主义出身的领导，古巴革命明显地加速了整个斯大林主义篇章的最终结束。”^①

第四国际统一书记处这一派继续“无条件地”支持卡斯特罗政权，虽然它不时向卡斯特罗政府就其“错误”主动提出忠告。古巴政府开展的那场争取使1970年蔗糖收获量达到一千万吨的运动失败了。代表统一书记处观点的意大利发言人利维奥·梅坦在1970年11月30日一期的《洲际新闻》上写了一篇长文分析这一运动的后果，在接近文章末尾时，他写道：“第四国际从来没有把对工人国家及其演变分析服从于任何策略上的考虑。这就是今天我们正试图对活动于古巴的各种倾向进行评论的原因所在，而且在指出积极方面的同时，还指出一系列令人吃惊的因素。古巴仍然是世界革命的堡垒。革命古巴的存在，就是美帝国主义弱点的无穷根源和促进整个拉丁美洲革命的客观因素。一切迹象表明，古巴领导人必将站在任何发展着的革命运动一边，因为他们没有忘记他们的革命归根结蒂取决于大陆革命。”

^① 社会主义工人党编：《古巴革命性质》，第25页。

统一书记处对于 1971 年初埃维尔托·帕迪利亚一案极为不快。帕迪利亚是一个诗人，他的作品曾经获得卡斯特罗政府“美洲之家”的奖，可是他被逮捕了，经过低头“供认”错误之后才获释。关于这一点，让-皮埃尔·博沃在统一书记处法国下属组织 1971 年 5 月 10 日一期的机关报《红色》周刊上写道：“在莫斯科、布拉格和华沙，这都是正常的。恐怖手段是傲慢愚蠢的官僚们想到的唯一办法。因为这些官僚们主要一心想维护秩序。这并不使我们感到惊讶。可是在哈瓦那，这是新的情况，很严重，十分严重。”在指出统一书记处托洛茨基分子一贯支持古巴革命之后，博沃说，“近年来一系列官僚主义畸形发展的加剧，它对经济计划所造成的错误，以及采取诸如支持入侵捷克斯洛伐克或者把支持拉丁美洲革命派降为古巴领导的次要任务等国际立场，这一切成为我们担忧的问题和批评的材料……帕迪利亚案件正是在这一背景下显示出它的全部严重性的。”

利维奥·梅坦以《古巴：一张必要的资产负债表》为题，在 1971 年 7 月一期的《第四国际》上对卡斯特罗革命作了进一步的评论。文章分为两部分，一部分是二月完成的，跋是在六月帕迪利亚事件之后写成的。这篇文章反映人们对帕迪利亚问题的关注，但是说明统一书记处对古巴问题的立场没有改变。梅坦在文章前一部分写道：“我们深信古巴革命尚未发挥其全部潜力”，而且相信拉丁美洲革命者“受到他们以反帝行动来保卫工人国家的责任感的鼓舞，古巴工人国家仍不失为最敢于蔑视和最仇恨资本主义历史上最强大帝国主义的。”梅坦在跋中写道：“这个问题的要害（以及我们已经得出的资产负债表）没有发生任何质的改变。”

从六十年代初起，第四国际波萨达斯派也认为卡斯特罗政权是个“工人国家”。我们已经指出，波萨达斯派的古巴下属组织革命工人党（托）对古巴政权所作所为的批评，是从设法改善古巴工

人国家这一角度提出的。第四国际也持这同一立场。

第四国际波萨达斯派第七届世界代表大会的政治决议中有题为“古巴革命之影响”的一个部分。这个文件的开头提到“古巴社会主义革命”，后来指出“古巴托洛茨基派的活动，就像全世界托洛茨基派的活动一样，就是要无条件保卫这个工人国家。”然而，这个文件还评论说，卡斯特罗政府谴责古巴托洛茨基分子，“表明古巴的官僚主义化进程已经严重地开始了。”这种一方面表示“无条件支持”，一方面又在一些细节上批评卡斯特罗政权的活动，仍然是整个六十年代波萨达斯派的立场。

第四国际体系中公然谴责卡斯特罗政权并认为托洛茨基派同卡斯特罗政权根本无关的唯一成员，是第四国际希利派国际委员会。1966年4月在伦敦举行的该委员会第三届代表大会上，通过了《第四国际国际委员会宣言》。宣言对卡斯特罗政权性质作如下评述：“小资产阶级波拿巴集团正在土崩瓦解。他们的政治任务主要在于引导群众运动，这就赋予他们对帝国主义以明显的独立性。他们当中最激进的分子，不管他们同帝国主义的分裂究竟到达何种程度，结果还是在帝国主义的控制之下。”

宣言接着将这一概括具体运用到古巴：“最极端的例子——古巴——也不是例外。美帝国主义迫使古巴小资产阶级居然去没收美国公司，并且号召古巴工农群众支持它的措施。但是不管菲德尔·卡斯特罗和七·二六运动究竟走多远，政权的社会性质却依然是资产阶级的。在反对美帝国主义的斗争中，古巴的主要支柱只能是克里姆林宫官僚集团，这就使古巴成为它的俘虏。”

最后，宣言预示卡斯特罗革命将面临悲惨的结局说，“对收归国有的帝国主义财产可以商定给予补偿的提议，对‘左翼’展开的斗争，对卡斯特罗运动原领导人的审讯，反菲德尔·卡斯特罗阴谋的发现，反托洛茨基主义的攻击，这么多的迹象都表明古巴革命正

达到一个危机阶段。在小资产阶级卡斯特罗式的领导之下，古巴政权的种种矛盾在增长。由于缺乏革命的工人政党，这些矛盾必将导致古巴政权的衰败而有利于帝国主义，而不管菲德尔·卡斯特罗及其小资产阶级随从的个人命运如何。”^①

希利派的态度从那时以来没有改变。安德鲁·辛克莱在1970年3月6日一期的社会主义劳工联盟机关刊物《工人报》上撰写了埃内斯托·格瓦拉传记。托尼·肖特评论这一传记时说：“把资产阶级国家、军队和警察机器的权力基础统统集中在一小撮人手里，说好，是波拿巴主义，说坏，是法西斯主义。崇拜暴力和战争，把它们作为人类美德的创造者，这也使人们想起法西斯主义的意识形态。”

同年晚些时候，古巴一千万吨蔗糖收获计划受挫之后，《工人报》刊载一篇题为“古巴危机增长”的文章。文章的一部分写道：“卡斯特罗主义——以及企图把卡斯特罗主义说成是替代斯大林主义的革命道路的人们——正陷入深刻的危机之中，它不仅对古巴和拉丁美洲而且在全世界必将产生反响——主要是在背叛统一书记处的前托洛茨基分子队伍中……巴勃罗集团实际上将其整个政治前途寄托在帝国主义和斯大林主义之间出现一个卡斯特罗式的‘第三种力量’……现该集团表明同两者都有联系，从而证实我们所说的六十年代初以来出现了小资产阶级民族主义的卡斯特罗变种的看法。”^②

结 语

虽然古巴托洛茨基派对三十年代初的有组织劳工曾有过相当大的影响，但是托洛茨基主义领导人不参加全国性政治活动的“主

^① 《第四国际》(希利派),伦敦,1966年8月,第129—130页。

^② 《工人报》,伦敦,1970年7月30日。

流”达二十五年之久，因此，托洛茨基主义的影响急剧下降。在整个四十和五十年代，古巴托洛茨基派在有组织劳工中仍然是一个很次要的因素，而且他们的主要支柱局限于古巴岛东端的关塔那摩地区。

在卡斯特罗执政之前和执政之后，革命工人党(托)都积极支持古巴革命。但是它对古巴政权“无条件的支持”，并不能使它幸免于卡斯特罗政府对它的迫害和最终镇压。在古巴，任何第二个革命政党都没有立足之地，即使像革命工人党(托)这样小小的政党也是如此；1961年以后，只有一个合法的政党，这个党四年之后取名古巴共产党。菲德尔·卡斯特罗任党的总书记。

第四国际的各种派系对卡斯特罗政权采取了不同的态度。第四国际波萨达斯派尽管它在古巴的下属组织遭到压制，但却坚持认为卡斯特罗政权是工人国家而且主张给予支持，同时它也坚持必须使托洛茨基派在古巴保持活力并对古巴政权的某些行动持批判态度。统一书记处是最积极支持卡斯特罗的（虽然它经常向卡斯特罗提出忠告，而且对卡斯特罗赞同入侵捷克斯洛伐克和帕迪利亚的“供认”感到不安），但是统一书记处的古巴追随者参加卡斯特罗的党的不多。希利派从一开始就对卡斯特罗政权十分敌对，并对支持卡斯特罗政权的组织(诸如统一书记处)进行了攻击。

第十二章 拉丁美洲其他国家的托洛茨基主义

我们在前面几章讨论了阿根廷、巴西、玻利维亚、秘鲁、墨西哥和古巴等国一些最重要的、存在时间最长的国际托洛茨基派拉丁美洲下属组织的情况。但是乌拉圭的托洛茨基派也具有一定的重要性,特别是在该国的劳工运动中;在厄瓜多尔、巴拿马、波多黎各和哥伦比亚,托洛茨基主义运动特别在其形成的年代里,只是作为一种共产主义的左翼倾向短暂地出现过。本章将论述乌拉圭托洛茨基主义运动和这些为时短暂的托洛茨基主义组织。

乌拉圭

在二十世纪前半叶的大部分时间里,乌拉圭在拉丁美洲国家中是独特的。在何塞·巴特列-奥多涅斯*的影响下,制定了一项民族主义的、着眼于社会的纲领。这一纲领的实施,使大部分经济置于国家所有制之下,几乎普及了初等教育,制定了广泛的劳工立法和规模过于庞大的社会保险体制。

主要是由于实施了巴特列的纲领,传统的红党和民族党**继

* 何塞·巴特列-奥多涅斯(1856—1929年),是乌拉圭红党著名的领袖。1903—1911年期间曾两次出任总统,推行一系列政治、经济改革措施。为了鼓励民族工商业的发展,对英国资本实行限制,并将铁路、电力、自来水、银行等部门收归国有。巴特列的改革措施,反映了当时新兴资产阶级的政治、经济要求,促进了乌拉圭资本主义的发展,扩大了红党的政治影响。——译者

** 民族党即白党。它和红党同时成立于1835年,是乌拉圭传统政党。1958年11月白党在大选中击败了自1865年起连续执政的红党,于1959年开始执政。1962年大选中白党再次获胜,又执政了四年。1966年大选中败于红党。1973年政变后,白党处于非法状态。——译者

续博得大部分乌拉圭人的效忠。红党主要代表城市利益集团，民族党得到农村居民、特别是大土地所有者集团和其他反对巴特列改革纲领的人们的支持。大部分工人倾向于投票支持红党的巴特列派，这个派从第一次世界大战起就被称为巴特列红党。乌拉圭特有的选举制度使红党和民族党可能成立一个相互竞争并反对其他政治组织的共同阵线，尽管各自的党内都存在大规模的派别活动。

所有小党的选票加在一起只代表乌拉圭全国选票的15%—20%。在本世纪头六十年的大部分时间里，这些小党有天主教公民联盟、社会党和共产党。天主教公民联盟通常获得小党选票总数的大约一半；其余的一半通常由社会党和共产党所得；如果社会党趋向获胜，共产党就败北；反之，也是一样。在这总的政治格局中，托洛茨基分子从来只代表对两大传统政党都不支持的少数居民中很小的一部分。托洛茨基主义有一个时期在有组织劳工中的影响是明显的，但不是很大的；它在政治上活跃的学生中时常有一定的追随者。

革命工人同盟

托洛茨基派由于国际共产主义在世界范围内发生分裂而出现以后不久，就在乌拉圭出现了。南斯拉夫籍乌拉圭人埃斯特班·基基奇从1926年以来就同詹姆斯·坎农保持通信联系，后来坎农成为美国托洛茨基主义运动的主要领导人之一；大约在坎农及其追随者被开除出美国共产党的同时，基基奇和另一名南斯拉夫人以及一位保加利亚人在1929年退出乌拉圭共产党。但是，正式的托洛茨基主义组织革命工人同盟一直到1937年才在乌拉圭建立起来。其所以拖延，据说主要是因为托洛茨基主义的主要支持者是在乌拉圭的外国出生的工人。

托洛茨基分子在劳工运动中曾有过一些影响。埃斯特班·基基奇于1940年带头建立了统一冶金工业工会。蒙得维的亚的大部分金属制造工人参加这一工会。该工会加入了工人总工会，当时这个总工会是乌拉圭主要的中央劳工组织。但是工人总工会是在共产党控制之下，所以这个新成立的工会也受到共产党的控制。基基奇曾经担任过该工会执行委员会委员，因此他终于在1942年被迫辞退这一职务并退出这一工会。

基基奇及其同伴们在被迫退出统一冶金工业工会的情况下，集中精力在蒙得维的亚的拉古西和沃尔米诺特造船与修船企业建立独立工会。到了四十年代中期，这个工会为其会员争取到只有工会会员才能进厂工作的规定和大幅度增加工资，成为该市最强大的工会之一。

由于工人总工会内部各种政治倾向反抗共产党控制该工会，工人总工会于1942年开始分崩离析。因此，到了第二次世界大战结束时，乌拉圭有三个主要的中央劳工组织在活动；在共产党控制下的工人总工会；主要受社会党控制的工会联络委员会；以及在无政府主义者和托洛茨基分子共同控制下的自治工会联络委员会。埃斯特班·基基奇是自治工会联络委员会的杰出人物。参加委员会的，还有面包工人工会和两个造船工人组织。

与此同时，乌拉圭托洛茨基分子已经感受到了1940年美国托洛茨基主义运动发生分裂的影响。当时在苏联政府性质的问题上，特别在1939年底托洛茨基支持苏联入侵芬兰的问题上，马克斯·沙赫曼同社会主义工人党及其他领导人和列夫·托洛茨基本人进行了一场剧烈辩论之后，带领他的支持者退出了社会主义工人党。埃斯特班·基基奇和乌拉圭其他托洛茨基派领导人同情沙赫曼在这些问题上的立场，但是他们并没有同革命工人同盟中持不同观点的那些人破裂。由于沙赫曼及其支持者当时没有设法建

立一个同托洛茨基为首的第四国际相对立的组织，所以托洛茨基分子在乌拉圭不必非得在对立的国际机构间进行选择，这样的选择有可能引起乌拉圭托洛茨基主义运动内部的分裂。^①

1944年年中，革命工人同盟受到了全国范围的注意，因为当时内务部部长在众议院一次立法议案辩论期间对同盟进行了猛烈攻击。那位部长敦促通过一项法案，规定建立解决劳工争端的强制性的协调与仲裁委员会，他支持这一立法的主要论据之一是所谓托洛茨基分子“使用罢工作为革命训练学校”。通过这一立法就是实际上禁止罢工。托洛茨基分子回答说，“我们不使用‘罢工作为革命训练学校’，但是我们认为罢工是工人所拥有的争取实现要求的唯一武器，必须用一切手段加以维护。”他们号召成立一个“维护罢工权利和建立工会自由的阶级联合阵线”，极力主张工人“要求各个工会动员起来以维护这些自由并且同其他工人组织开展一场反对镇压劳工运动的联合运动。”^②

一些年来托洛茨基分子能够偶而出版一份报纸，它最初叫《社会主义行动》，1942年开始取名《反潮流》。那是一份办得很活跃的报纸，刊登各种新闻、思想和宣传。它经常谴责其他国家（特别是苏联）和乌拉圭本国的斯大林分子。它特别注意乌拉圭劳工运动的事态发展，特别是冶金工人的境况；它还攻击屠宰业工人联合会内各种政治倾向的工会领导人的“背叛”。屠宰业工人联合会是当时乌拉圭唯一最重要的劳工组织。《反潮流》广泛地刊载国际事件。讨论到的事件有：希腊的内战、加强拉美和美国经济关系的“杜鲁门计划”以及联合国的成立等等。

对其他国家托洛茨基分子的活动给予很大注意。1946年11

① 上述内容引自对埃斯特班·基基奇的访问记，1946年10月10日和17日于乌拉圭蒙得维的亚。

② 传单《乌拉圭工人：我们的行会自由处于危险中》，1944年6月12日。

月一期的《反潮流》，特别提到法国第四国际分子在战后第一次选举中成功地赢得六万张选票一事；1946年10月一期讨论希腊托洛茨基分子反对当时当权政府的情况；有几期论述了玻利维亚革命工人党的一些问题。1946年6月的一期发表一篇详尽的文章，报导不久前在比利时召开的第四国际会议；但文章未说明乌拉圭代表团是否出席这次会议。

《反潮流》刊载许多旨在向读者介绍第四国际理论的文章。1946年11月一期发表了布尔什维克政府于1917年末和1918年初制定的“五项根本法令”。有几期涉及到土地改革问题，强调托洛茨基分子认为有必要在乌拉圭进行土改的见解，并提出了他们赞成的那种重新分配土地的纲领。

1946年末在一次屠宰业工人罢工时，托洛茨基分子（他们在这一重要行业的工人中没有影响或影响很少）发表了一篇题为《屠宰业工人罢工万岁》的文章，告诫工人们警惕“资产阶级和叛变的劳工领袖之间达成交易。”文章还敦促罢工工人不要满足于所谓通过两方工资委员会就可以解决工人们的要求的许诺。这是政府当时广泛用来解决各种劳工危机的一种做法。

革命工人同盟没有积极参加选举。1946年11月一期的《反潮流》，号召工人们抵制预计在该月举行的大选。同盟显然没有提出自己的候选人，认为工人投任何其他政党候选人的票无助于实现工人的利益。该刊物还争辩说，在建立新的九人“委员会”来代替共和国总统的问题上举行公民投票，不是乌拉圭工人关心的事。革命工人同盟下一期报刊上，刊出大标题《五十多万选票并没有改变人民极度贫困的状态》。

1952年，革命工人同盟的报纸改名为《工人阵线》。1952年7月的一期说明当时同盟的各种活动。它刊载了一篇反对同美国签订军事条约的重要文章。文章批评大多数宣传反对这一条约的人

们都是在“资产阶级统治机构”的控制之下的。它号召展开一场“全国性群众统一行动的伟大运动来反对该条约”，并要求就这个问题举行公民投票。

这一期的《工人阵线》还登载了阿根廷和锡兰托洛茨基主义活动的消息，以及对《工人阶级》（从社会党分裂出来的左翼集团“工人社会主义组织”的机关报）攻击乌拉圭托洛茨基分子一事的答复。这篇题为《劳工党基本原则》的社论，强调需要在乌拉圭建立一个新的劳工党，这个党应该具有马克思列宁主义的意识形态。但是这篇社论评述说，“马克思列宁主义政党不是自发地产生出来的。而是在吸收马克思列宁主义关于国际劳工运动的学说基础上产生的……”。社论断言，“我们将托洛茨基派和第四国际在争取建立新党的斗争中所发展的马克思列宁主义奉献给革命先锋队。”

到了五十年代初，乌拉圭托洛茨基分子已经丧失了他们五年前在劳工运动中所获得的大部分影响。第二次世界大战一结束就曾接受托洛茨基分子和无政府主义者领导的自治工会联络委员会已经消失了。大部分劳工运动要么合并到共产党领导的工人总工会，要么合并到乌拉圭工会联合会，后者当时的力量较大，其领导人中有社会党、独立民族党和巴特列红党的党员。《工人阵线》的文章中没有迹象表明托洛茨基分子直接参与劳工运动的活动，虽然文章确实要求两个中央劳工组织联合起来。

尽管 1953—1954 年第四国际发生了分裂，乌拉圭托洛茨基分子仍归属于米歇尔·巴勃罗领导的一派。他们还把他们的组织改名为革命工人党（第四国际）。该党成为阿根廷以外接受波萨达斯影响最早的托洛茨基主义政党之一。

托洛茨基分子与日益增长的乌拉圭危机

在第二次世界大战之后的年代，乌拉圭的经济和社会正进入

深刻危机之中，这对许多人来说是越来越明显了。几十年前巴特列提出的解决办法不足以应付局面了。国民经济中传统畜牧业部门提供了乌拉圭的大部分外汇，这个部门已经进入了严重衰落时期。巴特列以后的各届政府所主张的工业化虽已尽可能地取得进展，但在方向上没有根本的改变。大批工人可以在政府和私人部门兼职的制度虽已得到推广，但却越来越失去任何经济意义了。社会保险制度效率日益低下而且花费昂贵。

然而，第二次世界大战后乌拉圭政治领导人没有作出什么努力来解决这些问题中的任何一个。因此，在1958年，红党九十多年来第一次在大选中受挫，民族党开始了为期八年的统治。同时，反对两个传统政党的不满情绪日益加剧，这种不满情绪看来在任何一个现有的小党中都不会找到有效出路。

在这一关头，革命工人党(第四国际)设法至少为国家政治生活中极左翼人士提供一个替代的出路。民族党获胜后不久，革命工人党(第四国际)召开了全国代表大会，随后将中央委员会1959年7月会议的一项决议作为小册子印发。这次会议阐明了党对全国政治问题的立场。

乌拉圭托洛茨基分子竭力主张将已分裂的劳工运动重新统一起来，他们说，“统一的中央劳工组织和无产阶级联合阵线的出现，是反对阶级敌人、提高群众政治成熟性、通过行动和党的纲领来加深社会党和共产党党内危机并提供一个进步的解决办法的必要手段。”^①

革命工人党党员认为，社会党和共产党内都有严重危机，而托洛茨基分子可加以利用。该党中央委员会的决议认为：“工人阶级及其斗争，以及我党通过一切手段采取的真心想意的行动，是发展

^① 革命工人党(第四国际)编：《全国形势：无产阶级的前景和任务》，1959年7月，革命工人党中央委员会政治局决议，第10页。

一个充分的社会党左翼倾向的决定性因素，这一倾向有可能成为社会党内的领导力量。我党有权并负有革命职责力求使社会党内的危机取得进步的解决。”^①

就共产党而言，革命工人党看出该党下层领导和一般党员对党的全国领导日益表示失望。它认为，“在这种情况下，在共产党内建立一种派系倾向，就不仅应加以推动和鼓励，而且是一条逐步解决共产党危机的道路。”^②

革命工人党中央委员会 1959 年 7 月决议的末尾提出一项广泛的纲领。决议号召的内容中包括：“制定一项实现工业化的工人计划”，“在内地建立工业，实行工业国有化并置于工人管理之下”，“制定一项符合大众需要的住宅计划”，并“同时占有一切现有的大建筑物和房屋——避暑别墅、公寓、旅馆。”此外，纲领还要求实行土地改革，包括“无补偿地没收大庄园”，以及“将一切社会成果推广到农村。”纲领敦促“同工人国家发展贸易”，以及“同其他拉丁美洲国家签订协议和制定联合计划。”^③

但是，这一纲领还不足以使革命工人党（第四国际）在劳工运动内部或在总的政治舞台上赢得任何重大影响。虽然，社会党危机（托洛茨基派曾对此作过详尽分析）的确导致了社会党迅速衰败，但是革命工人党（第四国际）对这一点还不能够加以利用。托洛茨基派曾预计的共产党队伍内的危机事实上并未出现；六十年代共产党的影响大大扩大了，控制了除一小部分以外的整个劳工运动，大大增加了它在国会的代表席位。而革命工人党在乌拉圭国内事务中仍然是一个弱小的组织。

① 革命工人党中央委员会政治局决议，1959 年 7 月，第 12 页。

② 同上决议，第 13 页。

③ 同上决议，第 15—16 页。

革命工人党(托)的近期历史

1962—1963年,乌拉圭托洛茨基分子作出了统一第四国际的新尝试,其结果是出现了使用同名的三个组织。乌拉圭托洛茨基派加入了第四国际以J.波萨达斯为首的在拉丁美洲居优势地位的一派。而且,乌拉圭由于有比较民主的气氛,就成为第四国际波萨达斯派事实上的所在地,波萨达斯本人也在那里度过了大部分时间。

尽管如此,这一局势无助于改善乌拉圭托洛茨基分子的命运。他们在1962年大选时向选民提出的候选人只获得总共二百一十三张选票,这一事实有力地说明他们缺乏影响。托洛茨基分子没有参加下一届的1966年的选举。^①

象第四国际波萨达斯派的其他下属组织一样,革命工人党(第四国际)也支持菲德尔·卡斯特罗的古巴革命。该党政治局委员路易斯·爱德华多·纳吉尔·莫拉托里欧据说出席了1963年在哈瓦那召开的支持古巴大会。^②

六十年代后期,乌拉圭托洛茨基主义组织(当时称为革命工人党〔托〕)终于遭到政府残酷的迫害。红党在1966年总统和国会选举中重新掌权,这次选举使退休的奥斯卡·赫斯蒂多将军担任总统。他于1967年末去世,由副总统豪尔赫·帕切科继任。帕切科新政府着手实行一项重要纲领来解决国家不能控制的通货膨胀(年通货膨胀率为100%),开始认真改革社会保险制度,起草一项长远的经济发展政策。

这一纲领受到劳工运动和左翼政治人士的欢迎。1968年罢工很盛行,卡斯特罗式的图帕马罗斯组织的恐怖活动有所加剧,曾有数年之久,这种恐怖活动成了国家生活的一个特色。但是,恐怖

① 匿名外交人士:《革命工人党(托)》,1969年3月。

② 匿名外交人士:《革命工人党—托洛茨基分子〔革命工人党(托)〕》,1967年3月。

活动遭到正统共产党的反对。有理由认为该党（此时它主要控制了劳工运动）在工会内部正起着缓和作用的影响。

面对这一局势，帕切科政府——它无法妥善解决图帕马罗斯问题——看来要把小小的托洛茨基主义组织作为它的替罪羊。1968年10月，警察袭击了革命工人党(托)的一次会议，驱散了警察声称是第四国际波萨达斯派举行的一次会议。蒙得维的亚的日报对这一事件大肆宣扬，共产党的《人民报》坚持说被捕者之一阿根廷人奥梅罗·罗慕洛·克里斯塔利其实就是著名的J.波萨达斯。托洛茨基分子否认这一点，甚至居然说没有波萨达斯其人，但是共产党人正确地辨认出克里斯塔利就是波萨达斯。他的照片在第二天的报纸上刊载了。

对托洛茨基分子的这一迫害，激起了乌拉圭国内外对托洛茨基派的深切同情。甚至共产党报纸在对波萨达斯进行辨认之后几天，也对监禁革命工人党(托)领导人表示抗议，说什么此举是“违反言论自由权，是对言论自由的攻击，是对革命言论的镇压。”连众议院主席也表示抗议，乌拉圭政府收到了一些拉美国家组织要求释放托洛茨基分子的信件。

托洛茨基派犯人不让监狱人员过轻松日子。他们坚持高唱革命歌曲，断然拒绝回答对他们审讯时提出的任何问题。他们将大部分时间用于政治讨论，看来这些讨论是由波萨达斯领导或控制的。值得指出的是，其他犯人则把注意力主要集中于设法使托派文件中称为“N”而显然就是波萨达斯的那个人不致遭受任何不幸。犯人中的乌拉圭人终于获释；其中的外国人则在智利拒不接受之后被驱逐到意大利，其它几个拉丁美洲国家通知乌拉圭政府说，它们不准这些人进入它们的国界线内。^①

^① 这一情况来自弗朗西斯科·卡纳斯：《1968年12月1日报告与总结》，革命工人党(托)，一份油印内部公报，未注明日期。

这一事件并不是对革命工人党(托)的迫害的结束。1969年3月的上半月,乌拉圭警察袭击蒙得维的亚一些地区的住房和公寓,许多托洛茨基分子(其中包括一些外国人)被捕。^①1969年3月15日,帕切科政府终于颁布一项法令,解散革命工人党(托),取缔该党《工人阵线》报。在法令的前言中,总统指出政府缴获“该党大量宣言、声明、决议、计划、长篇文章、纲领等等,这些文件主要鼓吹开展世界革命斗争,诉诸暴力以及在我国和世界其他国家现有政权被推翻之后使用武器作为掌权的有效手段。”^②

尽管对革命工人党(托)宣传的性质作出这种评价(这一评价比较准确),但没有迹象说明乌拉圭托洛茨基分子当真想推翻政府。特别是也没有迹象表明他们同图帕马罗斯城市游击组织有过任何联系。

在1971年11月的选举中,革命工人党(托)对广泛阵线候选人已退休的利伯·西格尼尼将军给予了它的微弱支持,企图建立曾使萨尔瓦多·阿连德于1970年当上总统的那种胜利联盟,但没有成功。广泛阵线主要包括共产党、社会党和基督教民主党以及红党和民族党这两大党内持不同政见的派别。

劳工革命党

1969年,另一个同革命工人党(托)相对立的托洛茨基主义政党成立了。它就是劳工革命党。1971年3月1日《洲际新闻》确认该党“拥护第四国际”,意指统一书记处派。劳工革命党据说“竭力通过积极参加该国政治活动的办法来扩大它的无产阶级基础”,据说劳工革命党认为“只有来自群众性工人阶级运动的武装斗争才能获得最后胜利。”据这一报告称,劳工革命党是“学生和工人”

① 《国家》,蒙得维的亚,1969年3月11日。

② 《晨报》,蒙得维的亚,1969年3月16日。

建立的，虽然还没有证据说明他们过去可能加入过什么组织。劳工革命党被迫从事地下活动，但仍比较定期地出版一份名叫《革命倾向》的报纸。

尽管《洲际新闻》确认劳工革命党“拥护第四国际”，但统一书记处于1971年3月22日发表声明，似乎对此加以否认。1971年4月12日《洲际新闻》发表了这一声明，断言“在乌拉圭没有第四国际支部。”统一书记处的这一声明还大力反对广泛阵线，当时广泛阵线正在筹组之中。声明指出，统一书记处一如既往，完全反对革命马克思主义力量在人民阵线中同资产阶级力量不论何时和何地任何合作。

1971年12月13日的《洲际新闻》将劳工革命党确定为“一个声称拥护第四国际、但尚未作为一个支部得到认可的托派集团，”但劳工革命党不顾统一书记处的这一立场，仍参加了广泛阵线。劳工革命党试图说服广泛阵线领导人同意许可该党自己的候选人在广泛阵线旗帜下参加总统和副总统的竞选（根据乌拉圭独特的议会选举修正法，这在法律上是可能的），未获得成功，劳工革命党就把广泛阵线正式提名的总统和副总统候选人列在它的竞选名单之首，它把这份名单叫做“劳工名单”。然而劳工革命党候选人只参加次要职务的竞选。就目前所知，该党候选人没有一个当选的。

关于乌拉圭托洛茨基派的结束语

托洛茨基派运动在乌拉圭已存在了几乎三十五年，但它在劳工运动中或该国左翼政治生活中，从未成为真正有影响的因素，更不用说在全国更广泛的政治舞台上了。托洛茨基分子四十年代在有组织劳工中曾经有过一些影响，但在后十年中几乎失掉了所有这些影响。托洛茨基派曾有过重要的机会来利用那次使社会党在五十年代末、六十年代初遭到困难的危机，但它无法加以利用。甚

至六十年代中期第四国际波萨达斯派总部设在乌拉圭，也未曾扩大革命工人党(托)在全国政治生活中的影响乃至威信。乌拉圭托洛茨基派只不过是一个小小的左翼派系。

其它拉丁美洲国家的托洛茨基主义

在托洛茨基主义作为国际性运动出现的最初日子里，美国的美洲共产主义同盟同那些对国际左翼反对派所持的立场表示兴趣的许多拉美国家的组织和个人进行广泛通讯联系。如上所述，在有些情况下，这样的信件来往、情况交流和宣传材料的交换至少在某种程度上促成了许多全国性托洛茨基主义政党或组织的出现。

然而，在有些情况下，国际托洛茨基主义领导人通过这一通讯所产生的希望证明是破灭了。一些拉美国家出现的托洛茨基主义组织证明是寿命不长的。比如，负责美洲共产主义同盟拉美联络工作的墨西哥籍美国人 A. 冈萨雷斯于 1934 年年中报道说，“我们收到厄瓜多尔一位朋友来信，他通知我们说他们在厄瓜多尔也成立了一个组织。”^① 这一组织的名称甚至还未记下来，似乎就杳无踪影了。

直到 1971 年，才又有一些迹象表明厄瓜多尔存在着一个托洛茨基主义组织。秘鲁波萨达斯派的革命工人党(托)机关报《工人之声》1971 年 3 月下半月一期刊载厄瓜多尔革命共产党(托)和共和国总统何塞·玛丽亚·贝拉斯科·伊瓦拉相互致电的消息。该党致电总统，对他要求美国撤出厄瓜多尔军事使团一事表示祝贺。电报还说，“我们要求反帝联合阵线、政府、民族主义的军人和全国群众剥夺帝国主义和寡头的财产”，电报最后提出下列口号：“争取在智利、玻利维亚、秘鲁和厄瓜多尔建立联邦和制定经济与政治计划。”

^① 奥·费档，A. 冈萨雷斯致奥·费的信，1934 年 6 月 3 日。

《工人之声》编辑部又加上编者按,说他们的党“以巨大的革命喜悦来迎接这一事件和厄瓜多尔支部的这一胜利。”编者按还对革命共产党(托)机关刊物《共产主义斗争》的出版进行了评述,敦促厄瓜多尔同志努力工作以便定期出版报纸。编者按最后说,“厄瓜多尔支部的这个刊物最后一期发表了第四国际国际书记处波萨达斯同志讲话原文,这对建设革命的领导,对促进和迅速发展谋求同厄瓜多尔群众沿着社会主义道路建立联合阵线的民族主义倾向是必不可少的。”

巴拿马早期托洛茨基主义组织的寿命证明没有厄瓜多尔托洛茨基主义组织那样为时短暂。我们对巴拿马托洛茨基主义组织的最初印象又是来自 A. 冈萨雷斯。冈萨雷斯给一位墨西哥记者写道:“我们同一位正努力在巴拿马建立我们一个支部的巴拿马共产主义杰出的一员建立了联系。冈萨雷斯最近告诉我们说,他现在成立了一个统一的组织,希望在不久的将来,他们一定能够正式组成我们的一个支部。”^①

到了1935年最初几个月,巴拿马托洛茨基分子牢固地组织在马克思列宁主义工人党内。这个党当时正在出版一份叫《组织》的报纸。新党的领袖是一个名叫迪奥赫内斯·德拉罗莎的年轻人。他积极参加巴拿马工会运动。A. 冈萨雷斯称他是“巴拿马革命运动最杰出的成员之一。”^②

但是,马克思列宁主义工人党于1935年后期已不存在了。该党党员加入巴拿马社会党。这个党当时正同共产党争夺对有组织劳工运动的控制权。现在还不清楚此举是否同所谓“法国式策略”有任何关系,后者大约同时使一些托洛茨基主义组织加入它们各

① 奥·费档,A. 冈萨雷斯致奥·费的信,1934年6月3日。

② 奥·费档,A. 冈萨雷斯致路易斯·古铁雷斯(奥·费)的信,1935年3月12日。

自国家的社会党。总之,看来托洛茨基分子完全没有严重地“从内部破坏巴拿马社会党”。相反,迪奥赫内斯·德拉罗莎作为社会党主要领导人之一崭露头角。四十年代中期,他当了国民立法会议议员,1948年在一场同托洛茨基派毫无关系的争权斗争中退出了社会党。他当时认为托洛茨基派是历史的陈迹。五十年代和六十年代,德拉罗莎作为他的国家中比较杰出的外交家之一服务了一些年。^①

波多黎各托洛茨基运动看来持续时间比厄瓜多尔和巴拿马的托洛茨基主义运动略微长一些,但大约在第二次世界大战爆发时就显然消失了。关于波多黎各托洛茨基派形成的情况,1935年1月16日波多黎各独立共产党组织委员会路易斯·贝尔格内·奥尔蒂斯给A.冈萨雷斯的信件中作了说明。贝尔格内·奥尔蒂斯指出,1934年9月6日以前,当地共产党还是保持统一的。但是,在美国共产党派遣阿尔维托·桑切斯和另外两三名“斯大林主义者”以及一名共产主义青年联盟代表前往波多黎各之后,出现了困难。据说派遣桑切斯(本人就是波多黎各人)等人一事并未同波多黎各领导人磋商过,他们显然被授予广泛权力来控制独立的波多黎各共产党。

贝尔格内·奥尔蒂斯向冈萨雷斯报告说,那些因桑切斯的活动而从共产党分裂出去的人一直设法组织一个纯地方性的党,但是世界上发生的一些事件——包括苏联进入国联,基洛夫被谋害之后苏联出现的恐怖活动(基洛夫是列宁格勒共产党领袖,他之死开始导致1936—1939年苏联的大清洗)以及西班牙共产党在1934年10月社会主义起义期间的无所作为——促使这些波多黎各领导人认为有必要成立一个新的第四国际。因此,贝尔格内·奥尔蒂斯说,独立共产党领导人得出结论说,他们的新党应同托洛

^① 同迪奥赫内斯·德拉罗莎的谈话,1948年7月26日于巴拿马城。

茨基派结盟。

虽然贝尔格内·奥尔蒂斯说同第四国际各种力量结盟尚未“肯定”，但是一旦发生了党所组织的失业游行示威，这样的行动就会采取了。他最后要求一些有关第四国际运动的西班牙文材料。^①波多黎各托洛茨基派最初组织起来之后，第四国际机关报对它很少进行什么宣扬或不作任何宣扬，虽然1939年3月一期墨西哥托洛茨基主义杂志《关键》指出，波多黎各同志正在出版一份题为《火花》的刊物。

哥伦比亚显然在一段时期内存在过一个托洛茨基主义组织。1939年5月21日一期的托洛茨基主义刊物《布尔什维克》指出，“国际主义的哥伦比亚社会党，即第四国际哥伦比亚支部，号召哥伦比亚无产阶级加入它的队伍为争取革命的马克思主义而斗争。”关于这个组织的详细情况则不得而知。在邻近的委内瑞拉直到1971年才出现托洛茨基主义组织。1972年1月10日一期的《洲际新闻》指出：不久前在委内瑞拉建立了一个具有统一书记处倾向的党。但是没有说明组织的名称。

最后，还可以提一提法属安的列斯群岛最近第一次出现了托洛茨基主义组织。1971年7月一期的统一书记处机关刊物《第四国际》季刊指出，当地一个同法国的“工人斗争”组织有联系的组织创办了一份名叫《工人战斗》的托洛茨基主义报纸，而法国的“工人斗争”组织同统一书记处保持友好关系。据报道，瓜德罗普和马提尼克政府还采取步骤取缔这一新的托洛茨基主义刊物。

① 奥·费档，路易斯·贝尔内·奥尔蒂斯，1935年1月16日。

后 记

托洛茨基主义派虽然从未成为拉丁美洲政治生活中的一个重要力量，但四十多年来一直是极左派的一种思潮和行动。在这一或那一时期，托洛茨基主义政党或组织存在在二十个拉丁美洲共和国中的十二个国家以及在波多黎各和法属安的列斯群岛。在其中的八个国家，托洛茨基派一直存在了几十年。

在少数国家里，托洛茨基派至少短暂地成为左翼政治中一支相当重要的力量。三十年代中期的智利和古巴，五十年代初期的玻利维亚，就是这种情况。三十年代后期，由于列夫·托洛茨基光临墨西哥，墨西哥第四国际主义者获得尤其突出的地位。托洛茨基去世后，他们对该国工会运动产生了明显的影响达数年之久。但是除了玻利维亚的革命工人党外，拉丁美洲托洛茨基主义政党中没有一个当真地争夺政权。在大多数国家，托洛茨基分子从来不过是人数很少、没有什么影响的马克思列宁主义左派。

拉丁美洲托洛茨基分子往往非常教条，很容易卷入剧烈的个人之争；这些特性经常引起灾难性的派性斗争，这往往导致在一国内形成两个或两个以上的托洛茨基主义组织。那些思想不那么教条的托洛茨基主义领导人，诸如智利和古巴的托洛茨基派创建人，同托洛茨基及其同伴和继承人有了一段短暂的接近以后，一般都趋向于抛弃第四国际主义者。

拉丁美洲托洛茨基主义党和组织占国际托洛茨基派成员的一大部分。也许是因为拉丁美洲托洛茨基派距离欧洲和纽约遥远，以及这些组织比较贫穷，因此他们很少能起到同它们参加第四国

际活动人数比例相一致的领导作用。这种总貌的一个例外，是由 J. 波萨达斯派第四国际所代表的托洛茨基主义派系。波萨达斯是阿根廷人，他是在巴勃罗派第四国际拉丁美洲局的基础上组织他的集团的，而且完全控制了拉丁美洲局。不管怎样，功过都有他的份。然而，当第四国际内部本身出现了分裂时，各个对立派系的领导人都热切地争取拉丁美洲各政党的支持。第四国际的分裂也成为拉丁美洲政党本身内部派系斗争的一个重要根源。与之相对立的第四国际派系企图从参加第四国际对立部分的政党中争取友好分子。

第四国际在某种程度上干预了许多拉丁美洲下属组织的国际事务。这一干预在墨西哥尤为经常，第四国际在墨西哥曾经多次试图整顿当地的托洛茨基主义运动。托洛茨基派在阿根廷和玻利维亚也具有一定重要性，第四国际在这两个国家里有时支持当地相互争执的派系中的这一派或另一派。

很难想像有拉丁美洲托洛茨基主义组织凭借自己的力量而当权的。它们规模小，极端教条主义，热衷于搞政治迫害，这些情况看来使它们不可能当权。托洛茨基主义政党和组织在拉丁美洲将会继续存在下去，有时候对于极左派中更为重要的成员来说，它们是讨厌的人物。可是，某一天托洛茨基主义组织在拉丁美洲某个国家中，参加了一个范围比极左派更广泛的政权，那也不是不可能的。

书 目

有关拉丁美洲托洛茨基主义的材料极为分散，很难把它们收集到一起。我的材料来源包括同托洛茨基主义运动现在和过去的领导人以及同本人尽管不是托洛茨基主义者、但能够观察一国或更多国家的托洛茨基主义活动的其他人员的访问记。拉丁美洲一些托洛茨基主义政党和组织，第四国际及其各种派系以及少数欧洲和北美托洛茨基主义组织出版的刊物，也是很有用的。只是在少数情况下，我才有机会接触有关这类材料的完整档案。我还查看了并非主要论述托洛茨基主义的书籍中附带涉及的有关参考书，而且也查看了主要涉及个别国家托洛茨基主义的小册子和一些书籍。这些材料也包括第四国际分子政治对手们的出版物中零星谈到的托洛茨基分子的活动。最后，我还有幸能看到我的朋友为我提供的书信和其他内部文件。为便于这一课题的研究者使用，我决定将书目分为以下八类，我在注释中引用的所有材料来源均详细开列于此。

书籍和小册子

阿尔瓦，维克托：《伊比利亚美洲共产主义史纲》，墨西哥西方出版社，1960年。Alba, Víctor. Esquema Histórico del Comunismo en Iberoamérica. Mexico: Ediciones Occidentales, 1960.

亚历山大，罗伯特·J：《拉丁美洲的共产主义》，新不伦瑞克，拉特格斯大学出版社，1957年。Alexander, Robert J. Communism in Latin America. New Brunswick: Rutgers University Press, 1957.

———：《阿根廷、巴西和智利的劳工关系》，纽约，麦格劳—希尔出版

社,1962年。Labor Relations in Argentina, Brazil, and Chile. New York: McGraw-Hill, 1962.

———:《玻利维亚民族革命》,新不伦瑞克,拉特格斯大学出版社,1958年。The Bolivian National Revolution. New Brunswick: Rutgers University Press, 1958.

安德烈斯,尼塞托:《拉丁美洲托洛茨基主义的国家政策:中派主义和革命》,布宜诺斯艾利斯,新进程出版社,1949年。Andrés, Niceto. La Política Nacional del Trotskismo en América Latina (Centralismo y Revolución). Buenos Aires: Ediciones Nuevo Curso, 1949.

阿尼,卡斯蒂略,贡萨洛:《游击战秘史》,利马,马萨利亚出版社,1967年。Añi Castillo, Gonzalo. Historia Secreta de las Guerrillas. Lima: Ediciones Masalla, 1967.

巴拉塔,阿希尔多:《革命者的生活》(回忆录),里约热内卢,梅尔索出版社,日期不详。Barata, Agildo. Vida de Un Revolucionario (Memorias). Río de Janeiro: Editorial Melso, n.d.

巴斯托斯,阿夫瓜尔:《路易斯·卡洛斯·普列斯特和社会革命》,里约热内卢,卡尔维诺出版社,1946年。Bastos, Abguar. Luiz Carlos Prestes e A Revolução Social. Río de Janeiro: Editorial Calvino, Limitada, 1946.

巴斯班,莱昂西奥:《共和国真实史》,里约热内卢,普尔戈尔出版社,1968年。Basbaum, Leoncio. Historia Sincera da Republica. Río de Janeiro: Editor Pulgor, Ltda., 1968.

贝略尼,阿尔维托:《从无政府主义到庇隆主义:工人运动史》,布宜诺斯艾利斯,A.佩尼亚·拉略出版社,1960年。Belloni, Alberto. Del Anarquismo al Peronismo: Historia del Movimiento Obrero. Buenos Aires: A. Peña Lallo Editor, 1960.

布兰科,乌戈:《我国的革命道路》,利马,秘鲁革命出版社,1964年。Blanco, Hugo. El Camino de Nuestra Revolución. Lima: Ediciones Revolución Peruana, 1964.

鲍恩·埃雷拉,阿尔弗雷多:《论工会运动与农业工会》,圣地亚哥,“名声”出版社,1934年。Bowen Herrera, Alfredo. Ensayo Sobre el Movimiento Sindical y el Sindicalismo Agrícola. Santiago: Imprenta

“La Fama,” 1934.

坎农,詹姆斯·P.《美洲托洛茨基主义史:一个参与者的报告》,纽约,先锋出版社,1944年。Cannon, James P. *The History of American Trotskyism: Report of a Participant*. New York: Pioneer Publishers, 1944.

科尔内霍,阿尔维托:《玻利维亚政纲》,科恰班巴,大学出版社,1949年。Cornejo, Alberto. *Programmas Políticos de Bolivia*. Cochabamba: Imprenta Universitaria, 1949.

多伊彻,伊萨克:《被遗弃的先知:托洛茨基(1929—1940)》,纽约,牛津大学出版社,1963年。Deutscher, Isaac. *The Prophet Outcast: Trotsky, 1929-1940*. New York: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1963.

埃查伊斯,雷内·里昂:《智利各政党的历史演变》,圣地亚哥,埃尔西利亚出版社,1939年。Echaiz, René León. *Evolución Histórica de los Partidos Políticos Chilenos*. Santiago: Editorial Ercilla, 1939.

埃德,乔治:《拉丁美洲的通货膨胀与发展:玻利维亚通货膨胀和稳定化的实例史》,安阿伯,密执安大学,1968年。Eder, George. *Inflation and Development in Latin America, A Case History of Inflation and Stabilization in Bolivia*. Ann Arbor: University of Michigan, 1968.

《恐怖主义对革命工人党(托)的镇压,巴西革命条件的发展》,利马,工人之声出版社,1970年。El Terrorismo, La Represión Contra El POR (Trotskista), El Desarrollo de las Condiciones Revolucionarias en Brasil. Lima: Ediciones Voz Obrera, 1970.

费尔曼·贝拉尔德,何塞:《维克托·帕斯·埃斯登索罗:人与革命》,拉巴斯,印刷工业企业,1955年。Fellmann Velarde, José. Victor Paz Estensoro: *El Hombre y la Revolución*. La Paz: Empresa Industrial Gráfica, 1955.

冈萨雷斯·迪亚斯,加洛:《胜利的大会——智利共产党第十次全国代表大会报告、讨论与决议摘要》,圣地亚哥,1938年。González Díaz, Galo. *El Congreso de la Victoria; Resumen de los Informes, Discusiones y Resoluciones, X Congreso Nacional del Partido Comunista de Chile*. Santiago, 1938.

冈德·弗兰克,安德烈:《乌戈·布兰科不能死》,多伦多,罗伯特·麦卡

锡出版社, 1965年。Gunder Frank, Andre. Hugo Blanco Must Not Die. Toronto: Robert McCarthy, 1965.

加西亚·蒙特斯, 豪尔赫和安东尼奥·阿隆索·阿维拉:《古巴共产党史》, 迈阿密, 宇宙出版社, 1970年。García Montes, Jorge, and Antonio Alonso Ávila. Historia del Partido Comunista de Cuba. Miami: Ediciones Universal, 1970.

《国际共产主义组织致菲德尔·卡斯特罗公开信: 墨西哥托洛茨基分子的答复》, 墨西哥, 1966年1月。Grupo Comunista Internacionalista. Carta Abierta a Fidel Castro: Respuesta de los Trotskistas Mexicanos. Mexico, January, 1966.

霍尔珀林, 厄恩斯特:《智利的民族主义与共产主义》, 马萨诸塞州坎布里奇市, 马萨诸塞理工学院出版社, 1965年。Halperin, Ernst. Nationalism and Communism in Chile. Cambridge, Mass.: The M. I. T. Press, 1965.

希利, 杰拉尔德:《第四国际的问题》, 伦敦, 1966年, 日期不详。Healy, Gerald. Problems of the Fourth International. London, n.d. (1966).

休伊特·辛西娅:《伯南布哥农村劳工运动介绍》, 哥伦比亚大学, 拉丁美洲研究所, 1965年9月, 油印。Hewitt, Cynthia. An Introduction to the Rural Labor Movement of Pernambuco. Columbia University: Institute of Latin American Studies, September 1965.

伊达尔戈·普拉萨, 曼努埃尔:《武装起义——1931年9月16日共产党参议员曼努埃尔·普拉萨在参议院的讲话》, 瓦尔帕莱索, 欧罗巴出版社, 1931年。Hidalgo Plaza, Manuel. La Rebelión de la Armada: Discurso del Senador Comunista Manuel Hidalgo P., en el senado, el 16 de Septiembre de 1931, Valparaíso: Editorial Europa, 1931.

《宪兵审讯录第709号: 巴西共产党》第三卷, (1967年)第442页。陆军图书馆出版社。Inquérito Policial Militar No. 709: O Comunismo no Brasil, Volume 3. Rio de Janeiro: Biblioteca do Exército Editora, 1967.

詹姆斯, C. L. R.:《1917—1936年世界革命: 国际共产主义之兴衰》, 纽约, 先锋出版社, 1937年。James, C. L. R.: World Revolution 1917-1936: The Rise and Fall of the Communist International. New York: Pioneer Publishers, 1937.

胡斯托,利沃里奥[硬木头]:《玻利维亚受挫的革命》,玻利维亚,科恰班巴,塞拉诺兄弟出版社,1967年。Justo, Liborio [Quebracho]. Bolivia: La Revolución Derrotada. Cochabamba, Bolivia: Editorial Serrano Hnos., Ltda., 1967.

———:《阿根廷第四国际主义运动编年史简述》,革命劳工同盟(第四国际),阿根廷共和国,1941年。Breve Reseña Cronológica del Movimiento Cuartainternacionalista Argentino. Liga Obrera Revolucionaria (La Internacional), República Argentina, 1941.

———:《中派主义、机会主义和布尔什维克主义:革命劳工组织与在阿根廷和南美洲为争取马克思列宁主义的斗争》,布宜诺斯艾利斯,1940年。Centrismo, Oportunismo y Bolchevismo: El Grupo Obrero Revolucionario y la Lucha por el Marxismo-Leninismo en la Argentina y en la América del Sur. Buenos Aires: 1940.

———:《如何摆脱困境:建立世界社会主义革命党(第四国际)阿根廷支部》,布宜诺斯艾利斯,日期不详。Como Salir del Pantano: Hacia la Formación de la Sección Argentina del Partido Mundial de la Revolución Socialista(4a Internacional). Buenos Aires: n.d.

———:《革命战略:为争取统一和拉丁美洲民族与社会解放而斗争》,载《锻造》杂志,布宜诺斯艾利斯,1956年。Estrategia Revolucionaria: Lucha por la Unidad y por la Liberación Nacional y Social de la América Latina. "Fragua", Buenos Aires: 1956.

———:《面对世界的重要关头:第四国际想干什么》,布宜诺斯艾利斯,1939年。Frente al Momento del Mundo: Qué Quiere la Cuarta Internacional. Buenos Aires: 1939.

———:《列夫·托洛茨基和华尔街:第四国际领导人如何为在墨西哥的美帝国主义效劳》,布宜诺斯艾利斯,巴达霍出版社,1959年。Leon Trotsky y Wall Street: Como el Líder de la Cuarta Internacional se puso al Servicio del Imperialismo Yanqui en México. Buenos Aires: Ediciones Badajo, 1959.

———:《自传摘要》,第二版,布宜诺斯艾利斯,库雷出版社,1956年。Prontuario: Una Autobiografía, 2nd Edition. Buenos Aires: Ediciones Cure, 1956.

卡罗尔, K. S.: 《游击队掌权: 古巴革命的道路》, 纽约, 希尔与王记出版社, 1970年。Karol, K. S. *Guerrillas in Power: The Course of the Cuban Revolution*. New York: Hill & Wang, 1970.

兰兹伯格, 亨利: 《拉丁美洲的农民运动》, 纽约州, 伊萨卡, 康奈尔大学出版社, 1969年。Landsberger, Henry. *Latin American Peasant Movements*. Ithaca N. Y.: Cornell University Press, 1969.

勒斯基, 乔治·J.: 《锡兰托洛茨基主义的来源》, 加利福尼亚州, 斯坦福, 胡佛研究所, 1968年。Lerski, George J. *Origins of Trotskyism in Ceylon*. Stanford, Ca.: The Hoover Institution, 1968.

马达里亚加, 何塞·路易斯: 《什么是民族左翼? ——革命社会主义手册》, 布宜诺斯艾利斯, 英氏出版社, 1969年。Madariaga, José Luis. *¿Qué es la Izquierda Nacional? Manual del Socialismo Revolucionario*. Buenos Aires: Ediciones In, 1969.

马林, 杰伊: 《“切”·格瓦拉论革命》, 迈阿密, 迈阿密大学出版社, 1969年。Mallin, Jay. *“Che” Guevara on Revolution*. Miami: University of Miami Press, 1969.

马洛伊, 詹姆斯: 《玻利维亚未完成的革命》, 匹兹堡, 匹兹堡大学出版社, 1970年。Malloy, James. *Bolivia: The Uncompleted Revolution*. Pittsburgh: The University of Pittsburgh Press, 1970.

革命工人党(第四国际)编《全国形势: 无产阶级的前景和任务》, 1959年7月革命工人党中央委员会政治决议, 蒙得维的亚, 1959年。Partido Obrero Revolucionario (IV Internacional). *La Situación Nacional: Perspectivas y Tareas del Proletariado, Resolución, Política del Comité Central del Partido Obrero Revolucionario*. Julio de 1959. Montevideo: 1959.

社会党, 全国宣传处: 《共产党的黑书》, 圣地亚哥, 1941年。Partido Socialista, Departamento Nacional de Propaganda. *El Libro Negro del Partido Comunista*. Santiago: 1941.

佩尼亚洛萨, 胡安·拉蒙: 《托洛茨基面对拉丁美洲民族革命》, 布宜诺斯艾利斯, 印第安美洲出版社, 1953年。Peñaloza, Juan Ramón. *Trotsky Ante la Revolución Nacional Latinoamericana*. Buenos Aires: Editorial Indoamerica, 1953.

波萨达斯, J.: 《庇隆先锋组织在争取建立阿根廷工农政府中的任务》,

布宜诺斯艾利斯,当代出版社,1965年。Posadas, J. *El Papel de la Vanguardia Peronista en la Organización de la Lucha por el Gobierno Obrero y Campesino en la Argentina*. Buenos Aires: Editorial Present, 1965.

———:《世界资本主义、工人国家与共产党的官僚统治的瓦解,世界广大群众革命斗争与共产主义情感不可遏制的发展,世界共产主义先锋队同第四国际的目标、政策和纲领的合一》,蒙得维的亚,拉丁美洲马克思主义评论出版社,1968年。La Desagregación Mundial del Capitalismo, de la Burocracia de los Estados Obreros y de los Partidos Comunistas, el Avance Incontenible de las Luchas Revolucionarias y del Sentimiento Comunista de las Masas del Mundo y la Fusión de la Vanguardia Comunista Mundial con los Objetivos, con la Política, con el Programa de la Cuarta Internacional. Montevideo: Ediciones Revista Marxista Latinoamericana, 1968.

拉莫斯,豪尔赫·阿维拉多:《争取建立革命党的斗争》,布宜诺斯艾利斯,草原与蓝天出版社,1964年。

Ramos, Jorge Abelardo. *La Lucha por un Partido Revolucionario*. Buenos Aires: Ediciones Pampa y Cielo, 1964.

———:《拉丁美洲的民族革命:曼努埃尔·乌加特和反帝斗争》,布宜诺斯艾利斯,印第安美洲出版社,1952年。La Revolución Nacional en Latinamérica: Manuel Ugarte y la Lucha Antiimperialista. Buenos Aires: Editorial Indoamerica, 1952.

雷耶斯,埃塞基耶尔:《什么是左派——答复共产党朋友们》,布宜诺斯艾利斯,安第斯出版社,1961年。Reyes, Ezequiel. *Qué es la Izquierda (Respuesta a los Compañeros Comunistas)*. Buenos Aires: Andes Editora, 1961.

列拉·埃尔南德斯,马里奥:《古巴工人史(1574—1965)》,迈阿密,雷马出版社,1965年。Riera Hernández, Mario. *Historial Obrero Cubano, 1574-1965*. Miami: Rema Press, 1965.

社会主义工人党:《第四国际(世界社会主义革命党)创建大会,纲领和决议》,纽约,1939年。Socialist Workers Party. *The Founding Conference of the Fourth International (World Party of the Socialist Revolution), Program and Resolutions*. New York: 1939.

———:《古巴革命性质》,纽约,1968年4月。The Nature of the Cuban Revolution. New York: April 1968.

托洛茨基,列夫:《斯大林帮》,墨西哥,美洲出版社,1940年。Trotsky, Leon. Los Gangsters de Stalin. Mexico: Editorial América, 1940.

巴伦西亚,维加,阿利皮奥:《玻利维亚政治思想的发展》,拉巴斯,1953年。Valencia Vega, Alipio. Desarrollo del Pensamiento Político en Bolivia. La Paz: 1953.

比利亚努埃瓦,维克托:《乌戈·布兰科与农民起义》,利马,胡安·柏希亚·帕卡出版社,1967年。Villanueva, Víctor. Hugo Blanco y la Rebelión Campesina. Lima: Editorial Juan Mejia Paca, 1967.

沃尔夫,伯特伦·D.:《迭戈·里维拉的生平和时代》,纽约,艾尔弗雷德·A·诺夫出版社,1939年。Wolfe, Bertram D. Diego Rivera: His Life and Times. New York: Alfred A. Knoff, 1939.

———:《迭戈·里维拉的传奇生活》,纽约,斯坦与戴氏出版社,1963年,青年社会主义同盟:《无土地,毋宁死》,纽约,1967年。The Fabulous Life of Diego Rivera. New York: Stein & Day, 1963. Young Socialist Alliance. Land or Death. New York: 1967.

党和工会大会报告

迪亚斯·马丁内斯,胡安:《有利于智利无产阶级的三十个月的行动》1939年7月26—30日全国指导委员会致例行大会备忘录,圣地亚哥,1939年。Díaz Martínez, Juan. Treinta Meses de Acción en Favor del Proletariado de Chile—Memoria del Consejo Directivo Nacional al Congreso Ordinario, 26 al 30 de Julio de 1939 (CTCh). Santiago: 1939.

智利共产党(托派):《保卫革命:1933年3月19日提交共产党全国代表大会审核的报告、论文和文件》,圣地亚哥,阶级斗争出版社,1933年。Partido Comunista de Chile [Trotskyist faction]. En Defensa de la revolución: Informes, Tesis y Documentos Presentados al Congreso Nacional del Partido Comunista a Verificarse el 19 de Marzo de 1933. Santiago: Ediciones Lucha de Clases, 1933.

智利共产党(斯大林主义派):《建立真正的阶级的党——1933年7月共产党全国代表会议决议》,圣地亚哥,格登伯格出版社,1933年。Partido

Comunista de Chile [Stalinist faction]. Hacia la Formación de un Verdadero Partido de Clase—Resoluciones de la Conferencia Nacional del Partido Comunista Realizada en Julio de 1933. Santiago: Gutenberg Press, 1933.

社会主义工人党:《人民的道路——圣地亚哥 1942 年 5 月 1—3 日社会主义工人党第三次全国代表大会决议》, 1942 年。Partido Socialista de Trabajadores. El Camino del Pueblo—Resoluciones del Tercer Congreso General del Partido Socialista de Trabajadores, Santiago, 1 a 3 de Mayo de 1942. Santiago: 1942.

托洛茨基主义期刊

《战斗》, 玻利维亚社会主义工人党机关报, 拉巴斯, 四十年代后期。Batalla. Organ of Partido Socialista Obrero de Bolivia, La Paz, late 1940's.

《第四国际国际书记处新闻公报》, 第四国际国际书记处波萨达斯派油印刊物, 蒙罗维的亚, 1967 年。Boletín de Información del Secretariado Internacional de la IV Internacional. Mimeographed publication of Posadas International Secretariat of the Fourth International, Montevideo, 1967.

《新闻与讨论公报》, 工人社会主义组织(墨西哥持不同政见的托洛茨基主义组织) 1945—1946 年。Boletín de Información y Discusión. Mimeographed internal organ of Grupo Socialista Obrero, dissident Trotskyist group in Mexico, 1945-46.

《内部公报》, 国际共产主义组织内部油印刊物, 墨西哥, 1969 年。Boletín Interno. Mimeographed internal bulletin of Grupo Comunista Internacionalista, Mexico, 1969.

《革命工人党(托)内部公报》, 乌拉圭革命工人党(托)油印刊物, 蒙得维的亚, 1968 年。Boletín Interno del POR/T. Mimeographed organ of Partido Obrero Revolucionario (Trotskista) of Uruguay, Montevideo, 1968.

《列宁主义公报》, 筹建革命先锋组织临时中央委员会编, 第四国际智利支部, 第一年, 第一期。Boletín Leninista. Edited by Central Provisional Committee for the Formation of a Revolutionary Vanguard, Chilean Section of the Fourth International, Year 1, Number 1.

《公报》，第四国际(希利派)国际委员会美国下属组织工人联盟机关刊，纽约市，六十年代。*Bulletin. Organ of Workers League, United States affiliate of International Committee of Fourth International (Healyite), New York City, 1960's.*

《关键》，1938年10月至1941年5月墨西哥出版的托洛茨基主义月刊。*Clave. Trotskyist monthly magazine published in Mexico from October 1938 to May 1941.*

《反潮流》，四十年代后期的乌拉圭革命劳工同盟报纸。*Contra la Corriente. Newspaper of Liga Obrera Revolucionaria of Uruguay in the 1940's.*

《第四国际》，第四国际(波萨达斯派)执行委员会机关刊，1962年以后。*Cuarta Internacional. Organ of Executive Committee of Fourth International (Posadista faction of international Trotskyism), after 1962.*

《第四国际》，第四国际(统一书记处)国际执行委员会西班牙语机关报，1963年及以后。*Cuarta Internacional. Spanish language organ of International Executive Committee of the Fourth International (United Secretariat), 1963 and thereafter.*

《第四国际》，国际共产主义同盟报纸，墨西哥城，1936—1937年。*IV Internacional. Newspaper of Liga Comunista Internacionalista, Mexico City, 1936-37.*

《布尔什维克》，国际共产主义同盟油印刊物，墨西哥，1939年。*El Bolchevique. Mimeographed periodical of Liga Comunista Internacionalista, Mexico, 1939.*

《战斗者》，老资格的托洛茨基分子马特奥·福萨出版的报纸，布宜诺斯艾利斯，1946—1947年。*El Militante. Paper published by old-time Trotskyist Mateo Fossa, Buenos Aires, 1946-47.*

《第四国际》，第四国际希利派国际委员会机关刊，伦敦，六十年代和七十年代。*Fourth International. Organ of Healyite International Committee of Fourth International, London, 1960's and 1970's.*

《第四国际》，美国社会主义工人党机关刊(季刊)，纽约市，四十年代和五十年代。*Fourth International. Quarterly organ of Socialist Workers Party of United States, New York City, 1940's and 1950's.*

《工人阵线》，五十年代乌拉圭革命劳工同盟、随后的革命工人党(第四国际)和革命工人党(托)的机关刊，蒙得维的亚。*Frente Obrero*. Organ of Liga Obrera Revolucionaria of Uruguay in 1950's, subsequently of Partido Obrero Revolucionario (IV Internacional) and Partido Obrero Revolucionario (Trotskista), Montevideo.

《工人阵线》，巴西革命工人党(托)机关刊，圣保罗，六十年代(波萨达斯派)。*Frente Operaria*. Organ of Partido Operario Revolucionario (Trotskista) of Brazil, São Paulo, 1960's (Posadista).

《工人新闻》，国际共产主义组织希利派法国隶属组织机关刊，巴黎，六十年代和七十年代。*Informations Ouvrières*. Organ of Organization Communiste Internationaliste, Healyite French Affiliate, Paris, 1960's and 1970's.

《国情通报》，1966—1968年马克思主义革命工人政治组织和随后的巴西共产主义行动党机关刊，里约热内卢。*Informe Nacional*. Weekly mimeographed bulletin of Organização Revolucionaria Marxista Política Operaria, 1966-68, and subsequently of Partido Operario Comunista of Brazil, Rio de Janeiro.

《洲际新闻》，美国社会主义工人党非正式出版的国际新闻周刊，纽约，六十年代和七十年代，原名《世界展望》。*Intercontinental Press*. New York, 1960's and 1970's. Originally called *World Outlook*.

《国际社会主义评论》，美国社会主义工人党出版的季刊，纽约，六十年代和七十年代。*International Socialist Review*. Quarterly review of Socialist Workers Party of the United States, New York, 1960's and 1970's.

《民族左翼》，民族左翼社会党豪尔赫·阿维拉多·拉莫斯，布宜诺斯艾利斯，六十年代和七十年代。*Izquierda Nacional*. Organ of Partido Socialista de la Izquierda Nacional (Jorge Abelardo Ramos), Buenos Aires, 1960's and 1970's.

《工人行动》，美国托洛茨基主义持不同政见派(沙赫曼派)，最初称工人党，后来称独立社会主义联盟出版的周刊，四十年代和五十年代。*Labor Action*. Weekly paper of dissident (Shachtmanite), United States Trotskyist faction, first the Workers Party but later the Independent Socialist League, 1940's and 1950's.

《国际》，墨西哥国际共产主义组织油印刊物，1969—1970年。*La Internacional*. Mimeographed periodical of Grupo Comunista Internacionalista of Mexico, 1969-70.

《工人斗争》，第四国际波萨达斯派意大利隶属组织革命共产党(托)机关刊，罗马，六十年代。*Lotta Operaia*. Organ of Partido Comunista Rivoluzionario (Trotskista), Italian affiliate of Posadista Fourth International, Rome, 1960's.

《工人斗争》，墨西哥国际主义工人党机关刊，墨西哥，1939—1947年。*Lucha Obrera*. Organ of Partido Obrero Internacionalista of Mexico, 1939-47, Mexico.

《工人斗争》，玻利维亚革命工人党机关刊，拉巴斯，四十年代和五十年代初期。*Lucha Obrera*. Organ of Partido Obrero Revolucionario of Bolivia, La Paz, 1940's and early 1950's.

《工人斗争》，1956—1957年玻利维亚革命工人党分裂后，该党乌戈·冈萨雷斯·莫斯科索派的机关刊，拉巴斯。*Lucha Obrera*. Organ of Hugo González Moscoso faction of Partido Obrero Revolucionario of Bolivia, after POR split in 1956-57, La Paz.

《工人斗争》，智利波萨达斯派革命工人党(托)机关报，圣地亚哥，六十年代和七十年代初。*Lucha Obrera*. Organ of Partido Obrero Revolucionario (Trotskista), Posadista party in Chile, Santiago, 1960's and early 1970's.

《群众》，1956—1957年玻利维亚革命工人党分裂后，该党吉列尔莫·洛拉派的机关刊，拉巴斯。*Masas*. Organ of Guillermo Lora faction of POR of Bolivia after 1956-57 split, La Paz.

《新国际》，最初是美洲共产主义同盟，以后在三十年代初是工人党，再后是社会主义工人党“理论性”机关刊物，纽约，1937—1940年。*New International*. “Theoretical” organ of Communist League of America; then of Workers Party, in early 1930's; then of Socialist Workers Party, New York, 1937-40.

《新国际》，美国托派沙赫曼派“理论性”机关刊，纽约，1940—1958年。*New International*. “Theoretical” organ of Shachtmanite faction of Trotskyism in the United States, New York, 1940 to 1958.

《新国际》，墨西哥国际共产主义同盟机关刊，墨西哥，1934—1935年。*Nueva Internacional*. Organ of Liga Comunista Internacionalista of Mexico, 1934-35, Mexico.

《世界前景》，1967年以后同统一书记处有联系的墨西哥托洛茨基分子出版的国际新闻刊物。*Perspectiva Mundial*. Periodical of international news published by Mexican Trotskyists associated with United Secretariat, Mexico, 1967 and thereafter.

《工人政治》，六十年代第四国际统一书记处阿根廷隶属组织工人政治运动机关刊，布宜诺斯艾利斯。*Política Obrera*. Organ of Movimiento Política Obrera, Argentine affiliate of United Secretariat of Fourth International in 1960's, Buenos Aires.

《工人政治》，同情第四国际统一书记处的马克思主义革命工人政治组织机关报，里约热内卢，六十年代。*Política Operaria*. Organ of Organização Revolucionaria Marxista Política Operaria, group sympathetic to United Secretariat of Fourth International, Rio de Janeiro, 1960's.

《拉丁美洲社会主义合众国纲领》，阿尔维托·贝略尼出版社，布宜诺斯艾利斯，1964年及以后。*Programa Para los Estados Unidos Socialista de América Latina*. Alberto Belloni, publisher, Buenos Aires, 1964 and afterwards.

《干什么？》，墨西哥托洛茨基主义杂志，副报题：《保卫工农利益》，墨西哥，1954—1955年。*¿Qué Hacer?* Trotskyist magazine in Mexico, subtitled “En Defense de los Intereses Obreros y Campesinos,” Mexico, 1954-55.

《马克思主义评论》，智利托洛茨基主义刊物，圣地亚哥，六十年代中期。*Revista Marxista*. Chilean Trotskyist publication, Santiago, middle 1960's.

《拉丁美洲马克思主义评论》，1963年前是巴勃罗派托洛茨基主义拉美地区刊物，1963年后是第四国际波萨达斯派第四国际国际书记处机关刊。*Revista Marxista Latinoamericana*. Until 1963 the Latin American regional publication of the Pabloite faction of International Trotskyism; thereafter “Organ of the International Secretariat of the Fourth International,” the Posadas faction of the Fourth International.

《革命》，秘鲁第一个托洛茨基主义组织马克思主义工人组织双周刊，利

马,四十年代后期。 *Revolución*. Fortnightly newspaper of Grupo Obrero Marxista, first Trotskyite group in Peru, Lima, late 1940's.

《无产阶级革命》,古巴托洛茨基派的机关报,哈瓦那,四十年代初。 *Revolución Proletaria*. Organ of Cuban Trotskyists, Havana, early 1940's.

《红色》,统一书记处法国隶属组织共产主义联盟机关刊,巴黎,1968年9月至今。 *Rouge*. Organ of Ligue Communiste, United Secretariat's French affiliate, Paris, September 1968 to present.

《斯巴达克》,持不同政见的托洛茨基派组织斯巴达克同盟的机关刊,纽约,六十年代和七十年代。 *Spartacist*. Organ of dissident Trotskyist group, Spartacist League, New York, 1960's and 1970's.

《战斗者》,三十年代美洲共产主义同盟和三十年代至七十年代美国社会主义工人党的周报,纽约。 *The Militant*. Weekly newspaper of Communist League of America in 1930's and of Socialist Workers Party of United States from late 1930's into 1970's, New York.

《社会主义论坛》,墨西哥持不同政见的托洛茨基主义组织工人社会主义组织的机关刊,1945—1947年出版,墨西哥。 *Tribuna Socialista*. Organ of Grupo Socialista Obrero, dissident Trotskyist group in Mexico, published 1945-47, Mexico.

《先锋通讯》,六十年代后期和七十年代斯巴达克同盟中持不同政见者出版的油印月刊,纽约。 *Vanguard Newsletter*. Mimeographed monthly published by dissidents from Spartacist League, New York, late 1960's and 1970's.

《工人之声》,波萨达斯派第四国际的玻利维亚隶属组织革命工人党(托)油印机关刊,拉巴斯,1969年至今。 *Voz Obrera*. Mimeographed organ of Partido Obrero Revolucionario (Trotskista), Bolivian affiliate of Posadista Fourth International, La Paz, 1969 to present.

《工人之声》,墨西哥波萨达斯派革命工人党(托)机关刊,六十年代,墨西哥。 *Voz Obrera*. Organ of Partido Obrero Revolucionario (Trotskista), Posadista party in Mexico, in 1960's, Mexico.

《工人之声》,波萨达斯派秘鲁隶属组织革命工人党(托)油印机关报,利马,六十年代和七十年代。 *Voz Obrera*. Fortnightly newspaper of Partido Obrero Revolucionario (Trotskista) of Peru, Posadista affiliate, Lima,

1960's and 1970's.

《无产者之声》，阿根廷托洛茨基主义的波萨达斯派工人党（托）机关刊，布宜诺斯艾利斯，五十年代至七十年代。 *Voz Proletaria*. Organ of Partido Obrero (Trotskyista), Posadista faction of Argentine Trotskyism, Buenos Aires, 1950's into 1970's.

《工人报》，第四国际希利派英国隶属组织社会主义劳工联盟日报，伦敦，1969年至今。 *Workers Press*. Daily newspaper of Socialist Labor League, British affiliate of Healyite Fourth International, London, 1969 to present.

《世界展望》，社会主义工人党出版的非正式的国际新闻周刊，六十年代中期改名为《洲际新闻》，纽约。 *World Outlook*. Unofficial international news weekly published by Socialist Workers Party; in middle 1960's renamed *Intercontinental Press*. New York.

非托洛茨基主义报纸和期刊

《社会主义古巴》，卡斯特罗古巴执政党“理论性”机关刊，1961—1967年，哈瓦那。 *Cuba Socialista*. “Theoretical organ” of government party of Castro's Cuba, 1961-67, Havana.

《贸易》，秘鲁利马出版的极其保守的日报，为米罗·克萨达家族所有。 *El Comercio*. Daily newspaper in Lima, Peru, exceedingly conservative, owned by Miro Quesada family.

《砍刀》，二十年代和三十年代初墨西哥共产党的报纸，墨西哥。 *El Machete*. Newspaper of Communist Party of Mexico in 1920's and early 1930's, Mexico.

《国家》，代表乌拉圭独立民族党的日报，蒙得维的亚。 *El Pais*. Daily newspaper representing Independent Nationalist Party of Uruguay, Montevideo.

《拉丁美洲劳工》，共产党控制的拉丁美洲工会联合会机关刊，1929—1935年，蒙得维的亚。 *El Trabajador Latino Americano*. Organ of Communist-controlled Latin American trade union confederation, Confederación Sindical Latino Americana, 1929-35, Montevideo.

《共产党国家政治活动的发展》，主要在不发达共产党国家开展活动的弗

里德里克·艾伯特基金会出版的油印刊物，德意志联邦共和国，波恩-巴特戈德斯贝格，六十年代和七十年代。 *Entwicklung-politische Aktivitäten Kommunistischer Länder* Mimeographed periodical of Friedrich Ebert Foundation, devoted to activities of Communist nations in underdeveloped countries, Bonn-Bad Godesburg, German Federal Republic, 1960's and 1970's.

《快报》，秘鲁利马的日报，1969年被贝拉斯科政府接管，成为工人合作社。 *Expreso*. Daily newspaper of Lima, Peru.

《格拉玛报》，1965年以后的古巴共产党报纸，哈瓦那。 *Granma*. Havana.

《工业与劳工》，国际劳工组织刊物，日内瓦。 *Industry and Labour*. Geneva.

《国际新闻通讯》，共产国际出版的单面周刊，二十年代和三十年代。 *International Press Correspondence*. Weekly clippingsheet of Communist International, 1920's and 1930's.

《晨报》，日报，蒙得维的亚。 *La Mañana*. Daily newspaper, Montevideo.

《新闻报》，秘鲁利马出版的保守派日报，为佩德罗·贝尔特兰所有。 *La Prensa*. Daily newspaper in Lima, Peru, owned by Pedro Beltrán.

《新美洲》，美国社会党机关报，纽约，五十年代后期到七十年代。 *New America*. Organ of Socialist Party of United States, late 1950's into 1970's, New York.

《纽约先驱论坛报》，纽约出版的日报，二十年代至六十年代。 *New York Herald Tribune*. Daily newspaper in New York, 1920's to 1960's.

《十月》，支持奥万多政权的左翼民族主义组织“塞尔希奥·阿尔马拉斯·帕斯”革命统合中心机关刊，拉巴斯，1969—1970年。 *Octubre*. Organ of Centro de Integración Revolucionaria 'Sergio Almaraz Paz,' left-wing nationalist group supporting Ovando regime, 1969-70, La Paz.

《存在》，具有基督教民主主义倾向的玻利维亚报纸，拉巴斯，五十年代至七十年代。 *Presencia*. Bolivian newspaper of Christian Democratic orientation, 1950's-1970's, La Paz.

《社会主义学说评论纲领报》，墨西哥社会主义研究组织机关刊(罗德里

戈·加西亚·特雷维尼奥主编),墨西哥,五十年代初。*Programa-Revista de Doctrina Socialista*. Organ of Grupo de Estudios Socialistas en México, early 1950's (Rodrigo García Treviño, editor), Mexico.

《起义》,玻利维亚中央工会机关报,拉巴斯,1952年以后。*Rebelión*. Organ of Central Obrera Boliviana, 1952 and thereafter, La Paz.

《红色国际劳工联盟杂志》,红色国际劳工联盟(斯大林主义共产党人的国际工会组织)机关刊,二十年代后期和三十年代早期。*R.I.L.U. Magazine*. Organ of Red International of Labor Unions, international tradeunion organization of Stalinist Communists, late 1920's and early 1930's.

《社会主义呼声》,美国社会党“战斗者”派机关刊,后来是该党正式的机关刊报,纽约,1935—1960年。*Socialist Call*. Organ of “Militant” faction of Socialist Party of United States, and then official organ of the party, 1935-60, New York.

《共产国际》,英国出版的共产国际机关刊物。*The Communist International*. Organ of Communist International, published in Great Britain.

《社会主义先锋》,民主社会主义周刊,马里奥·佩德罗萨主编,里约热内卢,1945—1948年。*Vanguardia Socialista*. Democratic Socialist Weekly, 1945-48 (Mario Pedrosa, editor), Rio de Janeiro.

《季度报告》,弗里德里克·艾伯特基金会出版的油印刊物,德意志联邦共和国,波恩-巴特戈德斯贝格,六十年代至七十年代。*Viertel Jahres Berichte*. Mimeographed publication of Friedrich Ebert Foundation, 1960's into 1970's, Bonn-Bad Godesburg, German Federal Republic.

传 单

《政府委员会致全国的声明》,智利社会主义共和国格罗维政府发布的声明,1932年6月,圣地亚哥。*La Junta del Gobierno al País*. Proclamation distributed by Grove government of the Socialist Republic of Chile, June 1932, Santiago.

革命劳工同盟传单《乌拉圭工人:我们的行会自由处于危险中》,1944年6月12日,蒙得维的亚。*Liga Obrera Revolucionaria. Trabajadores del Uruguay: Peligran Nuestras Libertades Gremiales*, June 12, 1944, Montevideo.

革命劳工同盟传单《冷藏工人罢工万岁》，1946年，日期不详，蒙得维的亚。Liga Obrera Revolucionaria. *Viva la Huelga de los Obreros de los Frigorificos*, undated but 1946, Montevideo.

《三十点纲领》，智利社会主义共和国格罗维政府发布的声明，列举政府的纲领，1932年6月，塔尔卡瓦诺。Los 30 Puntos. Proclamation distributed by Grove government of Socialist Republic of Chile, listing program of the government, June 1932, Talcahuano.

工人政治：《为什么瓜纳巴拉州选举无效？》，谴责巴西瓜纳巴拉州的选举，1965年，日期不详。Política Operaria. *Por Qué Anular o Voto Nas Eleições no Estado da Guanabara*. undated but 1965.

信 件

古巴共产主义运动历史学家安东尼奥·阿隆索·阿维拉致罗伯特·J·亚历山大的信，1970年3月21日。Antonio Alonso Ávila, historian of Cuban Communist movement, to Robert J. Alexander, March 21, 1970.

詹姆斯·P·坎农致查尔斯·柯蒂斯的书信，1938年6月21日。James P. Cannon to Charles Curtiss, June 21, 1938.

查尔斯·柯蒂斯致罗伯特·J·亚历山大的信，1971年2月10日。Charles Curtiss to Robert J. Alexander, February 10, 1971.

卢西亚诺·加利西亚致列夫·托洛茨基的书信，1938年12月20日。Luciano Galicia to Leon Trotsky, December 20, 1938.

约瑟夫·汉森致罗伯特·J·亚历山大的信，1970年12月24日。Joseph Hansen to Robert J. Alexander, December 24, 1970.

墨西哥国际共产主义同盟致第四国际泛美局的信，1939年2月10日。Liga Comunista Internacionalista of Mexico to Buro Panamericana de la IV Internacional, February 10, 1939.

第四国际泛美与太平洋局书记何塞·洛佩斯致迭戈·里维拉的书信，1938年10月21日。José López, Secretary of Pan American and Pacific Bureau of Fourth International to Diego Rivera, October 21, 1938.

卡洛斯·曼努埃尔·佩列塞尔致罗伯特·J·亚历山大的信，1969年3月14日。Carlos Manuel Pellecer to Robert J. Alexander, March 14, 1969.

特伦斯·费伦从阿根廷科尔多瓦山区致查尔斯·柯蒂斯信，1941年10月28日。Terence Phelan to Charles Curtiss, from Sierra de Córdoba, Argentina, October 28, 1941.

迭戈·里维拉致查尔斯·柯蒂斯信，1939年3月20日。Diego Rivera to Charles Curtiss, March 20, 1939.

曼努埃尔·罗德里格斯致罗伯特·J·亚历山大的信，1971年3月。Manuel Rodriguez to Robert J. Alexander, March 1971.

社会主义工人党前领导人，持不同政见的托洛茨基主义派马克斯·沙赫曼致罗伯特·J·亚历山大的信，1970年12月7日。Max Shachtman, former leader of Socialist Workers Party and of dissident Trotskyist group, to Robert J. Alexander, December 7, 1970.

纳塔莉娅·塞多娃·托洛茨基致“第四国际执行委员会”和“社会主义工人党政治委员会”的信，1951年5月9日。Natalia Sedova Trotsky to “Comité Ejecutivo de la IV Internacional” and to “Comité Político del Socialist Workers Party,” May 9, 1951.

其他未发表过的材料

匿名者：《关于阿根廷托洛茨基主义的备忘录》，提供本材料的作者是希望不公布姓名的原阿根廷托洛茨基派领导人。Anonymous. “Memorandum on Argentine Trotskyism.”

匿名外交人士：《革命工人党——托洛茨基主义分子[革命工人党(托)]》，1967年3月。Anonymous Diplomatic Source. “Revolutionary Workers Party—Trotskyite (POR/T),” March 1967.

匿名外交人士：《革命工人党(托)》，1969年3月。Anonymous Diplomatic Source. “The Revolutionary Workers Party (POR/T),” March 1969.

夏利埃，费尔南：《波萨达斯主义：事后的分析报告》，未发表的文章。Charlier, Fernand. “Le Posadisme: Un Rapport d’Autopsie.”

奇尔科特，罗纳德：《巴西的共产党》，手稿。Chilcote, Ronald. “The Brazilian Communist Party.”

奥克塔维奥·费尔南德斯档案：关于三十年代和四十年代墨西哥托洛茨基主义运动的文件，属前墨西哥托洛茨基派领袖奥克塔维奥·费尔南德斯所

有。Octavio Fernandez. Archives (referred to as OFA in text). Documentation on Trotskyist movement of Mexico, 1930's and 1940's.

纳夫特, 斯蒂芬: 《拉丁美洲的劳工运动》, 手稿日期不详。Naft, Stephen. "Labor Movements in Latin America."

佩列塞尔, 卡洛斯·曼努埃尔: 《从韦特海姆博士到波尔卡诺博士》, 打字文稿, 未注明日期。Pellecer, Carlos Manuel. Del Doctor Wetheim al Doctor Polcano.

访 问 记

奥斯卡·巴里恩托斯, 革命工人党科恰班巴地区领导人, 1954年7月26日于玻利维亚科恰班巴。Oscar Barrientos, leader of Partido Obrero Revolucionario in the Cochabamba region, in Cochabamba, Bolivia, July 26, 1954.

赫尔曼·布特龙, 制造业工人总联合会执行书记, 1953年7月11日于拉巴斯。Germán Butrón, Executive Secretary of Confederación General de Trabajadores Fabriles, in La Paz, July 11, 1953.

查尔斯·柯蒂斯, 一度担任第四国际驻墨西哥代表, 1970年8月8日于新泽西州皮斯卡塔威。Charles Curtiss, one-time Fourth International delegate in Mexico, in Piscataway, New Jersey, August 8, 1970.

迪奥赫内斯·德拉罗莎, 巴拿马马克思列宁主义工人党创建人, 后为社会党领导人, 1948年7月26日于巴拿马城。Diógenes de la Rosa, founder of Partido Obrero Marxista-Leninista of Panama, later a leader of Socialist Party, in Panama City, July 26, 1948.

奥克塔维奥·费尔南德斯, 一度任墨西哥国际共产主义同盟, 国际主义工人党和社会主义工人组织的领导人。1971年1月21日和23日于墨西哥城。Octavio Fernández, one-time leader of Liga Comunista Internacionalista, Partido Obrero Internacionalista and Grupo Socialista Obrero of Mexico, in Mexico City, January 21 and 23, 1971.

费尔南德斯夫人, 前托洛茨基主义领导人奥克塔维奥·费尔南德斯之妻, 1971年1月21日于墨西哥城。Sra. de Fernández, wife of ex-Trotskyist leader Octavio Fernández, in Mexico City, January 21, 1971.

伊斯梅尔·弗里亚斯, 秘鲁巴勃罗派革命工人党前领导人, 1971年7月

13日于利马。Ismael Frias, ex-leader of Pabloite faction of Partido Obrero Revolucionario of Peru, in Lima, July 13, 1971.

卢西亚诺·加利西亚,一度任墨西哥国际共产主义同盟和国际主义工人党领导人,1971年1月22日于墨西哥城。Luciano Galicia, one-time leader of Liga Comunista Internacionalista and of Partido Obrero Internacionalista of Mexico, in Mexico City, January 22, 1971.

罗德里戈·加西亚·特雷维尼奥,一度任墨西哥工人联合会法律事务助理秘书长,墨西哥社会主义组织秘书长,1971年1月20日于墨西哥城。Rodrigo García Treviño, one-time Assistant Secretary of Technical Affairs of Confederación de Trabajadores de Mexico; one-time Secretary-General of Grupo de Socialistas Mexicanos, in Mexico City, January 20, 1971.

费布斯·吉科瓦特,巴西社会党圣保罗领导人,1953年6月17日于圣保罗。Febus Gikovate, former Trotskyite, a São Paulo leader of Partido Socialista Brasileiro, in São Paulo, June 17, 1953.

约瑟夫·汉森,《洲际新闻》主编,美国社会主义工人党的主要领导人,1970年1月28日于纽约市。Joseph Hansen, editor of *Intercontinental Press*, a major leader of Socialist Workers Party of United States, in New York City, January 28, 1970.

曼努埃尔·伊达尔戈,智利共产党左翼前领导人,1946年12月17日于圣地亚哥。Manuel Hidalgo, former head of Izquierda Comunista of Chile, in Santiago, December 17, 1946.

爱德华多·伊瓦拉,智利市政工人工会主席,1947年4月17日于圣地亚哥。Eduardo Ibarra, President of Unión de Obreros Municipales de Chile, in Santiago, April 17, 1947.

费利克斯·伊瓦拉,一度任墨西哥国际共产主义同盟秘书长,1971年1月20和22日于墨西哥城。Félix Ibarra, one-time Secretary-General of Liga Comunista Internacionalista of Mexico, in Mexico City, January 20 and 22, 1971.

埃斯特班·基基奇,自治工会联络委员会委员,乌拉圭革命劳工同盟领导人,1946年10月10日和17日于蒙得维的亚。Esteban Kikich, member of Comité de Enlace de Sindicatos Autónomos, leader of Liga Obrera

Revolucionaria of Uruguay, in Montevideo, October 10 and 17, 1946.

胡安·莱钦,玻利维亚矿工工会联合会执行书记,1947年5月28日和1952年8月14日于拉巴斯,1957年7月30日。Juan Lechín, Executive Secretary of the Federación Sindical de Trabajadores Mineros de Bolivia, in La Paz, May 28, 1947, August 14, 1952, and July 30, 1957.

伊尔卡尔·莱特,巴西前托洛茨基主义领导人,1953年6月11日于里约热内卢。Hilcar Leite, former Brazilian Trotskyist leader in Rio de Janeiro, June 11, 1953.

欧卡里奥·莱昂,墨西哥全国劳工联合会主席,1951年8月20日于墨西哥城。Eucario León, President of Confederación Nacional del Trabajo of Mexico, in Mexico City, August 20, 1951.

吉列尔莫·林皮亚斯·比列加斯,玻利维亚银行工人工会领导人,1953年7月11日于拉巴斯。Guillermo Limpías Villegas, head of Bank Workers Union of Bolivia, in La Paz, July 11, 1953.

赫纳罗·利纳雷斯,全国烹调工人联合会秘书长,1957年7月23日于拉巴斯。Genaro Linares, Secretary-General of Federación Nacional de Gastronómicos, in La Paz, July 23, 1957.

阿里斯蒂德斯·洛沃,前巴西托洛茨基主义领导人,1953年6月17日于圣保罗。Aristides Lobo, former Brazilian Trotskyist leader, in São Paulo, June 17, 1953.

吉列尔莫·洛拉,玻利维亚革命工人党主要领导人,1947年6月2日于拉巴斯。Guillermo Lora, principal leader of Partido Obrero Revolucionario of Bolivia, in La Paz, June 2, 1947.

阿图罗·马丁内斯,墨西哥国际共产主义同盟前领导人,1971年1月20日于墨西哥城。Arturo Martínez, former leader of Liga Comunista Internacionalista of Mexico, in Mexico City, January 20, 1971.

普利尼奥·梅洛,前巴西托洛茨基主义领导人,巴西社会党圣保罗领导人,1953年6月16日于圣保罗。Plinio Melo, former Brazilian Trotskyist leader, São Paulo leader of Partido Socialista Brasileiro, in São Paulo, June 16, 1953.

卢西奥·门迪维尔,玻利维亚革命工人党领导人,参议员,1947年5月28日于拉巴斯。Lucio Mendivil, leader of Partido Obrero Revolucionario

of Bolivia, and Senator, in La Paz, May 28, 1947.

埃德温·莫勒，玻利维亚中央工会的主要托洛茨基派领导人，后来是民族主义革命运动国会议员，1953年7月10日、1954年7月20日、1956年8月22日、1957年7月20日于拉巴斯。Edwin Moller, principal Trotskyite leader in Central Obrera Boliviana, subsequently deputy for MNR, in La Paz, July 10, 1953, July 20, 1954, August 22, 1956, and July 20, 1957.

马里奥·蒙特内格罗，民族主义革命运动创建者卡洛斯·蒙特内格罗之子，他本人是民族主义革命运动分子，1962年4月7日于拉巴斯；1960年5月28日于首都华盛顿。Mario Montenegro, son of Carlos Montenegro, founder of MNR, himself a Movimientista, in La Paz, April 7, 1962, and Washington, D .C., May 28, 1960.

曼努埃尔·纳兰霍，智利工会行动会秘书长，1953年7月1日于圣地亚哥。Manuel Naranjo, Secretary-General of Acción Sindical Chilena, in Santiago, July 1, 1953.

琼·纳什，美国人类学家，1971年3月31日于新泽西州新不伦瑞克。June Nash, United States anthropologist, in New Brunswick, New Jersey, March 31, 1971.

古斯塔沃·纳瓦罗(特里斯坦·马罗夫)，玻利维亚革命工人党和社会主义工人党的创建人，1947年5月26日于拉巴斯。Gustavo Navarro (Tristán Marof), founder of Partido Obrero Revolucionario and of Partido Socialista Obrero de Bolivia, in La Paz, May 26, 1947.

马里奥·佩德罗萨，前巴西托洛茨基主义领导人，《社会主义先锋》主编，1946年8月14日于里约热内卢。Mario Pedrosa, former Brazilian Trotskyite leader, editor of *Vanguardia Socialista*, in Río de Janeiro, August 14, 1946.

维克托·帕斯·埃斯登索罗，玻利维亚前总统，民族主义革命运动领导人，1971年7月10日于秘鲁利马。Victor Paz Estenssoro, ex-President of Bolivia, leader of Movimiento Nacionalista Revolucionario, in Lima, Peru, July 10, 1971.

阿斯特罗吉尔多·佩雷拉，前巴西共产党领导人，1965年10月19日于里约热内卢。Astrogildo Pereira, former leader in Brazilian Communist Party, in Río de Janeiro, October 19, 1965.

N·M·佩雷拉,锡兰平等社会党领导人,财政部长,1971年9月21日于纽约市。N. M. Pereira, leader of Lanka Sama Samaja Party of Ceylon, Minister of Finance, in New York City, September 21, 1971.

伊里内奥·皮门特尔,玻利维亚矿工工会联合会领导人,民族主义革命运动分子,1954年3月14日于新泽西州新不伦瑞克。Irineo Pimentel, a leader of Federación Sindical de Trabajadores Mineros de Bolivia, MNR member, in New Brunswick, New Jersey, March 14, 1954.

恩里克·兰赫尔,墨西哥全国无产者联合会主席,1948年8月23日于墨西哥城。Enrique Rangel, President of Confederación Proletaria Nacional of Mexico, in Mexico City, August 23, 1948.

曼努埃尔·罗德里格斯,墨西哥托洛茨基主义创建人,1971年1月22日于墨西哥城。Manuel Rodríguez, a founder of Mexican Trotskyism, in Mexico City, January 22, 1971.

埃米尼奥,萨切塔,巴西革命社会党前领导人,1953年6月16日于圣保罗。Hermínio Saccheta, former leader of Partido Socialista Revolucionario of Brazil, in São Paulo, June 16, 1953.

卡洛斯·萨拉萨尔,玻利维亚社会主义工人党执行委员会委员,《战斗》报主编,1947年5月29日于拉巴斯。Carlos Salazar, member of Executive of Partido Socialista Obrero de Bolivia, editor of *Batalla*, in La Paz, May 29, 1947.

豪尔赫·萨拉萨尔,革命工人党领袖,铁路局经理,1947年5月28日和1952年8月13日于拉巴斯。Jorge Salazar, a leader of Partido Obrero Revolucionario, Manager of Caja de Ferroviarios, in La Paz, May 28, 1947 and August 13, 1952.

尼古拉斯·桑切斯,矿工联合会中革命工人党一派的领导人,1947年5月26日于拉巴斯。Nicolas Sánchez, a leader of Partido Obrero Revolucionario faction in the miners federation, in La Paz, May 26, 1947.

埃尔南·桑切斯·费尔南德斯,玻利维亚社会主义工人党执行委员会委员,玻利维亚矿工联合会早期领导人,1947年5月28日于拉巴斯。Hernán Sánchez Fernández, member of Executive Committee of Partido Socialista Obrero de Bolivia, early leader of Miners Federation of Bolivia, in La Paz, May 28, 1947.

何塞·圣地亚哥和温贝托·巴伦苏埃拉,前者为革命工人党执行委员会秘书长,后者为委员,1946年12月28日于智利圣地亚哥。 José Santiago, Secretary-General, and Humberto Valenzuela, member of Executive Committee of Partido Obrero Revolucionario, in Santiago, Chile, December 28, 1946.

马克斯·沙赫曼,社会主义工人党前领导人,前第四国际执行委员会委员,长岛植物园,1970年1月16日;1970年6月21日于纽约市。 Max Shachtman, former leader of Socialist Workers Party, former member of Executive Committee of Fourth International, in Floral Park, Long Island, January 16, 1970, and in New York City, June 21, 1970.

查尔斯·西米恩,古巴托洛茨基主义运动创建者之一,1970年4月12日于新泽西州尤尼恩城。 Charles Simeon, one of founders of Trotskyist movement of Cuba, in Union City, New Jersey, April 12, 1970.

罗伯特·西森,前民族解放联盟书记,1965年9月8日于里约热内卢。 Roberto Sisson, former Secretary of Alianza Nacional Libertadora, in Río de Janeiro, September 8, 1965.

劳尔·巴尔迪维亚,古巴糖业工人联合会中前真正党领导人,1971年1月20日于墨西哥城。 Raúl Valdivia, former Auténtico leader in Sugar Workers Federation of Cuba, in Mexico City, January 20, 1971.

阿道弗·贝内加斯,秘鲁阿普拉党纪律委员会委员,阿普拉党大学指挥部前书记,1971年7月12日于秘鲁利马。 Adolfo Venegas, member of Discipline Commission of Partido Aprista Peruano, ex-secretary of University Command of Aprista party, in Lima, Peru, July 12, 1971.

贝尔纳维·比利亚雷亚尔,拉巴斯汽车司机工会秘书长,玻利维亚工人联合会执行委员会委员,1952年8月14日于拉巴斯。 Bernabé Villarreal, Secretary-General of La Paz Chauffeurs Union, member of Executive Committee of Confederación Sindical de Trabajadores Bolivianos, in La Paz, August 14, 1952.

奥斯卡·韦斯,前智利托洛茨基主义领导人,1947年3月17日、1968年7月3日、1971年6月19日于智利圣地亚哥。 Oscar Weiss, a former leader of Chilean Trotskyists, in Santiago, Chile, March 17, 1947, July 3, 1968, and June 19, 1971.

何塞·塞加达,玻利维亚中央工会记录书记,1954年7月29日于拉巴斯。José Zegada, Recording Secretary of Central Obrera Bolivia, in La Paz, July 29, 1954.